

As Nature Made Him

性別天生

一個性別實驗犧牲者的真實遭遇

1966年4月27日，
一名失去陰莖的男嬰被變性成女生。
對世人而言，
性別可以後天決定的實驗成功了，
但是，
女孩的染色體卻不同意……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C0156728

約翰·科拉品托=著



▲真娜跟她的雙胞胎兒子，布萊恩和布魯斯。導致布魯斯變性的重大意外還在幾個月之後。



▲兩歲時的布蘭達，攝於她變性後不久。



◀ 蹣跚學步時的布蘭達和布莱恩。

▼ 布蘭達和布莱恩，大約開始上幼稚園的年紀。



▲ 布莱恩和布蘭達——最佳的「配對」。



◀ 布蘭達十歲的時候。「每個人都說你是女生，」大衛後來說：「但是你告訴自己：『我不覺得自己是女生。』」



▲一九七〇年中期的耶誕節，布蘭達穿上最好的衣服去看祖父母。



▶一九七八年五月，布莱恩、朗恩、真娜攝於最後一次造訪巴爾的摩的途中。拍攝者為布蘭達，她在生命這個時期，小心地不讓自己入鏡。



▲布莱恩和布蘭達攝於十四歲。拍完這張照片不久之後，他們就得知布蘭達出生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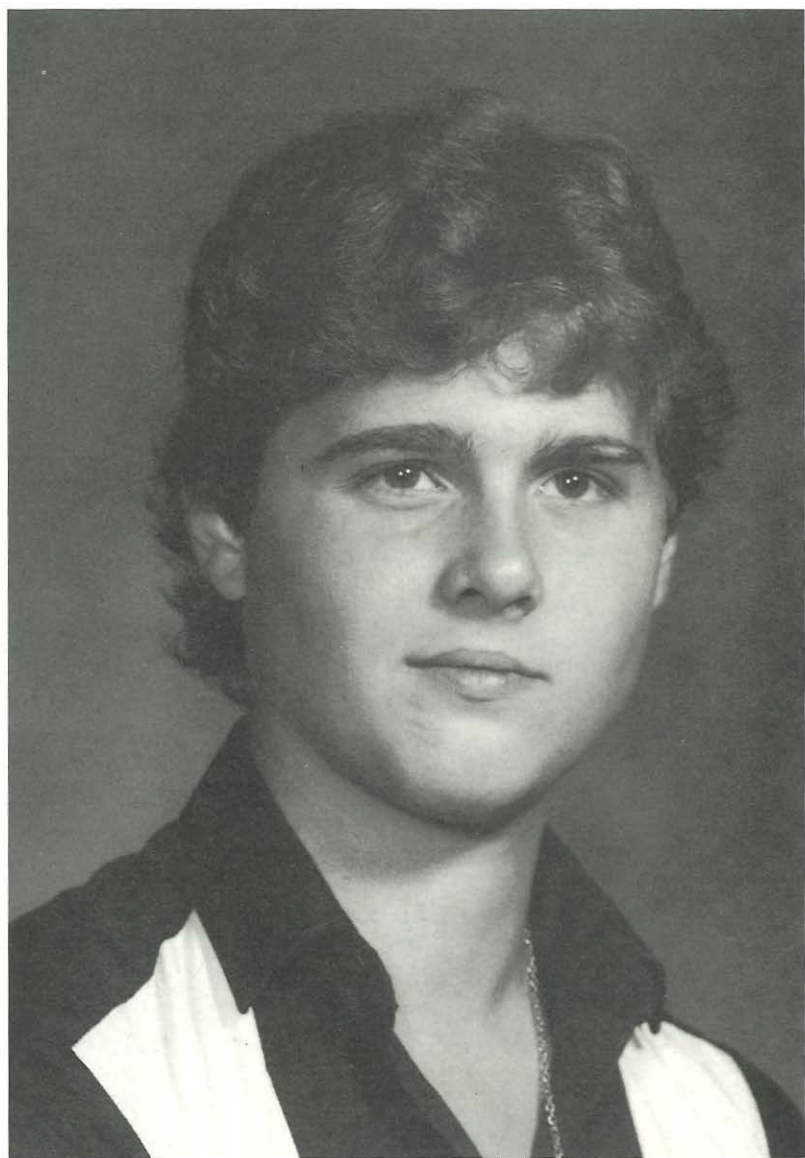
◀十二歲的布蘭達，攝於她開始用荷爾蒙促進身材女性化之前不久。



►一九八〇年五月，大衛和布萊恩攝於舅舅的婚禮上，這是大衛第一次以男生身分公開亮相。大衛仍然留著布蘭達暴飲暴食以掩飾凸出胸部的後遺症。他的胸部在五個月後以手術移除，加上注射睪固酮，讓大衛很快就趕上學生弟弟的身高。



▲大衛和布萊恩，攝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在舅舅的婚禮上。



▲十八歲時的大衛。



▲大衛和珍攝於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的結婚典禮。珍對於大衛過去真相的反應，讓他確信了她的「真心」。

〈本書照片均由利馬家提供〉



性別天生

AS NATURE MADE HIM

前言

- 【推薦序一】 陰陽和而萬物得
- 【推薦序二】 生物科技入主生活的省思
- 【推薦序三】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 【推薦序四】 錯誤軀體的啟示
- 【推薦序五】 由記錄片手法看《性別天生》
- 【譯者序】 貼近生命的憂傷
- 【導 讀】 褲襠間的迷思

王道還
吳英璋
黃越綏
陳皎眉
虞戡平
戴蘊如
潘震澤

第一部 科幻遊戲

第一章 悲劇降臨

第二章 先天本性 vs. 後天教養

第三章 布蘭達誕生

第二部

真相大白

第四章 男孩女孩

第五章 脫掉衣服！

第六章 四分五裂

第七章 被動了手腳

第八章 潛意識中的男生

第九章 變性追逐戰

第十章 永別約翰霍普金斯

第十一章 水落石出

第十二章 還我男兒身

第三部

性別天生

第十三章 銷聲匿跡的雙胞胎案例



性別天生

AS NATURE MADE HIM

謝辭

結語

第十四章 向多餘變性說不

第十五章 風向逆轉

第十六章 終入坦途



313

309

285 267 233





【推薦序一】

陰陽和而萬物得

王
道
學

性象 (sexuality)

羅馬神話中有這麼個故事。有一天，天帝朱彼特 (Jupiter) 與天后朱娜 (Juno) 閒來沒事，有一句沒一句的扯淡。不知怎地朱彼特逗弄朱娜說：「得了，妳們女人在床上比男人爽多了。」朱娜不同意。小倆口居然認真起來，要找凡人泰立席斯 (Tiresias) 問個明白。

原來泰立席斯有過奇遇，男人女人都做過。他本是男人，有一次在森林中以手杖打了兩條正在交尾的巨蛇，突然就變成女人了。泰立席斯做了七年女人後，又遇上那兩條蛇正在交尾，他想到：「要是打你們一下就會產生變性的魔效，我就再打你們一下。」於是他就變回了男兒身。

對於天帝夫婦的玩笑話，泰立席斯當然最有資格評斷。他也不想就證實了朱彼得的說法。哪裡知道朱娜居然翻臉，詛咒泰立席斯此後活在永恆的黑暗中。於是他成了瞎子。朱比特當然過意不去，但是由於天神無法撤銷其他天神的命令，他就賜予泰立席斯預知未來的能力。於是泰立席斯成為世上最著名的預言家。

這個故事要是抽去神話，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個亦男亦女的人擁有超自然的能力。因為世上的自然人只有男人或女人，亦男亦女的人不自然，所以超自然。

其實泰立席斯不只是神話中的人物。澳洲人彼得(Peter Stirling)就是一個，現在他鬍子斑白，頭也開始禿了，就要慶祝銀婚紀念。但是他還記得十五歲初潮，二十二歲生下一個女孩的經驗。(你不會以為我寫錯了吧?)

彼得一九三六年出生於雪梨，是不折不扣的女生，那時父母取的名字是珍妮。不過珍妮到了青春期，老師就要她退出學校的合唱團，因為她的聲音低沉了些。她初潮來的時候，正在操場上與男生踢足球。

珍妮二十一歲時與羅伯結婚，可是生下孩子後婚姻就破裂了。她覺得不對勁，又說不出名堂，就找醫師求助，結果轉診到倫敦。專家發現她體內的雄性荷爾蒙高得異常，於是她切除了乳房、子宮，變成彼得。後來他再婚了，這回他可是新郎。

以染色體、性器官而言，彼得是女性，他有卵巢，體內的女性荷爾蒙也正常。可是他的身體裡也有能夠製造大量男性荷爾蒙的組織。所以珍妮生下女兒，可是卻由彼得將她嫁出去。不過彼得仍需要不時注射男性荷爾蒙。

也許珍妮／彼得的故事畢竟不是神話，彼得這位現代泰立席斯並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他只想以自己的故事幫助他人。彼得不像泰立席斯，他寧願不去回想那段身為女人的



日子。天帝夫婦的問題其實只是：「做異性的感覺是什麼？」他告訴我們的卻是：「一個身體裡有兩個人，珍妮必須離開，彼得才能現身，」意思是：他不想做珍妮，決定做得。

這也是本書主角大衛的決定。從他還不滿兩歲的時候開始，一直都是女生布蘭達，但是他決定做男生大衛。可是布蘭達的故事與珍妮／彼得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是心理學家曼尼(John Money)精心設計的科學實驗，想為「性別後天論」張目。(相形之下，天帝夫婦對待陰陽人的方式，令人覺得溫暖多了。)

由於大衛有個同卵孿生弟弟，他的案例似乎是「性別天生」的最佳證據。但是一九九八年曝光的另一個加拿大案例，更能呈現「性別天生」的「說法」其實並不足以反映問題的複雜程度：

一個出生時正常的男嬰，因為意外喪失陰莖(與大衛的遭遇相同)，七個月大時以手術「指定」為女生(大衛是在接近兩歲的時候接受手術的)，從此當作女生撫養。到了一九九八年，她已二十六歲。她交過好幾個男友，最近與男友分手，變成女同志。她以藍領工作維生(那個行業不禁止女性入行，但實際上全由男性包辦)。她從小行為上就像個男孩，性幻想的對象以女性為主。但是研究人員認為她的性別認同是女性，只有性別角色、性傾向仍屬男性。

換言之，這些研究者認為這個案例至少需要三個不同的概念來談「先天／後天」的影響：性別認同、性別角色、性傾向。性別認同比較容易受養育經驗的塑模，而性別角色、性傾向則比較受「生物因素」的支配。

可是這個結論卻與彼得與大衛的經驗牴觸。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性別天生的簡單「說法」不能窮盡人類經驗，甚至連動物的經驗都無法解釋。我們還是從「性」談起罷。

有性生殖

生物的定義就是「生」，與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生」同義。性別是生殖分工的結果。可是「生殖為什麼必須分工？」在演化生物學裡一直是個大問題，高手非要以這個問題掂掂自己的斤兩不可。理由很簡單：好端端的自己生不就成了，幹嘛還要找個伴？千萬別忘記合作是背叛的溫床。（讀過古龍的小說嗎？）伴侶既要質優，又要可靠，這麼好的事，憑什麼落到我頭上？（天可憐見，讓我中樂透好嗎？）何況尋尋覓覓，花時間、花精神，煩都煩死了，可是最後結算下來，自己身體裡的基因最多只有一半遺傳給子女。

總之，有性生殖風險高，又不划算。可是在生物界有性生殖卻是主流模式，連細菌似乎都不例外。為什麼？



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尤其顯得尖銳。因為魚類、兩棲類、爬行類仍有物種能夠實行孤雌生殖，就是卵不須受精就能發育成個體。（蜜蜂、螞蟻的卵要是不經受精，可以發育成雌性。）但是哺乳類中沒有一個物種可以孤雌生殖。偏偏哺乳類的雌性身體是完美的生產機器，她們似乎最不需要雌性了。迪士尼卡通片《小鹿斑比》就非常寫實：斑比的爸爸從來沒盡過家長的義務。熟悉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的觀眾，一定對於剛出生的鹿，不久就能站起追著媽媽吃奶十分驚異。哺乳類幹嘛需要雌性？他們似乎一輩子只做兩件事，不是打架就是打炮——一樣糟蹋糧食。（只有男「人」例外，男人最命苦。）

對這個問題，最流行的答案是：兩性生殖可以增加子女基因組的複雜程度。只有在棲境會迅速惡化的情況下，這才是最好的策略。生物的棲境真的惡化得那麼快嗎？英國演化生物學大師漢彌頓(W. D. Hamilton, 1936-2000)的睿見是：與我們一齊生存競爭的是病媒。病媒的生命週期短，牠們以速度與數量的優勢，前仆後繼、見縫插針，是驅使複雜生物拚命演化最重要的力量。相對於病媒的繁殖（變異）速率，我們的確生活在生存條件日趨惡劣的棲境中。看來兩性分工的生殖模式是我們的演化宿命。

了解了這一點，再來討論「性別是否天生」的問題，就比較容易避免以訛傳訛，凸顯議題了。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人類的兩性分工生殖模式是演化的產物，哺乳類物種無一例外。

「異常」的「性傾向」，要是不能「遺傳」給子女，都無法說是天生的。

一九九三年美國有個研究團隊「發現」男同志的X染色體長臂上有共同的標誌段落 (genetic marker)，這一段DNA名為xq28。一時之間媒體爭相報導發現「男同志基因」(gay gene)了。由於男性的X染色體來自母親，因此有一陣子男同志流行在T恤上印上：「謝謝媽，沒有你就沒有xq28！」可是真相是：

一、這不是所謂的「男同志基因」；

二、xq28是X染色體上的一段，包括許多基因，還沒有一一找出，更不用說確定每個基因的功能了。

三、一九九九年有份研究報告指出：更多的男同志沒有這個特定的xq28。而最近的研究，仍未證實一九九二年對於xq28的結論。

有趣的是，國內有位醫師去年底卻迫不及待地在報上義憤填膺地指出：「生物學的知識已經逐漸披露所謂『同性戀』行為有其基因遺傳的基礎。而且偏向母系遺傳。」(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聯合報／聯合副刊)

其次，性器官的確可能遭到「挪用」，達到生殖以外的目的。人類近親巴諾布猿 (bonobo) 就是精於性遊戲的高手。在牠們的社群中，性不只是繁衍的手段，而是社會的潤滑劑，無論雌雄老少同性異性，都以性作為調整社會關係的手段。在劍拔弩張的場合，雙方



公開玩起性的遊戲，是消除衝突的制式表演。巴諾布猿過去給當作矮種黑猩猩，直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學者才確定是個獨立物種，據估計牠們二百萬年前才與黑猩猩(chimpanzee)分化。巴諾布猿的社會生活與黑猩猩不同，暴力事件很少見，學者認為那是牠們以做愛代替作戰的結果。

人類社會據說最古老的行業就是「性工作」，至今禁不勝禁。此外，人類夫婦間的性交名曰「敦倫」，透顯了人類的性行為不以生殖為唯一目的的本質。這都與巴諾布猿「挪用」性器官從事社交的行動，沒有本質的差異。何況我們有個異常發達的大腦——黑猩猩與巴諾布猿的三倍到四倍大。

性別天生

但是性的挪用與性的本職到底是兩回事。英美大規模的性調查，的確發現了人類性象在行為上的表現是個「連續體」：從陽剛男人到陰柔男人，從陰柔女人到陽剛女人，從絕對的異性戀到絕對的同性戀。但是這種質的描述無法反映量的事實：完全以同性為情欲對象的人絕對是少數。例如一九九四年公布的芝加哥大學報告顯示，受訪前一年內與同性有過性接觸的男性只有二·七%，女性則是一·二%。

「性別天生」之類的議題，其實只是性倫理已經變遷的症狀。同志出櫃運動，爭取的

是普世人權，本來就不需要老天（基因）的支持。人體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腦，而不在腰部以下。以人類最近一兩百年的創制成就來說，想像新的肉體關係、新的感情模式輕而易舉。只不過演化信不過大腦。熟悉浮世男女故事的人，大概也信不過吧？

參考資料：《性趣何來》，戴蒙著，王道還譯，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

（本文作者為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推薦序二】

生物科技入主生活的省思

醫學的發展的確協助許許多多的人們度過病痛的侵襲與威脅，但它的誤用也造成（或增加）了某些人的痛苦。本書以傳記式的手法，深刻地描繪出身受其苦的個案三十多年來的身心困厄。

讀到本書的大綱時，馬上聯想到三十年前某一次在醫院裡碰到一位意志非常堅決要求「變性」的個案。當時在相關的醫學技術報告中，已有相當成熟的做法與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案例，然而主其事的幾位前輩均非常謹慎，包括協助案主回憶她的過去，幾乎是用放大鏡來檢驗其欲求「變性」之理由是否無任何不妥之處；第二，雖然案主已經是「成人」，但亦期盼與其家人共同討論這件事；另一方面也引導她想著未來的生活。如果真的進行該項技術，她的身體會有哪些變化，以及由這項變化所衍生出來的心理、社會、文化等等問題。我已經忘了最後是不是進行了該項技術，但是幾位前輩的尊重個案、審慎與她一起思考這個「決定」，不厭其煩地再三檢視各種「可能性」等專業表現，令我至今仍記憶猶新。「醫學技術發展出來之後，尤其是新的醫學技術，對醫事工作人員會產生很多的誘

惑，形成一種忍不住想試試看的衝動，也因而會有偏向樂觀（甚至過度樂觀）之後果預測的心理傾向，所以要特別審慎。因為醫事技術介入到一個人的身上，常是無法回頭的，而身體上的變化一定會衍生出心理、社會、倫理道德等等相關聯的種種變化。醫事人員要對得起病人所託付的信任。」這是當時由各位前輩的身教所留存在心裡的工作信念。

證諸本書的案例，一位學術與專業地位均非常高的專家，卻將他的光環建立在本書主角及其家人既深且廣的痛苦之上，令人深惡痛絕之餘，也當心現今的醫學界與生物科技界是否也有類似的情況而不自知。諾貝爾發明炸藥之後的懊惱不曉得是否也繼續發生在各位諾貝爾獎得主身上？

展讀本書，有一種一發不可收拾的感覺，一方面跟著書中的主角（與其親人）心情起落，非看到最後的發展不可，一方面計較著「那傢伙」有沒有得到他應有的懲罰，再一方面則聯想著近三十年來自己在臨床上接觸的病友們，而作了無限的延伸。生物科技逐漸開始主宰人們生活的現在，本書令人深省！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推薦序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黃越綏

在今天，變性外科手術已經是許多先進國家白天脫口秀節目的主要素材之一，但大家很難想像在五〇年代，這種概念聽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

雖說科學的首要格言之之一就是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立基於單一實驗上，但曾是世上最受尊敬的美國性別研究者之一，也是創造了「性別認同」此詞的心理學家曼尼(John Money)，為了證明其極端主張「在性別塑造過程中，環境因素的確勝過生物因素」，他抓住機會利用了一對加拿大的雙胞胎男嬰，其中一位男嬰的陰莖在割包皮手術中被燒掉，男嬰的年輕父母在無知與慌亂無助的情況下，接受了曼尼的建議，讓男嬰進行了變性的治療，並深信只要依靠手術和荷爾蒙，就可以讓男嬰順利正常成長，且變成異性戀的女性，結果不但證明是失敗的心理實驗工程，更因為這個案例的發表，幾乎摧毀了男嬰家庭的前途與幸福，更令這位無辜的男嬰在既無選擇又無能力反抗的沈默下，痛苦地承受自己是男性而非女性的性別扭曲，且歷經三十年慘無人道的羞辱與私密的陰影。

這些問題的答案正說明了性別認同的神祕性，同時也揭露了傑出性別研究者之間的競

爭，其殘酷的本質不只造成這個令人不安的醫學悲劇，也可能就是當初促成這個實驗的誘因。也許正如約翰霍普金斯的心理系主任麥克修(Paul McHugh)一針見血的說法，心理學家應該以談話治療，而非以激進且無法變更的手術來醫治病人；另外雷納醫生(William Reiner)更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必須學習傾聽孩童本身的心聲，他們才是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的人」，何況我們誰也無法取代上帝的角色來決定別人的命運。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竭誠地推薦這本用血淚交織而成的醫史見證，除了希望能引起本國專業心理學家及醫生們的重視並作為借鏡外，最重要的是此書的故事內容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因為意外不是某人的專利，苦難更非生存的目的，因此您絕對不能忽視了《性別天生》對您的影響，同時也期待您能用悲天憫人的心情來閱讀此佳作。

(本文作者為心理諮商專家、美國諮商協會會員)



【推薦序四】

錯誤軀體的啟示

陳百眉

本文所敘述的雙胞胎案例，因為是那麼地有名，幾乎只要對人類行為到底是先天決定或後天影響爭論稍有接觸的人，都會有所涉獵；它甚至普遍地出現在普通心理學的教科書上，而大部分的人也只是愉快地把它當成是支持後天影響的一個重要案例，畢竟大家一直以為「她」適應良好，成功地被撫養成一個與先天遺傳相反的性別。

沒想到，事實的真相是這樣地殘酷：大衛不但沒有適應良好，他其實生活在一個「悲慘世界」中；他一點都不像女生，而且也不覺得自己是女生。雖然，後來經由他自己、家人與專家們的協助，大衛再度變回男性，也有一個相當光明的未來，但是，他所經歷的一切真的是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也許，經由這個案例，科學家們可以學會更謙卑一些，不要太武斷地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自覺「好像生活在一個錯誤的軀體裡(in the wrong body)」是專家在考慮是否為當事人進行變性手術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沒想到，卻也是專家的建議使大衛自覺「一直生活在一個錯誤的軀體裡」。當然，每一個個案都有它的獨特性，我們不能用一個個案來肯定

一切，也不能用一個個案來否定一切，但這樣一個案例，的確讓我們更要審思，畢竟科學的目的在於使世界更美好，而不是創造一個悲慘世界。希望大家都能從本書得到更深刻的
啓示。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社會局局長暨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



【推薦序五】

由記錄片手法看《性別天生》

原以為僅需數小時即可看完這本由戴蘊如小姐譯的《性別天生》，豈知才看到前兩章即陷入了反覆對比與印證的情境。這並不是因為譯者用原作者的字語直譯，而產生的認知差距，我倒認為是譯者刻意運用字語直譯，好讓譯者維持客觀性的思維方式，才不致以煽情或濫情的異樣眼光看待一位「變性人」追求生命中屬於自身「性別」應有的尊嚴與價值的深刻過程。

作者在前兩章，對主要人物的背景作了極其詳盡的描述（涵蓋文化、宗教、地緣、家庭等因素），同時也對「性別認同」屬於「天生本性」抑或「後天教養」的主題，提出各種可能的辯證空間。作者更開宗明義地強調：所有段落皆是來自心理學家面談的錄音記錄、精神醫師諮商的現場筆記、事件目擊者及當事人的直接口述，絕對沒有「配合敘述」、「營造氣氛」或為類似小說目的而刻意捏造。（這種說辭通常也是一些記錄片工作者常有的口頭禪。）也許是我長期從事記錄片工作的慣性思維使然，這麼堅定的說辭，強烈地引發我要檢視作者的寫作意圖，以前兩段的章節，仔細作對比、印證的工作。然而，我其實也不

自覺地將內容吸收轉化，而產生情緒挪移的現象，因為持續往後閱讀時，所有事件的情景變得特別鮮活；當事者的心理情緒也如同身受。這才警覺到，我正一步步踏入作者設定，或者說期盼的閱讀狀態中。這是極有趣卻也弔詭的複雜心理。一方面，我仍能理性但卻「有情地」專注於事件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會迫使我檢視近二十年從事記錄片工作的思維與方式。兩種心理的交叉並融，使人有種闊達、喟慨而又難理的情緒感受。這種在結構上運用等距描述的手法，卻讓譯者擁有更多自主性醞釀的心理空間。

許多段落中，當讀者的情緒投射到人物上達到適當的程度時，作者隨即切入學術研究或調查資料的佐證，適時提醒讀者應持有「理性而有情」的閱讀態度。作者的章節推展與記錄片也極為類似。好的記錄片是透過聲音、影像讓觀眾產生合理、有根據的文字或詩化情境，而作者能以文字讓讀者快速地在腦海中轉化成聲音及影像，使閱讀的情緒不致鬆怠。這對有志成為記錄片工作者的人，也是極其有效的思維訓練。

作者最後將案例與女性主義、中性人協會等社會運動產生對話的機制，更是豐富了內涵，也拓展了視野。當然這本書僅以一位名叫大衛的變性人作案例的切入點，從醫學、精神、社會、人性、性別等不同的角度作深刻的探討，強調「變性人」應經由「自主意志」選擇自己的性別，更不應成為「不當學術研究的犧牲品」，但這絕非「變性」或「性取向」的「絕對結論」。作者以極為謹慎的態度，呈現學術研究者之間的對立與競爭，卻主導了這



性別天生

AS NATURE MADE HIM

極度令人不安的醫學悲劇。作者雖力求客觀，但仍有些許主觀性的抽樣選擇。也許我們應該從中學習到的，不是如何成就一本精采的書籍或一部有水準的記錄片，而是本文作者的人道精神及對生命本質的尊重。

（本文作者為資深記錄片導演）

【譯者序】

貼近生命的憂傷



跟許多女性朋友一樣，女性主義思潮改變了我的生命基調。

我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二年赴美留學，在兩位女性教授的啟蒙下（恰好都是在美國同為「少數族群」的女性，一位是黑人，另外一位則是韓籍移民），受到女性主義理論的洗滌。那是在性別領域中，性別天生的理論隱然成形，足以挑戰後天養育論的時代。在異鄉的生活經驗，讓我對於那些「文明」思潮，有了更深的體悟，也為自己過往的生命中一些「模糊的感覺」尋到了系統的學理根源。用筆記小說的說法，平權思想在我的身上化了人形。

平權思想的基本精神無非就是人生而平等：沒有人應該因為膚色、財力、學識、或性別的差異，而喪失基本的生命權利，更不要說是被壓榨、利用和欺凌。如果說，《性別天生》這本書所蒐集的證據，顯示了身為一代學術領導人的曼尼(John Money)如何粗糙地對待他的「人體實驗品」，那麼他的私心，卻也回頭來幾乎摧毀了他所處心積慮維護的後天養育論。原來旨在尊重生命、鼓勵教養的學理，反而成了玩弄生命的工具。學術巨擘在扮演上帝（形塑一個新的個人）的同時，成了撒旦的替身。



這本書，不僅處處充滿了類似這樣的神諭氣氛，也充滿了許多文學、神話的典型和戲劇元素。它是布蘭達／大衛的個人寫真，也是曼尼的歷史傳奇；有悲劇英雄，也有「壞蛋」。因為作者的深入淺出和鉅細靡遺，我們看見了大衛之所以平凡又足以為經典的地位；哈姆雷特、科學怪人……這些畢竟都是文學作品中的悲劇角色，而大衛卻是在我們眼前、在號稱嚴謹求證的科學界裡，一個活生生被命運弄的例子。也因為這些戲劇化的張力，即使對學術理論或醫學專業沒有興趣的讀者，也應該會被故事的發展和敘述深深吸引。

對於一個從事新聞寫作的記者來說，這個個案本身，絕對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報導素材，正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整個故事夠深沈、夠爭議、夠衝突、夠完整和夠「精采」。然而碰上這樣的題材，卻也更需小心求取平衡：於是我們看見作者在細密地鋪陳蒐集來的素材之餘，仍秉持了媒體工作者最終的良知和道德勇氣，讓所謂事實真相和小人物的沈冤、相對於獨占各方資源的權威，也能在輿論上得到曝光和公評的機會。

希望我的譯筆，在呈現這個故事的可讀性和整個案例的重要性上，都能忠實地傳達。

最後要特別謝謝我的家人。我的先生在時間和精神上給予我的充分支持；還有我的女兒——雖然，因為她的降臨，讓這本書的中文版不能更早問世，但是她辛苦求生的頑強生命力和可愛甜美的笑容，都讓我體會到生命的真義，也更能貼近大衛和他父母生命中的一切痛苦和憂傷。

【導讀】

褲襠間的迷思



一九六六年四月加拿大溫尼伯市(Winnipeg)有一對八個月大的同卵雙胞胎，在一家醫院進行割包皮手術。醫院的電灼燒刀不幸發生故障，導致電流過強，而把其中一位幼兒的陰莖給完全燒焦了。事後雖然醫生及醫院承認錯誤，並賠償和解，但大錯已經鑄成。該受傷男嬰的外部陰莖已整個壞死，醫生對其預後均不樂觀，認為該男嬰日後將不可能人道（當年人工陰莖的技術尚未成熟）。

面對此一不幸事件，該男嬰的年輕父母十分自責，但又難以向親友傾訴，因此生活在愁雲慘霧之中。事件發生後十個月，他們碰巧在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製作的一項電視節目中，聽到來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一位性學專家的談話，內容是變性。該專家除了談論一些自願變性的成年人外，也提及性器官發育不全的嬰兒，亦可藉助變性手術改換性別。看了這段訪談節目，這對夫婦像是溺水者抓到了根繩子，便與霍普金斯大學的這位專家取得聯繫。在親自造訪之後，這對夫婦便被說服，而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小孩一歲十一個月大時，讓霍普金斯



的醫師進行了變性手術，包括去除睪丸及建構初步的女性外陰。之後，他們將該幼兒改名為布蘭達（原名布魯斯），以女兒身分撫養。由於布蘭達還有一位同卵雙胞胎的弟弟，使得這項實驗有個絕佳的對照組。之後這對夫妻每年都帶兩個小孩回到霍普金斯大學一次，接受檢查及心理諮商，一直到他們十二歲那年才不再去。

提出這項變性理論的曼尼(John Money, 1921-)出生於紐西蘭，一九五二年從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後，就一直在霍普金斯大學服務，目前已經退休。他先是與兩位精神醫師組成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Psychohormonal Research Unit)，針對中性人(intersex，或稱陰陽人[hemaphrodite])作心理諮商與治療。之後他更說服霍普金斯大學於一九六六年成立性別認同診所(Gender Identity Clinic)，專門進行變性手術，以及手術前後的諮商與輔導。這在當年乃是創舉，使得霍普金斯的醫學院成為全美第一所進行變性手術的所在。

曼尼在性學研究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著作等身，影響力遍及學術與臨床界。他從成年變性人的研究中，得出性別的取向乃後天所決定，與先天性別無關的推論，因此主張出生時性器官發育有缺陷的男嬰，可以經手術變性（切除發育不全之外部性器官及睪丸），以女孩養育；並在進入青春期中，給予補充雌激素，就可成功地變更其性別。這項理論雖然爭論性甚大，但在醫學界卻主導了三十幾年，理由無他，就是因為曼尼在這一行的聲望，以及他對加拿大這對雙胞胎的工作及報導。

雖然曼尼在其歷年的論文及專書中，一再宣稱該變性實驗的成功，但事實卻不然。布蘭達從小無論思想行為，都表現得男孩樣，她喜歡男孩的遊戲與玩具，好以武力解決爭執（比弟弟還強悍）。她從幼稚園起就一直是麻煩不斷，一路被校方列為問題學生，強迫進行心理諮商，還留了幾級。主要是布蘭達內心一直充滿著困惑與無歸屬感（自覺不屬於女兒圈，但又被男孩嘲笑），縱使父母及醫師再三強調她的性別，還是沒法消除她的疑慮。醫生原本計畫在布蘭達進入青春期前，要為她作進一步的人工陰道手術，以及開始雌激素的治療；由於布蘭達的堅決反對，手術並沒有進行，但在父母的壓力下，她的情願地服用了一陣子的雌激素藥丸。

由於溫尼伯當地精神醫師的建議，布蘭達的父母終於在她十四歲那年，告知了事實真相。沒有多作考慮，布蘭達便選擇結束十二年的女兒身，恢復他的本性，並為自己取了大衛這個名字。雖然他內心仍然充滿憤怒與無奈，但對於恢復男兒身卻顯得自然無比，親友也欣然接納，並不覺得突兀。他定期接受睪固酮注射，並切除了因服用雌激素而長大的乳房。十六歲那年，他開始進行陰莖再造的手術，在三年內陸續進出醫院數十次，常常是為人工尿道的阻塞及感染。在二十三歲那年，大衛認識了一位比他兩歲且已有三個小孩的女士，兩年後，他們結了婚。

這對雙胞胎的故事，三十多年來一直受到學術界及媒體的注意，但除了曼尼及溫尼伯



當地經手的醫生外，一般人並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分及情況，也只有接受曼尼定期報告中的成功報導。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由另一位學者戴蒙(Milton Diamond)聯絡上當初治療過大衛的精神醫師，商得當事人的同意，作了後續的訪問調查。他們據此寫成的論文被多份期刊退稿後，終於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發表於美國醫學協會(AMA,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小兒科與青少年醫學彙刊》(*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該論文發表後，引起了媒體的相當迴響，《紐約時報》、《時代雜誌》都大幅報導，美國廣播公司(ABC)也對大衛作了採訪。之後，大衛接受了《滾石雜誌》記者科拉品托的採訪，說出了他的心路歷程。該篇報導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刊出，獲得相當的好評，並贏得了「國家雜誌獎」。之後科拉品托更花了將近一年，一百多個小時的面談時間，完成了一本翔實的記錄，讀者手上的這本《性別天生》，就是該書的中文版。

一般人很難相信，僅僅因為一位心理學家的強烈自我，竟然影響了醫界三十多年，也造成成千上萬性器官有缺陷人士的苦難(包括先天或後天的缺陷)。多年來，對於人類性別取向的「先天與後天(nature vs. nurture)之爭」(註)，經由大衛這種人的痛苦經驗，終於有所定論：胚胎發育時所決定的性別，不是後天可以輕易改變的。譬如說，有人認為同性戀的傾向，可能是由從小的養育環境及與父母的關係所造成，由大衛及許多人的例子，可知事實不見得是那樣。

人的性別決定，之所以會產生這許多的變異，主要是因為任何人都有發育成兩種性別的潛能。在胚胎發育的早期，由於性染色體的不同（具有Y染色體與否），就決定了性腺的命運，亦即往睪丸或是卵巢發展；再由於睪丸的存在與否（經由睪丸分泌的激素），決定了腦部以及內、外部性器官的分化。這段過程的發生時間，不同動物的早晚不一：人類胎兒早在子宮內完成，鼠類則延遲至出生以後。至於造成不正常變異的原因，則從染色體缺陷（精卵產生及受精分裂的過程）、激素量失常（譬如從母體處接受過量雄性素）、到胎兒本身細胞的反應不足（譬如缺少雄性素受體）等，在所都有，益增其複雜性及診斷的困難。

因此之故，在產房大家常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女孩還是男孩？」不單是指嬰兒褲襠間的差異，事實上還有更深的含意；那也是每位生養過子女的父母都知道的事：男孩女孩天生就有不同。這個不同，並不僅限於我們外觀看得到的部分，更存在於中樞神經的許多層面（包括構造與生理）。這些差異有的是為了男女生殖生理不同的需要而存在（女性需有週期的控制，男性則無）；有的就相當微妙，像是認知與情感的層面。尤其是後面這一部分，對於人類這種童年期待長，以及學習、模仿、制約與記憶等大腦功能高度發展的社會

〔註〕「先天」在此指的不只是遺傳基因的決定面，還包括出生前在娘胎受到的一切影響；「後天」則指出生以後所接受到的一切。



化物種來說，先天本性與後天教養的角色孰重，更不容易釐清。傳統對於男性與女性特質的定義，常取極端，忽略了人的性格特質像個連續光譜，從紅到紫都有。我們可以說大多數男性在這些天生特質的分布上，屬於綠偏紅，女性則是綠偏紫。這種基本面的不同，是人類生物性的部分，不應刻意忽略。

大衛的故事是個悲劇，所幸由於他的執著，還有個尚好的結局。《性別天生》一書的出版，讓我們了解了這樁喧騰三十多年公案的事實真相；除了增添一般人茶餘飯後的談興外，當有深一層的歷史教訓。人的性別決定，確實要比一般人想像中來得複雜，某些先天的決定因素，不是後天說改就能改的。同理，面對少數偏向另一極端的男女，自認屬於「正常」者，豈不該多一些包容？

（本文作者為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教授）

作者註

這不是一本小說。所有的段落都是從心理學家面談錄音帶的記錄、精神醫師諮商的現場筆記，或是這些事件的目擊者或當事人的口述直接取得，沒有一段話或場景，是為了「配合敘述」、「營造氣氛」或是任何類似小說的目的而捏造的。曼尼(John Money)在一九六七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製作的電視節目中出現的部分，是從節目錄影帶而來；該帶子在播出至今的三十年當中都沒有被銷毀，真是一項奇蹟。布蘭達(Brenda)在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Psychohormonal Research Unit)接受心理治療過程中的對話，是從現場錄音記錄取得(首度在此披露)；那是一九九八年六月，曼尼博士應病人當地的精神醫師要求而提供的。

前言



我已經進入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冒險事業。我希望呈現給世人一位天生本性的堂堂男子，而這名男子就是我本人。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錄》(*Confessions*)

我怎能不為曉得自己的出生感到開心呢？

——索福克里斯(Sophocles)，《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

難就難在將事實架構，亦即絕對無法否認的事實，從理論家與記者的浮誇矯飾中區分開來。我們既然已經建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就有責任得出推論，並找出整個迷團的關鍵轉折點。

——《福爾摩斯回憶錄》(*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我第一次拜訪大衛·利馬(David Reimer)家。那是一間位於曼尼托巴省(Manitoba)溫尼伯市(Winnipeg)勞工住宅區，狹小、沒有任何特色的屋子，只從房子看來，一點都看不出它的主人竟可以引起一名紐約記者的興趣，更別說讓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醫生著迷了。一台小孩騎的腳踏車躺在修剪整齊的草地上，屋前的街道邊，停著一輛車齡八年的二手豐田(Toyota)。屋內，客廳一角一張手工訂做的木製五斗櫃上，放著家庭生活標準擺飾：結婚照、畢業照、瓷器娃娃和旅行紀念品等。除此之外，還有一張古董咖啡桌、一張老舊舒適的椅子和一張沙發，沙發上端坐著一位穿著牛仔外套和磨損工作靴的瘦削年輕人，他就是這個家的主人。

大衛今年三十一歲，但說他只有二十歲或不到，你也會信。這一部分是因為他臉上毛髮稀疏，只有下巴長了幾撮金黃色的毛髮；一部分則是因為他明顯的顴骨和瘦削的兩頰，顯現出一股細緻感。除此以外，他看起來和講起話來就像他的身分一樣：一個藍領的工廠工人，只有高中學歷，最大的嗜好就是週末和父親到附近的河裡釣魚，或是在後院和妻小烤肉。他是那種外剛內柔型的年輕人，談話的內容經常繞著修理汽車引擎、工作上的煩惱，或是以不到四萬元的年薪要養活三個小孩的負擔等，諸如此類的話題。

我來到溫尼伯是為了了解大衛的所有事情，但最感興趣的，是他的童年。我一提起這個主題，他立刻就有了很大的轉變，他臉上的笑容和玩笑的語調全不見了，眉毛在小而直

的鼻子上皺起來，眼睛開始快速地眨個不停，下巴也好像有人要跟他單挑那樣向前挺。他的聲音——深沈、黏膩的中低音——突然改變音高和節奏，變得喋喋不休，除了明顯聽得出來的苦惱和憤怒，還充滿著生怕別人不了解、急切想表達情緒的渴望。甚至連他自己能了解多少這樣的情緒，只怕也說不清楚。我注意到，當大衛描述發生在他十五歲以前的事件時，似乎刻意不用主詞「我」，而是用帶有距離的「你」，好像談論的是別人一樣。不過，在某種程度上，那時的他，也的確是「別人」。

「這就好像是洗腦一樣，」大衛點燃了第一支香菸，之後就不曾停過：「我願意不計代價找個催眠師，能讓我完全忘記過去。那實在是折磨人，他們對你身體所做的事，遠不如他們對你心靈做的事那樣糟糕，那讓你在腦袋裡進行心理戰。」

大衛指的是三十年前，一個四月的早上，八個月大的他，在拙劣的割包皮手術中失去全部陰莖後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在遭受這個無法挽救的傷害之後，他的父母帶他到巴爾的摩知名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去找一位知名的性別研究專家。那裡的人說服了大衛的父母，讓自己的兒子接受變性手術。整個過程除了為還是嬰兒的大衛進行必要的去勢和相關生殖器手術外，還加上之後長達十二年的人際關係、心理和荷爾蒙重建計畫，好讓這個改變可以在他的人格中成形。這個案例在醫學文獻裡屬於絕對的成功，大衛也成了現代醫學年鑑中最出名(雖然是匿名)的病人之一。



這種名聲的由來，不只因為這是第一個原本正常發展的男孩，在嬰兒時期接受醫學手術，成功變成女孩的案例報導，同時也由於一項統計上幾乎不可能的巧合，讓這個案例更具特殊意義。由於大衛生下來是雙胞胎之一，他的孿生弟弟，也是他唯一的手足，剛好成為這個實驗的對照組：一個大衛基因的複製品，帶有完整的陰莖和睪丸，並且被當成男生撫養。根據報導，這對雙胞胎長成了一對快樂、適應良好，但性別互異的小孩，看起來是「性別塑造過程中，環境因素勝過生物因素」這個理論無懈可擊的證據。醫學和社會科學的教科書都因為此案例而改寫，新生兒的生殖器官因受傷或不完整，即可進行變性的慣例也因此建立。這個案例還變成七〇年代女性運動的試金石，廣泛用以證明性別鴻溝是文化的制約，而非天生的結果。對主持這個泛稱「雙胞胎案例」(twins case)實驗的醫事心理學者曼尼(John Money)而言，這更是他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成就，並在一九九七年為他贏得了「本世紀最偉大性學研究者之一」的榮耀。

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六月那個早上，坐在我面前的那個年輕人，他的存在卻顯示了該實驗的失敗。這個事實，直到該年春天《小兒科與青少年醫學彙刊》(*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這份醫學雜誌公開發表之前，沒有多少人知道。在該雜誌的文章中，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生物學家戴蒙(Milton Diamond)，以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的精神醫師西蒙森(Keith Sigmundson)記載了大衛如何從一開始就

反抗這個強加在他身上的性別，並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又變回了寫在他基因和染色體上的那個性別。這篇報導在全世界的醫學圈引起軒然大波，對於嬰兒時期變性做法的持續使用（比局外人所能想像的更為普遍），也引發了激烈的辯論。這篇報導也提出了一些讓人費解的問題，包括這個案例一貫的報導方式，亦即為何要經過幾乎二十年的時間，才有後續的報導披露真實結果，以及為何後續的評估不是由曼尼博士或約翰霍普金斯的人進行，而是圈外的研究者。這些問題的答案，正說明了性別認同 (sexual identity, gender identity) 的神祕性，同時也揭露了知名性學研究者之間，那種勢不兩立的競爭。這項對立，不但主導了這個極度令人不安的醫學悲劇的揭發過程，同時也可能是當初促成這個實驗的動力。

這項受到相當矚目的醜聞，牽涉了性學研究界一些大名鼎鼎人物，也促使醫學有所改進，但對大衛而言，則單純只是他個人的災難。之前，除了在兩場電視訪問中出現過以外（臉部和聲音都作了掩飾），大衛從來沒有跟任何記者說過自己全部的故事。後來他同意接受我為《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 一篇文章所作的採訪，前題是不准暴露有關他身分的重要細節。因此，我在那篇文章中，並未提到他出生、長大並繼續居住的地方；我替他父母朗恩 (Ron) 與真娜 (Janet) 和孿生弟弟布莱恩 (Brian) 分別取了假名；大衛在溫尼伯的治療醫師，我用他們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代替；大衛本人則叫作「強」(John) 或「瓊」(Joan)，這是戴蒙和西蒙森在那篇描述他被迫接受的可怕雙重生活文章中，替大衛取的名字。我小心翼翼



翼避開任何可能暗示大衛居住地的線索，甚至不提他接受割包皮手術那天早上幾乎癱瘓溫尼伯的大風雪。那場奇異的四月大雪，讓人不得不毛骨悚然地聯想到，在莎士比亞和希臘悲劇中，那些總是預示著恐怖降臨的自然異象。

我的文章刊登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號的《滾石雜誌》，將近兩萬字，在篇幅限制和雜誌截稿的壓力下，它已經稱得上是夠完整了。但就算有那篇文章的發表，形成這個事件的兩項決定性要素，亦即大衛的一生和科學的詭祕，很顯然具有足夠的複雜性、重要性和戲劇性，需要有本書，才能完整地交代。事實上，大衛也在想同樣的事情，並希望由我來執筆。在那一刻，我不得不告訴他，如果要我來做這件事，有個重要的先決條件：他必須丟掉強／瓊的面具。

除了我無法想像要寫一本書，而主角、他的家人、朋友、醫生和其他人物都用假名出現在「美國中西部北邊一個城市」這樣不確定的背景之外，我也知道，曉得他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當地的居民，對於正確理解這個案例是很重要的。在一個以先天(nature)對抗後天(culture)、遺傳對抗環境、生物對抗養育等辯論為核心的故事中，我必須儘可能地正確描述大衛所成長的社會文化環境。最後，身為一個作家，我也很清楚，如果大衛堅持匿名，這個故事中許多特殊的詩意共鳴將會喪失。堅持用假名，將意味著必須犧牲一段重要的故事：當大衛在十四歲那年開始他辛苦轉變回男生的過程時，為何要取一個跟他原來出

生時的名字布魯斯(Bruce)不一樣的名字？大衛這個名字，不僅帶有他喜歡的那種與男性直接相關的實在，同時也引發了他的成就感。這份成就感來自於戰勝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在他人生最初的十四年中，試圖說服他與內心深處所感覺的自我，是不一樣的兩個人。正因為這項勇敢且得來不易的勝利，他決定要以聖經裡手刃無敵巨人歌利亞(Goliath)的小孩為名。在這個以及其他數不清的例子中，維持匿名所犧牲的事實真相，不但會反映在整個故事上，同時也將影響大衛對自我成就的認知。

從一九九三年初起，大衛接受了戴蒙和西蒙森為他們那篇醫學期刊論文所作的面談，以及接下來接受我為《滾石雜誌》所作的採訪。他一點一點地走出了生活裡一直存在的羞辱和私密的陰影，而在我說服他放棄強／瓊的面具之前，他已經走了一段漫漫長路。在和妻子、父母、弟弟討論之後，他考慮了一個晚上，告訴我他決定以真正的自己現身。

為了幫助我呈現他的過去，大衛沒有絲毫隱瞞，不拒絕任何問題。他答應我在一年之內接受一百個小時的訪問，也簽下放棄保密的同意書，讓我可以調閱一堆在他特殊成長期中累積起來的法律文件、心理治療筆記、兒童輔導中心(Child Guidance Clinic)報告、智力測驗、醫學記錄和心理研究資料。他幫助我尋找小時候認識他的同學——這件偵察工作很困難，因為他根本沒留下畢業紀念冊，只記得少數同學的姓，而且之前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試圖遺忘和躲避任何知道他以前是女孩的人。更重要的是，大衛幫我爭取到所有的家人接




受訪問，包括他的父親；由於這些事件所帶來的痛苦，二十多年來他父親從未跟任何人提及。唯有透過利馬一家人少見的坦誠，強／瓊的完整故事才能終見天日。雖然故事本身主要是介紹大衛，以及他兩種不同性別身分的生活經驗，但同時也談到了一對年輕夫婦，才二十歲出頭，就作出重要的決定，交出自己的雙胞胎男孩之一，進行這項性心理(psychosexual)工程上史無前例、但終究注定失敗的實驗。

「我父母感到非常內疚，認為整件事情都是他們的錯，」我第一次造訪溫尼伯時，大衛這樣跟我說：「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他們純粹是出於好意、愛和絕望，才做了這些事。當你沒辦法可想的時候，你做的事情不一定全都是對的。」

第一部 科幻遊戲





第一章

悲劇降臨



朗恩和真娜兩人共同生活的開端，可說是充滿希望；那對後來發生的事而言，是個極大的諷刺。要不是他們倆共同的種族與宗教背景，以及一向在面臨痛苦時展現堅忍不拔的特性，他們也不可能通過這場考驗。

朗恩·利馬和真娜·史查茲(Schultz)都是門諾派(Mennonite)教徒的後裔，門諾派是十六世紀創始於荷蘭的重洗教派(Anabaptist)的一支。朗恩和真娜的門諾祖先和艾米許人(Amish)一樣，是和平主義者，直接依循著耶穌的《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過著儉樸、出世的生活。在天主教宗教裁判(Inquisition)的年代，數以千計的門諾教徒遭到拷問和屠殺，逃出的倖存者開始二百多年的追尋，希望找到一個能夠容忍他們獨特文化和宗教的國家定居。大部分的門諾教徒逃到俄羅斯，以耕種為生。十八世紀末，他們開始大規模地移民到新世界，部分的人定居在內布拉斯加州和堪薩斯州，但是大多數人集中在加拿大，因為當時加拿大政府急於增加空盪盪的西部平原人口，所以提供門諾人完全的宗教自由、自己的學校，以及免除兵役等各種優惠。第一批門諾人在一八七四年抵達南曼尼托巴，之後的五年間，超過一萬名門諾人尾隨而至，把俄羅斯的整個村莊移植到加拿大的大草原區。朗恩和真娜的曾曾祖父那一代是荷裔門諾教徒，屬於最早一批教徒的嫡傳後代，在這波移民潮中，也來到了曼尼托巴。

這批新移民的到來，適逢加拿大太平洋鐵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開通到溫尼伯，

改變了該地的風貌。溫尼伯原本是個狹小、孤立的毛皮集散地，也是哈得遜灣(Hudson's Bay)貿易據點；三十年間，這塊據點已經變成北美洲中西部主要的穀倉之一。「一條條大路通溫尼伯，」《芝加哥記錄先鋒報》(Chicago Record Herald)於一九一一年如此報導：「它注定要成為北美洲最大的貿易集散中心，以及重要的製造區之一。」

雖然溫尼伯並沒有達到當初那些偉大的預期，但是它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不管在城市規模、文化發展和重要性各方面，都有快速的成長，設立了加拿大第一個國家芭蕾舞團和交響樂團。今天它的人口已經超過了六十萬人；沿著蜿蜒的紅河(Red River)所興建的市中心，雄偉而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和精緻的維多利亞風建築相映成輝。

散布在大草原區的門諾人早已被溫尼伯的富裕所吸引，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同化較多的家庭便開始搬到城裡從事製造、搬運和建築等行業，其中包括了朗恩的父母，彼得(Peter)和海倫(Helen)。他們在一九四九年賣掉了鄰近德羅恩(Delorraine)的農場，搬到溫尼伯附近的聖伯尼菲斯(Sr. Boniface)。彼得在那兒的屠宰場找到工作，海倫則在家撫養四個小孩。朗恩是他們的長子。

朗恩從小就很有責任感、很勤奮，他既注重隱私，又異常努力的特質，連他自己的母親都常常感到訝異。「他總是很害羞、很安靜，」海倫回憶：「但他也是個閒不下來的小子，我得想辦法讓他別惹麻煩。我會教他怎麼燒菜，他一直想要作有關食物和烹飪的工



作。」這種熱情在朗恩身上從未消退，長大成人後，他終於自己開業養活老婆孩子，作的就是咖啡餐車，到溫尼伯附近各工地賣些三明治和其他現成食品。

到了一九五七年，朗恩剛進入青少年時期，貓王(Elvis Presley)、查克貝瑞(Chuck Berry)、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等人的搖滾樂也流行到了溫尼伯。汽車、女孩、啤酒與搖滾樂很快就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對朗恩父母那一代的門諾人而言，一九五〇年代那種快速的文化變遷是蠻嚇人的，他們雖然不算特別虔誠的教友，但也不過才離開幾乎完全門諾式的農場社區十年左右而已。那些農場社區的日常價值觀和想法，更接近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鄉下，而非二十世紀後葉的北美洲都市。因此，在一種可以說是反向移民的潮流中，利馬家和很多其他門諾人家庭，因為抗拒都市裡動盪的文化變遷，而重新遷回他們文化的根源地——草原區。一九五九年，朗恩的父親在距離曼尼托巴九十六公里，靠近克里斐爾(Kliefeld)處，買了一塊農場，將一家人搬到那裡定居下來。

當時十五歲的朗恩十分討厭這次搬家。說到克里斐爾，就只是在幾百公尺的碎石公路上，散落著一些搖搖欲墜的商家，例如穀糧店、郵局、雜貨店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朗恩發揮他認真的工作態度。他會採收重達兩百磅的薩斯卡通果〔譯註一〕(saskatoon)，然後以一磅兩毛五的價錢賣出。這份工作又累、收入又少，完全比不上他在城市中可以賺到的薪資。況且他的父親還堅持拿走這些小錢，來維修他們那座位於一小塊遍地樹叢農地上的老

舊木板農舍。

就在這種無聊、貧困，加上跟嚴厲、權威的父親愈來愈不合的情況下，十七歲的朗恩接受好友魯迪(Rudy Hildebrand)的邀請，到鄰近史坦巴哈(Steinbach)小鎮上魯迪女友的住處玩。魯迪的女友有一個漂亮的室友，名叫真娜，他們認為朗恩也許會喜歡她。

就像朗恩一樣，真娜也在溫尼伯長大，她是家中長女，父母都是門諾教徒，戰後從大草原遷到城市去。真娜在溫尼伯附近的聖維多(St. Vital)長大，是一個活潑有求知欲的女孩，十分喜好閱讀，從神探南茜(Nancy Drew)、哈迪兄弟(Hardy Boys)〔譯註2〕看到恐怖小說，最後則是心理叢書。書本為她打開了生活中有別於父母傳統門諾式價值觀的新視野，特別是她常常頂撞的母親。真娜說：「我想要受教育，但是媽媽要我去工作貼補家用。」念完九年級後她終於讓步，輟學到紡織廠工作。真娜把薪水全部交給母親，但是這樣做也改善不了多少兩人的關係。當青少年初期的真娜拒絕上門諾教堂時，母女之間的鴻溝更進一步加深了。「我覺得教堂限制太多，」真娜說：「我不認為那是聖經的旨意。他們甚至

〔譯註1〕為一種可食之深紫色果實，此種灌木產於北美西部，開白花。

〔譯註2〕這兩套偵探叢書皆出自史垂梅亞(Edward Stratemeyer)之手，南茜是一名十餘歲的少女偵探，哈迪兄弟則是一對相差一歲的少年兄弟檔偵探，名為法蘭克(Frank)與喬(Joe)。



認為笑也是有罪的，我才不這樣想呢。」事實上，十五歲的時候，真娜還常常拿父母的宗教開玩笑。「為什麼門諾人從不站著做愛？」她問她的朋友，然後揭曉答案：「因為怕有人以為他們在跳舞！」真娜喜歡跳舞和溜滑輪，而棕眼褐髮、長得漂亮、身材又好的她，身邊從不乏追求者。

真娜的父母也和朗恩的一樣，認為自己最大的小孩，也是唯一的女兒正愈來愈不受管教，於是便加入從城市返鄉的隊伍中。一九六〇年，真娜十四歲的時候，史查茲一家搬到新伯斯威(New Bothwell)這個距離溫尼伯四十五分鐘車程、錯落在秣草倉和田地之間的小村莊。真娜想念城市裡的電影院、餐廳、溜滑輪場和舞廳，因此她很快就開始接受任何一個有車、可以帶她逃離農場生活的男孩的邀約。真娜的母親試圖限制她的社交生活，卻效果不彰，因此真娜剛過完十五歲生日不久，她母親就叫她搬出去住，而她也樂於從命。真娜搬到鄰近的史坦巴哈，在紡織廠找到一份工作，跟堂姐緹娜(Tina)分租一層小公寓。不久之後，緹娜的男友就帶著一個年輕人來見真娜。那個男生十七歲，高高的個子、金色的頭髮，大大的藍眼睛害羞地看著她。他叫作朗恩。「我用言語挑逗朗恩，」她笑著說：「可是我覺得他沒有回應，所以我認為他不喜歡我。」

事實上，朗恩的確喜歡她，但是太害羞，不敢在另外兩個人面前表達自己的感情。他請真娜去看自己停在街上的車，然後邀她週末去看電影。當天稍晚，朗恩從一部丟在廢棄

場的福特車上拆下變速箱，拿去賣給他的朋友，賺了十塊錢作為這次約會的費用。那個週末，他們去看了《夏威夷式的傑傑》(Gidget Goes Hawaiian)這部電影。「我大概整場電影看不到五分鐘，」真娜大笑：「因為我都在忙著偷瞄他。他實在太性感了！」

後來整個夏天他們經常見面，跟緹娜和魯迪一起成雙成對地約會，通常只是開車到某一條鄉間小路上，把車停下來，喝掉半打啤酒、接吻愛撫，然後聊天。當朗恩和真娜談起自己的背景時，很驚訝地發現他們竟然有很多共同點。這些相似處讓他們更靠近，而矛盾的是，他們的差異也有同樣的作用。真娜補足了朗恩有時不願採取行動的被动性格，而另一方面，朗恩緩慢而深思熟慮的生活態度，也多少控制住真娜一味往前衝、毫無所畏的熱情和衝動個性。他們在一起所形成的整體，比彼此分開來都要強。

當真娜決定搬回溫尼伯時，朗恩理所當然地跟著她一起回去。雖然他們沒有一起租房(當時是六〇年代初期，對這樣一對還只有十來歲的情侶來說，那還是無法想像的大膽行為)，但是朗恩卻常常待在真娜租來的房間裡。他們在那裡第一次發生關係，兩個人都是第一次。不久之後，真娜發現月經遲了，那時她才剛滿十八歲，而朗恩十九、將近二十歲。這樣的年紀結婚是太早了一些，但是他們之前談過要結婚的事，真娜懷孕這件事，或許只是代表他們早點結婚比較好的徵兆。他們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結婚，地點在史坦巴哈。為了慶祝雙方都從父母的反對壓力中解放出來，他們刻意選擇不在該鎮二十個門



諾教堂中的任何一所舉行婚禮。

這對新婚夫婦搬進溫尼伯市中心一間只有冷水的小公寓，這是他們能供得起最好的房子了。真娜在紅頂餐廳(Red Top)當女侍，拿最低工資，朗恩則在製造窗戶的公司辛苦工作，錢也賺得不多。他們很顯然需要多賺一點錢，特別是真娜在一次產檢中，發現自己懷的竟是雙胞胎。朗恩很緊張，不過真娜倒是很樂觀。「我好興奮，」她說：「因為我一輩子都在期望，如果能生對雙胞胎，那就真是太棒了！」

那年六月，真娜懷孕第五個月，朗恩在城裡最大的屠宰場得到一份工作，隸屬於工會，薪水是原來的兩倍以上，他們因此可以搬到都布克(Dubuc)和迪莫隆(Des Meurons)街角的一間兩房公寓。搬家後不久，小倆口碰上了一樁嚇人的事。處於懷孕末期的真娜得了嚴重的毒血症(Toxemia)，那是一種由懷孕引起的高血壓，如果不治療，將會對胎兒造成傷害。醫生建議她作引產。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離預產期還有四個禮拜的時間，真娜進了聖伯尼菲斯醫院(St. Boniface Hospital)。在她生產的過程中，朗恩一直坐在候診室的長椅上，焦躁不安地等待結果。幾個小時之後，一位護士過來宣布一切順利，他已經是一對雙胞胎的父親了。聽到真娜母子均安的消息，朗恩頓時壓力解除、高興萬分，其他的事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他衝向育嬰室想要看看小寶寶，一位護士笑謎謎地叫住他問：「男的還是女的？」

「我不知道！」朗恩大叫回去：「我只知道有兩個！」

他們替雙胞胎取名為布魯斯和布萊恩。雙胞胎長得太像了，一般人都分辨不出來，只有朗恩和真娜，就像所有雙胞胎的父母一樣，馬上就可以輕易地分出誰是誰。哥哥布魯斯早生了十二分鐘，稍微有一點過輕，所以得留在醫院幾天養胖一些。等到他回家後，很明顯地就可以看出他比較好動，常常蠕動不安，半夜也比較常醒來；而弟弟布萊恩就很安靜，比較不吵。兩兄弟都長得很像真娜，有著微翹的鼻頭和小而圓的嘴。

當雙胞胎六個月大的時候，真娜對於安撫、餵食、換尿布這些事情已然駕輕就熟。朗恩又得到加薪，所以他們搬到更大更好的房子去，位於梅卡夫街 (Metcalf Street) 上，是一棟真正的房子，跟他們原來住的公寓相距不遠。這對年輕夫妻的家庭生活似乎愈來愈上軌道了。

只有一點令人不安的是，在雙胞胎七個月大不久之後，真娜注意到他們尿尿的時候似乎不太舒服。剛開始她以為是濕尿布讓他們一直哭，但是她發現即使換了尿布，他們還是一直哭鬧。她檢查他們的陰莖，發現上面的包皮似乎在前端封了起來，讓他們的排尿不



順。她帶雙胞胎去看小兒科醫生，醫生檢查之後，認為他們是為一種叫作「包莖」〔譯註3〕(phimosis)的症狀所苦。這種症狀並不少見，他說，而且很容易以割包皮手術去除。真娜跟朗恩商量之後，同意把兩兄弟送到聖伯尼菲斯醫院去割除包皮。

手術預定的時間是四月二十七日早上，但是因為朗恩在屠宰場上晚班，他和真娜便決定前一天晚上先把小孩送到醫院去。跟一般父母在這種手術前一晚會有的擔心比起來，他們倆倒是沒有特別擔憂割包皮手術，他們也沒有理由擔心。聖伯尼菲斯是一間極佳的現代化綜合教學醫院，它有七層大樓、七百個床位、一間心臟病照護中心和一間兒童醫院。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每年大約有兩千六百個嬰兒在此出生，進行差不多一千次的割包皮手術，都平安無事。

「我們並不擔心，」真娜說：「我們根本不認為有什麼值得擔心的。」

一般來說，在聖伯尼菲斯醫院，割包皮手術是由有經驗的小兒科醫師執行，但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那個早上，當利馬雙胞胎要開刀的時候，不知道什麼原因，平日負責的主治醫師卻不在。因此，這項工作落在四十六歲的一般診療科醫生修特(Jean-Marie Huot)

身上。

當護士被派來領取第一個嬰兒去動手術時，完全是機運湊巧，她從嬰兒床中抱起了布魯斯。

當他們把布魯斯固定在手術台上、以手術覆布蓋好之後，麻醉醫生章姆(Max Cham)讓布魯斯吸入麻醉氣體，讓他昏睡過去。(雖然新生兒的割包皮手術通常不用麻醉，但像布魯斯這樣八個月大的嬰兒，醒著是沒辦法動任何手術的。)接下來發生的事就有一點眾說紛紜了。指控那位外科醫師、醫院及三名參與護士的法院文件中，提到他們用了「動脈夾」(artery clamp)來固定準備要割掉的那片包皮。然而，動脈夾是最不常用來動這種手術的工具。我在一九九七年冬天訪問章姆醫師時，他表示修特醫師用的是標準的宮扣夾(Coenco clamp)，這種夾子是特別為割包皮手術設計的，用來預防失血過多，只要把包皮拉長覆蓋在鐘形的金屬鞘上，並以圓形的夾子套在伸展的包皮上，將包皮壓向下方的鐘形鞘，如此一來，受到擠壓的包皮以手術刀切割時，就不會流血。

不管修特醫師究竟用的是什麼夾子，可以確定的是，修特醫師選擇不用手術刀切除布魯斯的包皮，而是用一種波維(Bovie)燒灼器。這種儀器用發電機將電流傳送到一個尖銳、

〔譯註3〕泛指陰莖包皮無法縮回的情形，初生男嬰十分常見。



針頭式的切割器上，可以封合切口的血管，防止它繼續流血。如果修特醫生真的用了宮扣夾的話，再用燒灼儀器可以說是相當多餘的做法，而且很危險，因為包圍陰莖的鐘型金屬球會導電，而讓電流太靠近陰莖。如果，通往針頭的電流同時又開到接近最大，就可能造成一場災難。

根據手術室管理員後來的證詞，電燒灼器打開後，控制針頭熱度的刻度盤設定在最小值，然後修特醫師將針頭向下碰觸布魯斯的包皮。在後來的測試中，該儀器一切正常，但在那一刻，不曉得是暫時的儀器失靈、人為失誤，或是兩者都有，總之，針頭在第一次的嘗試中，無法切斷那層皮肉。手術人員將刻度盤調高一些，然後再次用針頭碰觸包皮，但還是沒法割開。電燒灼器的電流又再加大，針頭也再一次碰觸包皮。

「我聽到一個聲音，」章姆醫師回憶：「就像燒烤中的牛排發出的聲音。」
嬰兒的鼠蹊部上方升起一小撮煙，燒肉的味道瀰漫在空氣中。

他們立刻召來泌尿科醫生。當天值班的是范恩 (Earl K. Vann)，他撤除了傷口外所有的器械，檢查生殖器。他發現器官反常地蒼白，他戴上手套觸摸陰莖，感覺它不尋常地堅硬。范恩企圖用探針伸入尿道開口，卻發現通不進去。他告訴手術房管理員，他要立刻進行緊急恥骨上膀胱切開手術，裝入導尿管，幫助小嬰兒排尿。他從布魯斯的肚臍下方切開，把一長條管子伸進去，穿過肌肉層，進入膀胱，然後縫好，固定它的位置，並將一個

承接尿液的袋子接在導管的另一端。隨後，嬰兒被推入燒燙傷加護病房。他們決定取消另一個嬰兒的割包皮手術。

在朗恩值夜班的晚上，利馬夫婦通常的作息是真娜準備晚餐，然後等午夜朗恩一下班到家後一起吃。他們會聊一下天，也許看一會兒電視，通常要到兩、三點才會上床，然後睡到第二天中午左右。四月二十七日早上，當電話鈴響的時候，他們正在睡覺。

真娜接起電話，是醫院打來的。

「他們要我們到醫院去跟醫生碰面，」真娜回憶：「他們說發生了一點小意外，需要立刻跟我們會面。」朗恩接過電話，問電話那頭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說要見我們，」朗恩說：「沒說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朗恩和真娜可以從那個人的語調中聽出來，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好的事。他們穿好衣服，準備去開車。他們一打開門，卻發現在經過幾個禮拜早春充沛雨水的滋潤之後，整個城市竟籠罩在一場詭異的大風雪裡。整個車道完全被雪覆蓋，車子也被雪淹蓋到保險桿的高度。雪片仍然持續綿密地從泛白的天空飄落。



朗恩費力地把車挖出來，然後他們開始緩慢地駛過因為大雪阻礙而交通混亂的街道。從聖瑪麗路(St. Mary Road)向北五條街，右轉到達契大道(Tache Avenue)，再經過八個路口，就到醫院了。車子的收音機裡傳來機場關閉的消息。氣象報告說，預計今天將會降下十七公分左右的大雪，氣象播報員也估計，這會是該城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大風雪。經過三十多年，老市民都還能清楚記得這場風雪。

朗恩和真娜終於開完從家裡到聖伯尼菲斯醫院這段不到兩公里的路，他們衝進醫院，卻只能在醫生的辦公室乾等。時間彷彿過了好久，修特醫生終於走了進來。他用公事公辦的口吻告訴利馬夫婦，布魯斯接受割包皮手術時發生了意外。

「意外，你是什麼意思？」真娜問。

修特說，布魯斯的陰莖被燒焦了。

「我好像僵住了，」真娜說：「我沒有哭。我好像變成了石像。」當她終於恢復神智可以說話時，她發現自己正在問，他們是不是也燒壞了自己另外一個孩子。

「沒有。」修特醫生回答：「我們沒碰布萊恩。」

朗恩和真娜要求立刻去看看受傷的孩子。醫生告訴他們，布魯斯因為接受人工導尿管的手術，還在恢復當中。他告訴利馬夫婦別擔心，他們明天就可以去看小孩。於是，他們只好先把沒受傷的布萊恩領回，在持續落下的大雪中，開車回家。

第二天，朗恩和真娜又回到醫院。范恩醫生帶他們去看小孩。真娜對兒子第一眼的印象，在經過三十年後，仍然讓她一想起來就臉色發白。站在燒燙傷加護病房，布魯斯的床邊，她看著兒子的陰莖——如果那還可以算是陰莖的話。

「那完全是黑色的，看起來像是一條細線，就那樣連在它的底部，連在布魯斯的身體上。」對朗恩來說，那個陰莖看起來「像是一小塊木炭。我很清楚它之後再也不會活過來了」。

儘管如此，真娜還是問這位泌尿科醫師：「它還會再長嗎？我兒子會不會有一個小小的陰莖？」

范恩醫生搖搖頭：「我認為不會。陰莖的生長情況不是這樣的。」

接下來的幾天，小布魯斯的陰莖乾燥了，一塊塊地剝落下來。過不了多久，就再也看不見這個器官的任何痕跡了。

布魯斯持續留在醫院裡，朗恩和真娜看著溫尼伯當地最好的醫學專家，陸續前來替他作檢查，結果都認為希望不大。陰莖重建到今日都還是相當粗糙、克難的權宜之計，在六



○年代更是處於萌芽時期，這個事實整形外科醫生克那漢(Desmond Kernham)的說明之下，已經相當清楚。他描述了從布魯斯大腿或腹部取下來的肉做成的陰莖，會有什麼限制。「這樣的陰莖當然不會有和正常陰莖一樣的颜色、組織與勃起的功能，」克那漢醫生在他的諮詢報告中這樣寫著：「它可以用來導尿，不過這也是它唯一的功能了。」根據另一個也檢查過布魯斯的泌尿科醫生史華茲(M. Schwartz)的看法，那樣的說法也嫌樂觀；他寫道：「要我預測前景的話，讓該陰莖恢復功能是完全不可能的。」溫尼伯診所(Winnipeg Clinic)神經及精神科主任亞當森(G. L. Adamson)醫生則評估了布魯斯未來可能的心理及情緒狀況。「我們可以預測，」他這樣評論：「布魯斯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將無法有正常的生活，他將無法完婚圓房，也無法有正常的異性關係。他必須了解到自己是不完整的、身體是有所缺陷的，因此必須獨自生活。」

小兒科醫生梅鐸夫(Harry Medovoy)也被邀請來一起研究這個案子。雖然梅鐸夫醫生在曼尼托巴執業，卻享有國際名聲。他是美國《小兒科雜誌》(Pediatrics)編輯顧問，也是溫尼伯健康科學中心(Winnipeg Health Sciences Center)裡兒童醫院的創始人，該醫院到今天還以他為名。梅鐸夫雖然極力吹捧加拿大的醫學水準，卻也認為布魯斯應該到美國主要的醫學中心去接受診治。他推薦位於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Rochester)的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從此地搭火車不過半天的時間。於是，在六月七日布魯斯出院當天，朗恩和真娜就

帶他搭乘火車前往羅徹司特。從布魯斯當初住進聖伯尼菲斯醫院算起，已經過了六個禮拜。

在梅約醫學中心，小嬰兒再度接受一群醫生的檢查。他們建議布魯斯在上小學前就先裝上人工陰莖。跟溫尼伯的醫生們一樣，梅約醫學中心的專家們說明，裝人工陰莖並不容易，不僅必須在幼兒時期進行多次手術，而且不管是外觀或是功能上，結果都不樂觀。

朗恩和真娜幾乎無法相信，這就是梅約醫學中心的醫生所能提供的答案，他們後悔為什麼要花這些錢，如此麻煩，千里迢迢跑來這間有名的醫院，結果只聽到他們在加拿大聽過的答案。

至此，朗恩和真娜曉得自己已經別無選擇，於是他們返回溫尼伯，試圖要自己認命，撫養這個無論人工手術成不成功，都「必須獨自生活」的兒子。

《溫尼伯自由報》(Winnipeg Free-Press)，以及它的競爭對手《論壇報》(Tribune)，很快便聽到風聲。這兩個報紙分別刊登一篇文章，報導聖伯尼菲斯醫院燒掉了一個小男孩的陰莖。報導中都沒有提到利馬家的名字，朗恩和真娜因而可以保持祕密，不用讓鄰居知道發



生在兒子身上的悲慘遭遇。當鄰居其他年輕的媽媽們，邀請真娜到她們家喝咖啡時，她總是靜靜地坐著，聽別人興高采烈地交換育兒心得，只有在回家之後，眼淚才奪眶而出，哭喊著：「上帝啊，我恨祢！」至於她那沈默寡言的先生，則一向不允許自己流露出這種情緒。他有一次嘗試跟一起工作的朋友吐露這個意外，別人卻拿來開玩笑。「我從此不跟這些人說話，」朗恩說：「甚至可以說，我不再跟任何人說話。」之後，當布萊恩的包莖問題自行消失後，更加深了這對小夫妻心中的難過。布萊恩健康的陰莖，不斷提醒著他們，發生在布魯斯身上這場割包皮手術的災難，原本是完全不必要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雙生兄弟的第一個生日，朗恩和真娜黯淡地度過了這一天。到了一月，他們簡直覺得自己像是關在家裡的囚犯。他們甚至無法一起去看場電影（如果他們曾經這麼想過的話），因為他們害怕請來一位到處八卦這場悲劇的保姆。二月，朗恩開始夢到自己正在勒死修特醫生，因而半夜從惡夢中驚醒。

然後在二月中的一個週日晚間，約是布魯斯發生意外之後的十個月，朗恩和真娜看到了一件將他們從沮喪中驚醒的事。他們小小的黑白電視機剛好轉到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很受歡迎的時事論壇節目《天天一小時》(This Hour Has Seven Days)。當日的特別來賓是一位自稱曼尼博士的人。曼尼博士大約四十多歲，戴著眼鏡的他有一種溫文儒雅的魅力，五官深邃精緻，很像個演連續劇的明星。他在節目中侃侃

而談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所進行的變性實驗的好處。

在今天，變性外科手術已經是白天脫口秀節目的主要素材之一，大家很難想像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傍晚，這種想法聽起來還多麼地像天方夜譚。在此之前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一位美國退伍士兵喬治·喬建森(George Jorgensen)宣布自己動過手術，轉變成克麗絲丁(Christine)的消息，引起媒體爭相報導。他是在丹麥作的手術，引起了美國醫院的嚴厲批評，因為他們拒絕作這樣的手術。就在人們逐漸淡忘這件事情之際，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宣布他們不僅已經成功完成兩件男變女的變性手術，還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研究中心，專門致力於成人變性的工作。在幕後推動這家知名醫院採取並推廣這種爭議性做法的，就是現在出現在利馬家電視螢幕上的曼尼博士。

朗恩和真娜依稀記得聽過這個名字。在布魯斯發生意外不久之後，有一位溫尼伯的整型外科醫生就提過，他在美國參加一場學術會議時，曾經把布魯斯的案例跟一位一流的性學研究專家提過；那位專家建議朗恩和真娜把布魯斯當成女孩來撫養。另外，梅約醫學中心的醫生也曾經跟朗恩和真娜提到，巴爾的摩有個人可以幫助他們把布魯斯變成女生。雖然梅約的醫生們不推薦這種方式，不過他們說，利馬夫婦不妨聽聽別的專業意見。當時，朗恩和真娜根本沒有考慮過變性的想法，也或許他們是有想過。總之，當他們在電視上看到曼尼博士時，他們忽然領悟到，這個念頭從未完全消失過，而是隱藏在潛意識裡，就像



朗恩說的，「如同一粒種下的種子」。如今，他們看見也聽見了曼尼博士的談話，那顆種子就好比已經長大並開出花朵。

曼尼博士最吸引人的，就是他的自信。即使在電視攝影機和現場觀眾的注視壓力下，他仍然以一種有品味、英國人的腔調，非常流利地發表他的言論。甚至當那位犀利的年輕節目主持人戴維斯(Alvin Davis)問他，為什麼其他心理醫師「這麼反對」他所宣揚的做法時，曼尼博士的回答連一個螺絲都沒有吃。

「嗯，」曼尼博士說：「我想很明顯的是，許多人覺得這不是精神醫生治療病患的方
式，因為通常對精神醫學的定義，就是心理療法和談話治療。然而，卻有一小群人，包括我在內，相信這是完全正當的做法，我們只是努力不斷地提升我們助人的能力，以及持續追蹤二十到三十個病人，看看他們在接受這種治療之後，五到十年之內的狀況如何。」

「但是無論如何，」戴維斯追問：「當一位同性戀者來找你，說他要閹割時，難道不是你，或是你和一群約翰霍普金斯的委員，必須判斷是否要閹割他嗎？」

「是的，」曼尼博士溫和地說：「如果你要這樣說，也沒錯。」

「不只是閹割他，」戴維斯繼續追問，像個檢察官那樣升高了他的語調：「還要在他身上注射荷爾蒙，實際改變他——不是變成女性，而是變成一個具有女性器官的男性。你會不會覺得你們僭越了一些不只是精神醫生，也許連上帝都不願意有的決定權？」

「是嗎？」曼尼博士笑容閃爍，語帶辛辣嘲諷地回答：「所以你是代表上帝說話囉？」

「不，」戴維斯說：「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相信上帝不插手這件事。」

「嗯，」曼尼博士回答，又恢復了他不慌不忙的平靜聲調，其中還帶有一點點忍耐的客氣：「我不確定這是個真正特別相關的問題——雖然我知道很多人會認為是。我可不可以，」曼尼博士繼續說：「給你巴爾的摩一群神職人員的回答？當報上披露這個消息時，有人問他們的看法，其中十三個人同意，以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來看，特別是以它牽涉到相關者生命的重要性來說，這種幫助他們的做法，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只有一個人稍後才作出答覆，他是羅馬教會的代表。」

「那為什麼在加拿大沒有人這樣做呢？」戴維斯進一步追問，而且再度重複他稍早的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精神醫生如此反對這樣做呢？」

「噢，」曼尼博士幾乎是懶洋洋地說：「我會說，這是因為很多地方都有保守的傾向。我應該不用告訴你，在很多醫學、科學，甚至家管或農耕的領域中，都有一種墨守成規、執著於過去的傾向吧？」

「而你就是那個先鋒？」戴維斯問。

「嗯，」曼尼回答：「或許小小的程度上算是吧。」

這時攝影機的鏡頭，從這主客兩個人，切換到一位走到布景前面的金髮女郎身上。她



穿著窄裙、高跟鞋，搭配著一件緊身短外套，走到兩位男士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在特寫鏡頭下，她豐潤甜美的臉蛋上化著精緻的妝，是那種六〇年代中期的風格，眼線、睫毛膏、粉底和唇膏都很濃。

「這是黛安·巴藍司基小姐(Diane Baransky)」節目司儀介紹：「四年前，她的名字叫作理查(Richard)」

朗恩和真娜目瞪口呆看著電視螢幕，那是他們第一次看到變性人。聽曼尼博士談論變性的理論是一回事，親眼看見又是另一回事。朗恩和真娜幾乎不敢相信。如果沒有人告訴他們巴藍司基小姐原來是男人，他們一點也猜不出來。即使現在知道了，還是很難相信。她看起來就是一位吸引人、甚至可以說是性感的妙齡女郎。她的動作、行走和坐立的方式，甚至她的聲音，雖然有一點沙啞，但是當她跟觀眾和主持人打招呼的時候，都充滿了女性的特質。

在戴維斯問了一些開場的問題之後，曼尼博士開口了，他立刻掌握了訪問焦點。

「戴安，」曼尼問道：「我想大家會很想知道你在手術前後生活的差異，你能不能簡短描述一下。」

「噢，差異實在太大了，」巴藍司基小姐說：「那是一種找回自我的方法。你可以融入社會，更被一個正常的社會接納。」她說明身為男兒身、但內心感覺是女生的矛盾，這

在自己成長過程中，一直是種煎熬。「在青少年時期，或者說是年輕的時候，你跟別人不一樣，那真的很辛苦。」巴藍司基小姐說，變成女生之後，她所有被嘲笑和「排擠」的問題，全都迎刃而解。作完變性手術之後，她才覺得自己不是完全孤獨的。現在大家都認為她是女人，而且她也已經結婚了，嫁給一位美髮同業。「我曾經是不一樣的，」她說：「以前的我是不完全的，非男又非女。」

「而現在作為一個女人，你覺得自己是完整的？」戴維斯問。

她的回答毫不含糊：「噢，是的，絕對是。就是，完全是——身心都是。」

然後觀眾開始發問。當這個段落快結束之前，有一位年輕人提出了一個一直在真娜心中盤旋的疑問，他問到關於曼尼治療的「其他性別障礙病人」，亦即曼尼稍早稱為擁有一「尚未完成之生殖器」，生下來男性或女性性徵都不明顯的嬰兒。曼尼博士回答，他和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同事們，可以經由外科和荷爾蒙的矯正，讓他們變成任何適當的性別，使小孩可以快樂地以那種性別長大。「在這種情形下的心理性別，」曼尼表示：「不見得跟遺傳性別相同，也與具有男性或女性的性腺(sex gland)無關。」

雖然曼尼博士講話的速度很快、又用上一些專業的詞彙，朗恩和真娜還是聽懂了。他的意思是，嬰兒生下來的性別不重要，你可以把嬰兒的性別從這一種變成另外一種。

真娜轉頭跟朗恩說：「我想我應該寫信給這個曼尼博士。」



朗恩同意。節目告一段落後，真娜便提筆寫信給曼尼博士，告訴他發生在布魯斯身上的事。曼尼很快就回信了，對於約翰霍普金斯能夠幫利馬家的小孩做些什麼事，他在信上表示他相當地樂觀，並催促他們儘快把小孩帶來巴爾的摩。

經過這麼多月來讓人沮喪、難過、希望全消的預後推測之後，真娜說，曼尼博士的話像是一帖鎮靜劑。她說：「終於有人認真傾聽我們說的話了。」



第二章

先天本性vs.後天教養



曼尼博士的確有認真傾聽。就某種意義而言，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可能一直在等待像真娜這樣的求助。

在曼尼得知利馬一家處境的時候，他已是世界上最受重視的性學研究者之一，雖然他的論點有所爭議。他一九二一年出生於紐西蘭，二十五歲時來到美國。他在哈佛大學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然後加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他如流星般地崛起，成為出名的性學研究及臨床專家。加入霍普金斯十五年之後，他已是「性別認同」一詞公認的命名者，該名詞是形容一個人自認為是男性或女性的內在感覺。同時，他也是全世界公認研究外陰性別不明（ambiguous genitalia，或稱性器混淆）的心理學權威。他在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首創的變性手術診所，也登上全球報紙的頭條新聞。

就像曼尼在《天天一小時》節目中不慌不忙的表現，他在推銷自己的想法時幾乎難有敵手。小兒精神科醫師強·漢普生(John Hampson)表示：「他是個極為出色的演講者，當他說明某個案例的資料時，非常有組織、非常有說服力。」強·漢普生和他的太太瓊(Joan)，在五〇年代中期，和曼尼一起發表了好一些有關性別發展的開創性文章。「我想許多人都很嫉妒他，他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有些人並不喜歡他。」

曼尼驕傲的信心其實是付出代價才得到的。他在紐西蘭鄉下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充滿了焦慮、個人悲劇和早期的挫敗。他的父親是澳洲人，母親則是隸屬於弟兄會

(Brethren church)的英國人。從小他就是個瘦削、敏感的小孩，在一個嚴格的宗教保守氣氛下長大，他稍後嘲弄地稱之為「緊緊封閉的、傳福音式的教條」。他很早就發展出知識優越感。當他五歲第一天上學時，被學校的小孩子欺負，於是他跟著堂姊躲到女孩子的遊樂場去，在那兒男生可就安全了。「因為無法打鬥，」曼尼稍後這樣寫道：「我只好努力在智能上贏過別的小孩。那對我來說比別人容易多了。」

曼尼小時候的困擾，由於跟父親的關係不良，使得事情更為嚴重。六十年後，他仍以幾乎毫無保留的惡意下筆批判父親。他把他父親描寫成一個殘忍的人，會無情地射殺在果園裡橫行的飛鳥，對於四歲的兒子，更只因為他打破了一扇玻璃，就施以「凌虐式的審問和毒打」。這件事情，根據曼尼描述，讓他畢生排斥「男性的兇殘獸性」。

曼尼八歲時，父親死於長期的腎臟疾病。曼尼寫道：「我還來不及忘記或寬恕他不公平的殘忍，他就過世了。」父親被抬往醫院三天後，他才知道父親過世的惡耗。當叔叔告訴他，現在家裡就由他作主時，曼尼的震驚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對一個八歲的孩子而言，那個責任實在太沈重，」曼尼說：「它對我的影響太大了。」成人後，曼尼永遠避免「當家作主」的角色。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在一次以離婚收場的短暫婚姻之後，他再也沒有結婚，也沒有任何小孩。

在父親死後，曼尼由母親和沒結婚的阿姨們撫養，而在這種完全女性化的氣氛下長



大，她們那種反男性的惡罵對他也影響頗深。「我為自己身為男性感到內疚，」曼尼這樣描寫：「我帶著男性可憎的性別象徵」，亦即陰莖和睪丸。對照曼尼往後在成人和嬰兒變性方面的名聲，他以下的話有種令人不安的重要意義：「我在想，如果男人跟動物一樣，一生下來就閹掉，這個世界對女人來說，或許真的比較好。」

曼尼青少年時期很孤獨，對天文學和考古學有股狂熱，也曾經有當音樂家的野心，但是當他一旦了解自己最多不過是個技術不錯的業餘人士之後，這個目標便注定只能以失敗收場。在紐西蘭首都威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就讀時，曼尼發現了新歡：心理科學，那讓他一直不順的創造力有所投注。一如許多受到研究心理和情緒所吸引的學生，曼尼會對這個學科發生興趣，主要是想解決某些困擾自己的問題。他第一份心理學的正式研究，也就是他的碩士論文，是關於「音樂家的創造力」，在其中，他寫道：「我開始研究，自己與其他音樂系學生相較，究竟缺少什麼成功因素。」

曼尼稍後又將研究範圍縮小到性心理學，這一點也有類似的個人基礎。跟他父母的信仰分道揚鑣後，曼尼愈來愈反抗他認為成長時期壓抑他的宗教束縛。性別的學術研究，讓最怪異的性行為，都能掙脫道德考量，進入「單純的」科學研討範圍，對曼尼來說，這無疑是種解脫。從二十歲以後，他就極度鼓吹對性的好奇和探索。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性革命沸沸揚揚，曼尼也公開擁護開放式婚姻、裸體主義，以及其他的性解放形式。他在他

的著作《性的特徵》(Sexual Signatures)一書中寫著：「有很多證據顯示，奉行雙性群交的人，可以和擁有單一伴侶的人一樣滿足，只要對方和他們『頻率相同』。」在別的著作中，他則描述自己的生活是隨性而不墨守成規的：「跟合得來的性伴侶互相給予，友善來往，其中有的是女人，有的是男人。」

曼尼沈迷於扮演「性革命臥底」(《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九七五年如此稱呼他)的角色，從未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宣揚他對性解放的教義：在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演講完後，在黑暗中對著一個學生強調性的歡愉；以專家身分出庭，為一九七三年出品的色情電影《深喉嚨》(Deep Throat)辯護，極力稱讚該電影有「淨化」作用，可以鞏固婚姻；在《紐約時報》不斷撰寫文章鼓吹「休閒性交的新道德」。一位在一九七〇年代，因為罕見的內分泌障礙而接受曼尼治療的病人回憶說，他記得有一次曼尼曾經隨口問他有沒有體驗過「黃金淋浴」(golden shower)，當時他還很年輕、性經驗不多，不知道曼尼在說什麼。「就是讓人家尿尿在你身上啦。」曼尼用一種輕快的聲調，帶著一抹閃爍而輕微暗諷的笑容說道，那是他發表類似刻意挑釁的評論時，喜歡採用的態度。

曼尼認為，禁用一些字眼反而會助長假正經，所以他常常在日常跟同事和病人的談話中，放進「幹」(fuck)、「雞巴」(cock)和「屌」(cunt)這些字眼。曼尼的同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柏林(Fred Berlin)，視曼尼為其最重要的導師之一，極力為曼尼敢於言



性的傾向辯護。「因為他覺得讓人不怕討論性議題是重要的事，」柏林說：「所以他有時會用一些別人聽起來有攻擊性的三字經。也許他可以稍微妥協一些，但是曼尼是個很有個人想法的人，如果他覺得某種方式最好，就不會考慮其他的做法。」

曼尼認為討論性議題的最佳策略，在七〇年代只引起別人的側目，到了更保守的八〇年代初期，當他開始攻占那些最大膽的性學先鋒也不敢冒進的領域時，便引起了眾怒。一九八六年，曼尼發表了《愛情地圖》(Lovenaps)，針對諸如虐待被虐症(sadomasochism)、嗜糞症(coprophilia)、斷肢癖(amputation fetish)、自勒(autostrangulation)，以及其他種種他稱之為「性倒錯」(paraphilia)而非變態(perversion)的性行為，作了鉅細靡遺的研究，目的是要讓這些行為去污名化及除罪化。戀童癖(pedophilia)的主題也成了曼尼的特別興趣之一，顯然他樂於在公開場合宣揚。

「兒童時期的性經驗，」曼尼向一九八〇年四月期的《時代雜誌》(TIME)解釋：「例如作為某一親戚或長輩的性伴侶，不一定對個人有不利影響。」他也答應接受荷蘭戀童雜誌《培帝卡雜誌》(Paidika)採訪，這本雜誌刊登的廣告，包括北美戀童協會(NAMBLA, 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以及其他贊同戀童的團體。「如果要我來看一個十歲或十二歲的男生深受一個二十或三十幾歲男人吸引的案例，假使他們的關係完全是雙向的，結合也是真正雙向的，我就不會說他們有任何病態。」他如此告訴該刊，然後又補

充說：「重要的是，一旦關係建立在這種正面而有感情的基礎上，就不應該遽然中斷。」一九八七年，曼尼為在丹麥出版、名為《男孩跟男人的接觸》(Boys and Their Contacts with Men)的特殊書籍作序，該書作者為荷蘭的教授山佛(Theo Sandfort)，書中呈現的主要是真人實證的案例，其中小至十一歲的男孩們，熱切地描述和老至六十歲的男人們發生性關係的喜悅。「對在西元二〇〇〇年後出生和受教育的人來說，」曼尼在序中寫道：「我們將是他們的歷史。我們對於孩童時期性和情欲發展的原則，那種自以為是和道德教條式的無知，會讓他們感到十分不解。」曼尼的結論宣稱：「這是一本很重要，而且很正面的創作。」

至於那些針對他公開言論的批評，曼尼的反應總是予以反擊，嘲笑那些批評者守舊落伍的清教徒式性觀念。在他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文集《愛神欲神》(Venuses Penuses)中，有一篇自傳，其中曼尼描述自己是性的「傳教士」，他驕傲地宣稱：「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就從二十世紀紐西蘭鄉下基督教正統派和維多利亞式傳統中解放出來，可是要社會這麼改變並不容易。」



曼尼對於性的實驗性、打破禁忌的態度，也反映在他追求專業研究生涯的方式上。他避開比較拘束的性別研究領域，刻意尋求陌生的角落。一九四八年，他在哈佛念心理學博士的第一年中，就發現了人類性別研究裡，相對而言尚稱未開發的處女地。在一堂叫作「臨床心理學的實地調查與研討」的個別指導課程中，他接觸到一個十五歲男生的案例，他沒有完整的陰莖，只有一個小瘤般、類似陰蒂的陰莖。這個男生正值青春，已經長出胸部來。這是曼尼第一次碰到半陰陽症（hermaphroditism，又叫中性〔intersexuality〕）的例子，意指出生時內外部性器官異常。這個名詞是結合希臘愛神漢密斯（Hermes）和阿佛洛狄忒（Aphrodite）〔註一〕兩個字而來，描述一般人所說的半男半女。根據某些估計，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大約是兩千分之一，各案例的症狀不一，從最極端的例如女生生下來有陰莖大小的陰蒂和像陰囊般密合的陰唇，到相反的另一端，男生生下來卻有跟女生幾乎一樣的性器官，一直到青春「她」沒有月經，大家才發現他的真實性別，以及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各种可能情形。

曼尼對於半陰陽症深感著迷，以此作為他的論文主題。在此之前，這方面的研究幾乎

都是從生物觀點出發，曼尼則是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陰陽人成長過程中，心智和情緒的反應。他的論文「半陰陽症：一個人類矛盾體的本質」(Hermaphroditis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a Human Paradox)於一九五二年完成，他因此接到了約翰霍普金斯的聘請，而當時霍普金斯早已成立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和治療中性人案例的門診中心。該中心的主任是小兒內分泌醫學先驅威爾金斯(Lawson Wilkins)，他讓曼尼跟一對夫妻檔精神醫師，瓊和強·漢普生一組，研究門診中陰陽人的心智和情緒。這三名研究人員組成了新創立的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Psychohormonal Research Unit)。

接下來的六年之間，曼尼和漢普生夫婦研究了一百三十一個中性人案例，從襁褓中的嬰兒到成人都有。身為該小組的主要研究員及發表報告的撰寫者，曼尼聲稱，從這些被診斷出外陰性別不明、染色體異常、常被以相反性別撫養長大的陰陽人案例中，觀察到一個驚人的事實：在超過九五%的案例中，這些陰陽人的心智經評估都是正常的，不管他們是被當作男孩或是女孩來養。曼尼稱這兩種病例組群為「配對」(matched pairs)，還說，決定中性孩童性別認同最重要的因素，並不是生理，而是他們的養育方式，這些配對就是最好的例證。他認為這些小孩子下來時，心理性別是完全一樣的，因為撫養的方式不同，才讓

〔譯註一〕兩者皆為希臘神話中的神祇，漢密斯為司學藝、商業的智慧之神，阿佛洛狄忒則司愛與美。



他們逐漸形成身為男性或女性的概念。

以這樣的理論為基礎，曼尼遂建議霍普金斯的外科和內分泌科醫師，可以讓初生兒經由手術或荷爾蒙的改造，隨他們的意思變成男生或女生。這種手術範圍很廣，可以小到切除女生過大的陰蒂，或大到將陰莖發育不完全的男孩完全變性為女生。這種改造成女生的手術由於外科技術的發展而已定型，因為對外科醫師而言，裝設人工陰道比人工陰莖容易。曼尼唯一的但書是：這樣的「性別指定」(sex assignment)和轉換，必須在嬰兒出生的兩年半之內完成（根據曼尼的理論，超過這個年紀，小孩的性心理就不再柔軟可塑），而且一旦決定了性別，醫生和父母就不可以再搖擺或猶豫，否則就可能會在小孩的心智上造成嚴重的矛盾。

對於醫學上最麻煩及充滿情緒糾葛的難題之一：如何處理天生中性的小孩，曼尼提出了一個看似有力的心理基礎，提供醫師一個相當簡單的外科解決方案。「我們幾乎無法想像，當父母提出第一個問題：『是男孩還是女孩？』，而醫師卻無法回答時，他們有什麼感受，」柏林醫生說：「早在數年前這個話題還沒人談論時，曼尼是少數幾個率先盡其所能試著幫助這些家庭，突破這個艱難處境的人。」

然而，曼尼的主要興趣並不在這些陰陽人的案例上。就像他早在哈佛論文中說的，他了解中性人案例的科學價值主要在於他所謂的「自然的實驗」(experiments of nature)，意指

他們是一組研究對象，而研究結果或許可以解開正常人類性別發展的迷思。事實上，他們可以解決科學上長期的辯論，亦即，究竟我們對自我的性意識是先天本性，還是後天養成？曼尼在霍普金斯初期發表的一些論文，就把中性嬰兒初生時性心理中立的理論，普遍應用在所有小孩的身上，甚至包括那些初生時性器官並無不正常的嬰兒。

「從所有陰陽人案例的證據來看，」曼尼一九五五年寫道：「男與女的性行為和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並沒有先天和本能的基礎。半陰陽症的研究證據證明了另一個概念，取代男性／女性直覺是天生的理論，那就是在心理上，性別在出生時是沒有差別的，它是因為成長過程中不同的經驗，才逐漸區分成男性或女性。」簡單來說，曼尼提出了一個先進的概念，即人類本身是男是女的概念，其形成是根據他們穿藍色或粉紅色衣物、取的是男性化或女性化名字、穿褲子或裙子、玩玩具槍或芭比娃娃這些事情而定。許多年以後，曼尼描述自己是如何想出這些關於人類性行為的激進理論：「我常常發現自己在把玩一些概念，找出潛在的假設，」他沈思著：「就像是在玩科幻遊戲一樣。」

儘管曼尼新生兒性心理如同白紙的理論，在現代讀者聽來恍若科幻小說，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卻恰恰相反，廣為醫師和科學家所接受。這種接納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並不難理解。性別差異源自後天教養的觀念引領風騷已有數十年，在此之前，一直是先天本性派獨占鰲頭，而這當然要歸功於十九世紀末，所謂男女荷爾蒙鞏固劑(testosterone，又譯睪丸



酮、睪丸激素等）和雌激素（estrogen，又譯動情激素等）的發現。這種以化學為基礎的內分泌發現，讓生物學家堅稱已經解開性別差異的謎題：睪固酮促成男性化，雌激素則造成女性化。他們信心滿滿地預測，在男同志血液中，將會發現雌激素過多、睪固酮不足；然而成年男同性戀者的血液和尿液經過精細分析之後，卻沒有發現這種荷爾蒙的不均衡現象。在顯微分析下，異性戀男子和同性戀男子的內分泌是完全一樣的。其他要證明性別認同決定於荷爾蒙的實驗也都宣告失敗。當這類的失敗愈來愈多，希望從生物學來解釋性別差異的熱忱便愈來愈少。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佛洛伊德和現代心理學出現之際，人類行為的社會學習模式快速增加。在這種背景之下，約翰霍普金斯小組所提出的性別認同和取向完全由父母和社會鑄成的結論，剛好吻合由行為學理論主導的當代思潮。更何況，這些論文帶著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這所全球首要醫學研究中心之一的出版認可，對於其接受度可是有利而無害。

約翰霍普金斯一九五五年的中性人論文出版後立刻被稱為經典，贏得該年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頒發的荷夫海默獎（Hofheimer Prize）。不久，漢普生夫婦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前往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任職，到一九六一年之前，他們倆已逐漸離開了性別認同研究的領域。因此，曼尼獨自繼承了論文得獎的名

聲，同時，因為他也是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唯一的主任（威爾金斯於一九六二年過世），所以他也是該單位成功果實的唯一受益者。一九六三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給予曼尼一筆總數二十萬五千九百二十元的補助經費，這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而且這還只是衛生研究院給的第一筆經費而已。衛生研究院的金援讓曼尼和他的單位，在往後三十五年之間，都沒有後顧之憂。一九六五年，曼尼應邀到水牛城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兒童醫院擔任小兒科客座教授，並「因為對兒童心理發展研究的貢獻」，獲頒費城兒童醫院獎章(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 Medal)。一年之後，當他終於說服約翰霍普金斯設立門診，專門治療與研究成人變性時，他開始在學術界以外的領域累積名聲。

從一九五二年克麗絲丁·喬建森第一次在媒體披露後，曼尼就受到變性論所鼓舞。在喬建森的案例中，曼尼看到了他一直想要的證據，足以證明他環境而非生理決定心理性別的理論，因為喬建森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有天生正常的男性生理外表和性徵，但其內心卻認為自己應該是女性，跟他染色體、生殖腺(gonad)、荷爾蒙、生殖與解剖上的性別都完全相反。還有什麼更好的證據，可以證明性別認同不是由生理，而是由環境決定的呢？曼尼下定決心要儘可能研究更多這類個案，於是開始讓霍普金斯進行變性治療和研究，而這個概念當時對大部分的美國醫學機構而言，都還是不太受歡迎的。



在曼尼一連串讓約翰霍普金斯成為美國第一所接受變性手術醫院的努力中，他了解到，他首先必須找到一位令人尊敬的醫界人士加入。（曼尼自己只是一個心理學者，並沒有任何醫學學位。）他先找上了瓊斯(Howard Jones)，他是霍普金斯的婦科醫師，變性手術技術嫻熟，曾經幫忙診治曼尼的中性嬰兒病例。「我記得，」瓊斯說：「連續好幾個月，也許甚至好幾年，曼尼都不停地在問，難道我們真的不應該涉足變性領域嗎？」雖然瓊斯對於實驗性醫療很有興趣，他卻不贊同為成人進行選擇性的去勢和生殖器重建手術。（瓊斯最後終於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到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設立了全美第一個人工授精診所。）

但是曼尼卻很堅持。他轉而向班潔明(Harry Benjamin)求助。班潔明是美國公認的變性研究之父，之前的十年，他早已悄悄轉介很多病人到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或是摩洛哥(Morocco) 去作變性手術。曼尼把班潔明動過手術的三位變性人請到約翰霍普金斯，跟瓊斯和小兒內分泌科醫師艾格頓(Milton Edgerton)見面，最後瓊斯和艾格頓都被說服了。「曼尼終於匯集了足夠的證據，」瓊斯這樣描述：「讓我們相信也許這是件應該做的事。」曼尼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個新的成人變性外科診所的命名人。他將之取名為「性別認同診所」(Gender Identity Clinic)。

霍普金斯第一個完整的變性手術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由瓊斯醫師操刀完成；一

位名為菲力普·威爾森(Phillip Wilson)的紐約男子，變性成為菲麗絲·雅芳·威爾森(Phyllis Avon Wilson)。但是，之後霍普金斯仍必須不斷向美國大眾推銷這個概念。雖然有些變性委員會的委員認為診所應該低調進行，曼尼卻敦促主動出擊，建議召開記者會，以避免流言的散布。曼尼的看法占了上風，並幫忙醫院的公關部門策畫了一場記者會。該項聲明發表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曼尼後來透露，他們的策略是先給《紐約時報》獨家消息，因為約翰霍普金斯的團隊希望《紐約時報》的聲望可以樹立其他媒體報導的基調。「這個計畫，」曼尼後來寫道：「結果正如預期。」

《紐約時報》披露這個消息的方式，一點都沒有在一九五二年對待喬建森案例的那種醜化羞辱。他們在第一版上，幾乎是直接引用霍普金斯公關稿裡，該診所委員會主席互普司(John Hoopes)的說法，認為該診所對於棘手的性心理障礙，提供了人道及有效的解決方法。類似的正面報導之後也陸續出現在三份主要的新聞週刊中，包括《時代雜誌》、《新聞周刊》(Newsweek)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之中。一九六七年四月分的《紳士雜誌》(Esquire)作了一篇該診所的透徹報導，其中大大地褒揚了曼尼的成就。事實上，在一九六六年晚期和一九六七年早期，所有對於約翰霍普金斯攻占變性手術領域的報導中，最尖銳的也就是加拿大廣播公司的《天天一小時》中，主持人戴維斯尖苛地挑戰曼尼關於轉換人類性別做法的道德和效益問題。除了那個尖酸的答辯(「那麼你是代



表上帝那一方囉？」之外，曼尼總是拒絕上鉤，為他性別認同診所的委員們，立下了如何應付直接攻擊的典範。曼尼冷靜、精明的表現是公關的傑作，對於那些了解他平時對於細微反對意見總是大力反擊的人而言，更是印象深刻。

曼尼自己在一篇一九九〇年發表的論文中坦承：「在我從事心理荷爾蒙研究這一行，我無法平心靜氣地容忍笨蛋。」這是個保守的說法。這位心理學家反擊學術上挑戰的猛烈，可是赫赫有名的。「曼尼出奇聰明，」和曼尼相交三十年的成人變性手術先鋒勞伯(Donald Laub)說：「他也許是我碰過最聰明的人。他聰明到這已經變成一種麻煩，因為他知道別的人都是蠢蛋。」無論如何，曼尼毫不在乎讓別人知道他瞧不起他們的智力。一九八〇年中期，在曼尼的指導下，於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拿到博士學位的心理學者迪沃(Howard Devore)說：「即使當曼尼問別人有沒有意見時，他要的也只是附議。」假使沒有馬上得到別人的同意，曼尼也從不怕顯露他的不悅。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曼尼就已經以好發脾氣聞名，包括他的同事、下屬、學生以及其他學術界前輩都知道。

「〔在約翰霍普金斯〕之後，在我待過的每個研究中心，」迪沃說：「只要有人看到我的履歷表上寫著曾經跟曼尼共事，他們都會要我私底下談談，跟曼尼共事的情形如何？他不是『跟別人說的一樣那麼壞』？他舉世皆知的名聲真是讓我感到驚訝。我曾經看過他在一場學術會議上，站起來發言把台上報告的人轟下來，只因為他不同意她所說的內容。」

一九六七年二月，當朗恩和真娜夫婦第一次在電視上看見曼尼時，曼尼的名聲在各方面來說都是無懈可擊的。專精性別認同的著名心理學家羅森寶(Benjamin Rosenberg)就說曼尼是「領袖，只要有關於混合性別(mixed sex)、半陰陽症、同性戀的意義等等議題，他都是跑在最前面的」。

曼尼在學術和科學界的成就與影響，幫著建立了未來幾十年（事實上，是直到今天）的科學風貌。很多受教於其性心理分化(psychosexual differentiation)理論的學生和同志，分別占據了美國最受尊崇的大學、研究機構與科學期刊中的重要位置。他的學生包括如今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資深教授的安赫特(Anke Ehrhardt)、英國倫敦性別認同診所(Gender Identity Clinic)主任格林(Richard Green)、多年來掌管出名的金賽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的瑞妮絲(June Reinisch)、以及深具影響力的馬斯特暨瓊生診所(Masters and Johnson Clinic)主任史瓦茲(Mark Schwartz)。

在臨床方面，曼尼的影響可能更顯著。他所持人類出生時性心理具有彈性的理論，成了小兒內分泌學這個醫學專科的基石。凱絲樂教授(Suzanne Kessler)在她一九九八年的著作，《中性案例的啟示》(*Lessons from the Intersexed*)中，就認為曼尼對於診治性別不明嬰兒的觀念及其意涵，在心理醫師之間形成了「科學領域中少見的共識」。



然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至少有一位研究者願意挑戰曼尼，他是堪薩斯大學 (University of Kansas) 的年輕研究生，剛從大學畢業不久。

戴蒙的父母是烏克蘭的猶太裔移民，朋友都叫他「米奇」。戴蒙從小在布朗克斯區 (Bronx) 長大，他卻避開了混入街頭幫派的命運，而邁入學者生涯。戴蒙在紐約市立學院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主修生物，並深為荷爾蒙在人類行為中扮演的角色著迷。當考慮念研究所時，他選擇了堪薩斯，因為解剖學家楊恩 (William C. Young，本身以三〇年代研究雌鼠動情周期中荷爾蒙的角色而聞名) 在那裡負責一個實驗室。戴蒙於一九五八年秋天進入堪薩斯，適逢楊恩的研究群，亦即費尼司 (Charles Phoenix)、戈伊 (Robert Goy) 和傑若 (Arnold Getall) 這三人小組即將發現荷爾蒙的性別分化角色，而這個發現自此將永遠改變性別發展的科學和研究。

很多性學研究者，包括楊恩的團隊，從早期荷爾蒙研究裡覺醒，把研究焦點從荷爾蒙在成熟生物中的角色，轉移到在子宮內的角色上。這些研究都奠基於二十年前蘇俄性學研究者唐契柯夫 (Vera Danichakoff) 的天竺鼠實驗，而堪薩斯團隊試圖了解的是荷爾蒙對於胎

兒發育中大腦及神經系統的作用。早期的研究者已經發現，在人類妊娠初期，男女胚胎的內外部性器是一樣的，然而在六到八個星期，便開始有了改變。如果胚胎細胞帶的是男性染色體（XY），胎兒的生殖腺就會發展為分泌睪固酮的睪丸。這種出生之前的雄性激素（androgen，又譯男性荷爾蒙），就是讓發展中胚胎的外生殖器變成男性生殖器的催化劑，使得尚未分化的生殖結節（genital tubercle）變成陰莖，而開放的生殖竇（genital sinus）則從中線癒合，形成陰囊，之後睪丸再下降進入陰囊；雄性激素同時也讓內部的生殖系統變成男性生殖系統，包括形成輸精管。（睪丸分泌的另一種物質，則抑制了原始雌性內部構造的生長。）反之，如果胚胎帶有女性（XX）染色體，生殖腺就會發育成卵巢，不分泌睪固酮，因此外生殖器和內部構造就會分化成女性的型態，生殖結節變成陰蒂，生殖竇仍然敞開成為陰道入口，而內部構造也發展成輸卵管和子宮。

堪薩斯團隊想了解的，就是這種出生前荷爾蒙對生殖系統的作用，是否也會發生在大腦。為了找到答案，他們在天竺鼠媽媽的子宮中注入大量的睪固酮，創造出一組中性天竺鼠。由於在出生前的生長關鍵期，暴露於睪固酮之下，因此出生後的雌性天竺鼠，一如預期，擁有像陰莖一樣大小的陰蒂。接著他們進行研究，經過這種處理、在解剖構造上變得雄性化的雌鼠，性行為是否也同樣會有雄性化的傾向。

觀察處理組的雌天竺鼠從幼年期進入成年期的過程，堪薩斯團隊發現了一件不尋常的



事。相較於未受治療的姊妹們，這組天竺鼠不只明顯地更好動，而且在其他正常公老鼠之前，牠們也不會展現出正常動情期雌天竺鼠脊柱前彎(Jordosis)、露出臀部以方便雄鼠插入的姿態，相反地，這些受到鞣固酮影響的母天竺鼠，甚至是那些陰蒂沒變大的，都企圖要騎上她們的正常姊妹。

一九九九年，該團隊成員之一戈伊過世前不久，我採訪過他，詢問關於他研究生涯中的突破時刻。他的聲音中充滿了興奮，彷彿前一晚才作出這項重大的發現。「我們作實驗的速度，根本趕不及我們想要做的事，」他告訴我：「我們每天晚上都在作實驗，一晚接著一晚不停地作，收集資料，分析再分析。」〔譯註2〕

戴蒙當時也全心投入研究之中，他以懷孕的母鼠作實驗，研究鞣固酮是否對懷孕有任何影響。他當初到堪薩斯，就是希望針對荷爾蒙對行為的影響，有新的了解和學習，如今，他發現自己正處於二十世紀性別研究最重要的生物學突破關鍵時刻。

團隊成員裡有人擔心他們的教授楊恩對於實驗結果的反應，因為他們知道楊恩支持四年前約翰霍普金斯曼尼團隊所提出的性心理中立理論。「楊恩曾是曼尼和漢普生的重要跟隨者，」戈伊告訴我：「他一直認為性行為的構成原則是經驗，因此他的信念被這些研究結果所打破。然而他的接納度出奇地高，對他而言事實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這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很不尋常，多數科學家沈迷於自己的想法和理論，你根本無法說服他，但楊

恩不是這樣的人。」

事實上，當到了要發表研究成果的時候，是楊恩把爭辯不休的團隊成員給擺平的。原本研究團隊還不確定如何為那些實驗組雌天竺鼠的行為命名，大家在「男性擬態」(masculine mimicry) 及「假分化」(Pseudodifferentiation) 這兩個名詞間決定不下，結果都給楊恩否決了。楊恩說，他們發現的出生前睾固酮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是製造出雄性行為的模擬而已，而是雄性行為本身。因此，楊恩建議他們，不妨明明白白地說明他們在天竺鼠胎鼠身上，發現了成年雄性性行為的「構成原則」(organizing principle)。

「楊恩是位解剖學家，」戈伊解釋說：「如果你了解解剖學家使用『結構』(organization) 這個詞的方式的話，就能了解我們非使用這個詞不可。解剖學家相信，身體的器官是由一群特殊分化的組織所組成，這些組織的結合，得以執行器官的特定功能，或造成功能障礙，那就是楊恩使用『結構』這個詞的意義。他指的是性行為背後的所有組織，不管是周邊結構、大腦組織、血液或肌肉，構成了一個整體。這個結構是在出生前暴露於荷爾蒙之下而強制形成的，若非變成雄性，就是變成雌性。他相信，我們發現了以男性化形式建構這些組織的原則。」

〔譯註2〕鼠類是夜型性動物，故此得晚上觀察其行為。



只是，當這個團隊要將結果寫成論文，刊登在一九五九年《內分泌學》(Endocrinology)期刊時，楊恩提醒他們小心，是否應該直接把動物實驗結果套用在人類身上——當然，這大部分是出於楊恩對於曼尼和漢普生研究的敬意。結果，對於他們的研究能否套用在人類的說法，團隊同意予以淡化。戈伊說：「我們的說法是，對於天竺鼠的了解也許可以在某些方面藉著指出『不同之處』，可以『互補』或『補足』我們對人類的認知。」

不是每個實驗室成員都滿意這個決定。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戴蒙，就覺得楊恩和其他人都太小心了，而未能將動物的研究結果直接跟人類的狀況相連。「我相信演化學，」戴蒙笑著說：「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人類在這方面和其他哺乳動物會不一樣。」他的感覺是如此地強烈，以致當他在堪薩斯研究所最後一年要申請一個研究獎金，必須提出一篇原創的論文時，他就決定以曼尼和漢普生的新生兒性心理中立理論為題。

這篇論文題目為「人類性行為個體發生學的批判評估」(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Ontogeny of Human Sexual Behavior)，戴蒙在其中公開地反駁約翰霍普金斯團隊的理論。戴蒙引用天竺鼠實驗的發現，提出這種人類「完全脫離其演化傳承」的理論「似是而非」。他認為，出生前的因素「限制」了文化、學習和環境對人類性別認同能有多大的影響。戴蒙匯集了生物學、心理學、精神病學、人類學與內分泌學上的證據，聲稱性別認同基本上從受精時就已經在腦子裡定了型。這篇論文是對曼尼權威的大膽挑戰，特別是作者是個沒沒

無名的堪薩斯大學研究生。

針對中性人性心理具有彈性的理論，戴蒙指出這樣的人在母體子宮內經歷了一種「遺傳或荷爾蒙的不平衡」，他認為即使陰陽人可能在出生被時導向某一種性別（如同曼尼說的），這並不見得就是他們出生時性別中立的證據。它可能只代表著他們神經系統和大腦的組織，在子宮裡也經歷了與性器官一樣模糊不明的構成過程。簡單來說，它們的神經天生就有能力可以雙向遊走。戴蒙急切指出，這種能力當然是基因正常的兒童不會有的。至於那些在解剖學上沒有明顯性別不明的變性人，可能有一種尚未發現的生物狀況，將他們的大腦給建構成跟他們的身體情況相反的設計。而戴蒙可以用班潔明博士這等權威人士的證據來支持這項可能性。班潔明方才完成一篇報告，指出在他八十七名病患中，有四十七名病患，他「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幼兒時期的狀況」跟他們相信自己生錯性別有關。

如果戴蒙當時知道的話，他還可以在他的評論中引用一篇約六年前發表在國外期刊中的罕見文獻，其中對約翰霍普金斯團隊治療中性人的做法提出質疑。發表在一九五九年《加拿大精神醫療協會期刊》(The Canadi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Journal)的文章中，三名多倫多的醫師卡彭(Daniel Caddon)、艾茲仁(Calvin Ezrin)與林司(Patrick Lynes)指出了霍普金斯團隊統計學和研究方法上的嚴重瑕疵。「這些工作者，」這幾位加拿大學者說明：「沒有把受試者的生理和心理整體視之，而只是比較了組成的部分，而且這些比較都沒有經



過數學證實。」他們自己研究了十七個中性人案例，並且比霍普金斯團隊更小心。為了避免結果染上主觀色彩，他們將研究團隊區分為二，一組從內分泌的角度研究這些案例，另一組則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為了作比較，這個加拿大團隊也同時以另一組正常人作控制組，並對一些同性戀、變裝者(transvestite)的案例進行研究。

這個團隊的研究成果顯示，認為中性孩童的生理和性別認同沒有任何關聯的假定，其實是很危險的；事實上，染色體、生殖腺或荷爾蒙的狀態，可能會讓一個中性小孩長大後更認同某一種性別而非另外一種。加拿大的醫生們認為，約翰霍普金斯團隊外科手術的建議是建立在「脆弱的理論」上，他們對於陰莖細小或甚至沒有陰莖的男生就該毫無例外地闖掉、改造成女生的建議，尤其感到不安。加拿大的這群醫生警告，這樣變過性的小孩，「容易因為跟生理性別不協調，而悲慘地長大」。

加拿大團隊的發現，可以說為戴蒙鉅細靡遺的理論批評又添上強力的一筆，但是戴蒙直到自己的文章發表之後，才知道這篇報告的存在（之後他就開始在自己發表的文章中引用它）。「加拿大的文章被湮沒了，」戴蒙說：「它就是默默地消失了。在某種程度上，它也許就像是拿霍普金斯和無名小鄉鎮來相比。」但是在一九六五年，當戴蒙的文章在一本相當高水準且受尊重的美國刊物《生物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上發表，大家就不可能注意不到了，尤其是曼尼，因為《季刊》是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出版的。

我坐在夏威夷大學醫學院戴蒙那間雜亂而沒有窗戶的辦公室裡跟他進行訪談，他回想著和曼尼長達三十年的科學辯論源起。這是一九九七年的六月，就在戴蒙和西蒙森聯合發表「強／瓊」文章，重擊老對手之後的整整兩個月。態度溫和、六十四歲、有著灰白卷髮和鬍鬚的戴蒙，顯然疲於應付那些來自記者和科學同業要求更多強／瓊資訊或進行訪問的電話、傳真和信件。他穿著一件已經洗得泛白、磨了很多洞的藍色T恤、一條牛仔褲和一雙磨損的球鞋，告訴我夏威夷大學的教授「薪水是用陽光來付的」，但是他的蒼白臉色卻顯示，他並未支用全部的薪水。事實上，戴蒙待在檀香山的三十年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作研究，或是窩在他稱之為「巢穴」的小辦公室裡的電腦前，完成了以性向為主題的一百餘篇論文，以及八本著作。在他旁邊的牆上，貼著一張他四千金的生活照；他前面凌亂的桌上，則堆滿了紙張、書籍、翻開的期刊，以及藍調歌手羅伯強森(Robert Johnson)和巴哈的錄音帶全集。


戴蒙堅持，在他寫一九六五年那篇文章時，對曼尼個人並沒有敵意，也沒有意圖要羞辱曼尼。他說，長久以來，科學傳統就是提出主張與挑戰，他的論文只是為提升知識領域的努力而已。戴蒙指出，在論文出版之後，他事實上曾向曼尼提議兩人合作寫一篇文章。雖然他了解，他們兩人在先天本性／後天教養這場爭論中，秉持著相反的立場，但戴蒙相信，這正是他們的合作有其價值之處。他搖搖頭笑自己的天真，當時他不過是一個研究



生，竟然向該領域的頂尖科學家提議要合作，更何況，他才剛剛在一本重要刊物上公開挑戰這位科學家。戴蒙說：「我真的相信那會是一件學術上的好事。」不過，曼尼顯然不這麼認為。「他的態度是：為什麼我要跟你一起做些什麼？」戴蒙說：「誰知道你是誰？」戴蒙承認，他對於這種反應不完全驚訝：「我已經挑戰了他的理論，他認為那是反對他的言論，但其實不然。」

然而，即使是比曼尼遲鈍的科學家，也會被戴蒙批評中冷靜不懈的邏輯所刺激。他在文章接近結尾時，對於大家毫無異議地接受曼尼的正常孩童性心理中立理論，提出了科學入門課裡最根本的科學法則予以駁斥。戴蒙如此寫道：「我們找不到任何正常男人被當作女人成功養大的實例，支持這樣的理論。」戴蒙補充說：「就算有這樣的例子，支持『出生時中立』理論的人也沒有提出來過，或許只能說，這樣的人很難找吧。」

很難——但正如事實所證明的，並非不可能，因為就在戴蒙在《生物評論季刊》上發表他攻擊論文的一年八個月後，曼尼博士接到了一封來自加拿大溫尼伯年輕母親的信，信上描述發生在她一個雙胞胎兒子身上的可怕割包皮遭遇。



第三章

布蘭達誕生



朗恩和真娜在電視上看見曼尼博士之後不久，於一九六七年第一次造訪約翰霍普金斯。這對年輕的夫妻當時一個二十歲，一個二十一歲，當他們看見占據整個巴爾的摩紀念碑街(Monument Street)山頭的巨大半圓形醫學中心時，感到非常地震撼。曼尼博士的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位於亨利菲浦斯精神科門診部(Henry Phipps Psychiatric Clinic)，那是一棟躲在中庭後頭的幽暗維多利亞式建築。研究中心位於大樓四樓，必須搭乘世紀初建造、看來有些危險的電梯才能抵達。曼尼的私人診療室(接下來十一年中他和利馬夫婦大部分都是在這裡碰面)則充分反映出這名心理學者對室內設計奇異的癖好。房間內的陳設除了一張長沙發、東方地毯，以及許多盆栽之外，還有一大堆色彩鮮豔的阿富汗毛毯披掛在座椅上，壁爐上放著許多原住民雕刻的直立陽具、女人陰部、胸部雕刻品，牆上則掛著許多原始的吹槍、鏢槍和面具。利馬夫婦當然沒見過像這樣奇怪的地方，但是曼尼博士以他溫和的自信、專業的態度，更別提他牆上懸掛的學歷證書，讓利馬夫婦覺得，他們終於找到了最能幫助他們的人。「我像仰望一個神一樣地看著他，」真娜說：「他說的一切我都接受。」曼尼說的正是他們長久以來亟欲聽到的。

在他寫的許多有關這第一次會面的文章中，曼尼回憶他如何向這對年輕夫婦說明變性手術對孩子的好處：「利用非技術性字眼、圖表、變過性小孩的照片。」

他跟朗恩和真娜說，他們會幫小孩做一個具有所有功能的陰道，「可以性交、享有性

的歡愉，甚至是高潮」。他也跟他們解釋，雖然小孩就算變成女生也不能生兒育女，但是在心理上，她會發展成一個女生，會對男生產生性趣。一旦她結婚，也可以收養小孩。

無法從曼尼出版的資料看出來的是，當時教育程度才不過七年級和九年級的真娜和朗恩，是否明白這樣的過程完全還是實驗性質。雖然曼尼和他霍普金斯的同事，已經為六個半陰陽症的小孩完成了變性手術，卻沒有作過任何一個像布魯斯這樣，出生時有正常生殖和神經系統的小孩。如今朗恩和真娜說，這中間的差別，他們要在多年之後才懂得分辨。他們從曼尼那兒得到的重點，是他確信這樣的做法絕對會成功。真娜記得他說：「我看不出有任何失敗的理由。」

曼尼的急切感，在近十年後他對該次會面情形的重述中，顯得非常明顯。「如果這對父母一旦決定要讓這個孩子變成女生，」他在《性的特徵》一書中寫道：「我們可以立刻用外科手術拿掉睪丸，建構女性的外陰器官。等到她十一、二歲時，再幫她注射女性荷爾蒙。」

如果曼尼顯得很急，他的確是如此。他跟朗恩和真娜說，他們得快一點作決定，因為根據他的理論之一，「性別認同門檻」(gender identity gate)是在兩歲半到三歲之間，過了那個臨界點，小孩就固定下來是男是女，而布魯斯現在已經十九個月大了。「小孩還夠小，所以不管變成哪一種性別，他後來的性欲幾乎肯定會朝向渴望另外一個性別發展，」



曼尼寫著：「但是離最後決定的日期已經不遠了。」

然而，朗恩和真娜還沒準備好要立刻把布魯斯送到醫院去。像這樣讓自己小孩接受外科變性手術的事情，他們需要時間來下決定。他們告訴曼尼博士，他們要回家想想看。真娜說曼尼毫不隱瞞他對於拖延的沒耐心。他們一回到溫尼伯，就接到他寫來的幾封信，催促他們趕快作決定。「他其中一封信說我們在『耽擱』，」真娜記得：「但是我們想慢點兒來，因為之前從來沒聽過這樣的事情。」

回到家後，朗恩和真娜四處諮詢意見。他們的小兒科醫師反對這種極端的治療方式，堅持自己先前的建議，要朗恩和真娜等到小孩到了學齡前的年紀時，再考慮開始一連串裝置人工陰莖的手術。真娜的母親貝蒂(Betty)，雖然傾向信任巴爾的摩的醫師，但自己也沒有特別的看法。朗恩則決定完全不跟他的父母親提這件事，因為他覺得他們必然不會贊成。

最後，朗恩和真娜了解到，只有他們能夠決定孩子的命運，因為每次在換尿布時，會聯想到孩子所受可怕傷害的，只有他們自己。真娜想像著把小孩變成女生的好處。「我那時什麼都不太懂，」她說：「我認為女人比較溫和。真是大錯特錯。我之後才了解到，骨子裡女人才是難以擊倒的強者，男人反而是比較溫和的，至少就我的經驗來看是如此。但那時候我想，由於他所受的傷害，如果以女孩的方式撫養，也就是以溫和的方式，應該會比較容易，他也不必像個男孩子那樣，必須證明什麼。」

朗恩也看出讓布魯斯變性的好處。「你知道那些小男生，」朗恩說：「他們老是在比誰尿得最遠，掏出小雞雞看誰能尿到籬笆邊。布魯斯沒辦法那樣做，其他的小孩一定會覺得奇怪。」當然，大家對布魯斯的性生活都有疑問。朗恩無法想像他會受到的羞辱和挫折。朗恩心想，如果布魯斯是女生，就不必面對這些。如果曼尼博士所說的都是真的，她就可以擁有一個正常的生活，可以結婚，快樂地生活。

在他們從巴爾的摩回來後的幾天之內，朗恩和真娜就停止幫小孩剪頭髮，讓他柔軟、淡棕色的頭髮在耳後卷起。真娜用她的裁縫機，把他的睡衣縫成小女生的睡袍。在朗恩和真娜的心中，他們的兒子已經變成女兒了。曼尼博士已經告訴他們，如果要幫她起名字，最好找和她原來名字第一個字母相同的，而不要用家裡女性親戚的名字，避免她在認同上會有困擾。真娜聽從了曼尼博士的建議，替她的新女兒取名「布蘭達·李」(Brenda Lee)。

當然，還有一件事要做。那年夏天，朗恩和真娜把布蘭達的雙生兄弟布萊恩留給叔叔和嬸嬸，然後帶著女兒飛往巴爾的摩。布蘭達現在二十二個月大，仍然在曼尼博士設定的變性安全範圍之內。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星期一，布蘭達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婦科手術室中接受了閹割手術，執刀醫師是共同創立曼尼性別認同診所的瓊斯博士。如今，瓊斯說他仍然記得該案例的幾個特點。他說所有變性的決定，都是由曼尼和小兒內分泌科醫師布里薩(Robert Blizzard)共同負責的。



「我主要關心的是個案的身體狀況和外科手術的可能性，」瓊斯說：「他夠健康可以承受手術嗎？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至於其他的事情，在我介入之前，就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對瓊斯而言，布蘭達的手術，跟他過去十二年為半陰陽症嬰孩作過的例行去勢手術一樣，而約翰霍普金斯對這個案例的看法顯然也是相同的。醫院的人員完全拒絕對這個案例發表任何評論，但是一名公關人員蘿潔斯(JoAnne Rodgers)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卻告訴我：「所有六〇年代的實驗性手術過程，都需要有適當的委員會同意議定。」瓊斯不記得醫院曾經為布魯斯這個劃時代的變性案，設立過任何特別的委員會，或是召開任何會議。

手術主要的程序是把兩邊的睪丸去掉。如同瓊斯手術室日誌顯示的，小孩在全身麻醉之後，平躺在手術台上，雙腳各自固定在馬蹬上，整個鼠蹊部暴露在醫師們的眼前。陰囊以三把止血鉗夾住，從中線兩旁各切開一條開口。瓊斯醫師用一把剪刀沿著既定的線，把陰囊剪開一條長一·五公分的切口，讓裡面的睪丸和儲精囊露出來。瓊斯用一把小手術刀切掉左右兩邊的睪丸，然後用一條腸線把成年後將傳送精子的受傷尿道的精索和血管給紮起來。

完成了陰囊的部分，瓊斯醫師開始建造基本的外陰道，用的是剩下的陰囊皮。他把它從下面的邊緣拉上來蓋住上面的缺口，縫好不讓陰囊變成一個空殼子，而是兩邊對稱的薄翼。「以 telfa〔譯註〕包起的一捲紗布放在中線，造成一道溝紋，讓大陰唇平均攤在兩邊中

間。」瓊斯的手術室筆記如此記載著。

朗恩和真娜說，他們決定讓小孩接受外科去勢時，就已經完全不去質疑手術的功效。這是一個大逆轉，因為曼尼博士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考量」，變性小孩的父母必須完全沒有疑慮，否則就會削減孩子對女生與女人的認同。

至於曼尼博士自己是否能夠去除對孩子未來發展的懷疑，又是另當別論。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布蘭達接受變性手術一個多月後，在他寫的一封信中，曼尼對於小孩的預後發展流露出相當的謹慎。這點或許是可以想見的，因為這封信是寫給一位溫尼伯的律師，他是朗恩和真娜雇來控告聖伯尼菲斯醫院和搞砸手術的醫師的。

「性別重整手術，通常只應用在那些出生時生殖器官有缺陷的孩子身上，」曼尼寫著：「之後大家通常會期待，小孩的心理，會符合他後天教養的性別。然而，對任何案例來說，預測都不可能絕對正確。」

事實上，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當布魯斯接受去勢手術時，曼尼博士之所以不願對這個孩子的未來心理發展作「絕對的預測」，是有特別的原因的。兩年前，堪薩斯團隊研究了天竺鼠出生前，睪固酮對男性化行為的影響，而曼尼曾經努力想找出，在人類身上是否也

〔譯註〕telfa是一種醫用紗布材質，因不會與組織相黏，可用在傷口。



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研究結果。在曼尼的指導下，他的一位研究生安赫特以十位三歲到十四歲的女生為對象，她們都曾經在母體內接觸到睪固酮，因為她們的母親在懷孕時，都曾服用人工類固醇黃體素（Progesterin）來防止流產。結果如同堪薩斯研究的天竺鼠，這十個女孩中，有九名出生時都有男性化的生殖器，陰蒂過大，陰唇甚至黏在一起。採訪過她們及其雙親後顯示，這九名女孩全都有曼尼和安赫特稱之為「男性化」的特徵。這項研究在布魯斯去勢之前的六個月發表，作者們解釋，這些特徵包括明顯喜歡「男性化」衣著和「戶外工作」，「對男孩的玩具有強烈興趣」（包括手槍和玩具兵），「對體力競賽和活動有高度興趣和參與」，「對女性的服飾、洋娃娃、照顧小孩和家務瑣事幾乎不關心」。

曼尼博士指派陰陽人某個性別做法的重點是必須在小孩很小的時候進行，而且不可以讓他們知道自己出生時不明的性別狀態。曼尼把同樣的嚴格限制加諸在小布蘭達身上。「他告訴我們不要談起這件事，」朗恩說：「不要告訴布蘭達整件事情，她不應該知道自己原本不是女生。」

在利馬夫婦從巴爾的摩回家後不久，也是兩兄弟屆滿兩歲生日之前，真娜第一次幫布

蘭達穿上洋裝，這是一件她親手裁縫的特別洋裝，用的是她自己結婚禮服的白緞。「它很漂亮而且有蕾絲邊，」真娜記得：「她用力拉扯，想把它扯下來。我記得自己心想，老天，她知道她是男生，才不想穿女生的衣服，她不要當女生。然後我又想，也許我可以教她想當女生。也許我可以訓練她，讓她想當女生。」

這件事朗恩和真娜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給她洋娃娃玩，試著教她保持整齊清潔；只要有可能，他們就試著加強她的女性認同。例如，雙胞胎四歲的時候，布萊恩看著朗恩刮鬍子，就問他是不是也可以刮，朗恩於是便給了他一個空的刮鬍刀和一些刮鬍膏玩。當布蘭達也要刮鬍刀時，朗恩就會拒絕。「我告訴她說女生不刮鬍子，」朗恩說：「我告訴她女生不用刮。」真娜說要幫布蘭達化妝，但是布蘭達卻拒絕了。

「我記得我說：『噢，我也可以刮嗎？』」大衛回憶道，這件事是他最早的布蘭達兒時記憶：「我父親說：『不行，不行，你去找媽媽。』我就開始哭說：『為什麼我不可以刮？』」

布萊恩說，這個事件，是他父母親試著要把布蘭達和他引向兩個不同性別的典型例子，而這樣的努力卻注定會失敗。「我知道布蘭達是我的姊姊，」布萊恩說：「但是她從來不曾扮演這個角色。」

今天，雙胞胎在性別分界線的同一邊重聚，但兩人生理特徵的全然不同，對於大衛所



經歷的一切，是個可怕的見證。當大衛在一九九七年夏天第一次介紹我和布萊恩認識時，我立刻斷定這個緊握我雙手的男人是哥哥，因為這個頭髮略少、鬍子濃密、像熊一樣強壯的男人，長得多麼不同於他年輕、瘦削、臉部光滑的兄弟。直到我近一點看著布萊恩的臉，發現他們兩人的眼、鼻與稜角分明的嘴之間極為相似時，我才確定我看到的是大衛的雙生兄弟，而且他才是兩人中較年輕的那一個（雖然只相差十二分鐘）。

在他們小時候，他們身形上的差距，就算沒那麼明顯，也同樣令人迷惑。

他們學齡前的照片，看起來就是一對相當漂亮的小孩：一個是有著小狗般大眼睛、理平頭的小男生，另外一個是瘦瘦的、有著棕色眼睛、核桃色波浪卷髮襯托出精緻美麗臉蛋的小女生。然而，根據所有家人、親戚、老師和兒輔人員的說法，當布蘭達一動起來，不管是說話、走路或是揮舞雙臂比手勢時，兩個龍鳳雙胞胎的幻影馬上就會消失。

「當我說布蘭達一點也不女性化時，」布萊恩笑著說：「我說的是一點也不。她走路像男生；她坐著時腿是張開的；她談的都是男生的事情，一點也不在乎清潔打掃、結婚、化妝這一類事情。我們倆都喜歡跟男生玩、蓋城堡或是丟雪球、打仗；她不要玩跳繩，反而把它拿來捆人、鞭打人；她會玩我的玩具，玩具卡車這一類的，至於她的縫衣機玩具則被丟在一邊。」後來有一天，大衛回憶，喜歡拆卸東西的布蘭達，從爸爸的工具箱中偷了一把螺絲起子，把玩具車也拆了開來。

參加女童軍後的布蘭達更可憐。「我記得一邊做花圈一邊想，如果這就是女童軍生活中最有趣的事，那真是不參加也罷。」大衛說：「我一直想著弟弟在童子軍中做的事情。」布蘭達耶誕節和生日都會收到洋娃娃當禮物，但是她卻不會去玩這些。「洋娃娃能拿來做什麼？」如今大衛說，聲音中仍然充滿著清楚的挫折：「你看著它，幫它穿衣服、幫它脫衣服、幫它梳頭髮，無聊死了！車子至少還可以開到什麼地方去。我那時候想要車子。」布蘭達也要買槍。有一次大約八歲時，她去店裡買雨傘，排隊等著付錢的時候，她看到附近擺著玩具槍。她猶豫了一下，就把雨傘放下，買了一把槍。十歲的時候，布蘭達改玩朗恩和真娜買給布萊恩的玩具來福槍，而且百發百中。諷刺的是，布萊恩自己反倒對那把槍沒什麼興趣。

布蘭達老是喜歡布萊恩的玩具或是衣服，到最後總免不了會引發打鬥。「一天到晚都有打架拉扯的事情發生，」真娜說：「布萊恩比布蘭達弱得多，布蘭達削瘦但結實，大多數時候都贏。可憐的布萊恩被女生打敗，難過得不得了。」

朗恩和真娜因為布蘭達男性化的行為而飽受困擾，但是曼尼博士勸過他們不要顯露任何對女兒的懷疑，因此他們覺得這樣做只會讓問題更嚴重。他們轉而試圖強化布蘭達可以稱之為典型女性的行為。「她有時候會有些女性化，那就是當她想要讓我高興的時候。」真娜說：「她會比較不那麼野，保持整齊清潔，在廚房裡幫一點忙。」



在她寫給曼尼博士描述布蘭達進展的信中，真娜都必定會描述布蘭達這些短暫的行為，好讓博士知道，他們的確非常努力地在執行他的計畫。她也會告訴他布蘭達的男性化傾向，但是這位心理學家總是讓他們相信，她只是個「男性化的野丫頭」而已。這個解釋讓真娜他們安心，她稍後幾年也都用這個理由來讓自己釋懷。「我看過各種女人，」她說：「其中一些你一定會說她們簡直就是男人。所以我想，也許這不會是問題，因為也有很多女人不女性化。也許這不成問題，我希望它不成問題。」

朗恩和真娜的父親都對布蘭達的行為感到震驚。「如果有女孩來要跟她玩，」朗恩的母親海倫說：「她不會像個女生那樣跟人家玩，然後她會叫她媽媽要別人回家。」

「我是在她和對街的男生打架時，才注意到這一點。」真娜的母親貝蒂說：「那個男生想痛揍她，而她全力反擊。」

真娜的叔叔強尼(Johnny)和嬸嬸愛芙琳(Evelyn)也無法忽視他們姪孫女的一些事實。他們也許會推測，布蘭達只是在模仿布萊恩，但是他們卻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特別了解布萊恩，因為當朗恩和真娜帶布蘭達去巴爾的摩作手術時，就是他們照顧了布萊恩三個月。如果他的姊姊不在他旁邊，布萊恩就比較安靜、溫和、敏感，不像是那個會跟著布蘭達，把他們家弄得天翻地覆的小恐怖份子。

強尼和愛芙琳私下認為，如果要認真說起來，布蘭達才是兩個人中的領袖，布萊恩則是

跟著她調皮搗蛋。強尼說：「她才是煽動者。」當然，強尼或愛芙琳都沒跟朗恩或真娜提過這件事，「我們試著習慣這種情形，」愛芙琳表示：「因為我們不想找麻煩。」

另一方面，布蘭達自己也有一些困擾。「這倒不是說你四歲半時有一天忽然醒來，看看時鐘，然後說：『我覺得自己像個男生。』」大衛解釋：「你那時還太年輕不懂事。」他說，即使在他完全了解男生和女生的概念之前，他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我知道我跟弟弟很像，那與我不是男生無關，而是我們更像兄弟的那種感覺。它跟我穿不穿裙子沒有關係。」

布萊恩直到上學以後，才開始懷疑姊姊的男性化行為。「那大約是我一或二年級的時候，」他說：「我看見其他女孩子做的事情，像梳頭髮啦，抱洋娃娃啦，但是布蘭達跟她們都不一樣，一點都不一樣。」當時布蘭達說自己想當垃圾清潔隊員。「她會說：『工作輕鬆，錢又好賺。』」布萊恩說：「我覺得事情有點奇怪——我的姊姊當個清潔隊員？」他姊姊的非傳統行為仍然讓布萊恩深感困擾，最後他不得不跑去找他的母親談。「噢，那只是因為布蘭達太男性化罷了。」真娜這樣告訴他，而他也接受了。

然而，那終究不是布蘭達的同學們可以接受的答案。當布蘭達就讀家裡附近樹林地(Woodlawn)的一間小幼稚園時，她立刻變成男生和女生共同的笑柄。「當你走過去的時候，他們就會竊竊偷笑。」大衛回憶：「不是只有一個人而已，大概全班都這樣。每天幾



乎都一樣，整個學校老是因為一些事情取笑你。」

「從她進幼稚園第一天就是這樣，」真娜說：「連老師都不能接納她。他們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

的確如此。事經二十六年，雙胞胎的老師麥格蕾格(Audrey McGregor)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仍然表示，不論是在布蘭達之前或之後，她都再也沒有見過和她一樣的女生。布蘭達第一眼看起來就像成千個她帶過的小女生，但是在麥格蕾格的經驗中，布蘭達有一種粗暴蠻橫、獨斷專制、完全缺乏任何女性興趣的獨特性。

麥格蕾格女士還提到另外一點，是在學年開始不久後發生的一件事。「布蘭達班上的
一個女生跑來找我，」麥格蕾格回憶：「她問我：『為什麼布蘭達上廁所的時候都是站著
上？』」

自從開始教雙胞胎上廁所，真娜就一直要揪住布蘭達，讓她相信泌尿時不是要站著面向馬桶，但是似乎所有的誘拐哄騙都沒效，真娜不得不把問題告訴曼尼博士。曼尼告訴她，常常有女生會堅持要站著尿，這個問題會隨著時間好轉。

但是事實卻不然，對真娜來說，布蘭達堅持站著尿尿，是家管的夢魘，因為布蘭達的尿液從她切斷的尿道幾乎與身體垂直噴出，灑得馬桶座後面全部都是。這件事充分反映出手術治療無效，然而這是真娜想都不敢想的事。

並未受過曼尼孩童發展理論訓練的幼稚園老師麥格蕾格，對於布蘭達則另有一套不同的看法。「她更像是個男生，」麥格蕾格說：「這就是事情的本質而言。」

另外，麥格蕾格相信，布蘭達自己在某種不自覺的程度上，是清楚這一點的。「我認為她不覺得自己是小女生。」這位老師說。

麥格蕾格的推測是正確的。一進入性別兩極化的學校世界中，布蘭達便立刻知道自己真的有些不同。「通常你知道女生像什麼樣，」大衛說：「你也知道通常男生像什麼樣。每個人都告訴你你是個女生，但是你卻告訴自己，我覺得自己不像。我想要做男生的事。它就是不對勁。所以你認為，一定有些問題。如果我應該要像這邊的女生，但是我的行為卻像那邊的男生，我想，我一定什麼都不是。」

布蘭達個人的難題，在教室裡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她年度的幼稚園技能評估中，她幾乎在以下各項評估中都不及格，包括：團體生活、工作習慣、傾聽技巧、演說能力和閱讀能力。學校威脅要讓布蘭達留級。真娜在一次到霍普金斯接受追蹤訪問時向曼尼博士抱怨，曼尼博士的回應是讓布蘭達作一個智力測驗。

接下來的兩天，他的研究助理芭布羅(Nanci Bobrow)負責執行了一次標準的魏氏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測驗。布蘭達的分數有九十多分，可以說是在中等上下。三個星期之後，曼尼博士把結果寄去她的學校，還附了一封信，描述布蘭達只是個有暫時性



困擾的女生，一旦過了他稱之為「調皮的否定期」(playful negativism)，很快地問題就會解決。他表示這個否定期，是因為「她早期住院治療經歷的不良情緒狀況」所帶來的後果。

「而就眼前的這個例子，」他的結論是：「我極力建議你們應該讓她過關，因為你們看到的成績低落，是一種情緒引發的功能障礙，讓她停留在幼稚園階段，問題不會得到改善。」

溫尼伯學校當局接到曼尼博士的信之後，改變了他們的看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布蘭達進入明尼東卡(Minnetonka)小學，成為一年級新生。

布蘭達的問題變得更糟。十月二十九日，布蘭達就讀一年級之後還不到兩個月，她的老師芙潤(Sharyn Froome)向該區的兒童輔導中心備了一個案。「我很難讓布蘭達對任何遊戲或活動感興趣。」芙潤在報告中如此寫道，她認為布蘭達負面的行為絕非只是「調皮」。芙潤對布蘭達的形容詞就是「非常負面」，而且她也注意到布蘭達完全孤立於同儕之間，她「做的完全是跟其他小孩相反的事」。

兒童輔導中心輔導員奈比絲(Joan Nebbs)這時跟其他人一樣注意到了布蘭達異常的行為。「她的母親把她打扮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地來學校，」奈比絲回憶：「她的身材很漂亮、頭髮微卷、眼睛是棕色的，是個非常漂亮的小女生。有問題的完全是她的態度。她老是髒兮兮的，不是跟別的小孩打架，就是在泥巴堆裡玩。布蘭達真的是個粗野的小孩，

她不會靜下來讀書，寧可去玩打擊敵人、警匪槍戰之類的遊戲。」奈比絲說，有時候布蘭達試著要跟女生玩，但是往往都會失敗。「因為她會要女生們照她的方式做，她要當領導人。她要她們玩牛仔和印地安人，然後追逐她們。都是這一類粗魯野蠻、女生不會要玩的遊戲。」


朗恩和真娜原本一直想要保守祕密，不公開布蘭達的就醫記錄，但這時也不得不體認到，要永遠保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學校和兒童輔導中心都不斷要求他們提供布蘭達的背景資料，好協助解決她的學業和社會化適應難題。朗恩和真娜終於簽署了一份放棄保密的文件，讓當地的小兒科醫師譚尼(Mariano Tan)和兒童輔導中心接洽。

「我希望貴中心能夠保證絕對不洩漏這封信的內容，」譚尼醫師寄給兒輔中心的信中這樣寫道：「這兩個小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之後，就在我的看護之下。他們是雙生子——雙生兄弟，但是布魯斯（就是現今的布蘭達）在進行割包皮手術時發生了不幸，他的陰莖被燒壞了。」譚尼醫師繼續解釋布蘭達在霍普金斯接受的變性手術。

譚尼醫師的信所提供的訊息，似乎解開了學校和兒輔中心對布蘭達的種種疑惑。「在我聽到不同的訊息之前，我一直認為他是個女生。」布萊恩的一年級老師哈妮(June Hunnie)說：「一旦我們知道了這個背景，我們都在想，噢，難怪。對於一個發生過這樣可怕事情的小孩，哪有什麼辦法能讓她坐下來、安安靜靜地作功課？簡直完全不可能。」



事實上的確是如此，至少對布蘭達來說是如此。學年末期，明尼東卡小學通知朗恩和真娜，布萊恩可以在一九七二年秋天升上二年級，但是布蘭達卻必須留級重讀，與曼尼博士樂觀的預測不同。



第四章

男孩女孩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布蘭達留級重讀一年級之後的四個月，曼尼公布了他的「雙胞胎案例」。

起因是為了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AA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年度大會，主題定為「孩童及青少年時期的性別角色學習」。在為期兩天的行程中，曼尼第一個發表演說，聽眾是成千的科學家、女性主義者、學生和記者。論壇舉行的地點是在樹而漢飯店(Shoreham Hotel)的大使廳(Ambassador Ballroom)，參與者幾乎包括所有性別發展領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只有曼尼登上了報紙頭版，這都要感謝他當天早上提出的案例。他告訴他的聽眾，他的新書(跟安赫特合著)《男人女人，男孩女孩》(Man & Woman, Boy & Girl)中，會有這個案例的詳細報導，而這本書正巧在曼尼出席論壇的那一天出版(可說是交叉宣傳行銷的一個早期案例)。

《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一書籌備了四年。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這本書從曼尼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診治過的數百名陰陽人病例中蒐集資料，並如同曼尼在書的前言中所提，援引了「遺傳學、胚胎學、神經內分泌學、內分泌學、神經外科學、社會學、醫學、臨床心理學，以及社會人類學」等各式各樣科學專業的內容。這是一本看來嚇人、野心勃勃的學術著作，加上它大量使用拉丁語彙和盤根錯結的複雜文法結構，使得它更顯如此。然而，它的主題倒是出奇地直接了當，可以濃縮為一個中心思想，在其三百頁的篇幅中一再

重複，亦即曼尼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論文裡首次推出的中性理論：區分人類性心理差異的是學習和環境，而非生理組成。

《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一書出版的時間，是在曼尼和安赫特提出資料，說明女性在子宮中暴露於過多的睪固酮之下，成長時會變成「男性化野丫頭」的理論之後五年，因此書裡不得不承認曼尼自己的說法：出生前荷爾蒙對成人性行為有「深遠的影響」。然而曼尼解釋，這些影響並非決定性的。他描述說，它們只會為女生的行為增加「一些特殊色彩」，在性別認同形成的過程中，出生前的生物因素，並不若出生後的環境力量那麼重要，後者會凌駕前者。要證明這個後天教養論，曼尼重複宣示他的陰陽人「配對」原則，也就是具有類似症狀的中性病人，可以成功撫養成任何一種性別。

但是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被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告白嚇一跳，即陰陽人的病例並不能解釋人類性別發展的全貌。在這本書的中段部分，曼尼承認，性別研究者若要真正解決人類性心理差異的迷思，就必須進行一些實驗，但是他們卻遭遇到一些令人失望的限制。「性別認同差異不全然是由性染色體、出生前的荷爾蒙型態，或是出生後的荷爾蒙濃度所決定，這個理論唯有在大家能夠接受在正常小孩身上作實驗，就像對待動物一樣，有著相同的道德自由度，才能真正地進行檢驗。」他寫道：「既然計畫中的實驗在道德上是無法想像的，我們就只能利用非預期的機會，例如一個在割包皮手術中失去陰莖的小男孩。」



曼尼接著披露，他碰上了這個拿成長中正常嬰孩來作實驗的「非預期的機會」，而他也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描述了這個受傷小孩的父母，如何允許自己的小孩經由外科手術變成女孩，也指出這個案例「極端不平凡」之處：有問題的小孩是孿生雙胞胎兄弟中的一個。不論是曼尼的讀者或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聽眾，都沒有忽略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當時曼尼說的是，他的實驗對象是一對小孩，他們在生物學上可以說是兩個幾乎一模一樣的人類，其生命開始於同一個原始受精卵細胞，其DNA有著相同的遺傳藍圖，而且他們的大腦和神經系統在子宮中發展時，也接受同樣多的荷爾蒙影響。簡言之，他們是最佳的配對。

曼尼很清楚，布蘭達的案例在他的工作領域（事實上是在性別研究的整個歷史上），占據著非常特殊的位置，這一點可以從他在《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這本書裡對它的強調看出來。他首先在序中提及這個案例，然後在書中各重要關鍵點又再次提及它，如第八章〈性別認同差異〉、第九章〈發展差異〉和第十章〈青春期荷爾蒙〉。特別是第七章〈性別雙型的確定和教養〉中，曼尼花了相當多的篇幅描述這個案例，他的資料全部取自利馬一家每年定期造訪他的研究中心，以及一年中真娜給他的電話、信件中對於布蘭達的第一手觀察。

曼尼順帶提到布蘭達具有的「男性化特徵」，但是他認為，這跟她其他女性典型行為比

較起來，並不重要；後者則取自多年來真娜對於布蘭達時斷時續試圖表現像個女生的樂觀記錄。曼尼的確提到了布蘭達異常的如廁習慣，但是當他說服了真娜之後，又讓他的讀者相信，「很多女生」都曾經像男生一樣站著小便，而且他還暗示，布蘭達五歲以後就不再站著小便了，即使她偶而故計重施，也只是想「模仿她的弟弟罷了」。曼尼絲毫沒有提到，在他這本書出版的一年半之前，因為布蘭達種種學校、社會和情緒上的困擾，他不得不居中在真娜和溫尼伯學校當局間作調解人。

由任何角度來看，書中描述的這個實驗都是一大成功。藉著跟她弟弟的比較，布蘭達可以提供曼尼稱之為「不尋常」和「極重要」的對照。布萊恩對於「汽車、加油槍和工具」的興趣，與布蘭達對「洋娃娃、玩具房子和玩具馬車」的渴望被拿來兩相比較；布蘭達的注意清潔與布萊恩的毫不在意，被說成是完全不同；布蘭達對廚房工作的興趣，則跟布萊恩的厭惡相提並論。曼尼確實把布蘭達描述成一直是「主導的雙胞胎」，但是他讓別人覺得這個部分有隨時間改變。在三歲之前，曼尼說，布蘭達對於布萊恩的控制已經變成「一種母親的嘮叨」。總之，這對雙生子幾乎奇蹟似地各據兩性的一端，擁有完全不同的品味、個性和行為，而且簡直就是男女性別是後天塑造而非天生的「最佳驗證」。

婦女運動也沒有忽視這個案例的重要性。數十年來，女性運動者一直堅持反對生物基礎造成性別差異的論調，而曼尼在一九五〇年關於「初生兒性心理中立」的數篇論文，已



經被當作現代女性主義的主要基礎之一。米利特(Kate Millet)在她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女性主義聖經《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中，就摘錄了一九五〇年代的那些論文，把它們當作科學明證，證示男性和女性的差異並非反映了生物指令，而是反映了社會的期望和偏見。雙胞胎的案例，提供了更多戲劇化、顯然無庸置疑的例證，來支持這樣的觀點。

「這個顯著的案例，」《時代雜誌》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曼尼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華盛頓會議披露這個案例一周之後，立即如此報導：「提供了女性解放主張的強力支持：傳統的男性和女性行為是可以被改變的。它同時也質疑，性別的重要差異，不論心理還是解剖上的，是否在受精時就一定終身。」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讚揚《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是「自金賽報告之後，社會科學最重要的著作」。《紐約時報書評》並為該書主張後天勝過先天的論點下了一個總結：「如果你告訴一個男生說他是女生，並且把他當作女生來撫養，他就會想做女生的事情。」

雙胞胎的案例，很快就成為從社會科學到小兒泌尿學等數不清教科書中的範例。「這個案例清楚傳達出，即使生理的性別差異確實會決定一些行為，但是社會因素，例如小孩被認定和被教養成的性別，可以凌駕於這些因素之上。」薩京(Alice G. Sargent)在她一九七七年的女性研究著作《超越性別角色》(Beyond Sex Roles)中，如此評論這個案例。社會學

家同樣為這個案例傾倒，認為它是最佳範例，顯示社會在塑造人類性別認同這塊基石上所具有的力量。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教科書《社會學》(Sociology)是個典型的例子，其中羅伯森(Lan Robertson)寫道：曼尼的著作「顯示小孩可以很容易地以相反的性別養育」，而人類少數生來就有的性別差異「並不明確，文化學習可以輕易取而代之」。由克洛迪尼(Robert Kolodny)以及知名性學者馬斯特和瓊生所著的《性醫學教科書》(Textbook of Sexual Medicine)的一九九九年版，點出這個案例是教養勝於本性的最佳明證：「這個〔生來原本是男孩的〕女生，她的孩童時期發展已經相當女性化，而且跟她孿生弟弟表現出非常不同的行為。她的正常發展，可以視為人類性別認同具有可塑性的重要指標，以及顯示出社交學習和制約反應，對這個過程的相對重要性。」

在此同時，曼尼盡力讓這個案例在學術領域或是一般媒體上，享有最高的曝光率。在一九七〇年代期間，他讓這個案例成為他公開演講的核心，幾乎沒有一場演講不提到它。他很快就發展出一套取悅聽眾的演講方式。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內布拉斯加動機研討會」(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中，曼尼用幻燈片放映了布魯斯失去陰莖後的胯下特寫，以及雙胞胎站在門口走道的照片。布萊恩穿著一件短袖的襯衫和深色長褲，布蘭達則穿著無袖洋裝、白色及膝襪和白鞋。曼尼也放映了一張由他拍攝的布蘭達獨照。小女孩姿勢古怪地坐在他具有圖案裝潢的辦公室沙發上，穿著一件花洋裝和球鞋，赤裸的左膝稍稍



抬起，自我保護似地擋住相機，左手則刻意地遮住臉。「從這最後一張照片，」曼尼告訴他的聽眾：「你們可以清楚地看見相當有說服力的女性肢體語言。」

在內布拉斯加的演講中，曼尼也為這個案例下了一個結論。他告訴他的聽眾，布蘭達變性成功，足以駁斥以下的指控：「曼尼的研究中只有奇怪和異常的案例，沒有正常的案例。」心知肚明的人都知道，這句話意有所指，說的是曼尼的主要理論對手戴蒙。

事實上，戴蒙並未反對曼尼用「奇怪和異常的案例」來研究性別認同，他只是質疑曼尼從中獲得的學術結論。自一九六五年發表了挑戰曼尼的文章之後，戴蒙就受聘於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擔任教職，並且實際研究中性人案例。在戴蒙自己跟路易維爾兒童醫院中性人案例的訪談中，他發現於嬰孩早期指定性別，絕非像曼尼所說的，是神奇的萬靈藥。

相反地，戴蒙自己就碰到好幾名病例，推翻了以某種性別養育、就會讓小孩接受該種性別的說法。有一名女嬰在母體子宮時接觸了過量的睪固酮，雖然從小被當成女生來撫養，她卻在六歲的時候，跟母親說自己是「男生」。還有一名男孩生下來陰莖極小，被當作女生，十七歲時自願到路易維爾兒童醫院要求變性，願意忍受二十五次以上的手術做一個人工陰莖，因為「她」強烈希望依照原來基因和染色體所決定的性別而活。即使那些確實看起來接受與天生性別相反的中性孩童案例，戴蒙也不相信他們根本的性別認同已經作了

改變。他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生殖和性行為探究》(*Perspectives in Reproduction and Sexual Behavior*)一書中提出警告，這樣的案例「只能給予人類角色的彈性和適應性一點功勞，而不是說教養具有不可磨滅的特性」。

這本書出版後幾年，戴蒙很開心看見他的想法開始受到一些科學家、研究者和醫師的注意。在英國，都賀斯特(Christopher J. Dewhurst)和高登(Ronald R. Gordon)醫師治療中性病患已有十年，在他們出版的專書《中性缺失》(*The Intersexual Disorders*)中，特別質疑曼尼的理論。他們認為，小孩不一定會完全接受後天養成的性別。他們不僅節錄了一份由英國醫師們所作的全國調查資料，其針對中性人的臨床經驗和曼尼互相抵觸，同時，他們也提到了戴蒙在路易維爾針對中性人的研究。一年後，一九七〇年，首度有另外一名美國人加入戴蒙的陣營，挑戰曼尼人類性心理分化的理論。

儒格(Bernard Zuger)是在曼哈頓開業的小兒精神科醫師，而他治療年輕男同性戀和其家人的經驗，讓他質疑盛行的性別取向源自教養和環境的理論。在了解其男同性戀病患家庭的互動後，儒格發現很多案例中，確實有威權主控的母親、配上疏離敵對的父親這種制式的組合模式；但是實際觀察小孩在家裡的情況後，儒格卻開始相信，這種互動不是小孩變成同性戀的原因，而是結果。儒格長期訪談五十五名兒童，其中有些甚至追蹤長達三十年，他發現，事實上幾乎每個案例中的男孩，很早就出現女性化的玩樂喜好、興趣和行



為。他們的父親原先想要加強他們朝男性的興趣發展，卻都被小孩拒絕，受拒的父親因而情緒上變得退卻，母親則取而代之介入，因此建立了父親疏遠、母親獨裁的模式。儒格猜想同性戀具有生理的基礎，與普遍接受的後天教養論相牴觸，而這種後天教養論，如同後來儒格所寫的，有相當程度是建立在曼尼和漢普生一九五〇年代關於陰陽人的得獎論文上。由於儒格想要理解約翰霍普金斯團隊是如何得出那些結論，因此他把他們的工作加以仔細檢驗。

如同十年前的加拿大小組，儒格對於約翰霍普金斯團隊的研究方法、臨床資料的解釋與統計分析，都發現有嚴重的問題。儒格認為，這些論文報告「缺乏個案發現時的年齡、其後續發展，以及替代性治療對於維持其性別角色的影響等資料」，同時也指出，十五年來不斷發展的新生物證據，對於霍普金斯的結論提出更多的質疑。然而，不同於加拿大小組的是，儒格事實上使用了他認為適合的統計方法和新的生物學發現，重新分析了霍普金斯的資料。他小心翼翼地一個個分析曼尼和漢普生夫婦的個案，發現這些被該小組指出以相反性別教養的孩童，其確定下來的性別，事實上都符合某個決定人類男或女的生物因素，不管這個因素是染色體、生殖腺或荷爾蒙。總之，對儒格而言，這六十五名拿來證明養育重於天性的個案中，只有四個個案可以說是無法完全推翻，但是他們還是大有問題。「這四個案例，」儒格寫道：「還是有可能得到解釋，像是戴蒙說的人類性取向的『彈性』，或

是由更仔細的研究可能找出某些特定生物因素。」

儒格的文章預計在一九七〇年一期的《心身醫學》(Psychosomatic Medicine)期刊上發表，該期刊的編輯們先拿了一份試印稿給曼尼看，曼尼隨即發表猛烈的反擊。

「看得見的人，很難給盲人上繪畫課。」曼尼開頭先這樣說，隨之批評儒格「蓄意偏頗的採樣」，並痛斥他的研究是「強辭奪理」和「純屬推測」。他不願說明儒格犯了什麼特定科學、方法學或統計學的錯誤，反而威脅該期刊的編輯群：「我相信你們現在很了解我對儒格博士論文稿的強烈感覺。我不希望採取容易的方式，要求你們別刊出，因為我知道現在的論文很容易四處投稿，一刊不登，就換另一刊。我真正想要做的是，要求儒格博士作大幅、全面的改寫。」根據曼尼鉅細靡遺的指示，他說的重寫，就是要儒格作出跟他一樣的結論。

曼尼在學術界的力量，終究讓編輯們採納了他的建議。他們要求儒格依照曼尼的建議改寫，但為儒格所拒絕，並指出曼尼的批評「毫無實質內容」，又說：「曼尼博士要求的全面修改，完全超出本文範圍，將造成這篇文章的無限拖延。」最後，透過雙方同意的安排，儒格的論文和曼尼的反駁信都完整刊登在該期刊一九七〇年九／十月這期。

不論由一九五九年的加拿大人、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的戴蒙、一九六九年的英國小組，或一九七〇年的儒格提出的批評，累積而成的分量引起多大的爭議，結果還是被曼



尼於一九七二年末出版的巨著《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特別是其中有關雙胞胎案例驚人的章節所招致的宣傳，有效地平息了。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的小兒內分泌科醫師葛朗巴哈 (Mel Grumbach)，是這方面的國際權威。他認為人類出生時性心理可塑的理論，以及使用變性手術來治療外部性器不明或受傷嬰孩的做法，之所以為全世界所接受，曼尼的雙胞胎案例具有舉足輕重的決定性。這個原本僅侷限於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做法，很快就傳播開來；如今或許除了中國大陸以外，世界上幾乎各主要國家都有人進行。雖然從未有人統計過，每年到底有多少嬰孩接受變性手術，不過根據一位外科醫師的保守估計，每年在全美各大城市，都有三到五名外陰性別不明的嬰孩需要變性，如此加起來，光是美國，每年就有至少一百件這樣的案例，而全世界則預估一年高達一千件。

「醫師們深受雙胞胎案例的影響。」葛朗巴哈解釋：「曼尼站上會議的講台，然後說：『我找到了這對雙胞胎，他們其中之一現在成了女生，而另外一個是男生。』意思是，他們把一個正常的男孩變成了女生。那是很有力的，真的很有力。我是說，你對那樣的事情會有什麼反應？這個案例強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你真的可以做任何事。你可以把一個剛出生、擁有XY染色體的正常男性變成女性，而不會有任何差別。」葛朗巴哈補充：「曼尼是個大人物，他說的話被某些人當成聖經一樣流傳並信從。」

但還不是所有的人。戴蒙繼續研究掌管性別的神經系統在出生前如何被建構，而他的發現只讓他更加深信，無論中性或正常小孩，在出生時的性心理絕非中性。這樣的信念，讓他以格外警覺的態度來看待嬰孩變性手術的迅速發展，而且他也愈來愈相信，要把正常嬰兒從某一種性別變成另外一種，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當時還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推翻雙胞胎案例，」戴蒙說：「只有學術上的辯證可以挑戰它。」不過他發誓要繼續密切追蹤這個案例，他說這個決定完全是出自科學動機，但是，假使如今戴蒙感到自己與曼尼學術上的纏鬥，也牽涉部分私人理由的話，那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記述了雙胞胎案例後，緊接的下一章裡，曼尼就斥責了戴蒙等挑戰他經典論文的人。曼尼再次重申自己的學術立場，並尖酸地寫道：「本來我是不需要再強調這些觀點的，只是有些作者還是無法理解。」他繼續說明，戴蒙和其他人的作品正在「摧毀無數年輕陰陽人的生命」。

《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出版的時候，曼尼和戴蒙的爭辯還侷限在發表的論文和書本當中，但情況馬上就有了轉變。

一九七三年九月，該書出版九個月之後，曼尼於南斯拉夫杜布羅尼克(Dubrovnik)自由酒店(Hotel Libertas)舉行的第三屆性別認同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ender Identity)中擔任主席。性別發展領域裡許多重要權威人士都參加了這個會議，包括與曼尼共



同執筆的安赫特，如今她是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精神科的臨床副教授；還有史丹佛醫學院教授、專精變性手術的整型外科醫師勞伯；以及如今仍是變性領域重要人士的精神醫師寶莉(Ira Pauly)。戴蒙並未受邀演講、亦未受邀參與小組討論，但他也來到南斯拉夫參加這個會議。第一天的演講結束，曼尼也已經發表過主要的大會演說，科學家們聚集在當晚舉行的雞尾酒宴會上。酒會在一個大廳舉行，大片的落地窗外，就是愛琴海上美麗的日落景象。

「我跟一些人坐在大廳的一角，」戴蒙回憶著：「而曼尼則和安赫特坐在大廳的另一邊。突然間，他站起來大聲地嘶吼著：『戴蒙，我他媽的恨你透頂！』」


一場口角於焉展開。

「他們爭論著雙胞胎的案例，」布勞(Vern Bullough)說，他當時是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教授，也是這兩個人的朋友：「戴蒙對曼尼說，他的資料根本不齊全，而且要為這個孩子下定論還言之過早。曼尼突然出手打戴蒙，是真的毆打他。戴蒙沒有回手，只是一再重複：『沒有證據。』曼尼對著他怒吼：『性學研究者要團結一致，而不是互相挑戰！』」（戴蒙則說，他不記得這次碰面有任何肢體衝突。）

兩個爭執者被拉開了，但是布勞說，這個事件卻讓酒會蒙上一層陰影。當然，它沒有阻止曼尼繼續在演說、論文和媒體上鼓吹雙胞胎案例。第二年六月，巴爾的摩地區的《美

國新聞報》(News America) 以非常大的篇幅介紹曼尼，其中，雙胞胎案例更被奉為他個人在性學和性別研究上的最大成就。「誰是男孩、誰是女孩，已經毫無任何疑問，」曼尼告訴該報：「可以說是一清二楚。」

「這樣的發現，」該報導接續：「將會對未來看待性別角色的態度影響甚深，其重要性直可比擬達爾文的進化論。」



第五章

脫掉衣服！



一九六七年，在布蘭達割除睪丸的同時，曼尼博士曾跟利馬夫婦明訂每年要帶布蘭達回診一次，接受後續的諮詢。這些回診，有時大約間隔一年半，目的是為了要「防止」變性孩童成長的「心理危機」，曼尼在給利馬家的律師信中如此寫道。然而根據利馬一家人的說法，以及一些同時期的問診筆記看來，他們每次到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旅程，都只讓布蘭達已有的困擾和恐懼更加惡化而已。如同曼尼的私人案例檔案所顯示的，布蘭達四歲第一次回約翰霍普金斯作後續看診時，就顯得相當恐懼。「她抗拒〔檢驗〕的方式有些狂躁，」曼尼在筆記中寫道：「不論她打人、踢人或是其他攻擊人的方式都是如此。」

「你可以感覺出有些事情不對勁，」大衛解釋在每年到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神祕造訪中，他所陷入的恐懼：「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什麼，而你也不知道。」每次也被要求同行的布萊恩，同樣覺得這些拜訪令人迷惑和不安。「我一點也不了解，為什麼全班所有人中，只有我要跟姊姊一起到巴爾的摩去跟這個曼尼博士談話，這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是異類。」雙胞胎很快就相信，從他們的父母，到曼尼博士和他的同事，大家都在瞞著他們一件事，「那件事當時還兜不太起來，」布萊恩說：「雖然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這一點，但是我們還沒有找到關聯所在。」

他們只知道，曼尼博士和他的同事似乎對他們的一切異常地感興趣。他們問的有些問題相較之下無傷大雅，像「你最喜歡吃什麼？」、「你比較喜歡誰，媽媽還是爸爸？」等，

但其他的問題則不然。曼尼不斷地問這兩個孩子，男生和女生生殖器的差別何在，以及不知道小孩是怎麼來的。布蘭達另外還要跟曼尼單獨晤談，被問一些細得不得了且不斷重複的問題，像是喜歡玩什麼玩具、會不會跟男生打架、喜不喜歡跟女生玩這一類的。大衛說，曼尼醫師和他的同事想盡辦法要去除布蘭達男性化的行為和疑慮。「他們會告訴我：『你不應該覺得當一個女生很丟臉。』」大衛說：「他們會說：『女生也可以跟男生做同樣的事情啊。』有一位女士是曼尼醫師的同事，她告訴我：『那是典型的男性化行為，我也做過同樣的事呀，你不過是像個男孩子罷了。』但是我告訴自己，不是，這跟那個不一樣，我不這麼認為。」

大衛聲稱，布蘭達嘗試要告訴曼尼和他同事她的性別困惑，但他們似乎不願意，或無法看見和聽見，而曼尼的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檔案也證實了這一點。在最早幾次到中心的回診中，布蘭達還無法有意識地表達她不是女生的感覺，但是曼尼博士的筆記顯示，這些感覺在幾次的訪談，以及他和學生們對她作的性心理測驗中，便已清楚地呈現。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的那次回診，布蘭達當時六歲，他們給她作「畫人測驗」(Draw a Person Test)。這是一個基本的測驗，要小孩畫一個人物，這個人正代表他自己的性別，藉此測出他們第一順位的性別認同。然而，布蘭達並沒有畫一個女生，相反地，她以小孩標準的稚氣手法畫了一個小男生。她的測驗者克洛培(R. Clopper)是曼尼的學生，稱之為



「粗線畫」(stick figure)。克洛培問布蘭達她畫的是誰，她回答：「我。」克洛培要她再畫一個跟她自己性別相反的人物時，布蘭達卻拒絕了，要在筆記中描述為「好言規勸許久」之後，她才畫了另外一個粗線條的人物。她先稱它為「綁馬尾的布蘭達」，後來又改口說是「布萊恩」，然後再度改換說法，說它就是布蘭達自己。當被問到跟自己「性別相反」的人穿什麼時，布蘭達回答：「洋裝。」

大衛說他很快就學會對曼尼和他的同事說他們想聽的答案。事實上，在曼尼的筆記中，可以偶而看見布蘭達嚴肅地聲明，她熱愛「縫紉、清洗、除塵和洗碗」，然而曼尼的筆記也顯示，布蘭達經常想要擺出穩重和恭敬的女性姿態，卻錯誤百出。以一九七二年六月的回診為例，他們看得出來她可以感應曼尼的想法，然後找出正確的方式來作答，並會急切地修正答案，以符合提問者的期望。

這種交流方式始自曼尼問布蘭達如果男生打她時，她會反擊或是跑掉。布蘭達先是脫口而出說：「打回去」，但隨即立刻更正。「不，」她說：「我會跑掉。」曼尼顯然注意到她很明顯地企圖說他想聽的話，於是又再問一次同樣的問題，但這次布蘭達毫不妥協，堅持自己沒有跟男生打架——「因為我是女生。」

「你是女生嗎？」這位心理學家問道。

「而且不是男生。」布蘭達覺得不得不向他保證。然後，很顯然不確定自己是否回答

的是正確的答案，她又問：「女生不會打架，對不對？」

幾分鐘之後，當曼尼又從另外一種角度問她同樣的問題時（她是否用手跟人打架？），布蘭達立刻自我矛盾地推翻稍早的答案，大叫說她會狠狠地反擊：「我是用拳頭。」

到了第二年，布蘭達七歲，根據曼尼的筆記顯示，她開始比較少犯這種前後不連貫的幼稚錯誤。當曼尼開始對她進行標準的「例行質詢」時，她盡責地回答，脫口而出、有問必答。

「你有時候會想要玩家家酒嗎？」曼尼問。

「會。」

「誰扮媽媽？」

「我。」

「那誰扮爸爸？」

「弟弟。」

「誰是小孩？」

「我的洋娃娃。」

「你怎麼玩洋娃娃？」

「餵它們吃，嗯，給它們喝牛奶。就這樣。」



然而在同一次造訪中，布蘭達卻開始透露，她下意識裡相信自己是個男生，起因是曼尼在上述問答之後，要布蘭達描述「一個好夢」。布蘭達於是開始敘述一個孩子在農場上騎著一匹馬。在提到孩子的性別之前，根據曼尼的筆記記載，布蘭達「停頓了一下、思索著下一個用詞」，然後才說在夢中的是個男生。

「感覺很好，」布蘭達繼續說：「他想吃東西，他想喝東西，他想上床，他想睡覺。就這樣。」

至於布萊恩和姊姊一塊兒參加的共同訪談，則無助於緩和布蘭達給人散漫、固執、專斷、好鬥的印象。事實上，曼尼跟雙胞胎的訪談手札，只有更加強了我從他們家人、老師、兒輔人員以及其他溫尼伯的人所得來的印象：在雙胞胎中，布蘭達反而比較像傳統的男性。當曼尼詢問這對六歲的雙胞胎怎麼玩洋娃娃時，布萊恩會先回答，他興奮地說著如何抱、餵和照顧娃娃，而布蘭達只有在人家逼她回答時，才試著模仿弟弟的說法。

在同一次訪談中，曼尼問了一個幾年來他不斷重複問這對雙胞胎的問題：誰是「頭頭」？布萊恩先說是他，但曼尼顯然很懷疑。（兩年之前，曼尼就已經記述著布萊恩「常常模仿布蘭達」。）他再一次問布萊恩同樣的問題，問他真的是頭頭嗎，布萊恩的虛張聲勢立刻瓦解了。

「我不知道。」布萊恩承認。

布蘭達突然發言。「你是頭頭嗎？」她向他挑戰：「你想當頭頭嗎？我才不認為呢，好啦，我來當頭頭好了。」

在同一次訪談中，曼尼問雙胞胎他們的打架習慣。布萊恩說他會打架，但只跟女生打，特別是一個橘頭髮的小女生每次都找他麻煩。

「那你會跟其他男生打架嗎？」曼尼問。

「不會，」布萊恩說：「我跟女生打。」布蘭達跟著解釋，她會幫助布萊恩反擊打他的女生，並警告她們：「你最好少碰我弟弟。」

一年之後，布蘭達更不隱瞞自己身為布萊恩保護者的角色。在單獨和曼尼訪談時，她又一次描述自己如何把布萊恩救出重圍，但是同時她也說溜嘴，說自己有時候也會欺負布萊恩。

「你們倆有時候會打架嗎？」曼尼問。

「會呀。」布蘭達說。

「你們用手、用拳頭，還是用腳——怎麼打呢？」

「拳打腳踢，還有用兩隻手。」

「你可以把布萊恩打扁，還是他把你打扁？」

「我打扁他。」



「那誰打贏呢？」

「我贏。」

在那一次，曼尼也比較了兩個人投球的方式。布萊恩之前曾經告訴這位心理學家，說布蘭達投球「像個女生」。為了證實這個令人興奮的說法，曼尼拿一個黏土做的球給布蘭達要她投，「她用左手投了一個相當直的球（他們兩個都是左撇子）」，曼尼在他的私人筆記上記載著：「那是一個標準的過肩球。」

大衛說，當時七歲的布蘭達還太小，還不能用語言表達她和弟弟除了性器官相反、但其他部分卻完全一模一樣的內心感受。然而，布蘭達在有一次和曼尼談到男生和女生私處的差異時，卻清楚地企圖表達這個概念。從很早的訪談開始，曼尼就逼迫雙胞胎回答這個主題，讓他們倆很明顯地都因此感到極為困窘。以這次為例，布蘭達先是閃躲和搖擺了幾分鐘，太過壓抑和害怕而說不出「陰莖」和「陰道」這兩個詞，但稍後相反地，她採用了這幾年跟曼尼兩人舌戰所嫻熟的一些打混仗技巧。當曼尼問到如何區別男生和女生時，她先說留短髮的是男生，留長髮的是女生。曼尼再問了一次同樣的問題，這回布蘭達說男生穿褲子，女生穿洋裝。他們又僵持了好幾分鐘，直到很明顯失去耐心的曼尼再問：「好啦，我來幫你好了。你看看自己下面，兩腿中間那裡。男生和女生下面有什麼不一樣？差別在哪裡？」

「你指的是，那裡是平平的嗎？」

「男生有小雞雞，用來泌尿，」曼尼說：「它看起來像是一條小香腸，是不是？那女生有什麼？」

「我不知道。」

「嗯，女生下面是平平的。」曼尼說。他又繼續：「男生就不是。他們不一樣。」曼尼重複說：「他們是不一樣的。現在我們了解了，是不是？」

這個時候，曼尼的私人筆記上繼續記載著：「可是她脫口而出：『但我們是雙胞胎。我們是雙胞胎呀。』」

這個平日口風很緊的女孩少有如此激烈的反應，曼尼顯然吃了一驚，他因而問道：「你說你們是雙胞胎是什麼意思？」

布蘭達只好無助地列舉了一些讓她和弟弟一模一樣的身體特徵，例如他們同樣是左撇子、聲音和眼睛都一樣等等。她因為太害羞而無法直接提及自己的生殖器官，於是把難題留給曼尼，讓曼尼來解釋，為何像這樣完全類似的小孩，性別外觀會不一樣。但是曼尼沒有接招，或許是他拒絕接招。相反地，他又回到他每一次問診的制式問答題上，追問一長串有關玩具、朋友、學校和打架的事情。



當雙胞胎年紀漸長，曼尼的問題變得更露骨。「曼尼醫師會問：『你曾經夢到跟女人做愛嗎？』」布萊恩說：「『你曾經勃起嗎？』」他也問布蘭達同樣的問題。「你想過這個嗎？想過那個嗎？」

曼尼一方面試著探究這對雙胞胎的性特徵，另一方面也想設定他們倆對於男孩和女孩的自我意識。他的理論之一是，孩童要形成各自不同的「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為曼尼的用語)，就必須在非常年幼時，即了解男人和女人性器官的差異。他相信，色情刊物就是最好的教材。「露骨的情色照片，」他在著作《性的特徵》中這樣寫道：「可以也應該被用來作為孩童性教育的一部分。」他說，這樣的圖片「強化了他或她的自我性別認同／角色」。

布萊恩說：「他會給我們看小孩的照片，男生和女生都有，沒穿衣服的。」大衛記得曼尼也給他們看成人性交的圖片：「他跟我們說：『我要給你們看媽媽們和爸爸們在一起做什麼的照片。』」

根據雙胞胎的說法，曼尼有雙面性格。「當爸媽不在時是一種，」布萊恩說：「他們

在的時候又是一種。」當他們父母親在的時候，曼尼像個長輩一樣，態度溫和，但是單獨跟他們兩個相處時，他卻很暴躁，甚至更糟，尤其是當他們不順從的時候。雙胞胎說，當曼尼要求他們脫衣服、然後互相檢查對方的性器官時，他們就特別頑抗。大衛記得有一次他企圖反抗這位心理學家。「他叫我脫掉衣服，」大衛說：「我就是不要，只是呆站在那裡。然後他大叫：『馬上脫掉！』比我這樣叫更大聲。我以為他要打我，所以就脫掉衣服，站在那裡直發抖。」布萊恩單獨跟我談話時，也提到同一次事件，「脫掉衣服——馬上脫！」布萊恩大吼著。

雖然雙胞胎還不明瞭這一點，不過曼尼博士要求他們作的性器官檢查，對於他的理論，亦即孩童發展出男孩或女孩的自我意識，是很重要的關鍵，也因此，在曼尼的心中，它也關係著布蘭達變性能否成功。如同曼尼在當時的作品中所強調的：「性別基模最堅固的基礎是男性和女性性器和生殖行為的差異，但這個基礎卻是我們的文化所極力阻止小孩碰觸的。其實所有的年幼靈長類，包括世界各地的人類小孩，以及次人類的靈長類，都會探索彼此和自己的性器、手淫，並以插入和交配的動作取樂。這些活動唯一會有的錯誤，是不懂得享受它們。」

但是這兩個小孩並不享受這些強迫的活動，特別是涉及「以插入和交配取樂的動作」。布萊恩記得，曼尼在他們六歲時，第一次跟他們介紹這些動作。他說，曼尼讓布蘭達四腳



著地趴在他辦公室的沙發上，然後讓布萊恩雙膝著地跪在她後面，跨下頂著她的屁股。類似的治療還包括不同的姿勢，像是布蘭達仰躺著雙腳張開，布萊恩則躺在她的上面。布萊恩說，至少有一次，當他們在作這種治療時，曼尼博士拿著拍立得相機幫他們拍照。

在雙胞胎接受的所有治療中，這種特別的諮詢方式最讓他們印象深刻。今天大衛仍然不願多談這個部分，他說：「有一些事情我不想記得。」在一九八九年，他曾經向珍(Tane Fontane)提及這項療程，珍後來變成了他的老婆。當時他們正在看一部電視記錄片，講的是中情局如何虐待犯人，包括電擊人的私處。「他哭得歇斯底里的，」珍告訴我：「他哭訴的是曼尼的事。我從來沒見過他那樣，我試著安慰他。大衛說，曼尼博士要他四腳著地，然後讓布萊恩趴在他後面，還拍下他們的照片。他特別提到這個。」

布萊恩提到這個性交模擬(coital mimicry)時，情緒也是混亂到極點。「那很難講——我到今天還是不了解，當初為什麼要強迫我們做那件事。」布萊恩說。

如果布萊恩曾經讀過曼尼孩童時期性演練遊戲的理論，他的混亂必定可以立刻消除。二十多年以來，曼尼不斷在他的書、論文、演說以及媒體採訪中，清楚地提及這個理論，以及它對於建立健康性別認同的重要性。

曼尼對於孩童性交模擬的耽溺，源自一九六九年末，那時他和三名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教授造訪澳洲北岸。曼尼在那裡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待

在一個叫作勇固(Yolngu)的海岸原住民部落。曼尼後來描述，勇固是一個完全異性戀取向、沒有任何心理性別混淆或性障礙個案的族群。當他造訪該部落的一些小學時，曼尼聽到一個八歲小孩的二手報導，說「前天晚上在營火前，兩個六歲的表兄妹當眾表演尼幾——尼幾(nigi-nigi)」。從他的小翻譯口中，曼尼了解到這個用語的意思就是「性交」。這個事件，再加上曼尼深信此部落沒有任何性別混淆，於是便成了他理論的基礎，亦即，孩童時期的性演練，對於形成健康的成人性別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曼尼在一九七〇年發表了一份關於勇固部落的論文，刊在《英國醫學心理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上，當中第一次提出這個理論。

「勇固人對於小孩子裸體和性遊戲直率的態度，使得小孩長大後也能坦然看待性別差異、性器官的正確意義和終極重要性、他們的生殖宿命，以及自己身為男性或女性的認同。」他如此寫道。曼尼假設，相反地，西方社會禁止這種小孩的性遊戲，反而是極為有害的，而且是同性戀、戀童癖、姦殺等事情的根本原因。

與曼尼同行的同事考特(J. E. Cawte)研究勇固族幾乎已有三十年，而他說，他從未見過族童玩這樣的性演練遊戲，也未聽說其他的研究者看過。考特教授同樣也對勇固人不會出現性問題的說法感到存疑。身為一位數十年來全心服務該族需求的精神醫師，考特說他治療過許多勇固成年患者，其症狀包括了各種他所謂的「性神經官能症」(sexual neurosis)，以



及各式的障礙。

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勇固人對於小孩性演練遊戲的支持，以及他們沒有任何性混淆的陳述，卻不斷出現在曼尼幾乎每一次公開的演說中。他在《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一書中，就有一節專述性演練遊戲。一九七五年，曼尼也在《科學雜誌》(The Sciences)上，發表了一篇該理論的專文。在他於一九七〇年中期寫《性的特徵》之前，亦即他治療利馬雙胞胎的同時，孩童時期性演練遊戲的議題已經確立了它在聖戰中的地位，可讓曼尼盡情發揮雄辯。「我們的文化出了什麼問題？」他寫道：「把小孩的性探索看成是傳染病……不讓他們看見性器官明顯的差異，不惜代價也不讓他們預演性交——那可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行為，強制要求兩性採取不同但協調的行為表現！」

在一九七七年四月接受色情雜誌《創世紀》(Genesis)訪問時，曼尼表達了他對於禁止小孩演練性行為，以及剝奪心理學家觀察權利的沮喪。「有關禁止人類嬰孩和青少年進行性演練造成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數字是完完全全的零蛋，」他說：「因為任何想作這類研究的人，都可能要背負唆使青少年犯罪，或是猥褻淫穢的罪名。想像一下，如果觀看兒童玩交媾遊戲的研究計畫想要申請獎金，它的新聞標題和下場會是什麼！」曼尼一九八四年又以同樣主題發表演講，哀嘆對一個性心理學家而言，「記錄孩童正常、健康的性演練遊戲」，簡直就是一種「罪行」。隨後，他接受《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訪問時，

再度談到這個主題，他給訪問者荷頓(Constance Holden)看一本有許多小孩性交照片的書，並說：「你光是看這些小孩的照片，就成了罪犯。」

一九八八年，曼尼上《歐普拉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在節目中他突然離題(原定要談中性問題)，大肆宣揚他偏愛的理論。「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我在澳洲北部沿岸的原住民部落中工作，」曼尼告訴歐普拉的觀眾：「對於他們沒有性的禁忌，我深感興趣。他們不會責罰小孩正常的性演練遊戲……我也非常驚訝地發現，他們族裡沒有雙性或同性戀。」歐普拉因為很顯然沒有人跟她簡報過曼尼研究中這個特別的部分，因此試著引開曼尼的話題，她打岔：「我幾乎很害怕問您說的是什麼意思，曼尼博士。」然而，曼尼不為所動，繼續清楚地描述現在他聲稱是親眼目睹的勇固族性演練遊戲。一年後，曼尼仍然繼續在加拿大電視節目《原創者》(The Originals)的某一集中宣揚他的理論。他在節目中嘲諷地指稱，禁止小孩探索性的社會根本是假正經。「對我來說，很明顯地，」他說：「性演練遊戲是大自然單純企圖的一部分，目的是為了讓小孩子長大後能夠性取向正常。」

但是，因為從來沒有聽過曼尼性演練遊戲的理論，布萊恩和布蘭達只能服從地擺出那些儀式化的姿勢，完全搞不清楚它們意義何在，也不知道在他們治療師的心中，這些課程正是讓他最著名的嬰兒變性實驗得以功成圓滿的關鍵。

但也許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布蘭達在七歲的時候，開始強烈地抗拒到巴爾的摩去。曼



尼建議朗恩和真娜，為了讓這些年度療程的「良藥」不會那麼「苦口」，不妨順便當作全家來霍普金斯度假。「很快地，」真娜說：「我們就得承諾到迪士尼玩，或是附帶一趟紐約行，一切只為了讓布蘭達願意出門。」

也就在這個時候，曼尼博士對布蘭達的療程，開始愈來愈集中在陰道整型上。當布蘭達在二十二個月大進行去勢手術時，那還只是她女性化過程的第一個階段而已。瓊斯博士選擇等到布蘭達的身體更成熟時，再進行剩下兩項手術，先是把她的尿道再改到更下方一些接近女性的位置，再來就是要挖造一個完整的陰道。對曼尼博士而言，布蘭達愈來愈迫切地需要為這些手術作好準備，因為在他的理論中，陰部外觀在一個人「學習」性別認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深信，除非布蘭達完成身體上的變性，否則她心理上的變性不會完整。

只有一個問題。布蘭達決定不作手術——永遠不作。曼尼的私人醫療筆記顯示，他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布蘭達來訪時，第一次跟她提到陰部手術的事情。他假裝不經意地隨口談起這件事。

「我想到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曼尼在一連串關於打架、如何區分男女生這類的例行問題之後接著說：「你已經知道你下面那裡、大腿中間的構造跟別的女生不完全一樣，對不對？」

「對。」布蘭達說。她對於這個狀況說得很保守。她的陰道皮膚下只有一個小筆頭似的突出，還有很明顯的疤痕，這讓她十分困擾焦慮，甚至不敢往下看或摸大腿中間那裡。

「關於這個部分，我有一個消息要告訴你，」曼尼說：「我們醫院可以幫你弄好它，讓它看起來像正常的樣子。」

「啊？」布蘭達說。

曼尼接著解釋，醫生可以在她身上動手術，讓她順利泌尿。（對於布蘭達在廁所裡持續的異常行為，曼尼的理論是，那完全肇因於她的陰道手術沒有完成。）「你覺得自己要多大才能接受這個〔手術〕呢？」曼尼問。

布蘭達說了個她經常給曼尼的回答：「我不知道。」

曼尼建議，當布蘭達下一次來看他，也就是她八歲的時候，應該就可以準備好了——也就是一年之後。布蘭達沒說話。曼尼繼續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地講著「穿白袍的醫生」將會「把那裡弄好」。最後布蘭達終於出聲了。

「我不要作。」她說。



布蘭達拒絕改變這個立場。

如今大衛解釋，他拒絕接受陰道手術，並不只因為他對於醫院、醫生和針頭有著深切的恐懼，更因為他當時的一些領悟，讓他相信自己不是女生，而且永遠不會是，不管他父母、醫生、老師或其他人怎麼說。因為，大衛解釋，當布蘭達七歲時，在她幻想的理想未來中，她看見自己是個留著小鬍子、擁有一台跑車、被朋友簇擁的二十一歲男生。「他就是我想當的人。」今天的大衛回想著那些兒時夢想說。正因為那些幻想，布蘭達相信，動陰道手術將會讓她困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性別中。

眼見自己著名案例的命運還懸浮在半空中，曼尼博士不遺餘力地試圖擊潰這個孩子的抗拒。在他們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面談手稿上，繼續記載著曼尼採取了另一個策略。曼尼希望能教導布蘭達認識她還沒有的陰道與陰唇，於是便問她：「你知不知道小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布蘭達回答：「從他們媽媽的肚子裡生出來。」

「好，」曼尼說，更進一步切中核心：「那你知道他們是怎麼生出來的嗎？」

此時，布蘭達顯然了解到曼尼的用心，於是打住了話，只吐出一些不連貫的音節。

「當寶寶準備要出來的時候，」曼尼重複：「他怎麼出來？」

布蘭達又不說話了。

「我再重複一次我的問題，」曼尼說：「當寶寶準備要生出來的時候，他怎麼從媽媽裡面出來？從哪裡出來？」

布蘭達知道自己已經把曼尼逼到他的忍耐極限，只好佯裝不懂。「噢！」她大叫：「他媽媽就把他生出來。」

曼尼卻不會這麼容易就被打發。「那他媽媽怎麼把他生出來呢？」他再問。

「嗯，我不知道，」布蘭達終於說：「我在學校沒有學過。」

「那你要不要看一些圖片呢？」曼尼說。

在錄音帶上，並沒有聽到布蘭達的回答。

「這本書叫作《兩個誕生》(Two Births)。」曼尼繼續說，並打開一本大型精裝書給布蘭達看。

《兩個誕生》於一年前出版，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最著名的作品，乃由伯潤(Egd Bryn)攝影，記錄了兩個女嬉皮在家生小孩的情形。大幅的黑白照片記錄了小孩出生前、出生時和出生後的時刻，拍得非常專業、非常漂亮，但同時構圖卻也是毫無保留的。大特寫照片秀出了兩個女人光著全身、臉部扭曲、裸胸漲大，也拍出了當寶寶的頭開始推擠通過伸展的陰唇口時，她們擴張的陰部。

「看見了嗎，這個女人裡面有個寶寶，」曼尼一頁頁翻給布蘭達看：「快準備好了，



已經開始要出來了……看，小寶寶就要出來了，他出來了。看，他的頭開始鑽出來……好了，他出來了。」

「好，」曼尼繼續：「我給你看寶寶出生的照片，是因為我要告訴你，你的身體下面還沒有寶寶可以跑出來的洞。」突然，曼尼又談起可以給她一個「寶寶洞」的「這裡醫院的醫生」。

然而，不管是表情痛苦、雙腳大開、陰道擴張的女人照片，或是曼尼對照片的解說，都無法說服布蘭達同意接受陰道手術，曼尼博士接下來對於性行為的描述，也一樣是徒勞無功。

「很多小孩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曼尼描述完陰莖如何進入陰道後這樣說：「因為沒有醫生告訴他們。知道的幸運小孩如果不要太常說這個，就是最棒的小孩。」

「好。」布蘭達說。

「你很聰明，對不對？」

「不對。」布蘭達回答。

「我覺得你很聰明。」

「不對，」布蘭達說：「我不聰明。」

「你不聰明嗎？」曼尼堅持。

布蘭達沒有回答。

「你還好嗎？」曼尼問。

布蘭達沒說話。

「我覺得你是個聰明的女生。」曼尼說。

「不是，」布蘭達重複：「我不是。」

「你是我最喜歡的女生之一喔。」

根據大衛的說法，當布蘭達繼續拒絕曼尼的奉承時，曼尼對她應有的好感，就逐漸變成挫折、不耐和怒氣。同時，布蘭達對於愈來愈多要求她動手術的壓力，強烈地反抗。一九七四年春天，即將面臨另一次到曼尼博士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回診、另一次與他鬥智鬥毅力的戰爭，布蘭達覺得壓力已經大到讓她受不了。

「我精神崩潰了，」大衛說：「因為我也知道，暑假看完這個傢伙，就要開學了。那簡直是雙重壓力。我記得那個就要九歲的夏天，我蜷縮在角落裡，一邊發抖，一邊哭泣。」

看見女兒的痛苦，朗恩和真娜延後了夏天的例行療程。然而，最後朗恩卻仍然相信，只有曼尼博士能夠幫助她。曼尼堅持讓布蘭達秋天再回去霍普金斯，因此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利馬一家再度前往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這一趟兩天一夜的行程，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對布蘭達而言尤其是。根據一卷一對一的錄音帶記錄，曼尼完全無法



讓她說話，她只會支吾著發出單音。當曼尼想要提起陰道手術的話題時，布蘭達衝出房間，跑到走廊上找她的父親，而且再也不肯離開他身邊一步。

如今大衛認為，如果當初他告訴爸媽，關起門後，那個心理學家和布蘭達之間發生的事，包括那些壓迫手段、誘拐哄騙、色情刊物、反常的檢查與擺姿勢，真娜和朗恩絕對不會要她再去約翰霍普金斯。但是她從來沒有動過這個念頭，只為了一個單純又令人心寒的原因。

「我以為我爸媽知道，」大衛說：「我以為，是他們作的決定。他們既然帶我來這兒，就一定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第六章

四分五裂



朗恩和真娜並不知道雙胞胎和曼尼進行的療程發生了什麼事。「雙胞胎總是被送到別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是哪裡。」真娜說：「大部分的時候，曼尼博士會花一些時間在一間小辦公室裡跟我談，有時候則跟朗恩談。」他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位心理學家單獨跟布萊恩或布蘭達相處時，會表現得跟他們在一起時不一樣。他在他們面前總是彬彬有禮、態度親切，只有一次，他們曾經有理由懷疑曼尼可能有另一面。「我們有一次臨時到他辦公室去，他沒有預料到我們會來，」朗恩說：「當時他正在對他的祕書破口大罵，為了一點小事滔滔不絕地指責她，她只不過是忘了寄一封信還是什麼的。當他看到我們的時候，就立刻住口了。」

像這樣讓人不安的碰面情形，沒有再發生過第二次，朗恩和真娜因此將它一筆勾銷，只當作是這位心理學家偶然失去了控制。他們繼續把曼尼當作是他們最親密的心腹知己，而他也把他們當成與布蘭達長期抗戰最重要的盟友。事實上，在他們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回診之後，曼尼把朗恩和真娜單獨叫到一邊，給了他們一件他稱之為「家庭作業」的任務。他要他們找機會跟布蘭達解釋清楚她的性器官和陰道手術，並交代他們，一定要說服她同意在下次來的時候作陰道檢查。

這次會面後，曼尼在給自己看的筆記上表露出更明顯的態度。「明年絕對要作身體檢查，」他這樣寫著：「把迴避當成解決棘手議題的方法，只能拖上一段時間，拖過明年就

一定不成，搞不好拖過今年就已經太晚了。」曼尼對於布蘭達頑抗的沮喪，也不知不覺地顯現在這個筆記上：「當布蘭達緊繃又過動時，她就不盡然討人喜歡，也不特別像個女生。」

回到溫尼伯之後，朗恩和真娜就得作家庭作業了。曼尼告訴他們要加強布蘭達對男女性器官差異的觀念，並教朗恩和真娜給布蘭達看他們的裸體。在《性的特徵》一書中，曼尼強調，父母親展示性器官，有助於小孩異性觀念的發展，他甚至建議父母親在小孩面前從事性行為。「在鎮定的指導下，」曼尼寫著：「這樣的經驗可以融入小孩的性教育之中，強化他或她本身的性別認同／角色。」

在孩子面前做愛超過了真娜和朗恩的底限，但是真娜盡量做到作業要求的其他部分。她儘可能地時常在布蘭達面前光著身子，但是這樣做只讓布蘭達難為情而已，她看見母親赤裸地在家裡到處走動，似乎相當吃驚。「突然之間，」大衛記得：「就在某一次我們從曼尼那裡回來之後，她就開始不穿衣服走來走去。」真娜急於讓這個方法奏效，更不想違背曼尼的囑咐，因此她十分堅持。「曼尼鼓勵我們去裸體海灘，」她說：「我們知道有一條河，附近方圓十哩之內都沒有人。我們就跑去那裡裸泳，但是雙胞胎就是不肯跟著做。」真娜也試著「打破沈默」，跟布蘭達談陰道手術的事，不過結果一樣徒勞無功。「我只要一談到那個話題，」真娜說：「她就立刻跑出房間去。」



當布蘭達了解到父母親跟曼尼串通好，一起強迫她接受手術時，利馬家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她開始公開反抗父母，即使應該是高高興興的耶誕節，也變成痛苦的經驗。布蘭達激烈地抗拒穿上為了要去克里斐爾鎮祖父母家，爸媽堅持要她穿的洋裝。布蘭達一直很憎恨去親戚家，因為那總是意味著爸媽會對她施加壓力，要她言行穿戴都要像個小淑女。更糟的是，她的祖父母、姑嬸、叔伯們老是不斷地對她詳加察看。「他們好像把我當個蟲似地研究，要看看我一年來變化了多少，」大衛說：「而且我每一次發現他們在看我，他們就把眼光轉到別的地方去。我跟爸爸說：『不知道為什麼，可是我老覺得在自己親戚中像個怪物似的。』爸爸非常小聲地回答我：『我知道。』」

朗恩的家人就像其他親戚一樣，都知道布蘭達變性的事情，因此朗恩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仔細觀察自己的女兒。在他內心深處，他也知道這些人看見了什麼。「大約在布蘭達七歲之後，我就大概知道事情是行不通了，」朗恩說：「但是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朗恩和真娜都無法想像自己作了錯誤的決定，唯一的選擇，只有把自己和那些一心一意要他們面對這個事實的人隔離開來。自此之後，朗恩決定，他們儘可能不要去他父母家了。

但是要跟所有會提醒他們布蘭達問題的事物隔離，是很困難的。就在那年秋天，兒童輔導中心跟他們聯絡，說布蘭達在校行為問題愈來愈嚴重，還說她「過度好動、旁若無

人」，而且看起來「不快樂」。更有甚者，該中心說，因為布蘭達的狀況，布萊恩也開始顯現嚴重的情緒問題。

「那時我對姊姊的主要情緒就是嫉妒，」布萊恩解釋：「因為她得到所有人的注意。我只不過是個正常的小孩罷了。媽媽和爸爸太過擔心布蘭達，以至於忽視了我。我覺得自己不重要，因此開始行為脫一點軌，試著引起一些注意。」那年三月，他果然成功地引起注意。他在住家附近的一家小店順手牽羊被抓，店主威脅要提出告訴。對朗恩和真娜來說，這已經是決定性的最後一擊。

布蘭達變性手術即將屆滿八年之際，他們當地的小兒科醫師曾經建議他們離開此地，到一個完全沒有「以前那個兒子」記憶的地方去，重新開始。當時他們拒絕了他的提議，如今他們才了解其中的明智之處。他們需要立刻離開盤據溫尼伯的陰影和狐疑眼光，也必須立刻把自己和朗恩的家人、兒輔人員，以及所有人遠遠地隔開。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朗恩和真娜賣掉了他們的房子、家具、電器用品以及一九六六年的龐帝亞克(Pontiac)轎車，另外買了一輛半噸負載的雪佛蘭(Chevrolet)卡車，後頭拖著個野營車。他們把剩下來寥寥可數的東西打包好後，往西朝英屬哥倫比亞開去。朗恩當地的朋友告訴他，那兒工作很多。朗恩幾乎不曾仔細計畫過這次的搬遷，完全沒有先考慮一下，致使他事後責怪自己為什麼要把所有東西都賣掉，害得他們一到哥省就得全部重新買過。



「我記得當我們一到那裡，我就自問：天哪，我做了什麼？」朗恩說：「我怎麼可以打了包、說搬就搬呢？這是多麼愚蠢的事情哪！」真娜說，直到很久之後，她和朗恩才完全面對他們如此急於將原先的生活連根拔除、前往哥省的原因：「我們一心想逃避。」

而曼尼博士對他們搬家的動機早已了然於胸，這點從他自己同時間的私人筆記上可以看出來。「搬到哥省的計畫可能高估了地理變化的奇效，」他這樣寫著：「特別是對解決與祖父母那邊親戚的問題而言。然而，也許這次搬遷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也說不定。」



利馬家的目的地是哥倫比亞省群山圍繞、林木叢生、人煙罕至的內陸地。他們在一個叫作艾虛頓溪(Ashton Creek)的小地方定居下來，離該地最近的小鎮是人口僅兩千五百人的恩得比(Enderby)。朗恩買了一個拖車屋，停在附近的露營區，雙胞胎則在規模甚小的艾虛頓溪小學(Ashton Creek School)就讀四年級。

「艾虛頓溪小學比較像一所鄉下小學，」大衛說：「但是這跟讀哪一種學校沒有關係。如果你不自在，不管念哪一所學校都會不自在，就算念的是上千人的大學校還是一樣。因為基本原則就是：女生一邊，男生一邊，兩邊是分開的。「那我要去」哪邊呢？我

不屬於任何一邊，完全被遺棄，這是不會改變的事實。學校一換再換又換，但這個事實永遠沒有改變。」

四月分，利馬全家再度前往巴爾的摩去看曼尼博士。將近十歲的布蘭達，如今對曼尼又採取了一種新的態度。她繃著臉，一付愛理不理的樣子，雙唇緊閉，除了發出一些單音外，拒絕回答他任何問題。她以為她成功地掩藏了已經開始出現的一些生理感覺，不過她錯了。根據朗恩的說法，那次回診時，曼尼博士告訴他一件他在單獨跟布蘭達會面時發現的事實。

「曼尼告訴我們，他問布蘭達她想要哪一種人做伴侶，男生還是女生？」朗恩回憶：「布蘭達說：『女生。』」朗恩說，曼尼想知道，對於撫養一個女同性戀小孩，他們的感覺如何。朗恩本來不知該如何回答，但認為曼尼博士似乎覺得這件事沒什麼重要，因此他說他真的相信同性戀「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曼尼顯然是這麼認為，因為他並未把這個診療的發現，記載於下一篇關於雙胞胎的報告中。這篇報告在同年末發表於《性行為彙刊》(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上，以「Ablatio Penis」為題(意即拉丁文中「器官完全切除的醫學狀況」)。報告再一次補強了之前變性手術成功的資料，而且增加了一項新的資料，證明這名女生如今開心地接受女性特質。曼尼詳述了有一次他跟布蘭達聊到，利馬家最近到華盛頓動物園玩的事情。「我訴諸



標準問答題，問她如果可以做一種動物，她想變哪一種。」曼尼報告：「她選了猴子……『那你想變成男猴子還是女猴子？』我問。『女猴子，』她回答，而且解釋了原因：『我本來就是女生！』」

關於這個似乎非常明確的女性性別認同陳述，還有一個問題存在（即使我們不排除那可能只是布蘭達一向的努力，為了滿足這位心理學家想聽的話）。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那次談話中，曼尼錄音時發生了錯誤，因此布蘭達的話錄得不太清楚，曼尼必須很費力才能聽得出隻字片語。「我把耳機貼近耳朵，」他一邊重聽這次談話錄音，一邊記筆記：「現在聽得出多一些了……我問她為什麼想當猴子，但是從帶子上聽不見答案。我記得我當時無法立刻聽懂她說的答案，直到她用手勢比出攀爬和擺盪的姿勢，我才了解。然後我問她想當女猴子還是男猴子，她的答案在錄音帶上聽得出來，是說：『女生。』我問她為什麼……錄音帶上聽到的答案是：『我本來就是女生。』『女生』(girl)的發音聽起來像是『grrl』的拼法。」

一九八八年，大衛第一次看到這些訪談的手稿時，堅稱他當時說的不是「女生」，而是用了他那時喜歡採用的標準濛混技巧之一。布蘭達並未回答曼尼關於猴子性別的問題，反而回答她想做的是哪一種猴子，「我說的是『猩猩』(gorilla)。」大衛說。只要想到利馬一家人都有的、省略字尾的加拿大大草原區特有口音，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gorilla，會因為錄

音的問題，聽起來像 *girl* 了。而曼尼會把這個字認定為 *girl*，說明的也許不是布蘭達的性別認同，而是科學研究者在蒐集和詮釋資料時的主觀期望。

撇開這個異想天開的解讀不談，曼尼這篇論文還以高度的樂觀論調作結。「除了這個家族以外」沒有人知道「她出生時是個男生」，曼尼寫道：「也沒有人會這樣推測。她的行為就像個正常好動的小女生，而且與她孿生弟弟的男孩行為截然不同，以致別人也無從猜測起。」

那年稍晚，曼尼又發表了另一篇布蘭達成功變性的報告，這一次，他針對的讀者不只是他的學界和醫界同僚，而是一般大眾。這篇文章收錄在《性的特徵》一書中。這本書是由曼尼和記者塔克(Patricia Tucker)合寫，使用的是大眾心理學暢銷書的商業語言，代表的正是曼尼試圖擴大讀者群的企圖。這本書也提供了截至目前為止，關於布蘭達變性最仔細、最易讀的資料。《性的特徵》書中雖去除了曼尼早期關於這次變性論述中難解的醫學術語，但布蘭達的故事仍然呈現出一種昂揚的、近乎勝利的語調。

「雖然在嬰兒時期，這個女孩是雙胞胎中的主宰者，」曼尼寫著：「但在他們四歲的時候，已經毫無疑問地可以分辨出誰是男生、誰是女生。五歲時，這個小女生已經喜歡穿洋裝多過穿褲子，愛戴髮帶、手環，穿有蕾絲邊的襯衫，也喜歡當她爸爸的小甜心。整個孩童時期，她的固執，以及和她弟弟一樣旺盛、消耗不完的精力，讓她成了一個男性化的



小女生，但無論如何，她仍然是個女生。」曼尼把布蘭達的變性形容成「戲劇化的明證，證明了對正常嬰兒而言，性別認同的選擇在出生時是開放的」。他繼續闡明，這個小孩後來的故事，證明了整個家庭已經成功地適應了當初去勢的決定。

當《性的特徵》在書店問世的時候，利馬家對於當初決定的調適，卻從他們搬至哥省的那一天起，日漸岌岌可危。

在一段令人難以忍受的失業期之後，朗恩在一個大型鋸木廠找到了工作。一談起女兒和她未來要面臨的重大醫療決定，他並不比之前好過。「我是個工作狂，」朗恩承認：「如果我擔憂一件事情，我就更賣力工作。」朗恩不去面對發生在布蘭達身上的事，包括她在前一年前往霍普金斯之前的精神崩潰、她強烈的男性化、她的拒絕討論手術、她在學校持續令人灰心的表現，以及她的同性戀傾向等，朗恩反而只顧著在鋸木廠加更多班，延遲回家的時間，靜默地扒著晚飯，然後盯著電視喝光半打啤酒。經常是真娜先上床睡覺，而他則在電視前逐漸陷入無意識的昏睡。

真娜也好不到哪裡去。在哥省住了六個月之後，她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我沒有家人可以說話，」她說：「我有一些朋友，但他們不了解真實的我——或真實的布蘭達。」唯一真的知道真實布蘭達的人是朗恩，但朗恩拒絕跟她談。大衛清楚地記得席捲他們小房子的混亂。「媽哭著、叫著，」他說：「而爸則喝著酒。」

那年夏天，真娜的狀況惡化，她陷入嚴重的沮喪中，耽溺於回想所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有時候感覺一點都不真實，」她說：「特別難以釋懷的是，這些年來我非常相信基督，相信有一位真主，為你規畫了一條路。我記得自己想著，這在我的生命中到底可能有什麼目的？這些不斷不斷的痛苦。這種可怕的生活能有什麼目的呢？」真娜開始情緒不穩，一下子易怒、一下子哭泣消沈，有時候覺得自己快要失去了理智。真娜說她經歷幾度短暫的「精神異常」，讓她無法分辨真實和虛幻世界差別何在。

「她簡直不可理喻，」布萊恩說：「我們都如履薄冰，因為不知道回家會面臨什麼狀況。」真娜去看了一些相關的醫生，但是「得不到任何幫助，」她說：「有一位女醫生還跟我說：『噢，你只是需要再生一個小孩，讓自己忙些。』我說：『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再生一個孩子！』」

朗恩和真娜幾乎完全疏遠了。那年夏天，真娜和當地一個男人發生外遇，想要讓朗恩難堪，他發現後完全被擊垮。心懷內疚的真娜吞了一整瓶安眠藥，朗恩即時發現，把她送到恩得比的醫院去。真娜出院後，他們倆雖然談到了離婚，卻決定再認真地共同生活看看。只是，剛一入秋，更多的厄運降臨：他們的拖車屋失火，燒得一乾二淨，也把他們的生活照和其他東西幾乎燒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距離他們離開溫尼伯一年又五個月之後，利馬一家把逃過一劫、




所剩無幾的行李打包好，展開遙遙返鄉路。真娜和朗恩不得不承認，他們當初逃脫的企圖，反而使他們想要逃離的問題更加惡化。真娜的沮喪和自殺未遂、兩人婚姻幾乎破碎，以及朗恩突然大量地飲酒，都明顯地讓雙胞胎付出昂貴的代價。布萊恩開始對其他小孩出現突發的暴力和憤怒舉止，布蘭達則把感覺藏在心裡，變得愈來愈焦慮、沮喪。她也對父母，特別是她的母親，懷有公然的敵意和不信任，雖然據大衛指出，他試著隱藏這些感覺，盡一切努力挽回父母瀕臨崩潰的婚姻。「我認為一切都是我的錯，」大衛解釋：「所以我試著讓他們開心，試著更淑女些。」

這些努力，對布蘭達而言，要比以往更困難，特別是在她已經度過了十一歲生日，開始出現某些生理上的變化：她的肩膀變寬、變得男性化；她的脖子和手臂也開始變粗；有時候她的聲音發啞、發出奇怪的嘎嘎聲。

總之，利馬家在哥省的旅居，和一九七五年五月號《紐約時報書評》上所形容的生活，形成了難堪而諷刺的對比。在該刊上，評論家沃芙(Linda Wolfe)，從曼尼著作《性的特徵》所呈現的資料中，整理出以下的結論：「這位陰莖在出生時燒壞的雙生兄弟之一，當初他的父母選擇以外科重建手術讓他變成女性，如今他已經安然度過兒童期，變成一位真正的女孩了。」

第二部 真相大白





第七章

被動了手腳



利馬一家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回到溫尼伯，並開始試圖重建他們的生活。真娜在一家廉價商店找到一份收銀員的工作，朗恩則在一家食品公司開午餐車，但他很快就離開了這個工作自行創業。他們暫時居住在城東的卡普里汽車旅館(Capri Motel)外，布蘭達和布萊恩則在阿格西道小學(Agassiz Drive Elementary)就讀。這所小學校座落在附近大學高地(College Heights)的舒適中產階級社區邊緣。在此之前，布蘭達唯一的心理治療，一直還只是每年一次的約翰霍普金斯諮商之旅而已，但是等她進入阿格西道就讀時，情況有了改變。她的焦慮、社交孤立和恐懼立刻引起了該校校長勃格曼(Mr. Bergmann)的注意，而勃格曼也立刻通知了市立兒童輔導中心。該中心的閱讀診療師奈比絲曾在一年半前處理過布蘭達的案子，她在一九七六年秋天再度和布蘭達面談。

「布蘭達的興趣非常男性化，」奈比絲針對十一歲的布蘭達所作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她對於組裝樹屋、裝了無線電的小型賽車、模型汽油飛機等有一堆了不起的計畫……她顯然比弟弟更愛競爭、更有侵略性，也髒亂多了——不管是在家或在校。」布蘭達另外與該中心治療師訪談的結果顯示，她「十分害怕她的性器官被動過手脚，」另外也「有一些自殺的念頭」。

布蘭達的案子被轉介紹給西蒙森博士。西蒙森和藹可親，當時三十四歲，是該中心精神科主任。他在距離溫尼伯北方一個小時車程的捕魚小鎮吉姆利(Gimli)出生成長，在溫尼伯的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拿到醫學和精神病學學位後加入該兒童輔導中心，

在職位上有快速的升遷。「因為我剛好在嬰兒潮之前出生，」西蒙森以他一貫的自嘲口吻道：「當年我接這個職位的時候，還太年輕，也許一開始就根本不夠資格。」

但即使是老練的精神醫師，也會覺得布蘭達的案子極具挑戰性。西蒙森讀過許多曼尼博士出版的作品，其中都聲稱布蘭達已經確立了清楚的女性性別認同，然而當他第一次跟這個女孩見面時，卻被她的外表嚇到了。「她坐在那裡，穿著裙子，兩腿卻張得開開地，一隻手穩穩地放在一邊膝蓋上，」他回憶：「全身上下可一點也沒有女生的樣子。」

西蒙森決定要為這個女孩的行為建檔，以和她的弟弟作比較，於是便安排拍攝診療錄影帶。拍攝地點在兒童輔導中心一個有雙向鏡的房間裡，由精神醫生墨姬(Doreen Mogey)跟雙胞胎作訪談，或者該說，試著跟他們作訪談。每年到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療程，讓布蘭達對任何陌生人或環境變得敏感多疑，她很快就對這樁事、心生戒意。

「那是一個大房間，」大衛回憶：「裡面什麼都沒有，只有三張椅子，一張給我坐，一張給弟弟坐，還有一張坐著那個在講話的女士。她在記事本上不斷寫著。她一直試著要我坐好，但我很懷疑，到處檢查。我跑到玻璃前面，然後看到了攝影機。」布蘭達一邊跟弟弟大叫說，有人在偷拍他們，一邊衝出房間，再也不肯回去。

錄影雖然失敗，不過卻也真實地記錄了布蘭達的情緒、動作和態度，因此，當西蒙森召集了城裡一群資深精神科、內分泌科和小兒科專家們共同會商這個案例時，他就放這卷



錄影帶給他們看。「每一個看見布蘭達那天表現的人，都認為她看起來就像個男生。」一同參與那次會議的墨姬說。經過一些意見交換和辯論之後，這些醫師們很快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他們只能繼續曼尼已經開始的療程，因為一切要回頭已經為時太晚。西蒙森也承認，布蘭達的案例在醫學文獻上實在太有名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西蒙森說：「這是個經典案例，我們必須試著讓它成功。」

為了增進布蘭達的女性認同，西蒙森決定讓女醫師來治療布蘭達。他徵召墨姬來擔任這項工作。墨姬是個眼神銳利、精神奕奕、發號司令型的女人，她也跟西蒙森一樣，打從一開始，就深為這個案例所困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她第一次跟布蘭達碰面，墨姬觀察到，布蘭達言行中時隱時現的女性姿態（特別是在有人觀察她的情況下），「混和著男性和女性的姿勢與性格」，墨姬在筆記中如此寫道。她很快就懷疑，布蘭達偶而的女性化，是否真能代表她意識到自己是個女孩。墨姬在她的筆記中寫著：「你會覺得〔布蘭達〕有時候說的是她覺得你想聽的話——『我是女生。』」

隨著療程持續進行，墨姬的懷疑也愈來愈深。她記錄了布蘭達不斷說相信自己「只是穿女生衣服、留長頭髮的男生」，以及別人認為她和說她「看起來像男生，說話也像男生」。同時，墨姬也注意到，即使只是談到她私處女性化的手術，布蘭達也會激烈地反抗，而且斷然拒絕再到約翰霍普金斯去。布蘭達抱怨那裡別人都在看她，還有「一個男人給她

看裸體照片」。

墨姬讀過曼尼對於案例的敘述，並因而困惑不已。「從那些報告上讀到的那個小孩，和你親眼看到的印象完全不符合，」她說：「這不是他描述的那個孩子。」而且，墨姬說，朗恩和真娜也不是曼尼描述的那對父母。在《性的特徵》一書中，曼尼形容布蘭達的雙親非常滿意於他們當初被迫授權讓嬰兒變性的困難決定，然而在她自己和朗恩及真娜訪談後，墨姬卻聽說他們最近幾乎分手、朗恩酗酒，以及真娜患有憂鬱症和自殺未遂等等。他們一點也不像是那對快樂地撫養女兒的夫妻，反而像是因為焦慮地試圖遵照曼尼博士的指示來撫養布蘭達，而快要瀕臨崩潰的一對怨偶。

朗恩和真娜有多遵從曼尼博士的計畫？墨姬第一次到阿格西道小學訪視布蘭達時，就已經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個寒冷的十二月天，所有的女生都是長褲裝扮，唯有布蘭達一個人穿裙子。當墨姬問真娜為什麼沒給布蘭達穿上長褲時，真娜無助地回答：「因為曼尼博士說要讓她穿洋裝。」墨姬因而得提醒真娜，溫尼伯不像巴爾的摩，可是有北美洲最寒冷冬天的地方，布蘭達應該像其他女生一樣穿長褲才行。直到那時，真娜才同意讓布蘭達穿比較適當的服裝，跟班上其他女生一樣，開始讓布蘭達穿起牛仔褲。

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亦即墨姬接手這個案例的一個半月後，她寫了一封信給曼尼，告知他布蘭達的行為問題，並向他索取一些背景資料，「以幫助布蘭達和她的家人針



對她的問題，作更適切的調整」。她探問布蘭達接受過哪些手術（曼尼出版的資料中，這部分一直寫得很模糊不清）、預計要接受哪些手術，以及曼尼作了哪些努力，來幫助布蘭達和她的父母「適應變性一事」。

曼尼於一月十七日回信給墨姬，他語氣輕快地表示自己非常開心墨姬加入研究布蘭達的案子。他解釋，布蘭達陰道手術的第二階段之所以尚未執行，是因為她「對醫院極端恐懼」，曼尼還寫道，那是一種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工作二十五年以來只碰過另外一次」的恐懼。他補充，只要提到荷爾蒙治療或是手術，就足以讓布蘭達「抓狂，強烈到完全無法討論任何相關事情，否則她就會衝出房間、大聲尖叫」。然而曼尼繼續說明，如今布蘭達的恐懼「急需」克服，因為她已屆青春期，荷爾蒙治療和外科手術的急迫性愈來愈高。「如果你能夠幫助她解除這種不正常的抗拒，就可以算是幫她一個大忙了。」他寫著。對於墨姬認為朗恩和真娜未能適應布蘭達變性一事，曼尼並未將她的擔憂放在心上，他說：「關於你能提供她父母的協助，我認為不是要協助他們適應變性的事，而是要幫他們適應彼此。」特別是，曼尼補充，要幫助真娜克服她的憂鬱性情緒起伏。

墨姬這時已經幫真娜找了一位精神醫師，真娜的情緒很快地就因為抗憂鬱藥物的關係而穩定下來，但是墨姬對曼尼的答覆感到困惑不已，她說：「我想，問題比這位母親可以掌握的還多得多呢。」但是她還是向這位對這個案例比較有認識與經驗的名博士妥協，繼

續她和布蘭達的諮商課程，不斷地要這個孩子相信她真的是女生，以及強調她回去約翰霍普金斯接受性器官手術的必要性。

「但抗拒可強得很哪！」墨姬說。布蘭達陰沈、生氣、毫無反應，通常就只是拒絕說話、擺個臭臉、盯著地板看。只要提到「陰莖」或「陰道」這兩個名詞，都會讓她立刻抓狂。布蘭達對於動陰道手術，或是到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回診的立場依然不變。「不要跟曼尼博士一起看女性身體的照片，」墨姬一月二十日的筆記上註明：「不要去曼尼博士。」

墨姬既驚訝於這個孩子明顯的厭惡，同時又擔心曼尼並未掌握住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她在二月二日又再次寫信給曼尼。這一次她寫了一封長信，清楚地載明了布蘭達的問題。她解釋，這個孩子在功課上比同齡孩子落後了兩年，而且從「第一天」上學開始，就沒有很大的進步；她說布萊恩為布蘭達「男性化的行為」感到「困窘」；還有布蘭達很難交朋友，而且公開宣揚自己和其他女生不同；布蘭達對「發育成女性身材沒興趣」，認為任何有關她身體的事情都是「骯髒的」；她依然拒絕手術，也曾經表示過到巴爾的摩去的時候，「有一個人給她看裸體照片」，讓她覺得很尷尬；甚至「她說她不要再回去看你，否則她威脅，必要時會逃家」。墨姬在這封信的最後表示，雖然布蘭達抗拒，她還是持續努力希望讓她能回到巴爾的摩就診，「因為我真的覺得布蘭達需要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並開始發展女性特徵」。



曼尼二月九日的回信很簡短。他完全沒有提到墨姬提出的諸多問題，只是再度表達他對墨姬參與治療感到莫大喜悅、能跟她一起「密切合作」十分開心，以及對她能幫助布蘭達重返約翰霍普金斯感到「如釋重負」。

但曼尼的如釋重負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在嘗試了兩個多月要布蘭達回去約翰霍普金斯，卻徒勞無功之後，墨姬決定，不管多少治療都無法消除這個孩子強烈的抗拒。那年春天，墨姬向朗恩和真娜提議，或許布蘭達不一定要到巴爾的摩去作陰道手術，而可以在溫尼伯作，這樣不僅可以為利馬家省下很多時間、精力和金錢，也可以消除布蘭達聯想到約翰霍普金斯時的深深焦慮。

然而朗恩和真娜卻顯露出對於不遵守曼尼原有計畫的恐懼。他們說，唯有曼尼博士核可這個計畫，他們才會同意這樣做。因此，四月十八日，墨姬再次寫信給曼尼博士，建議他讓布蘭達在溫尼伯動手術，「除非，」她補充：「有一些特別的因素讓她一定要回到約翰霍普金斯才行。」

事實上，曼尼認為這個孩子有很多理由必須回到約翰霍普金斯。他用了兩頁篇幅，密密麻麻地仔細陳述了這些原因，字裡行間似乎隱隱約約流露出可能無法掌控與接觸自己最知名研究案例的絕望。

「利馬家當然有權利選擇專業服務的地點，」曼尼開宗明義寫道：「我會尊重他們任

何的決定。然而，我相信他們最明智的抉擇，應該是不要跟約翰霍普金斯失去聯繫，並讓霍普金斯和布蘭達居住地的專家一起合作。」曼尼聲稱，約翰霍普金斯「心理醫學、內分泌科和外科密切合作」的「獨特」好處，就是能「消除不習慣一起工作的專家意見相左的可能性」。他也讚揚了瓊斯建造陰道的技術，瓊斯十年前割除了布蘭達的陰莖，未來要幫布蘭達做人工陰道的也是他。然而，曼尼顯然也知道，即使自己再怎麼強力解釋，也不足以說明，為什麼讓這個孩子千里跋涉，來接受一個複雜又需要長期觀察的手術，是比較實際的做法，而不乾脆在離家幾分鐘的醫院動手術。因此，他在信的最後以請求結尾，說明無論手術在哪裡作，都不希望自己失去跟布蘭達的聯繫。「我想要繼續見她，」他寫道：「希望未來還是像過去那樣，大約每年見一次面。」

當利馬家了解曼尼博士並不反對布蘭達在溫尼伯動手術之後，他們才同意改變計畫。但是關於布蘭達每年還是要回巴爾的摩一次這件事，朗恩和真娜還是給曼尼的善於言辭說服了。他們決定，如果本地的心理學家無法消除布蘭達的恐懼，他們每年還是會繼續帶布蘭達回去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跟曼尼博士諮商。「我們覺得好像無處可去，」真娜說：「沒有人像曼尼博士那樣，對我們或是布蘭達的認識那麼深。」



第八章

潛意識中的男生



布蘭達就讀阿格西道小學六年級的那年春天，墨姬醫生因為家庭因素必須離開溫尼伯，定居於離溫尼伯北方五十哩處的小鎮布覽登(Brandon)，布蘭達的案子因而被轉給一位新的精神醫師英格曼森(Janice Ingimundson)。英格曼森是曼尼托巴大學醫學院的校友，時年三十二歲，是個冷靜理性的佛洛伊德派學者，在她嚴謹、分析性的超然外表之下，小心地潛藏著睿智及溫暖的性格。英格曼森並不是該市兒輔中心的成員，而是自己在市中心設立辦公室開業。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她第一次和布蘭達晤面，就被對布蘭達的第一眼印象懾住了。

「所有的資料都說這個小孩已經接受自己是女生了，」英格曼森說：「然而我自己對這個小孩的親眼印象卻是個——」她握起拳頭、手肘彎曲擺出拳擊手的姿勢：「強悍的女生，一個看起來相當男性化的女生，粗魯的女生。」

布蘭達在那次晤談中所說的話，也與這個印象相去不遠。雖然布蘭達常常說她認為這個精神醫師想聽的話，譬如「我想變漂亮；我是女生，不是男生」，同時她卻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對自己的矛盾感覺。她維護自己對男生衣著的偏好，告訴英格曼森說：「我喜歡這樣穿。穿裙子感覺不太對，好像我不應該穿。」當被問到對男生的觀感時，布蘭達說她「想痛扁〔他們〕」，然後又加了一句意涵豐富到幾乎讓佛洛伊德象徵主義者解析不完的話。

布蘭達告訴這位精神醫師，如果男生「膽敢動她一根汗毛，她會拿她父親的斧頭把他的手

指砍掉」。當英格蔓森試圖碰觸陰道手術的主題時，布蘭達就變得特別野蠻。「我決定不要作，」她告訴這位精神醫師：「而且我也不想談。」

雖然深受這些談話所困擾，英格蔓森仍然採信曼尼博士的說法，認為布蘭達已經形成了女性的性別認同。她覺得自己的選擇並不多。「我當時想，決定早已經作了，」英格蔓森說：「如果你今天挑開這個爛攤子，然後說：『也許這個決定是錯誤的』，那麼，誰要來做這件事呀？」因此，英格蔓森一如她之前的墨姬，決定更努力讓布蘭達相信自己是女生，並儘快同意實行陰道手術。然而，從他們第一次會面開始，英格蔓森就對這個個案的各方面都感到不自在，特別是她可以感覺到，在這個小孩的潛意識裡，她不但知道自己是個男生，而且知道不可以說出來。

「她一跟你說話，」英格蔓森解釋：「就會流露出傳統的男性興趣。這一點都不奇怪，有些女孩也會這樣，但是她提及這類興趣的困難，或應該說是困窘，卻十分地嚴重。她不願意顯露出來。她經常說她有個『祕密』，她會提到想當『偵探』，想要解開那個迷團。那是個治療學上的謎題：她想知道，但又不願意知道。正在接受治療的人既想知道，但是又不願意知道，他們只想聽到好消息。」

英格蔓森又說，很明顯地，布蘭達已經相信事實絕非好消息。英格蔓森繼續說：「基本上，布蘭達的意思是：『我又沒什麼問題，為什麼這些人要干涉我？』而回頭來看，她



是對的。『我是個男生，我是男的，就這一點來說，我沒錯；但是就生理上來說，如果我是女生，我就有點問題了。』這就是她的束縛。『如果我承認我是男生，那麼我必須承認，我的生理結構是有問題的。如果我承認生理結構有問題，那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英格蔓森因此認為，布蘭達的抗拒，肇因於她隱隱感覺到並未被告知關於自己的全部真相，於是在她第二次見過布蘭達之後，就找她的父母來談話。她要朗恩和真娜開始準備找一天告知布蘭達關於她出生時的割包皮手術、經歷的意外，以及接下來的變性。「我們必須告訴她這件事，」英格蔓森說：「也必須幫助她接受事實。」這位心理學者相信，唯有如此，布蘭達才能接受除了動手術之外別無選擇的說法。在她的筆記上，記載了朗恩和真娜對於要向布蘭達揭露事實的恐懼。

真娜說：「我有点希望你你可以告訴她。」但英格蔓森說服她，布蘭達應由父母親口中聽見事實比較妥當。他們開始時應該放慢步調，把基礎打好，而同時，英格蔓森則幫布蘭達作心理建設，準備迎接最後的宣布時刻。

幾天之後，朗恩和布蘭達單獨談了話。朗恩坐在布蘭達的床邊，鼓足勇氣開口跟布蘭達說，當她還是嬰兒時，醫生「在她那兒犯了個大錯」，而為了要讓「其他醫生」彌補「第一個醫生犯的錯」，所以才要她動手術。但是朗恩發現，無論如何，他都無法提到布蘭達的真實出生狀態、變性的事，或是解釋這個「錯誤」。布蘭達也對這些題材不感任何興趣，事

實上，她的反應似乎暗示她一點也不知道。如同朗恩稍後向英格曼森回報的，他說布蘭達對於他神祕兮兮地提到「做錯事的醫生」時，唯一的反應就是問：「那你有揍扁他嗎？」

今天大衛解釋，朗恩那番關於「一個意外」拖拖拉拉的談話，完全無法讓布蘭達聯想到她原本是一個男生，卻因為手術而變成女生。「你再過一百萬年也不可能想到是這樣，」大衛說：「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也不想知道。」

在同一時期，布蘭達在學校裡仍然面臨一些障礙。「她只到學校上課四天，主要都是因為同儕問題，」學校的社工在布蘭達的檔案中，如此潦草寫道：「別人嘲笑她說『看起來像個男生等等』。」

不過在該學年裡，布蘭達卻逐漸融入一個由名叫海瑟(Heather Legary)的女生所領導的小黨派中，這些人全是些適應不良的男性化女生。海瑟留著短短的棕髮，臉上掛著大大的微笑。「剛開始上學的頭幾年，我好幾次都是人家躲避的對象，」如今海瑟說：「我知道那種感覺，我絕對不會對別人那樣，永遠不會。」她說，布蘭達似乎天生就屬於這群愛玩足球、躲避球、爬樹、騎單車的男性化團體，雖然布蘭達剛開始有些不信任海瑟的主動接



近，她最後還是卸下防衛，開始跟海瑟和她的朋友們廝混。「海瑟是我第一個朋友，」大衛說：「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朋友。」

至於海瑟，則是把布蘭達當成不會口是心非、背後捅人的女孩，這些事情過去破壞了她與許多女孩的關係，甚至威脅現在她男性化女性朋友們的和諧。「布蘭達話不多，」海瑟說：「但是當她說話的時候，她從來不會心懷惡意或說謊。她非常誠實，如果她說某件事是黑或白，真相就是如此。」

同時間，海瑟並非對她稱之為布蘭達的「怪異行徑」視而不見。海瑟認為，這一部分是因為布蘭達嚴重的焦慮所致。「布蘭達總是擔心是否應該做一些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例如騎單車穿越大學校園草坪這類我一天到晚做的事。她很憂慮，對自己非常沒信心。」海瑟說，這種焦慮甚至會影響布蘭達的表達：「有時候對她而言，連說一句話都很困難呢。」

關於布蘭達還有一件事情更奇怪。「就我所知，布蘭達是個女生，這就是生理上而言，」海瑟解釋：「但是從她做和說的每一件事情看起來，都擺明了她並不想當個女生。我們這個圈子的其他女生都想跟男生比；我們想證明自己可以做所有男生做的事情。我們想證明給他們看，我們可能會跟男生爭辯，但是我們不會跟他們硬幹，比如說，我就不想在臉上留下瘀青，但是布蘭達會跟男生打架。布蘭達不介意瘀青。」海瑟停頓了一下，想了想，然後說明：「我自己是個男人婆，但是我從來不想當男生。布蘭達想。」

有一天，在學校的遊樂場上，海瑟注意到布蘭達頭頂上有一小塊禿疤。這個無毛的地方是布蘭達還是小娃娃時，遇到一個意外造成的，當時她父親正在煮菜，她因為拉扯鍋子的電線，而被熱油濺到。但是布蘭達卻不是這麼跟海瑟說的。「她說她故意拿熱鍋燙自己的頭來燒掉頭髮，」海瑟回憶：「因為她『想要像個男生那樣光禿禿的』。」

因為她與海瑟的友誼，布蘭達愈來愈察覺到，在班上同學的生活中，潛伏著一個新的危機。她第一次之所以會注意到，是因為不小心聽到一些其他女孩子片段的對話，提到「愛上」、「穩定交往」和「接吻」等等字眼。然後她又看到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老師轉身過去之後，彼此偷偷地傳紙條。有一次她看見一張紙條，那是一張情書，信末簽署許多代表「吻」的「×○×○×○×」記號。

布蘭達在這些發展中，看見了新的困窘和羞辱的可能性，她決定遠遠地躲開這些愈形蓬勃的約會場景。她認為，既然沒有男生對她表示過任何浪漫的興趣，這個對策應該不難維持。然而她很快就了解到，她無法完全避開同儕們正在甦醒的性欲。那年秋天，海瑟帶布蘭達參加同班同學的生日舞會。舞會剛開始時完全正常，因為有壽星的父母親監護，孩




子們都還乖乖地玩遊戲，音響中播放的也是兒童歌曲，但是當大人們一離開到樓下去時，一切都變了樣。

「有個小孩拿掉了那張唱片，滋——的一聲，換了一個求愛的曲子，」大衛記得：「另外一個男生關掉了燈。突然每個人都跳起了慢舞，湊成了一對對。我看著海瑟，海瑟看著我，我們是唯一落單的兩個人。」他們很快地逃下了樓。「但是你還是可以從通風口中聽見。」大衛說：「我可以感覺到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問大衛，當他還是布蘭達時，看見班上同學都成雙成對時，有什麼感覺。他想了一下。「我想是嫉妒吧，」他最後說：「這些人看起來知道自己的歸屬，但是我不管在哪裡、跟誰在一起或做什麼，都覺得不舒服。」

布蘭達漸形升高的疏離感，在她與英格曼森醫師的諮商中清楚可見。英格曼森繼續努力地試著讓布蘭達開口、討論性器官、同意動手術，但是布蘭達絲毫不肯讓步。

「對我的努力沒有反應，」這位精神醫生在和布蘭達諮商了三個月之後，這樣記載：「沈默……看著空中，頭轉了開來……告訴我她感覺被困在辦公室裡，想要出去——或者她感覺被困在自己體內。」



第九章

變性追逐戰



一九七七年夏天，布蘭達忽然必須面臨新戰線的攻防。在前幾次到巴爾的摩的療程中，曼尼博士跟她談過，她很快就要接受能夠成為「正常女生」的治療。他談到雌激素，也就是可以刺激布蘭達寬肩、窄臀的男生體型朝向女性化發展的女性荷爾蒙。對布蘭達而言，長胸部的前景就像陰道手術一樣，也是一個夢魘，因此當她在阿格西道小學上完六年級後不久，有一天她的父親拿了一盒藥給她，要她開始吃時，她起了疑心。

「吃這個是要幹什麼的？」她問。

朗恩努力思索著該怎麼回答，最後終於說道：「它能讓你戴胸罩。」

「我說：『我才不想戴胸罩！』」大衛回想：「我大發脾氣。」

布蘭達對於荷爾蒙治療抗拒之深，從她如何對待溫特(Jeremy Winter)這位負責開處方進行荷爾蒙治療的小兒內分泌科醫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溫特是溫尼伯兒童醫院的教授，當時三十四歲。他是費城著名內分泌學大師邦喬法尼(Alfred Bongiovanni)訓練出來的，而邦喬法尼本身則是霍普金斯威爾金斯的弟子。

從這個學術的譜系來看，也許就不會驚訝在所有的溫尼伯醫師群中，對於曼尼雙胞胎案例的方法或結論，溫特都是最不質疑的一位。在跟布蘭達碰面之前，他完全不認為治療會有任何問題。

「我把圖表拿來，查看所有可得的背景資料。」溫特說：「我讀了《男人女人，男孩

女孩》，而且相信書中所寫的東西。我說：『聽起來很有道理，而且每件事都很吻合。我會見到這個孩子，然後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他指的是讓小孩接受一連串的雌激素治療，並儘快開始進行陰道手術；但事情並未照他所想的那樣發展。

「這很可能是這個診所有史以來，最令人挫折的案例。」溫特說：「我們以病人對我們極度信任為榮，我們能夠坐下來跟孩子們談話，在溫馨的氣氛中聽他們說話；但這個小孩極度地沈默、憤怒，而且一點也不想待在這兒。我問她：『可以幫你驗血嗎？』『不要。』『可以讓我檢查一下嗎？』『不要。』所以我只能一人在那邊唱獨角戲，喋喋不休地宣揚服用雌激素藥丸和接受陰道手術的重要性、它一定會成功、一定會很棒等等，而她也只會用單音回答我。」

根據溫特的說法，布蘭達特別堅持，絕對不回約翰霍普金斯。溫特回憶：「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哪個病人，對於去看另外一個醫生，表現出那樣的態度，也沒看過有哪個病人表現出這麼強烈的情緒。」此時，溫特不得不讓布蘭達試服雌激素藥丸，因為隨著布蘭達八月底就要過十二歲生日，這個需要愈來愈迫切。

布蘭達仍然試著拒絕，但是在溫特、父母親和英格蔓森持續的懇求之下（更別說曼尼曾經灌輸進她腦袋的威脅：如果她不吃藥，四肢就會長得比例失調），她終於在十二歲生日前夕開始吃藥，或者說，開始假裝吃藥。當她父母親沒注意時，她就會把小藥丸丟進馬桶



裡。「我記得那溶解在馬桶裡的粉紅色。」大衛說：「我必須在爸媽看見前趕快沖掉。」然而朗恩和真娜還是很快就逮到布蘭達這樣做，並決定從此站在她前面，看著她把每天的藥服下去——起初是〇・〇二毫克的乙快雌二醇(chinyl estradiol)〔譯註〕，後來又增加到〇・七五毫克。

很快地，布蘭達的胸前長出乳房來，腰和臀也都充滿了脂肪。這些改變帶給她深深的羞辱感，為了要掩飾她日漸女性化的身材，她開始大吃大喝。布蘭達每天吃好幾個霜淇淋，她的腰線很快便直逼四十吋。這些多出來的脂肪，雖然有助於掩飾她的胸和臀，但無論如何狂吃，也無法掩飾那年在她體內加速發生的其他生理變化。「不經意地表達對自己聲音的憂慮，」英格曼森在她九月的療程筆記上寫著：「她開始變聲了。」

布蘭達的聲音戲劇化地突然變沈，連內分泌科醫生溫特也無法解釋這個現象。照理說，布蘭達沒有睪丸（分泌男性荷爾蒙的主要內分泌腺），加上正在接受雌激素治療，就所有醫學規則來看，她的聲音都不應該像男生一樣在青春變聲期對。如今溫特揣測，布蘭達的聲帶和喉嚨會變粗，也許是因為腎上腺的雄性激素分泌量突然增加。不管因為何，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布蘭達的聲音開始變得很像弟弟布萊恩。她問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真娜腦筋動得很快，馬上提到電視情境喜劇《那個女孩》(That Girl) 節目中，嗓音低沈的女星瑪洛湯瑪斯(Marlo Thomas)。「她的聲音也很沙啞呀，」真娜告訴她的女兒：「有些

女孩的聲音就是像那樣，這是很正常的。」

有了這個解釋的護罩，布蘭達那年秋天到新學校開始上七年級。葛林伍初級中學 (Glenwood Junior High) 是一所公立的大學校，離家走路只要大約五分鐘。布蘭達立刻被發配到葛林伍社交生活的最邊疆，在一群適應不良份子的湊合堆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些人包含了一個女中性人、一個因為右腳比左腳短上七、八公分，而穿著複雜金屬腳架和訂製鞋的人，還有一個名叫伊瑟 (Esther Haselauer) 的女生。伊瑟深受波蘭氏症候群 (Poland's Syndrome) 所苦，這是一種妨礙生長的先天缺陷，她有一隻手部分萎縮，右胸則完全停止發育。伊瑟記得她當時立刻感到自己與布蘭達很相似。

「她很難親近，」伊瑟說：「但我和她有相通點。那是……我不知道，是一種悲傷吧。她讓我想起自己。」同時，伊瑟了解她們之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事實上，可以說是在布蘭達和她認識的所有其他女生之間都有的差異。「布蘭達不是個女性化的女生。」伊瑟說。甚至，跟布蘭達在一起，喚起了伊瑟內在一種感覺，很奇怪地，好像是跟相反性別的人在一起的感覺。「那是一種安全感，」伊瑟說：「當我跟布蘭達在一起的時候，我感覺好安全。其他小孩會因為我長得這麼矮小而欺負我，但是當我跟布蘭達在一起的時

〔譯註〕為婦科治療常用的合成雌激素。



候，如果誰敢找我的麻煩，她就會讓他們吃不完兜著走。」

大衛說他很感謝伊瑟的友誼，但是兩人之間的差異，讓他們無法親近。「她老是在談論男生。」大衛說。問伊瑟布蘭達是否曾經表示想跟男生談戀愛時，她笑了。「噢，才不呢！」她說：「那簡直令人無法想像，就跟只有一百二十公分高的我要參加籃球隊一樣無法想像。」

布蘭達開始上七年級的六個月之後，英格蔓森醫生接到一封曼尼博士索取進度報告的信。曼尼的信來得特別不是時候，就在兩天之前，英格蔓森和利馬一家人才進行了一次糟糕的會商。她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的心理會商筆記清楚地顯示，自從布蘭達在溫尼伯開始治療的十四個月以來，她對手術的抗拒完全沒有減少。她把冬天外套的帽子拉起來、手臂交叉在胸前、一句話都不說。當被迫對手術發表意見時，她終於大哭起來，而大人們只能在一旁無助地看著。「她的父母和我都說不出話來。」英格蔓森在筆記上這樣寫著。會商很快就因而結束。

英格蔓森在回信給曼尼時，此景仍然清晰在目。她解釋，當地團隊除了成功地讓布蘭

達服用荷爾蒙之外，在這個案例上可說是毫無進展。「關於手術，無法擬定任何計畫，」她寫著：「也沒有進行任何概括性的討論。」她又補充說，布蘭達仍然「抗拒醫療」，而且「仍然拒絕別人檢查她的生殖器官」。

曼尼如何看待這封信，別人不得而知，他的回信是由祕書代勞的，而且很簡短。「曼尼博士要我寫這封信，謝謝您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來信報告布蘭達·利馬的進展。我們非常開心接到來信。」這就是短箋的全文。

曼尼對於這個案例的觀點，很快便在同年稍後英國出版的《性行為之生物決定因素》(B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Sexual Behavior)的一章中，有更多的陳述。在這本關於性別認同的論文集中，他再次營造出一片光明的景象。論文集中有一張布蘭達和布萊恩的全頁照片，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到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時拍攝的，照片中他們倆並肩站在白色背景之前。布蘭達穿著一件燈籠袖短花洋裝，長頭髮整整齊齊地垂掛在肩上；布萊恩穿著男孩的短袖襯衫和深色牛仔褲，頭髮剪得很短，露出雙耳。他們的臉被兩個大黑點遮住，只露出相似的雙頰、下巴和眉毛。旁邊的圖說暗示，黑點之下的兩個小孩都開心地微笑著。「如今正值青春期，」曼尼寫著：「這個女孩有……女性的性別認同和角色，跟她的弟弟完全相反。」

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現，在這個最新的證據中，比較看不出變性後的雙胞胎有樂觀的



預後報告。在同一篇章裡，曼尼還針對女性在母體子宮內暴露於過多睪固酮之下的影響，闡述了他所作的進一步研究。曼尼如今揭示，應該有理由認為，這樣的暴露不僅會造成遊戲喜好、玩具偏好和職業目標的男性化（一如他和安赫特十一年前所報導的），也會影響其他行為。「早先的證據點出了這個可能性，」曼尼寫道：「〔這些女孩是〕雙性戀和同性戀的比例，比隨機取樣的更高。」

曼尼著名的變性雙胞胎個案，在出生前完全浸淫在睪丸所製造出來的睪固酮中（其量為正常女性胎兒所接觸的十倍），這項事實很可能會讓部分讀者以為，當他屆臨青春時期，多半就會對女性顯現性趣；但是針對布蘭達性取向這個最重要的議題，曼尼卻聲稱，對於她未來的性伴侶偏好，自己無法冒險作出任何學術上的預測（也許曼尼忘了自己向朗恩和真娜提過布蘭達的同性戀傾向）。他對布蘭達的性別認同總結道：「蓋棺論定的證據，還要等到浪漫興趣和性幻想出現以後，才能揭曉。」

在布魯斯變性為布蘭達之後的十一年期間，她當地的醫生團隊中，沒有任何一位親自跟曼尼當面討論過這個個案。但是在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溫特受邀前往約翰霍普金斯醫學

院生殖生物研討會 (Reproductive Biology Seminar) 發表演說。既然到了巴爾的摩，溫特便安排跟曼尼會談。他們四月四日在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碰面。溫特仔細地向曼尼描述了當地團隊在執行曼尼對布蘭達的計畫時，所碰到的極大難題：她仍然拒絕別人檢查她的性器官；甚至拒絕討論陰道手術；拒絕回巴爾的摩；經常拒絕服用荷爾蒙藥丸。根據溫特的說法，曼尼博士完全不關心他所提到的問題。

「他非常有自信，」溫特說：「認為一切都完美，沒有任何問題。我的擔心都是因為我太太真和年輕，假以時日，我一定會了解，根本沒有問題。」

曼尼自己關於這次會面的記載，也確認了溫特的印象。曼尼自信地提到，布蘭達終將會有能夠「為她自己（的手術）協商決策」的時候；還提到自己相信，布蘭達「對白袍和醫生的強烈恐懼」，只反映出她對八個月大時割包皮意外的深層記憶；以及「我強烈地懷疑，布蘭達已經知道她曾經有過陰莖，而且可能被視為男孩」。然而，這個懷疑並未削弱曼尼對布蘭達很快就同意動手術的深信不移，她甚至很可能會在約翰霍普金斯動手術。如同他的筆記所顯示的，曼尼也告訴溫特，布蘭達「強烈拒絕談到任何關於性的議題，或是看任何性教育的書」。根據溫特的描述，曼尼給他看過一些性教育的素材：「他給我看他用來測驗布蘭達是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的照片，全是些淫穢的黃色圖片。」

雖然溫特對曼尼似乎不關心他所提出的問題感到不安，又對曼尼給他看的素材感到困



擾，他還是為這次拜訪感到鼓舞。那是一種安慰，因為這位舉世聞名的性別認同專家並不覺得布蘭達的抗拒，對這次變性的最終勝利，會造成什麼無法克服的障礙。那也是一種安心，因為曼尼這位世界首屈一指的變性權威，已經為當地團隊的做法背了書。「我等於是一個資淺的生手向一名專家請益，」溫特說：「所以我很開心能得到一些保證。」

但是布蘭達對於約翰霍普金斯和手術的抗拒之深，很快就讓所有相關的人看清這項事實，特別是曼尼。一九七八年五月二日，亦即溫特巴爾的摩之旅後的一個月，利馬夫婦帶著布蘭達和布萊恩回去跟曼尼博士作諮詢。布蘭達對這次回診抗拒得很厲害，後來還是朗恩和真娜用順道去紐約旅行當賄絡，她才答應。但是，即使有曼哈頓作為包裹苦藥的糖衣，這趟旅程對布蘭達來說還是太過痛苦，以致她從此不肯再去巴爾的摩。

這次諮詢的幾個禮拜之後，曼尼寫了一封信給溫特，從中很清楚可以看出，在這趟旅程中的確發生了重大的事情。曼尼說明：「布蘭達比上次來這裡談得更多。」又說：「她跟我兩個選修的學生相處得特別融洽。然而，她直接了當地表明，不願提到性、與性相關的議題，以及未來的手術……她無法容忍繼續談論這類話題，跑到另外一個房間找她弟弟。我跟了出去，並要在結束這次諮詢時，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會把這視為一種安慰的舉動，但是她卻發瘋似地跑掉。一個學生跟著她，幫助她恢復鎮定。她們去散步，沒什麼交談，大約走了一英里。」在這封聽起來省略許多細節的突兀信件結

尾，曼尼提到這個學生是個「女生」。他沒說的是，這個女生原本是個男人，她是個從男變女的變性人，是曼尼找來向布蘭達說明陰道重建手術諸多好處的人。

利馬家這趟到該中心的旅程，一開頭可說是再典型不過，也就是說，布蘭達表現出強烈的焦慮、憤怒和沮喪，而且所有這些情緒都反映在要她填寫的完成語句測驗(Sentence Completion Test)上。布蘭達這樣寫著：「相較於大部分的家庭，我家是……」「失敗的。」「我認為大部分的女生……」「不是很好的人。」「我相信大部分的女人……」「也不是很好的人。」「我對婚姻生活的感覺是……」「爛透了。」「如果我有性關係……」「我不會喜歡的。男生要親我也一樣。」「對我來說，未來看起來……」「很糟。」

但是直到曼尼博士把那位變性人介紹給她時，布蘭達典型的沮喪，才變成全然的、深深的恐慌。

大衛回憶：「曼尼博士說：『我介紹一個人給你談談，她經歷過你將會經歷的所有事情。』」布蘭達被引見給一個她立刻認為是化了妝、穿了女生衣服、梳著女人髮型的男人。當那個人一說話，聲音是充滿了氣音的虛假高八度音調。「他告訴我手術的事情，」大衛說：「他說手術對他來說有多棒，他的生活變得多美好。」

布蘭達坐著一動也不動，沈默不語，似乎在聆聽，但是字字句句到了她的心裡，卻激起了狂亂而逐漸升高的恐懼。「我在想：『我將會變得像那個樣子？』」大衛說。



當變性人說完了，就帶布蘭達回到曼尼博士的辦公室去，他正坐在書桌前等她。布蘭達坐在他書桌旁的扶手椅上，變性人則坐在旁邊的沙發上。曼尼這次會面的手稿，記錄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如果你不想，你可以不必接受性器官的手術，」曼尼說：「你也可以隨時改變想法，決定要作，不管是二十幾歲、三十幾歲，或是更老的時候。但是從現在開始，你夠大了，可以自己簽署手術同意書，沒有人可以強迫你動手術。事實上，如果你不想吃藥，也沒有人能夠勉強你。你很清楚這一點，因為你只要撒謊說你有吃就行了，對不對？」

曼尼博士繼續像這樣說了大約十分鐘，一下子試圖示好、表示支持，一下子又語帶威脅、飽含怒氣。他說沒有人應該讓布蘭達覺得被壓迫，但是他自己卻無情地試圖說服她動手術。他談到她的「性別認同」，說她除非有性別認同，否則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然後他又提到手術，提到「女人的性器官」。

布蘭達試著搭腔，但是曼尼博士說他想要告訴她「一個很好聽的故事」，是關於一個「生來性器官有缺陷」的病人的故事。曼尼開始談論「陰蒂」和「陰莖」。布蘭達再度試著插話。「讓我說完。」曼尼粗魯地打斷她。重拾平靜後，他又繼續說，就像布蘭達，那個病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一再拒絕討論性取向。曼尼說他從這個病人身上學到，不要強迫小孩談論困擾他們的事情。然而同時，曼尼繼續逼迫她說話。「我要你知道，我是世界

上唯一一個你可以傾訴任何事情的人，因為我不會對你大吼大叫，」曼尼說：「我也不會說你瘋了，我只會聽你說話、幫助你、告訴你答案。你可以跟我說所有的事情。」

當曼尼終於閉上嘴，布蘭達只問了一個問題。

「你說完了嗎？」她說。

「我們結束了。」

布蘭達站起來快步走向曼尼辦公室門口。曼尼和那個變性人走近她，變性人提議要帶布蘭達上五樓去，兩人單獨相處一下。曼尼博士把手伸向布蘭達，她感覺這位心理學家的手指牢牢地抓住了她的肩膀。布蘭達以為他們要把她拖向手術房，於是掙脫了曼尼的掌握。如今大衛記不得他是怎麼跑出曼尼辦公室的。「我記得是用跑的，」大衛說：「只有這樣。」

「我聽見門碰地打開了，」布萊恩說，他當時坐在接待室中等待：「呼的一聲，布蘭達一下子就跑掉了。跑得飛快。我聽見曼尼在大叫，又看見一大群穿著實驗室白袍的人在後面追她。」

真娜和朗恩當時正在附近另一間辦公室接受訪問，聽到這陣騷動，都跑到走廊上來。「曼尼博士跳了起來，」真娜說：「他跑去追人，我們跟他的助理則留下來等待。」

布蘭達盲目地狂奔到階梯前，又瘋狂地拾級而上，最後來到了屋頂。變性人也跟了上



來。布蘭達蹲在一堆圍繞在屋頂周圍的矮磚圍牆旁，想要躲起來。大衛不記得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而變性人（她的名字在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記錄中被塗掉了）的說法是，布蘭達因為她緊追在後，就跑下四層樓梯，從醫院後門衝出去，跑到一個停車場。她找遍了整個醫院，然後突然看見布蘭達跑到大門口。她又追了過去，卻再度失去布蘭達的蹤影。

變性人到櫃檯打電話到曼尼的辦公室，告訴他追蹤的結果後，便躲在出口旁守株待兔。布蘭達兩分鐘後出現了，變性人在她走向這道門時攔下她，提議陪她走一段路，讓她心情平復下來。布蘭達答應了，但前題是兩人不准靠近，也不能交談。「我們走了一段路，」變性人的筆錄繼續寫道：「布蘭達在我身後保持一公尺多的距離。」就在這種奇怪的配位下，布蘭達和她的準心理治療師默默地從醫院走了八條街遠，然後再走回來。

在她們回來的途中，在門口碰到路易絲(Viola Lewis)，她是該中心少數幾位布蘭達稍微還信任的工作人員之一。路易絲陪這個小孩走到附近的喜來登大飯店(Sheraton Hotel)，大家要真娜和朗恩在這兒等布蘭達回來。

終於回到和父母弟弟共住的飯店房間後，布蘭達告訴真娜，如果再強迫她來見曼尼博士，她就要自殺。



第十章

永別約翰霍普金斯



利馬一家人從巴爾的摩一回到溫尼伯，就發現自己又面臨了和女兒有關的新危機，雖然這一次的事件並不是直接跟布蘭達本身有關，而是跟她當地的治療團隊成員們有關。幾個星期以前，英格蔓森已經因為懷孕而停止跟布蘭達的療程和診所的營業，並把布蘭達轉給另一位精神醫師肯朵(Shiela Cantor)。肯朵是一位積極直率的女士，她對布蘭達的看法和當地治療團隊其他人大相逕庭。肯朵在看過布蘭達的醫療記錄和兒輔中心報告，並與布蘭達和她父母諮詢過一次之後，便突然向利馬夫婦宣稱，布蘭達的變性很不幸地是個失敗，而且這個孩子必須立刻變性回男生才行。

西蒙森說，這樣的坦率是標準的肯朵(現已死於癌症)行為模式：「她是一位很好的精神醫師，但是對她所接觸過的所有事情都主見太強，以致會讓人敬而遠之。」肯朵顯然也嚇退了利馬夫婦。他們仍然深受曼尼指示的牽絆，不敢對治療有任何懷疑。

平常話不多的朗恩開口了。「我先生非常生氣，」真娜記得：「他說：『首先，我們必須確定她自己想當男生，不能只是假設。』他還無法接受布蘭達無法當女生的事實。」真娜也不行。溫特醫師也是。在利馬家與肯朵的爭執中，溫特選擇站在利馬家這一邊，然而如今溫特以暗示的方式承認，當初肯朵對布蘭達狀況的判斷是正確的，只是策略錯誤。「在醫學上，即使你得到對的答案，」他說：「但遊戲規則仍然是你必須等別人趕上你、認同你，如果不這樣做，即使最好的計畫也無法成功。」

有了溫特的支持，朗恩和真娜轉而向西蒙森求助，要求他把肯朵撤出這個案子。西蒙森照辦了，但也因此陷入嚴重的困境。他已經試盡了該市三位最資深的女性精神醫師，而且他也決定還是得把布蘭達交給女醫師來治療，以便增加她的女性認同，但是這麼一來，西蒙森的名單裡已經沒有適合的女性了。

當醫師們一邊為這個個案的未來而努力時，另一邊布蘭達已經決定好自己面對難題的對策了。當布蘭達那年秋天在葛林伍初中開始上八年級時，伊瑟注意到，她的朋友身上有了顯著的改變。通常布蘭達只穿牛仔褲和T恤，一點妝也不化，但是顯然夏天裡發生了一些事。

「我記得她走進教室，」伊瑟說：「穿著搭配好的方格條紋土色褲裝，頭髮梳過，擦了口紅、腮紅和眼影，還帶著一個手提包。很明顯地，她努力她想當個女生。」

布蘭達的確是如此。在她最後一次前往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慘痛經驗之後，布蘭達開始深信，要避開手術的唯一方法，就是盡其所能地玩這個遊戲。她要演好一個女生的角色，讓每個人都相信她很開心，如此一來，她推想，他們也許就不會逼她動手術了。誰知道呢？也許他們都是對的，也許如果她真的努力當個女生，她就會開始覺得自己是個女生。就像大衛說的：「我決定乖乖合作。我真的拚了命地去做。我非常不開心、不舒服。我覺得笨拙極了，但是面對壓力，我只有拼上全力。」



對朗恩和真娜以及當地醫療團隊的成員而言，布蘭達那年秋天的行為原先帶給他們無上的喜悅。「父母發現她這一年對上學有興趣多了，」社工道寧(Downey)九月初在布蘭達兒輔中心的檔案上這樣記載著：「而且她很顯然有跟其他女生一起去逛街。」這趟當地百貨公司之旅，事實上是布蘭達的老師貝莉(Mrs. Bailey)建議的。她私下把比較有同情心的女生叫到一旁，請她們幫布蘭達的衣著妝扮打點一下。通常布蘭達的母親會幫她化妝和穿衣服，但真娜最近找到一份停車場服務員的工作，每天很早就得出門，因此布蘭達必須自行打理。若非如此，布蘭達是不可能畫著不得體的妝、穿上那套和朗恩一起去逛街時自己挑選的土色褲裝去上學的。

「那套褲裝並不好看，」伊瑟說：「腮紅則像是在兩頰畫了兩個圈圈。她看起來還比較像個小丑。」

大衛同意：「我記得這些女生看了一眼我穿的樣子，就說：『我們得帶你去逛街！』」她們去逛哈德森灣的百貨公司，女生們找遍了專櫃，最後幫布蘭達挑了一件女性化的藍色高領毛衣，和一條名牌牛仔褲。放學後，真娜下班回來，布蘭達又問母親，該怎麼改變自己笨拙、像士兵那樣大步邁開的走路方式——從幼稚園開始，這就是同學嘲笑她的原因。真娜向布蘭達示範怎麼用頭頂著書練習平衡、挺直脊椎、縮小步伐。「真不自然，」大衛回憶道：「我一下子就僵硬了。但是既然大家都期望你這樣走路，我只有努力試試

看。」

葛林伍初中每星期五晚上在學校的體育館都有舞會，每個孩子都會去，布蘭達也去了。「我會穿上我中性的迪斯可服（牛仔褲加高跟馬靴），然後告訴爸媽：『我要出去忘掉憂慮和麻煩。』」但是布蘭達發現，她的憂慮和麻煩在學校舞會上並未散去。體育館迴盪著洛史都華(Rod Stewart)的歌聲〈你認為我性感嗎？〉(Do Ya Think I'm Sexy?)

大衛說：「我大部分都跟女生跳，而且是四、五個人一起跳。」但是布蘭達也有跟男生跳過。「人家期待我跟男生跳，所以我就跟男生跳。」大衛說：「我會問男生：『你要跳舞嗎？』然後他們都會看著你，」——他鼻子皺了起來——「然後說：『不了，謝謝。』」然而有些時候，男生還是會答應陪布蘭達下場。「有時候是快舞，」大衛說：「有時候是慢舞。」在男孩臂彎裡在舞池中旋轉，布蘭達很痛苦地體認到，這感覺顯然完全不對，非但沒有任何浪漫的火花，只覺得尷尬和痛苦的不自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大衛記得，一個全校女生偶像之一的九年級男生，因為一堆女生在取笑她而幫她解圍，並開玩笑地親了她。「他很快地在我臉頰上啄了一下，」大衛說：「我回家後想了想，我想：『感覺不太對。我不喜歡這樣，我應該要喜歡才對，但是感覺就是不對。』」

布蘭達一直在諮商療程中表達這樣的疑惑感覺，但卻總是被精神醫師忽視。「那些精神醫師和心理學家一直說，這些都是『正常的困惑』。」大衛說：「你覺得不只如此，但是



別人不斷告訴你的想法是什麼。只有你最清楚自己在想什麼，可是如此一來，卻讓人感覺自己更瘋狂。」

儘管如此，布蘭達仍然堅持著。那年秋天，一群女生邀請她參加睡衣舞會。「有人偷偷帶了瓶酒來，」大衛說：「我一點都沒喝。我假裝有喝，把酒瓶放進嘴裡，但是用舌頭頂住瓶口，所以一滴都沒喝到。每個人都在談男生——『你喜歡誰』這一類的，所以我說：『噢，好啦，我喜歡這個人或那個人。』我指的是，同性戀還沒出櫃的時候怎麼辦？假裝自己是異性戀呀！像別人一樣照規矩行事嘛。跟別人一樣，別人就會對你一視同仁了。」

對布蘭達來說，很明顯地，她跟屋子裡其他人的感覺都不一樣，特別是當別的女生開始準備上床的時候。

「有個女生在我面前脫衣服，」他說：「我非常尷尬，把頭轉向另一邊。她說：『沒關係，你不用害羞，你是我們的一份子。』她給我看她的胸罩，然後問我：『你覺得好不好看？』我說：『我不知道，看起來很漂亮；我喜歡那個蕾絲。』我坐在那裡，臉色通紅，覺得自己好像是窈窕奶爸〔譯註〕(Mrs. Doubtfire)。」問到他有這麼多半裸女子相陪，有沒有其他不自覺的生理反應時，大衛笑了，並用一個比喻回答我的問題。「如果你失去手臂，」他說：「而且快要渴死，你剩下的一截斷臂還是會朝向裝水的杯子移動，想要拿

水喝。這是直覺，就深藏在你的身體裡。」

然而布蘭達現在的生活，卻必須否認、壓抑和隱藏所有直覺，不管是在舞會、聚會、教室或街上。「我好像是機器人，」他說，並如此描述他當時每天、每分、每秒苦苦挨著的生存作戰遊戲：「你小心翼翼地讓自己看起來正常，但是卻不願意再多走一步。你告訴自己，現在似乎是微笑的適當時機，所以你微笑；現在是交叉雙腿的適當時候，所以你交叉雙腿。你在走每一步之前永遠要先思考，就像在下棋一樣。」

但是這盤棋，布蘭達注定會輸。除了那些少數遵守老師吩咐對布蘭達好的女生之外，大多數的同學繼續嘲弄她、取笑她。「很可悲。因為好像她愈努力，就愈失敗，」伊瑟說：「嘲弄她的情況愈來愈糟。」

在布蘭達八年級折磨她的人當中，包括當地一位歌星的女兒——既受歡迎又漂亮的荷德斯頓(Wendy Holderston)。她記得布蘭達是個「醜小鴨」、「男人婆」、有著「深沈聲音和非常深凹的眼睛」，這些特色讓布蘭達冠上「洞穴女」的稱號，而這個別名馬上被全班同學採納。剛開始布蘭達試著要用「淑女」的方式接受大家的嘲弄，但有一天她終於受不了

〔譯註1〕一九九三年由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主演的電影，他在片中陰錯陽差扮演女人，在心愛女人面

前必須極力掩飾自己真實的生理反應。



了。大衛記得，她在學校的走廊上堵住荷德斯頓，捉住她襯衫的前襟，把她摔向鐵櫃，再踹到地上。嘲笑布蘭達的男生也遭到類似的待遇。「這事布蘭達總讓我印象深刻，」伊瑟說：「她真的會跟那些作弄她的男生打架。她會把他們拖開，然後痛揍他們。我一直希望自己也可以這樣做。」

當大衛回想起自己布蘭達時代，修理那些嘲笑她的男生的習慣時，他則是多了些悲傷：「這樣做只會讓大家更覺得我是個怪物、更排斥我而已。」

還未到十一月下旬，兒輔中心的檔案中，早先關於布蘭達社會和學校生活的樂觀註記已經消失無蹤。「她在班上沒有朋友。」道寧十一月二十七日如此記載著。更驚人的是，布蘭達也顯現出令人擔憂的智力退化徵兆，急劇下降到一種無助、幼稚的倒退狀態。「她無法拼出星期幾或月分，」道寧在布蘭達的檔案上記載：「五年級的拼字對她來說都太難，她被編入四年級。她還沒學會班上的例行工作……她要等其他同學幫她開儲物櫃的數字鎖，因為她記不住自己的號碼。」

大衛記得他的無助所帶來的羞辱。「當你經歷我所經歷的事，學校功課對你來說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他說：「你最不在乎的事就是考試。你想的是要如何生存。」兒輔中心的奈比絲用同樣的語彙描述布蘭達的艱難處境。「那是生存問題，」她說：「必須掙扎著度過每一天、每一刻。」



利最高的穀類公司理查森(Richardson's)工作，但是家中向來缺乏自省和公開表達溫情的習慣。「她的蘇格蘭背景跟精神醫學並不搭調。」蘿德門(Evelyn Loadman)說。蘿德門於一九三四年首次結識麥肯蒂，兩人都是曼尼托巴有史以來攻讀醫學的女性先驅。「但是小麥恰好是那種非常體貼易感的人。直到她開始思考自己的特質之後，才終於理解她的人生使命。」

在一九四〇年早期，麥肯蒂在溫尼伯兒童醫院的第一份工作中，她擔任兒童精神醫師的獨特天分便開始顯現。麥肯蒂並未特別深究病人潛意識裡那些受保護的領域，相反地，她會把自己當作小孩，跟他們玩遊戲，鼓勵他們素描、畫圖或寫字。小孩因此被誘哄進入一種分神的專注狀態，反而能夠藉由文字或行為顯示自我。蘿德門回憶，麥肯蒂的無壓力策略，讓她產生神奇的特質，能夠解決病人不正常的行為，如尿床、扯頭髮等其他治療師無計可施的症狀。「她是兒童醫院中唯一真正曾經治好病人的精神醫師。」蘿德門的聲音中帶著一種不敢置信的語氣。

麥肯蒂在一九六〇年晚期受雇於剛成立的溫尼伯兒童輔導中心，並且很快就因為成功地輔導了最難纏的病童，而建立起名聲。事實上，當西蒙森在一九七六年末第一次接到布蘭達這個棘手又複雜的案子時，他首先就想把她交給麥肯蒂，但是麥肯蒂當時剛割除乳房，正在復元中，並考慮要退休，所以婉拒了。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西蒙森因為無法找

到其他女醫師願意接布蘭達的案子，而再次找上她。了解到西蒙森有多著急，麥肯蒂終於答應接下這個案例。

朗恩和真娜立刻就喜歡上這位冷靜的祖母型精神醫師，而布蘭達因為實際需要，則顯得比較小心。

一方面，布蘭達深受麥肯蒂吸引。她喜歡這個精神醫師說話時親切、口語的聲音，以及不那麼常作筆記的習慣，也喜歡她和麥肯蒂諮商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玩對奕遊戲，或是素描、畫圖或說繞口令等等。有時候麥肯蒂會丟下一個問題，問布蘭達覺得如何；有時候她也的確會在筆記上寫一些東西，但是麥肯蒂做起來感覺就是不一樣。「她會寫下一些東西，」大衛回憶：「然後我就說：『噢，你又在寫東西了——你在監視我，對不對？』然後她就說：『噢，才不是，親愛的，我要寫下來，這樣才能確定我們所有該做的都做了，這樣我才能幫助你呀。』」

然而另一方面，布蘭達卻無法完全相信麥肯蒂，因為她必須保持高度警覺，以防這位精神醫師的友善，也許不過是要騙她去作手術的更惡毒詭計。麥肯蒂的筆記顯示，布蘭達用了一堆策略來檢驗麥肯蒂的友誼是否真誠。她畫了一個很醜的麥肯蒂給她看，拿診所的玩具槍挾持麥肯蒂「當人質」，還開了一張「麥肯蒂死亡證明」。這位精神醫師都沒有拒絕。她仔細地保存了布蘭達那張醜陋的素描，甚至合作地在下面簽上自己的名字；被挾持



當人質那次，她讓自己被布蘭達用槍抵住，在辦公室裡遊行；在布蘭達開的死刑執行書上，她也盡責地在布蘭達留下的空白處，填上該死的自己的重要數據資料。

「我在測試她，」大衛說：「而她通過了測驗。」布蘭達放棄了她的激怒策略，開始真正地期待和麥肯蒂進行心理諮商。「我們不是醫病關係，」大衛說：「那是真正的友誼。」

布蘭達那時特別需要朋友，因為一個曾經存在的強敵又將重新出現在她的生活中。那一年一月，布蘭達向麥肯蒂告白，她偷看了母親的信件，發現曼尼博士寄來一封信，說他要來溫尼伯。他受邀到當地一家醫學院演講，因此計畫拜訪布蘭達和她的家人，而麥肯蒂寫道，布蘭達怕死了這次拜訪。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麥肯蒂記錄著，隨著曼尼預定的造訪日漸接近，布蘭達的恐懼逐漸升高。一月三十一日她跟麥肯蒂說，她做了一個有關曼尼博士、她弟弟和她自己的惡夢。「曼尼博士是一個穿著披肩的魔術師，」布蘭達告訴麥肯蒂：「他說他可以把我們變不見，撲的一聲，就像這樣。我醒來，以為我們都消失了。」為了表示同情布蘭達的害怕，麥肯蒂說，當曼尼來的時候，布蘭達沒有必要一定得見他。她們一起設立了一個「不見曼尼俱樂部」，麥肯蒂在會員名單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布蘭達也加上自己的簽名，並寫下「加入我的俱樂部吧！」幾個字。但是一個月後，距離曼尼造訪不到兩個星期時，布蘭達又

做了另外一個夢。「我穿上時髦的藍洋裝，也穿上最好的鞋子，」她告訴麥肯蒂：「但是裙子破了，因為太緊了。一切都已經清理乾淨，地板也刷過，好像有什麼大事要發生。附近有一個衣櫃（我們家也有一個類似的衣櫃），我很害怕，因為好像我可能會被關進衣櫃裡。」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那個星期，屬於溫尼伯的灰色季節之一。天氣在晚冬和早春之間停滯，厚厚的積雪不消，染上了車輛開過的黑跡，天空也是石灰的顏色。朗恩開著他的道奇車(Dodge)到該市的健康科學中心(Health Sciences Center)去接曼尼博士（他剛在那兒作完演講）。朗恩懊惱地看著骯髒的積雪，他本來期望天氣比較好，能讓曼尼對這個城市印象好一點。

在利馬家，真娜對曼尼對這次造訪溫尼伯的觀感，特別是對他們家的觀感，同樣感到十分焦慮。他們兩年前搬到這個新家，花了兩千多元整修。真娜對於她只花這些錢就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平常一向感到相當自豪，但如今，她重新從曼尼的角度審視這裡——對她來說，曼尼是她見過最有美學素養的人了。「我們搬進來時，房子裡本來鋪著一張老舊的



金色地毯，」真娜說：「我們把它清過了，但是看起來還是髒髒的。牆也很久沒粉刷了。我們還有一張廉價長沙發、一張老舊的土色沙發，中間還有一條橘色的線跑出來。」

真娜聽見車子停在門前車道上的聲音時，處在相當害怕的狀態，然而當曼尼博士從前門踏進利馬家簡樸的客廳時，他似乎特別努力表現出友善的態度，對映入眼簾的一切都接納認同。如果在曼尼心中，記憶停留在他最後一次看到利馬一家人的時候，亦即去年春天糟透了的巴爾的摩之旅，他也沒有表現出來。當然，朗恩和真娜很努力地想把這件插曲拋諸腦後。

真娜說：「他就像個朋友，或是伯伯，離開了好一陣子，如今來拜訪。」曼尼博士稱讚朗恩自製的牆櫃，又讚美了真娜掛在牆上的鋼筆畫作。當時雙胞胎則溜到地下室去，不願意上來見曼尼博士。

大人們坐在餐桌上，朗恩拿了瓶啤酒給曼尼。喝了朗恩給的加拿大淡啤酒後，曼尼放鬆下來，講著他在紐西蘭鄉下的童年故事。他說他曾經在那兒看過火球，還有那裡常常發生地震，所以他母親不得不拿繩子綁住廚房櫃子，以防酒瓶在震動中掉下來。曼尼談到家鄉流行的黑啤酒，還問朗恩溫尼伯有沒有賣。

今天朗恩或真娜都無法記起，為什麼當天曼尼博士原本只是計畫順道拜訪一兩個小時，最後卻在他們那兒過夜。真娜記得曼尼看了看時鐘，然後宣稱他錯過了班機；朗恩則

認為，也許曼尼回巴爾的摩的班機因為大雪而取消了。無論如何，一旦曼尼確定要留下來，朗恩和真娜出於禮貌，便邀請他睡在他們家，雖然他們只有一張墊子能擺在客廳讓他睡。讓他們意外的是，這位偉大的心理學家接受了他們的邀請。朗恩打電話訂了一桶炸雞塊招待這位意外的訪客，孩子們則繼續躲在地下室，直到父母逼他們上來。

在客廳氣氛尷尬地碰過面後，曼尼問雙胞胎學校生活好不好。回答的是布萊恩。對於他們學校的成績，他給了一個不痛不癢的答案，然後就問曼尼博士喜不喜歡這個城市、要待多久等等。「然後，」布萊恩說：「我們就想離開。」但在他們逃回地下室之前，曼尼拿出了他的皮夾，一邊說反正他本來也要把錢花在旅館上，一邊賞給他們一人十五元，雙胞胎才一溜煙跑到地下室去。他們之後沒有再露過面，直到第二天曼尼離開到機場去，他們才出來。這是利馬一家人最後一次和曼尼見面。

然而，這卻不是這個城市最後一次聽見曼尼的消息。在他走後，《溫尼伯自由報》接連兩天都有介紹曼尼在該市大學造成客滿的人類性欲會議(Human Sexuality Conference)演說。該報第一天以醒目的大字當作標題：學生與醫生辯論性演練價值。演說者道德價值被質疑。根據報載，曼尼因為放映了很多不尋常性行為的圖片，而讓部分學生很不舒服。事實上，放映幻燈片是曼尼標準演講內容的一部分，以便讓醫科生對各種性變態「不那麼敏感」。他在一九七一年把影片引進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課程時，就已經引起巴爾的摩當地報



紙的高度爭議。這些影片中清晰可見人們在從事獸交(Bestiality)、喝尿、吃糞和各種斷肢癖的性行為。根據該報報導，在他溫尼伯演說的第二天，曼尼也放映了一部五男三女的群交影片。放完後，他發表演說，告訴台下的教授和一年級醫學生，婚姻不過是經濟合約，是「心隨荷包走」的結果；近親亂倫不該被視為罪行；而在繼父和繼女發生性關係的案例中，母親通常是「開心的」，因為她「很高興（先生）不再煩她。」

馬丁(Robert Martin)是曼尼托巴大學精神科的臨床心理學家，他也去聽了曼尼的演說。「他是那個時代風格的代表人物，」馬丁說：「他喜歡發出驚人之語，扮演魔鬼代言人，非常傲慢、非常自信。他的態度儼然以『啟蒙蠻荒之地』的人自居，他自信滿滿，因而讓人完全不會起疑，而且他給人一種可能會全神專注於任何議題的印象。他不是那種你會忘掉的人。」

同樣聽了這次演講的資深記者懷梭(Steve Whysall)同意這種說法。他先前曾在倫敦艦隊街〔譯註2〕(Fleet Street)工作，當時是《自由報》的醫藥線記者，為該報作了一篇曼尼挑起爭議的訪問報導。「我一直從事相關報導，以為我看過和聽過的都不少，」他說：「但我很驚訝這個〔性題材〕是用那種方式呈現。」懷梭特別訝異的是，曼尼提到像吃糞這一類奇異性癖好時，那種刻意的神態自若。他在演講完後，跟曼尼作了簡短訪問。「我問他：『你是要告訴這些準醫生們，如果他們碰見來找他們的病人有那種要求或狀況時，他們不應

該大驚小怪囉？」懷梭說，曼尼不願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他假裝他很驚訝我識見這麼狹窄、這麼像清教徒。」

由於利馬家沒有閱讀《自由報》的習慣（他們比較喜歡看八卦報《論壇報》，而該報並未報導這個事件），他們並不知道這位在他們家過了一晚的客人所引燃的爭議。布萊恩倒是剛好看見曼尼的到訪引起一些媒體的興趣，因為當他看電視時，他看見第九頻道的CKND有一些曼尼博士的新聞，但是那畫面一閃而過，布萊恩沒有聽見報導的要點。

緊接在曼尼博士造訪溫尼伯後的日子裡，布蘭達跟麥肯蒂的諮商開始有了長足的進步，彷彿布蘭達終於從麥肯蒂會與巴爾的摩醫生串通一氣的最後一丁點懷疑中解脫出來。四月四日，復活節家庭聚會剛結束，布蘭達全身女性裝扮地來和麥肯蒂會面，她穿著黑色立領上衣、戴著紅寶石項鍊，還擦了眼影。當麥肯蒂稱讚她的外表時，布蘭達卻否認她有化妝。下一次諮商時，布蘭達聲稱：「我討厭洋裝。我只在喪禮和婚禮時才穿。」麥肯蒂

〔譯註2〕為英國報社重鎮所在。



五月四日時寫著：「布蘭達給我看她的手提包和裡面的東西，有母親給她的梳子、眼影、唇膏和腮紅。但是她開心地說：『我討厭那些東西。』」

六月八日的諮商，可說是布蘭達至今心理治療最戲劇化的分界點。這不尋常的遭遇，可以從麥肯蒂筆記的頭一句話中清楚看出。「不想玩任何遊戲，」麥肯蒂寫著：「很快就開始問一些關於她醫學狀況的問題。」這是布蘭達逃避醫學專業十年後，第一次主動提到她的性器官和別人不一樣的事實。布蘭達告訴麥肯蒂，她父親如何解釋有一位醫生「犯了一個大錯」。麥肯蒂問布蘭達，她自己認為發生了什麼事。

「我以前以為，」布蘭達說：「是我媽媽把我兩腿之間打成這樣的。」

麥肯蒂立刻告知西蒙森布蘭達的說法。兩位精神醫討論後，一致同意布蘭達對於母親的說法，似乎神祕地符合了心理分析的核心教條，亦即佛洛伊德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理論這個被認為標明每個人性心理分化成是男是女的發展階段。

伊底帕斯情結是以希臘悲劇裡不自覺地娶母弑父的悲劇英雄命名。佛洛伊德認為，所有的小孩，不管男女，在嬰兒最初期都會依戀母親，這種依戀會讓他們和父親爭寵，以贏得母親的溺愛。佛洛伊德推論，在男孩身上，伊底帕斯情結之後會被「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取代；而在女生身上，佛洛伊德說，伊底帕斯情節則會產生「陽具欽羨」(penis envy)，相信自己的陰莖被閹割過，亦即她曾經擁有陰莖，但卻被父親或母親去勢了。

在正常的女性發展上，佛洛伊德認為，女生想要重新獲得陰莖的欲望，會使得她把嬰兒時期對母親的性欲轉移到父親身上，藉著和父親發生性關係，來取回失去的陰莖，並經由這個形式，形成她「正常的」異性戀性取向。在佛洛伊德的觀點中，心理治療主要是要治癒病人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正常解決童年期出現的伊底帕斯情結，因而造成的心理疾病和失常。根據心理分析的理論，解決的關鍵步驟，就是要面對最初的閹割焦慮，把它說出來，而當布蘭達描述自己幼時恐懼是母親傷害了她的性器官時，顯然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

同時，西蒙森也承認，他被迫要考慮對布蘭達的說法作出另一種詮釋，不只要考慮到布蘭達強烈男性化行為的怪異現實，還必須認知到布蘭達生下來是男生，有正常的陰莖和睪丸，只是被去掉了（至少有一部分是在母親的授權下）。考量這些因素，布蘭達的話可以被視為不只是伊底帕斯式的宣告，而是比較具象的，亦即一個年幼小孩對於自己性器官慘狀，以及內疚的母親不時發作的抑鬱，所作出雖恐怖但情緒上符合邏輯的解釋。這樣看起來，布蘭達對麥肯蒂的說法，不能看作是她即將接受自己是個女生，而是相反的：她理解到早年擔憂被母親去勢的恐懼並不正確，如今她知道自己真正發生了什麼事。這也許是一種徵兆，暗示她已經到了應該擁抱那個她本能上一直知道的男兒身的時候了。

不管哪一種詮釋才是對的，西蒙森和麥肯蒂現在都相信，布蘭達的治療，已經到了一



個關鍵時刻。

那年六月發生的事情，也把真娜帶到一個關鍵時期。當她得知布蘭達的說法時，她十分震驚。她原來已經對女兒有著難以承受的悔恨和歉疚，而這最新的發展，更加令她難以忍受。「我很驚訝，」她說：「我無法相信布蘭達認為我會做這種可怕的事。我在想，她把我當成什麼樣的母親，會對自己的孩子做這種事。」

今天，真娜已經無法記得這件事是否削弱了她對整個實驗的信心，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那年六月，她和朗恩很快就面臨到平常要開始計畫前往約翰霍普金斯接受年度諮商的時刻。曼尼博士最近才剛跟他們聯繫過，要他們趕快約定七月的回診日期，但當七月來臨時，真娜和朗恩並沒有依約前往巴爾的摩。當布蘭達焦慮地問真娜，她們是不是計畫夏天要回去約翰霍普金斯時，真娜用一個同時也在問自己的問題答覆她。

「去對我們有好處嗎？」她問。

「沒有。」布蘭達說。

「那我們就不要去。」真娜甚至沒有聯絡曼尼博士取消約會。利馬一家就這樣不曾現身，而且從此以後也不曾再回去過。



第十一章

水落石出



當秋天來臨，布蘭達再度與麥肯蒂醫生進行心理治療時（像其他大多數精神醫生一樣，麥肯蒂也休暑假），布蘭達告訴麥肯蒂，她過了一個很無聊的暑假，只有在家裡看看電視與送送報紙。她一反常態，對於將到一所新學校開始上課這件事，感到特別地興奮與期待。去年春天，麥肯蒂醫生及當地其他性治療團隊成員，已和朗恩及真娜討論過將布蘭達從一般學校轉到職業學校的可能性，讓她至少學會一項技藝。朗恩及真娜意識到，布蘭達永遠都無法成為一位學者，於是也同意了這項計畫。而布蘭達本人更是特別熱中，她告訴麥肯蒂醫生，她想成為一個汽車維修人員，但這份工作唯一的缺點是，「沒有人會雇用一個女孩子來修他的車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布蘭達十四歲，她開始到位於溫尼伯另一頭雜亂不堪的城西工業區裡的魯賽爾職業學校（R. B. Russel Vocational School）上九年級。這所學校的簡介上都是令人愉悅的校園畫面，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大衛說，這所學校號稱要幫助有行為偏差或家庭問題的學生（據稱有些十來歲的女學生早已在兼差當妓女應召），但其實整個校園不過就是一棟覆蓋了許多塗鴉的冷峻水泥建築物。

這所學校的新生訓練週十分嚴峻，在這一週裡，布蘭達被高一年級的學長姊選為「新鮮人皇后」。她領取二十五元獎金的那天，必須依照指示，穿著最好的衣服——一件有著蓬蓬袖與滾著縐褶蕾絲領邊的長禮服。稍後她又得知，如果不與「新鮮人國王」跳舞，便無

法領到她的現金獎品。她的皇家舞伴是個理著小平頭、表情痛苦的矮小駝背男生，他們兩人起身在全校師生面前共舞。大衛說：「我只差沒暈死過去。」

這件事對布蘭達是另外一個轉捩點。那年九月，她在魯賽爾職業學校開始上課後，她開始掌握自己的性別和命運，不再過著女生的生活。她不再作前一年在葛林伍初中的裝扮：穿有領毛衣、戴垂環吊飾，或是手拿皮包。她開始穿著雙肘磨破的男用粗布夾克、骯髒且褲管也磨破的條紋花布長褲、一雙麥肯蒂醫生說的「男人的皮手套」，以及厚重建築工人穿的馬靴。她不再洗頭髮，讓頭髮糾結成塊，她的聲音也變成像如今大衛一樣低沈而響亮。身材上，她的情況一如麥肯蒂在她筆記本上形容的，到了「連陌生人都會轉頭注視」的地步，然而近一點仔細觀察，布蘭達的心理狀態更引人深究與同情。從布蘭達這一時期的照片看來，儘管她一再嘗試微笑，她的眼神仍然像一隻被困的動物。

「那是她生命中最糟的時刻。」西蒙森說：「魯賽爾職業學校把很多事情在短時間內壓縮進學生的小腦袋裡，如果布蘭達讀的是其他比較文明的學校，孩子比較有時間慢慢培養能力來應付那些遊戲。在別的學校，學生喊她『洞穴女』；在魯賽爾職業學校，學生則是看著她、直接對她說：『你他媽的簡直是隻猩猩。』」

儘管眾多同學粗魯野蠻地刺激、嘲弄她，布蘭達仍然拒絕改變。「我才不要像女孩子那樣好笑地走路。」她對麥肯蒂如是說，還跳起來，嘲弄地學著女孩子走路的样子。「裝



模作樣地碎步走路，」麥肯蒂記載著：「彎著臂膀兒並翹起小指。」布蘭達選修了一門家用電器修理課，成了魯賽爾職業學校開這門課十二年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選修的女生。這門課的老師泰勒(Hillel Taylor) 剛開始也擔心，一個女孩子要如何跟班上一群男生相處，但是他的恐懼很快便減輕了。「布蘭達就是有辦法跟這群男生平起平坐。」泰勒說，他一直不知道布蘭達的病史：「我可以想像她這樣子的女孩去從軍之類的模樣。我記得學校的校長和其他相關的人，如諮商指導老師等等，都問過類似的問題：『她適應得如何？』』她跟那群男生處得怎樣？』」泰勒跟他們形容，布蘭達適應的狀況仿若「就是他們的一份子」。

朗恩與真娜並不滿意布蘭達的表現，但布蘭達完全不在意。「我剛好處在開始叛逆的年齡，」大衛說：「我變得非常厭惡別人告訴我要做什麼。我到了人生的某一點，知道自己是個怪人，而且願意過著像怪人的生活。如果我想要頭髮一團糟，就會讓它一團糟。我想要怎樣穿衣服，就會怎樣穿。」

布蘭達有著更多私密的叛逆方式。從童年起，她就被父母及曼尼博士教導要坐著尿尿，儘管她有著強烈的欲望，想要站著面對馬桶尿尿。自從她在幼稚園被同學發現站著尿尿後，布蘭達便一直試著控制自己不再犯，而她也沒有再被捉到過。「但如果沒有有人在身旁，我仍然會站著尿尿。」大衛說：「對我來說，站著尿比較容易，我常想，怎麼尿有什

麼差別呢？」對魯賽爾職業學校的同學來說，差別可大了。有一天，布蘭達被逮到像男生般站著尿尿，自此之後，她就不准再出入女生廁所。她試著偷溜到男生廁所去，卻被踢了出來，而且被警告說如果再去的話，就會被狠揍一頓。在無處可去之下，布蘭達淪落到只能偷偷溜出去，到學校附近的後巷去尿尿。

正因為如此，有一次布蘭達又偷溜出去尿尿時，她發覺到在後巷的屋舍之間，有輛車子在那兒繞來繞去。她注意到那輛車是出租車的車牌，而坐在駕駛座的人似乎正在看她。她拉起褲子的拉鍊，立刻離開，但這輛車子卻跟著她。然後她發現坐在駕駛座的人拿起照相機對著她照。

「我跑著回學校，」大衛說：「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怎樣。我懷疑他是不是記者。你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你在美國見過那些重要人物，所以很有可能記者會想看你，但你不知道為什麼，或者為什麼他那麼想要拍到你的照片。」

早在布蘭達發現有人要偷拍她照片的八個月前，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就對曼尼有名的雙胞胎案例十分感興趣。BBC《地平線》



(Horizon) 節目系列的得獎紀錄片製作人葛溫(Edward Goldwyn)，在一九七八年末開始著手製作有關性別認同的影片。葛溫是個具有科學背景、不屈不撓的記者，他找尋了所有的相關題材，走遍全世界找專家訪問，足跡踏遍多明尼加共和國、東德、洛杉磯、紐約以及倫敦。在他走訪各地的同時，無可避免地多次聽說曼尼著名的案例，這個案例仍然被認為是最強有力的明證，足堪印證性別認同的形成，後天教養多過於先天本性。然而，當他與其他專家討論到這個實驗時，葛溫卻很訝異地聽到許多雜音，說這個案例並不完全像曼尼作品中所呈現的那樣。

「我看到巴爾的摩有些人因為曼尼和這個案例在文獻上的重要性而感到困窘，」葛溫說：「我可以看出這些人愈來愈擔心。」他們要求葛溫在和負責雙胞胎案例的醫生談過之前，不要太強調這個實驗的重要性。根據他拒絕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葛溫得知小孩是由溫特負責治療。

葛溫在一九七八年年底聯絡溫特，告訴他自己正在製作一部有關性別認同的紀錄片。

「我對有人要為娛樂性的電視製作這種影片，感到疑慮重重，」溫特說：「所以剛開始，我的態度非常冷淡。」但葛溫很快就對溫特展現出他的誠意，把所有讀過與研究過的内容都給他過目。「他完完全全讓我改觀。」溫特說。葛溫減低了溫特的疑懼，並開始詢問他有關雙胞胎的事。溫特無法精確記得他使用過的字眼，不過他說他的確讓這名記者領

悟到，這並非一個成功的案例。「至少，我很確定我有說：『聽著，我並沒有把這個案例看得太過認真，因為事實上，這個小孩的心理調適狀況是相當不同的一回事。』」

葛溫很想知道究竟有什麼不同，溫特的回答卻讓他大為震驚。「他告訴我，要不是麥肯蒂，這個孩子早就自殺了。」葛溫說。

一九七九年一月，葛溫甚至親自拜訪利馬家。二十年後，利馬家沒有一個人記得這次拜訪，不過這倒是有理可循的。葛溫因為急著想去看看這家人，但又不想讓他們發現自己的事情已被記者得知而受到打擾，於是他想出了一個接近他們的計策。他拒絕明確地說出自己採用什麼藉口，但他說：「我大概是問他們可否移一下車子，因為他們擋住了我的路這一類的理由來進入他們家。我想，我是有點不道德，但我認為對我來說，親自到他們家看一看是非常重要的。」他說，朗恩和真娜是「看起來很焦慮、很孤單的人」，而布蘭達確實看起來雌雄難辨，而且「我認為她是個非常非常憤怒的人」。總而言之，這個家庭一點都不像曼尼在他《性的特徵》書中所描述的明亮畫面。「我發現這個案例並不是個很好的資料，因為曼尼的研究實在不能證明什麼。」葛溫說：「我覺得我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把它從我的影片中全部抽掉。唯一要放進來的理由只是要貶低它。」

雖然作了這樣的決定，葛溫還是與在BBC製作一個更具爭議性節目的同事談到了他的發現。獨立作業的電視新聞記者威廉斯(Peter Williams)近來剛跟BBC簽約擔任製作總



監，製作一個新的節目系列，名為《公開秘密》(Open Secret)，旨在揭發醫學醜聞。威廉斯對葛溫說的曼尼著名案例很感興趣，並要求另一名獨立記錄片製作人史密斯(Martin Smith)來導演拍攝有關這個案例的半小時影片。

一九七九年九月底，威廉斯和他的太太裘(Jo Taylor)、史密斯以及一小組BBC電視台工作人員到達了溫尼伯。就在他們抵達後的幾天之內，麥肯蒂醫生知會了西蒙森，告訴他布蘭達在學校附近巷子裡，發現有人要拍她照片的奇怪事件，而西蒙森立刻便警覺到，記者已經耳聞布蘭達的棲身之處。身為該診所精神病學部門的負責人，西蒙森面對媒體非常有經驗，於是他答應會應付這些記者。

「在那個時候，」西蒙森說：「我心中對這個〔變性事件〕應否發生，已經有了十分明確的懷疑。我想，當時我真的很想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西蒙森同意，唯有在保證絕不讓利馬一家人曝光的情況下，才願跟記者談這件事情。他要求記者必須親筆簽下同意書，同意不在電視上播出拍攝到的布蘭達照片、不再進一步捕捉她的畫面、省略掉所有當地治療人員的名字，以隱藏利馬家人的所在地，而且，這個節目不可以在加拿大或美國販售。威廉斯與史密斯同意這些條件後，西蒙森答應於九月三十日在家接受訪問。

西蒙森雖然以不具名的精神醫生身分受訪，但在面對BBC的攝影機時，他仍然看起來非常緊張。他一直瞄著放在大腿上的筆記本，描述從布蘭達第一次來到兒童輔導中心，

就已經深深困擾她的「明顯心理問題」。他繼續說明布蘭達男性化的外貌、在學校的困境，以及無法與同儕維持友誼的狀況。只有當威廉斯問到變性的預後時，西蒙森才停頓了一下，經過了好幾秒，才再開口說話。

「我那時停了那麼久的時間，」西蒙森說道：「是在想是否真的要告訴他們實情，或者只要敷衍了事就好。那畢竟是霍普金斯，而曼尼仍然是一代宗師。」當西蒙森最後回答時，他小心翼翼地選擇所使用的字眼，就像踮著腳尖走過滿布地雷的區域一般。

「我不認為所有的證據都蒐集完全了，」西蒙森如此開場：「也許我們必須等她成為一位年輕人時，才能明白這個特殊案例的所有事情。但是，此時，她有些行為確實讓我非常懷疑，她是否真的能夠調適成為女人。」

布蘭達的前精神醫生墨姬也同意接受採訪。「我覺得必須這麼做，」墨姬說：「一定要有人站出來說，這個故事並不像在文獻上所呈現的那麼成功。」在鏡頭裡，墨姬描述她在布蘭達這個案例中所面對的困難，並且很詳細地描述了她如何以書信告知曼尼博士這些困境。

朗恩和真娜從麥肯蒂那兒得知BBC已經到了溫尼伯的事情，而麥肯蒂本身拒絕了製作人的採訪。

真娜回憶：「她打電話來說有些記者要來看我們。」麥肯蒂告訴她，他們不一定得接



受訪問，但是朗恩認為不需要拒絕——只要不拍他們或錄音就好。那時，朗恩和真娜仍然相信曼尼博士的治療一定會奏效，而且認為他們的證詞或可幫助其他有類似困境的父母。「我們太深陷其中了，」真娜說：「我已經被洗腦，無法再相信其他的事情。」

在利馬家的客廳裡，威廉斯與他老婆裘詢問布蘭達的治療成效如何。「我說我仍然覺得很有希望。」真娜回憶。記者們開始詢問關於西蒙森與墨姬對於布蘭達在校表現與社交生活的觀察。氣氛轉變，真娜開始哭了起來，而朗恩也陷入典型的沈默憂鬱中。記者們要求見見布蘭達，於是真娜把她從外頭叫了進來，並且跟她介紹，這些英國人是一家詩文雜誌社的編輯，他們想發表真娜的詩作。

布蘭達身穿撕破的牛仔褲與磨損的夾克外套，未洗的頭髮在臉旁糾成一團，昂首闊步地走進客廳，並用她低沈的聲音不自在地打了聲招呼，然後很快便消失了。她的外表似乎讓這些記者印象十分深刻。

「當布蘭達離開房間時，」真娜說：「那個女的站了起來，說：『我們一定得報導這個真相！』她似乎非常地生氣。」

BBC工作人員接著動身前往巴爾的摩。數週以前他們通知曼尼，告訴他他們正在製作這個雙胞胎的影片。「剛開始曼尼表現得非常樂意，也非常有興趣參與這件事。」史密
斯說，但這是在他知道記者們在溫尼伯的調查結果之前。

威廉斯與史密斯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傍晚抵達曼尼家。曼尼二十五年前離婚後，就從郊區搬到這個離約翰霍普金斯只要步行幾分鐘的地方，那是巴爾的摩近市中心的多塵地區，直到現在他仍然住在這裡。「這不是個你會認為一位在學術或科學領域上極有名望的人會居住的地方。」史密斯說。曼尼就住在一個十分破爛的轉角小店樓上。威廉斯與史密斯通過有三道誇張門鎖的前門後，也同樣地對曼尼家的室內擺設感到吃驚——曼尼用和辦公室一樣的面具、圖騰與性的加工品來裝飾他家。曼尼本人則非常地好客——至少剛開始是如此。

「他一些成年學生也在那兒，」史密斯說：「我們很隨意地在爐火前喝酒閒談，準備預定隔天要作的訪問工作。」

這些記者那時企圖向曼尼透露他們記錄片的整個內容，「我們認為這個案例非常地有趣，」史密斯記得自己是這麼說的：「所以我們想將它拍成記錄片，可是——」

「我們必須警告你，」威廉斯記得此時他插進話說：「我們已經聽說了一些有關這件事的其他說法。」

史密斯告訴曼尼，他們已和這個小孩的精神醫生談過，但事情並不像曼尼發表過的文章上所描述的那樣。「這時，我認為可以很持平地說，曼尼變得異常地生氣與憤怒，」史密斯說：「我想他感到自己被逼進了角落，但事情並不是他想的那樣。事實上，我們相當



有技巧地告訴他，我們是在製作影片之前，跟小孩的精神醫生們聯絡的。」

但曼尼很顯然並不感激這些新聞工作者精心安排事情的禮貌。「他的憤怒很可能是因為他覺得這個小孩子被調查過，或是處於險境，」史密斯繼續說：「也很可能是認為有人竟敢挑戰他研究的個人憤怒。我不曉得是哪一種，但我們彼此的關係很明顯地改變了。很快地，我們就被請出了門外。」

那天晚上，有一通電話打到溫尼伯的利馬家，那時真娜和朗恩已經上床了，真娜起來接了電話。那是曼尼博士從巴爾的摩打來的，而且他非常驚惶。這通電話的內容被保留在隔天麥肯蒂的筆記本裡，是由真娜詳述給麥肯蒂聽的。曼尼提到一些「不知名人士」，但「很有可能是BBC的一位史密斯先生」以及另一個人——「葛溫先生的一個朋友」。曼尼胡謔說他的檔案可能已被偷走，以及記者已經多多少少知道布蘭達的下落。

「他全然嚇昏了，」真娜說：「他說：『不要跟任何記者談話。』」此時真娜別無選擇，只好老實告訴他，她和朗恩兩人已經和BBC的一男一女談過話了。

曼尼不悅的程度可從隔天他寫給當時BBC電視台總監庫朗爵士(Sir Charles Curran)的

信中看出來。在說完他與威廉斯和史密斯之間事情的緣由後，曼尼語帶威脅地告訴庫朗：「我十分期望你能夠基於B B C道德與法律上的義務，詳細地審閱這個節目的內容，不要侵犯這個家庭的隱私權，因為這個家庭目前特別經不起隱私受到侵犯。我毋須說明，我純粹是想要保護這個家庭，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們，如果他們的隱私未受到適當的保護，假使B B C的報導對他們造成任何的傷害，我會建議他們依循法律途徑，請求應有的賠償。我相信事情不需要發展到這種地步。」

但B B C站在威廉斯與史密斯這一邊，記者們也因而得以繼續進行最後階段的報導：試圖找到一位可以評論他們調查結果重要性的科學家。有個名字一直被提及，那就是十四年前，曾經第一個質疑曼尼的結論，因而引發曼尼震怒，並且之後在杜布羅尼克的性別認同研討會上，與曼尼發生衝突的科學家。

「當我們與戴蒙博士聯繫時，」史密斯說：「我們很顯然陷入了一場所謂的科學之爭，而這種爭戰可以是非常血腥的。」的確，有鑑於曼尼與戴蒙長期學理交戰的記錄，B B C的記者們剛開始還有所保留，猶豫是否要讓戴蒙評論這個案例，害怕他所表達的意見可能無法反映出客觀的科學觀點。「你必須很慎重地分辨，這到底是不是私人恩怨？」威廉斯說：「我很滿意，戴蒙事實上提出了在道德倫理上讓他深感擔憂的事情，至於他是否喜歡曼尼，那則是另一回事。」



戴蒙說他並沒有特別不喜歡曼尼。對於六年前他們之間的口角，他早就不以為意，只把它當成科學家常有的怪癖，或者也許是在杜布羅尼克雞尾酒會上喝太多酒的結果。甚至在那次聚會之後，戴蒙也曾經試著與曼尼聯絡。「我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曾經多次詢問過曼尼有關雙胞胎的事，」戴蒙說：「但是他根本不想談論它。他說那個小孩正經歷與變性無關的一些困擾，現在並不適合去打擾她，所以我就沒再跟他提過這件事。」

但是戴蒙認為發展正常的嬰兒不可能變性的信念，卻從來沒有動搖過，而且他也毫不遲疑地發表這個看法，最近的一次，就在BBC與他聯絡之前的幾個月。在《性學研究前線》(Frontiers of Sex Research)一九七九年那一期中，戴蒙就引述了這個案例，並說以曼尼目前所發表的資料來看，似乎只是教養重於天性學理動力的「助燃料」而已。戴蒙還警告（在今日看來似乎有不尋常的先見之明），「到了青春期的時候，這個陰莖被切除的小孩，極有可能會反抗自己被扶養的方式，因為那與這小孩與生俱來的生物遺傳相衝突。」

戴蒙同意接受訪問，背景是在一個俯瞰大海的岩石懸崖。威廉斯問道，如果這個小孩顯現出「嚴重且持續不斷的」問題時，對這個領域會有什麼影響。戴蒙說：「我想這必須看你是問誰。相信（這個案例）的人，幾乎已經形成了一個宗教團體。」他繼續說，如果結合所有醫學、外科手術以及社會的努力，都無法讓這個小孩接受女性認同的話，「那麼也許我們真的必須想一想，或許每個人生理構造上確實有某些重要的因素存在；我們來到

這個世界時，並不是中性的，在我們出生時，或多或少帶著某種程度的男性化或女性化，這是社會無論使出多少力量，都無法超越的。」

這個記錄片被定名為《第一個問題》(The First Question，意指嬰兒出生時，舉世皆然第一個會問的問題：「男孩還是女孩？」)，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在英國播出。這部片子令人印象深刻地清楚綜觀了這個案例所牽涉的複雜情況，同時也嘗試平衡報導曼尼的研究。這個節目訪問了一位曼尼中性研究對象的母親，她的小孩出生時是XY男性基因，但陰莖很小，生殖腺也尚未降下，最後採納了曼尼的建議，動手術變成女孩子。這個小孩博拉(Paula)八歲時，可說是很成功地以女性性別生活著。然而這個節目對於該理論更重要的案例，亦即出生時發育正常的雙胞胎，也同樣毫無隱瞞，認為這個案例似乎瀕於失敗。

威廉斯和史密斯原本期待他們的節目能夠引起廣泛的爭論與評論，但是事實卻不然。「反應異常地沈默，」史密斯說：「我很驚訝平面媒體記者並未繼續追蹤這件事。」戴蒙同樣也感到困惑，不了解這個記錄片為何不能引起廣泛的迴響，或得到美國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之類的後續報導。

戴蒙決定將BBC的發現，傳達給北美的醫生知道。他在一篇短文中記載這個記錄片的報導結果，並寄給美國科學期刊《性行為彙刊》。這篇文章標題為「性別認同、以不同性別角色扶養長大的同卵雙胞胎，以及BBC的追蹤報導」(Sexual Identity, Monozygotic Twins



Rearing in Discordant Sex Roles and a BBC Follow-up），於該刊一九八二年專輯中刊登。戴蒙在這份報告中，引述西蒙森與墨姬關於布蘭達問題的評語，同時也提到西蒙森對布蘭達是否可能調適為女性的懷疑。戴蒙提及這個案例的其他潛在問題，以及眼前明顯的失敗，又補充說：「至於這對雙胞胎的案例，很遺憾的是，竟然有這麼多理論與哲學架構建立在這個單一、沒有控制且無法確認的案例上。更加遺憾的是，我們身在美國，卻必須依賴英國新聞記者的醫學追蹤，來調查這件原先出現於美國文獻，且已被大肆報導過的案例。」

當這篇文章發行時，戴蒙非常沮喪地發現，反應和記錄片播出後一樣冷淡。有些女性主義學者悄悄地將雙胞胎的案例從新版的女性研究教科書中刪去，學術界、科學與醫學圈對於這項發現也出奇地沈默。「他們選擇忽略，」戴蒙說：「因為那不是他們想要聽到的。」

就在布蘭達在學校附近的巷子裡，看到一個神秘男子拿著照相機偷拍她之後，接下來幾個禮拜裡，她在與麥肯蒂治療訪談中，對於拒絕當女孩子這件事，變得愈來愈坦白。她抱怨布萊恩因為不會經常被嘲諷，所以可以交到更多朋友；她埋怨弟弟可以跟別人打架，

也不會被人視為怪胎。「而女孩子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生小孩。」她說。

在學校，布蘭達明顯的男性化，引發同學更多的揶揄、辱罵與威脅。有一天，在耶誕節前不久，她被一位同班同學持刀威脅。大衛說：「我告訴媽媽：『我不要再去那間學校。我會逃走。』」真娜支持布蘭達的決定，麥肯蒂安排了一個私人家教給布蘭達上課，並由政府支付費用。

遠離了魯賽爾職業學校同學對她的嘲諷與威脅，布蘭達在家繼續以語言、穿著與行為表現她的男子氣概。真娜一直希望，布蘭達的行為只是一時的過渡階段，並繼續在女兒身上尋找女性化特徵的蛛絲馬跡。「只要發現任何一點點的特徵，我就會高興得飛上了天，」她說：「我誤解了許多她做的事情。」

大衛記得在這段期間內所發生的一件事。布蘭達在櫃子裡找到一雙她媽媽的黑色手套，「這雙手套裡面摸起來很舒服、很柔軟，」大衛說：「我便把它們戴上。它們使我想起在電影中看過的那些很酷的義大利賽車選手手套，我還在想，開車的時候時可以用它們把方向盤握得很緊。突然之間，我發覺到媽媽就站在身後，我轉身，看見她在對我微笑，然後說：『拿去吧，如果你想要戴上它們，只管拿去。』她以為，我在試著要表現得女性化。」

當冬天來臨時，真娜發現要維持這樣的幻想，已經愈來愈難了。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多年之後，她覺得這個夢正代表著她對女兒所有的壓抑。在夢裡，真娜正在拜訪



一個女人，這個女人的男朋友才剛剛搬出去。這個女人精神渙散地打開了車廂，然後畢恭畢敬地拿出一個鼓漲的陰莖。「她把它捧給我，就好像是捧著個金磚，」真娜回憶：「然後她說：『這是我可以追憶他的東西。』」

那年冬天，真娜開始覺得自己又回到全家人四分五裂、旅居英屬哥倫比亞省時那種一度吞噬她的絕望情緒。一月末，她的精神醫生朵普(Nona Doupe)認為她陷入嚴重的憂鬱症，並且再度會威脅到她自己的生命安全。朵普醫生把真娜送到維多利亞醫院(Victoria Hospital)治療，一待就是一個月。出院後不久，真娜再度被絕望圍繞，而利馬家的生活也變得一團亂。對布蘭達而言，她媽媽持續在她身上尋找女性特徵，已經令她無法忍受；而對真娜來說，身穿男生衣服、頭髮雜亂不堪的布蘭達仿若一種無言而難以忍受的責難，抗議著十三年前朗恩與她所作的決定。三月初麥肯蒂的記錄上，記載了布蘭達的怨言：「無論她做什麼事，都無法取悅她的母親，而且母親老是批評她、對她大吼大叫。」幾天後，混亂達到了最高點。

「她叫我去清理冰箱，」大衛說：「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但她仍然不滿意。我大叫：『我已經盡全力了！』」她把一盒燕麥片往我臉上丟過來，我把它丟回去。她要打我，我就抓住她的手並把她推開。媽媽說：『我要去告訴你爸爸！』」

朗恩推說他很累，遠離了這場戰火，然後將電視打開，並且為自己倒了杯酒。真娜認

為，他們家又要陷入當初坐困哥省的致命模式。她打電話給麥肯蒂，而麥肯蒂關於這次談話的筆記，註明了這個家庭此時陷入的混亂局面：朗恩喝了不計其數的威士忌；真娜和布蘭達兩敗俱傷；而布蘭達和布萊恩也公開宣戰，時常爭吵打架。

此時，麥肯蒂與當地治療團體的其他成員再也無法忽略明顯的事實：在他們執行曼尼博士計畫將近四年之後，布蘭達和家人的情況卻愈來愈糟。溫特博士是唯一一位仍然懷抱希望的醫生，他認為布蘭達未改造完成的陰道外表，是妨礙她心理上接受自己是女孩的主要阻礙。長期以來，他一直是贊成手術的最大擁護者，可是現在，連他也開始躊躇不定了。「先前，我曾經……催促及早動這個手術，」他在一封給麥肯蒂醫生的信中如此寫著：「但是現在，我卻不確定這是個好主意。對於何時適合開刀，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特別的計畫與意見。」

最後，布蘭達終於讓這位內分泌科醫生完全束手無策。三月中旬，她跟溫特在他的辦公室會面。她拒絕脫下醫院的病服接受胸部檢查。醫生又問了她一次，她仍然拒絕，兩人持續對立了二十分鐘之久。「這就好像到了你人生中的臨界點，你想到：『我已經受夠了！』」大衛說：「每個人都有他的限度，而這就是我的極限。」

溫特博士也到了他的極限。「你到底想不想當女孩？」他要她回答。

這是自從布蘭達懂事以來，曼尼博士就不斷問她的問題，也是多年來，當地治療團隊



不斷拿來煩她的問題。這個問題布蘭達已經聽過太多遍了。

她抬起頭，然後對著溫特的臉大聲咆哮：「不想！」

令布蘭達驚訝的是，溫特並沒有生氣，他只是離開了辦公室幾分鐘。當他回來時，他告訴她：「那好，你可以穿上衣服回家了。」

後來布蘭達才得知，溫特是在走廊上跟麥肯蒂醫生談話。他告訴麥肯蒂，在他來看，這個青少年應該要知道自己是誰，以及自己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在布蘭達每週與麥肯蒂醫生會面過後，通常是朗恩開車去接布蘭達回家，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那天下午也不例外，唯一的不同是，當布蘭達坐進車內時，朗恩說他們先不直接回家，而是去買霜淇淋吃。

布蘭達馬上就起了疑。「通常家裡發生某些重大災難時，好老爸才會開著家裡的車載你去買霜淇淋什麼的，」大衛說：「所以我就在想，是媽媽快死了？還是爸媽要離婚了？布萊恩還好吧？」

「不是！不是！」朗恩對布蘭達一連串緊張的問題直回答：「一切都很好。」

一直到布蘭達買完霜淇淋，朗恩將車子開上了住家的車道，他才找到適當的用字。

「於是他開始一步一步地，對我解釋發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大衛說：「他告訴我，我出生時是個男生，他告訴我當他們試著割我包皮時所發生的事，以及他們如何找遍各種專家，如何採納當時最好的建議，也就是將我完全改造過來。爸爸變得非常沮喪。」這是布蘭達第一次看見爸爸哭。然而她連一滴眼淚也沒掉，只是眼光直直地穿過擋風玻璃看著前方，霜淇淋也融化在她手裡。

「她就坐在那裡聽我說，非常安靜。」在父親與小孩之間這場不尋常的靜默對峙幾乎過了二十年之後，朗恩說：「我想，對於我所告訴她的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方夜譚，她大概非常地震驚。」

今天，大衛說那個祕密的揭露，喚醒了他內心許多情緒，包括憤怒、不相信與驚愕，但是其中一種情緒凌駕了其他所有情緒。「我感到如釋重負，」他說：「突然之間，我的感覺都說得通了。我不是什麼怪人，我不是瘋子！」

布蘭達確實有一個問題要問她爸爸。這個問題關乎她出生後受到祝福的那前八個月，關乎她生命中曾經擁有、或許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段毫髮無傷的歲月。

「我那時候叫什麼名字？」她問。



第十二章

還我男兒身



布蘭達馬上決定要回歸到她的生理性別。「當我十八歲時，我要變成我想要的樣子。」她知道事情真相後的第一次療程，就如此告訴麥肯蒂：「我要從女生變回男生。」問題是，要如何不讓別人閒言閒語。她想消失到溫哥華去一陣子，然後再以男生的模樣回來待在利馬家，但這個計畫有個明顯的缺點。「我看起來很像布萊恩，」她告訴麥肯蒂：「別人終究會看出來。」之後，布蘭達又提出另一項更為惱人的問題：她一輩子都被訓練成舉手投足要像個女孩子、要隱藏她的衝動與感情，當她顯露出自己的本色時，布蘭達擔心父母親不知會如何看待她。「如果我和女孩子出去，」她問麥肯蒂：「他們會怎麼說？」

一個半月之後，利馬家參加了一場大規模的家庭聚會，慶祝真娜最小的弟弟訂婚。布蘭達因為還是社會公認的女生，別無選擇地仍須以女孩子的樣子出席聚會。她穿上洋裝、紅色的鞋子與絲襪，化了妝，還披上一件非常時髦的仿貂皮白色短外套。這件外套是真娜為了這個場合特別買的，也許算是他們孤注一擲，最後一次想要誘導布蘭達以他們選定的性別姿態出現。但是，布蘭達既然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要她再以女孩的樣子在公眾場合展現，對她而言簡直是天大的侮辱。她曾經發誓在三年內一定要變性，現在則將期限往前挪。「兩年內，」宴會隔天她就告訴麥肯蒂：「我想要看起來像個男孩子。我要留鬍子。」

在接下來的會談中，布蘭達又把變成男孩子的期限再往前移，她現在就想變成男孩。

她告訴麥肯蒂，她已經開始為自己想男生的名字，但是她並不想回復出生時的名字——布魯斯，因為她覺得聽起來像「怪人和畸形人」。她想了兩個名字，一個是「喬」，她喜歡它不虛偽、不矯揉做作的感覺，是個凡夫俗子會取的名字。另外她也想叫自己「大衛」，靈感來自聖經中屠殺巨人的國王。「它讓我想起這個面對逆境，」大衛說：「面對兩米四高巨人的。它讓我想到勇氣。」

布蘭達把最後的決定權留給父母，而他們選擇了「大衛」這個名字。朗恩說，要改過原來叫這孩子布蘭達的習慣，並不是一件難事，自此之後，他不再不小心將大衛叫成布蘭達。其他人也是如此，他們發現，改叫布蘭達為大衛，比預期中容易多了。大衛的家教楚蒲(Dorothy Troop)說，剛開始知道這個改變時，她很緊張，但當大衛第一次來上家教課時，楚蒲卻發現，他的男性化一點也不會構成他們之間的障礙。以前的布蘭達一直是個悶悶不樂、壓抑、憤怒的小孩，但她變成大衛後，卻完全改了個樣。「他變得快樂很多，」楚蒲說：「穩定很多，而且對周遭事物也比較有反應。」楚蒲送給大衛一條上面刻有他新名字的鍊子，大衛則回贈給她一樣禮物：那件他曾在家庭宴會上穿著的仿貂皮外套。「他似乎想丟掉任何會讓他想起自己是布蘭達時的東西。」楚蒲說。

那年八月，大衛十五歲生日後的一個星期，他在他的大家族中，第一次以男生的模樣在眾人面前公開露面，場合是他的舅舅戴爾(Dale)的結婚典禮與招待宴會。大衛用膠帶將仍



然有點突出的胸部綁平，穿上一件漿過的白色襯衫、深色領帶，以及一件跟弟弟布萊恩一模一樣的炭灰色西裝外套。大衛說，第一次要在他的嬸嬸、叔叔、祖父母及朋友面前，以一個男孩子的樣子出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知道所有人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他嬰兒時變性的事情，但是他們知道這件事，並沒有讓長久以來一直被訓練以女孩之姿出現在親戚面前的他覺得輕鬆一點。雖然如此，下定決心不願畏首畏尾的他，甚至與新娘及她的好些伴娘跳舞。「快樂極了，」兩天後，麥肯蒂醫師在她與大衛諮商的筆記上寫下：「婚禮很成功。」

大衛開始注射男性荷爾蒙，他很快地開始在臉頰與下巴長出細柔的毛，而且長高了二·五公分。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他接受雙邊乳房切除手術，過程極度痛苦，讓他在手術之後的數個禮拜痛不欲生，所以他決定直到隔年夏天，等他讀完十年級之前，都不再接受進一步的手術。

在這段中斷的期間，大衛深深思索讓他陷入困境的這個意外事件的人生課題。「在他生命中的那個階段，」溫特博士說：「他只想拿把手槍殺了搞砸那個手術的醫生。」當溫尼伯陰沈的冬天到來時，大衛復仇的幻想開始付諸現實。拿著送報存下來的二百元，大衛在溫尼伯市中心的街上買了一支一九五〇年製的蘇聯魯格(Ruger)黑槍。二月的某一天，他跑到溫尼伯診所修特醫師的辦公室。

「我口袋裡放著那把槍，」大衛說：「我打開他辦公室的門。他看著我說：『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我說：『你還記得我嗎？』他說：『不記得，我應該記得你嗎？』我說：『你仔細瞧清楚。』然後他便知道我是誰了。他點了點頭，我本想拿出手槍轟掉他的腦袋，但他卻開始哭了起來。我為他感到難過。他的頭低低垂著。我說：『你知道你讓我不過著什麼樣的悲慘日子嗎？』他一句話都沒說，只是坐在那兒，哭著。我走了出去，聽見他在身後說：『等一下！等一下！』但我還是走了，跑到河邊放聲大哭。」

大衛用石頭將手槍砸爛，並把它丟進紅河裡。幾天之後，他向麥肯蒂坦承，他跑到修特的辦公室，並且「為了那場意外譴責他」，但他並沒有說他口袋裡有槍。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聯絡上修特醫生，但他拒絕談論這次會面。「那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了，」他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他也不想談論讓一個十五男孩沮喪、心懷殺機地跑到他辦公室的那件意外。當我問他割包皮的事，修特用他濃重的加拿大法語腔英文回答：「我現在不適合談這件事，真的，真的，真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十六歲生日的前一個月，大衛動手術做了一個簡單的陰莖，由



他的大腿內側肌肉與皮膚組成，緊連在他皮膚下剩餘的陰莖肉塊上。假的睪丸是由淡色的塑膠做成，裝在他重建的陰囊裡。陰莖懸在他大腿之間的感覺既奇怪又不熟悉。大衛很快就知道了人工塑膠陰莖的缺點。手術後的第一年，因為人工尿道的閉塞與感染，他住院了十八次，而接下來的三年內，他也必須繼續定期住院檢查。

同時，大衛試著適應他的新生活，並且準備重返這個世界。他說，從某些觀點來看，這比他原先害怕的容易一些。除了和海瑟與伊瑟的短暫友誼，布蘭達遭受嚴重的社會排擠；由於這個原因，以及她幾乎每年都會換學校，所以沒有人與她親密到能夠發現她突然消失，而大衛則突然出現。在他回歸到生理性別之後，大衛由於害怕會突然遇到有人認出他就是以前的布蘭達，所以還是小心地躲在父母家的地下室。他看電視、聽唱片、思索著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試著去吸收、消化它。這段時期維持將近兩年，直到慢慢地，大約在他十八歲生日時，他才開始走出家裡，在當地的連鎖速食店、溜滑輪場以及酒吧間，跟布萊恩和他的朋友們廝混。布萊恩的兄弟們很快就將大衛當成他們的一份子，但不可避免，還是有人依稀記得，布萊恩曾經有個叫布蘭達的姊姊。

這對雙胞胎聯合起來編了一個故事來解釋布蘭達的消失。他們宣稱她跑去英屬哥倫比亞跟男友住，後來在飛機失事中過世。大衛是布萊恩失蹤多年的表哥，至於大衛必須時常住院這件事，雙胞胎的解釋是，他要治療摩托車意外所受的傷。

「我們都知道他們並沒有把真相全部說出來，」萊爾(Lyle Denike)說，他是布萊恩與大衛那個時期的朋友之一：「但我們並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僵。我們都知道那是一些非常私人的事。」

布蘭達六年級同學海瑟也懷疑過。一九八三年七月，她剛就讀大一的那個暑假，她在哥哥的小型賽車場打工。「那時我在賣票，」海瑟說：「突然看見櫃台有一張很熟悉的臉孔出現，是布萊恩——我是這麼以為。我跟他打招呼，他卻沒有微笑，反而臉紅而且口吃了起來，然後退開指著另一個男生。然後真的布萊恩走上前來。我問：「剛才那個人是誰？他怎麼看起來這麼像你？」布萊恩說：「他是我表哥，大衛。」我在想他是不是布蘭達，但我很快拋開這個念頭，告訴自己，如果他說是他表哥，那就是他表哥。」

「我就是沒辦法跟她說話，」大衛談到和這位他認為是童年時期唯一一位真正朋友的碰面情況時，如此說道：「解釋每一件事要花太多時間，逃避人群還比較容易。」

那年夏季，大衛滿十八歲，他進入另一個新里程，因為他已屆法定年齡，可以取得兩歲半時就裁定給他的一筆信託基金，那是聖伯尼菲斯醫院與朗恩和真娜在一九六七年庭外和解時付的六萬六千元。比起某些人估計他們可以因為兒子誤失陰莖而得到的數百萬元賠償，這筆錢要少了很多，但因為那時他們急需用錢，而且律師又警告他們，法官很可能會否決一筆龐大數目的賠償，所以當時這對年輕夫妻就接受了醫院提出的賠償。以一九六〇



年的標準來看，這對朗恩而言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錢，那時他年收入只有六千元。這筆錢以大衛的名字交付信託基金保管，朗恩和真娜只能將之用於與大衛受傷相關的治療，而且也支付了這家人每年到約翰霍普金斯的旅費。到了一九八三年，這筆錢已經累積超過了十七萬元，而這馬上讓大衛在同伴中成為最有身價的年輕人。正如大衛之後告訴戴蒙的，為了希望能「套牢一些小姐」，他買了一輛加強馬力的廂型車，裡面有酒吧、電視，還鋪著地毯，它立刻被取了個綽號，叫作「求偶房車」。

然而大衛並沒有在這輛廂型車內追過女生，他與女孩的關係，是他在轉變期中最複雜的事。十八歲的他不只是長得還可以，而是非常帥。他在如今已成異性的團體中突然大受歡迎，使得他陷入嚴重的進退兩難局面，因為他知道他的陰莖不但不像正常的陰莖，也沒有真正陰莖的功能（它無法勃起）。「你到底要如何開始約會呢？」大衛回憶著這段時期的生活：「你根本不能。你的處境如此尷尬。」

但最後他還是與一個小他兩歲的女生約會，她是個漂亮但輕浮的十六歲女孩，對大衛而言，他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我想，如果她要求比接吻更進一步的事情，我到底該怎麼辦？我該怎樣處理那樣的情況？」他想出了一套對策，防止他們有太過親密的性接觸：他會喝很多酒，然後推說我太累了，我要睡了。但有一天晚上，他誤判狀況，喝得太多，真的醉得不醒人事。隔天早上當他醒來時，他的女朋友就躺在他身旁，而且從她臉上表情

看來，他知道她已經看過他的雙腿之間了。如今他別無選擇，只好告訴她實話，向她解釋曾經發生過的「意外」。他說幾天之內，每個人都知道了，事情好像又回到他童年一般，他又成為大家竊竊私語、嘲諷譏笑的對象。對大衛而言，這實在難以承受，所以隔天他吞下了一整瓶母親的抗憂鬱藥丸，然後躺在父母親的沙發上等死。

朗恩和真娜發現了昏迷不醒的大衛。「我和真娜面面相覷，」朗恩回憶：「我們還考慮是否應該弄醒他。」

真娜記得她對朗恩說：「我在想，我們也許就讓他去算了，這個孩子一生都在受罪，他真的很想死。」但很快地，她就下定了決心，他們將他抬起，緊急送到醫院去洗胃。一個星期後，大衛再度企圖自殺，吞下了另一瓶母親的抗憂鬱藥丸，然後跑向浴室放水，想淹死自己。「我那時在想，當你死了，你就不會有任何感覺，你的心不會再痛，身體也不會痛，再也不用被人羞辱——全都會消失。但是我就是無法爬到浴缸。我每走一步，兩隻腳就好像有千斤重擔壓在上面。」因為過量藥劑的作用，大衛躺在沙發上不醒人事。這一次是布萊恩救了他。

大衛退離了這個世界。他在近溫尼伯湖(Lake Winnipeg)邊的森林小木屋裡，一個人獨居了六個月，甚至拒絕去看麥肯蒂醫師。但是，麥肯蒂說服他帶一台錄音機到小木屋去，對著它講述心中的想法。一九八五年一月分的某個晚上，他真的照做了。



「我是大衛·利馬，」他開始錄音，聲音因為喝了酒而含糊不清：「我十九歲，很快就二十了，而我十二年級才讀了一半。我的人生計畫是，」他停頓了一下，然後以新的語調繼續說：「好吧，在我二十五歲以前，一切應該就搞定了。三十歲之前，我不打算結婚，因為我不是那種——那種結婚的類型。」在東聊西扯了幾分鐘後，他才又回到占據在他心裡一直揮之不去的主題。「我想要娶那種有點害羞的女孩，」他說：「但不要害羞。我希望她有自己的小孩，因為我想要小孩，但我不能生。」這個自白又讓他想起許多相關的事情。「喔！對了，」他說：「我有一些錢，大約十萬塊，是因為很久以前受傷所獲得的賠償，那是在我還很小的時候。」他又停頓了一下，好像在決定自己是否有勇氣或意願說出他這一部分的生活。他沒有。「就是這樣了，」他說：「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有個美好的一生。」他關掉了錄音機，之後再也沒有錄過另一卷錄音帶。

一直到隱居快滿一年後，大衛的兩個朋友，哈洛(Harold Normand)與洛恩(Ron Mandel)才說服他離開森林，事實上，是遠遠離開曼尼托巴嚴峻的隆冬。證諸其後一連串的事件，這三個年輕人選擇了一個頗富諷刺意味去處：夏威夷。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他們飛到檀香山，住在離戴蒙家不到十分鐘車程的奧瑞格旅館(Outrigger Hotel)整整一個禮拜。這趟旅行對大衛而言，是很有益健康的，因為在飛往夏威夷班機上的一件事，使大衛終於走出

憂鬱，開始面對自己過去的祕密。

在飛越太平洋時，他轉向哈洛，「他對我說：『我一直想要告訴你布萊恩姊姊的事。』」哈洛回憶：「我回答他：『你不用說了。我已經知道了。』」

哈洛三年前第一次遇見大衛時，他就聽說這件事了。那時他馬上便對所謂雙胞胎胎姊姊死於飛機失事的說法有所懷疑，因此將這件可疑的事告訴他的父母。他們馬上就聯想到一則一九六七年報上的簡短新聞，是有關一個雙胞胎男孩在聖伯尼菲斯醫院割包皮時，失去陰莖的事。後來他們從八卦聽說，那個家庭叫作利馬，而且聽到許多傳言，說後來這個男孩被當成女孩扶養。「我的父母經過一番推敲，就得到了一個大概的輪廓。」哈洛回憶。哈洛自己非常注重隱私，因此從未跟朋友八卦過大衛的事，也從來沒有跟大衛透露自己知道實情。

他們到夏威夷之後幾個月內，大衛跟他的朋友說了很多原本只說給麥肯蒂知道的事。「他告訴我，他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女生，所以當他一發現自己原本是男生時，就下定決心要變回去。」哈洛說：「若非如此，他可能會成為女同性戀，因為那是他自小以來最大的問題——他對女孩子有感覺。」



從夏威夷回來之後，大衛從他的醫生那兒聽說有一種新型的人工陰莖，醫生說那比他現有的陰莖進步很多。新的陰莖看來就像真的一般，而且透過先進的顯微手術，可以讓它有感覺。在他滿二十二歲之前不久，大衛動了第二次陰莖整型手術。這個手術歷經十二個階段，三個整型醫生花了十三個小時才完成。大衛接受了所謂的「微血管右橈動脈前臂皮片陰莖重建手術」(microvascular right radial artery forearm flap reconstruction of the penis)，亦即將他右手腕到手肘的動脈、肌肉與神經切割開來，用以製造一條尿管，以及新陰莖的主要組織，另外再從左邊肋骨移植一部分軟骨來支撐器官組織。儘管需要漫長的復元期，大衛對結果卻非常地滿意，因為這次的效果比他上次手術好太多了。「手術結束後我開車離開，」大衛說：「就在車上開始哭了起來。」

雖然他新的陰莖在外觀及感覺上明顯改善許多，大衛卻一直等了兩年多，才開始把它用在性行為上。他說，他之所以延誤這麼久，比較無關乎對新陰莖的信心和感覺，而是因為他二十二個月大時，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接受去勢手術的後遺症。「我一直在想，對一個我想與她結婚的女孩子，我該如何開口說這件事？」大衛回憶：「當她說她想要有小孩

而我無法辦到時，我到底該說什麼？」就算他遇到一個說不想要有小孩的女孩，到後來也有可能改變心意，並轉而憎恨他。「我想，這對一個我愛的人來說並不公平。」大衛說。

然而，大衛仍然無法擺脫想結婚與養小孩的念頭。他的弟弟布萊恩早在十九歲時就結婚了，而且截至一八八年夏天，已經是兩個小孩的父親，擁有大衛想要擁有的一切事物。

「我變得非常孤單，」大衛說：「我做了一件以前不曾做過的事。我向上帝祈求。我說：『祢知道，我的人生糟透了。我不是想跟祢抱怨，因為祢要我經歷這些，一定有祢特殊的想法。但如果祢給我機會，我一定可以做一個好丈夫；如果給我機會，我也會是個好爸爸。』」

兩個月之後，布萊恩和他的太太介紹一位他們認識的年輕女人給大衛。珍·芳登二十五歲，是個有著藍眼睛與金紅色及肩長髮的漂亮女人。她一五五公分高，八十公斤重，對體重相當地在意，但對自己龐大的身材倒也看得很開，而所有認識她的人都認為，這只是她充滿母愛性格中一個很自然的附屬品罷了。當我一九九七年夏天第一次跟珍見面時，她冷靜親切的友善態度，以及具有傳染性的笑聲，都讓我想起英國小說家卡里(Joyce Cary)的喜劇小說《她的驚喜》(*Herself Surprised*)中的主角，莎拉·曼蒂(Sara Monday)。一個打不倒的五個小孩的母親。莎拉在卡里筆下代表著大自然的力量，她真誠的良善與絕對的樂觀，讓她度過足以擊倒她的每個人生困境，包括她自己年輕無知的判斷。



就像莎拉一樣，珍擁有誠實與純真，而這足以解釋為什麼當她與大衛碰面時，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而且三個孩子的父親都不同。珍過於出塵脫俗，一輩子不沾菸酒，是個居家、不去酒吧，也不贊成「詛咒」的人。她最大的缺點是有某種程度的依賴，那可能是她在溫尼伯度過的困頓童年所造成，她由母親和繼父扶養長大。

珍十六歲時加入當地的平民軍校，這個軍訓計畫算是她學校提供的一種課外活動，她在那兒遇見了羅伯特(Robert)，一個比她大幾歲的軍校學長。「他是我的初戀。」她說。羅伯特提議他們離開溫尼伯，橫越大陸搬到他的家鄉安大略的班卡夫特(Bancroft)去。讓她父母惱怒的是，她竟然同意了。這對情侶在羅伯特的父母家住了一個夏天，然後搬往魁北克。珍很快就發現她懷孕了。羅伯特曾經提過結婚的事，但不久之後便漸漸藉故翹頭。「他會出去買菸，一去六個小時。」珍回憶。有一天，她看見他在街上跟另外一個女孩子手牽著手，不久之後，她就搭火車離開，返回溫尼伯的家。

珍的父母親得知她懷孕，大為震怒，但是她既無工作、又沒有錢，只得跟他們住在一起。她的女兒在一九八二年出生，珍那時二十歲。她是個非常好的母親，給子女兒她自覺未曾從父母身上得到的愛。珍最後終於搬出去，搬到城市西區的一間小公寓裡。在那兒，一個朋友的朋友介紹了迪恩(Dean)和她認識，他是個英俊、有著深色頭髮的年輕人，從事警衛的工作。他們開始約會，但是他太年輕，不願安定下來，即使當珍發現她又懷孕時亦

然。他們的女兒在一九八四年出生。迪恩有辦法時，就會資助一點金錢，但他的探望次數卻愈來愈少，到最後終於完全停止。由於家裡有兩個嬰兒，珍無法上班工作，可是最後她還是透過政府計畫找到了一份工作，開始賺起錢來。她的生活開始有些起色，然後她遇見了住在對街的年輕人雷蒙(Raymond)。「我們住的公寓剛剛好在正對面，」珍說：「他說：『如果你想用我的洗衣機或是烘乾機之類的話……』」珍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議，以及其他的好意。

「我並不以此為榮，」珍說：「但我真的總是在錯誤的地方尋找愛情。我想要跟人建立關係，需要有人來愛我。」當雷蒙得知珍懷了第三個小孩之後，他告訴她，他「法律上合法的老婆」剛好很快就要從英屬哥倫比亞回來。「這就是我失去雷蒙的經過。」珍說。她的兒子在一九八八年初春出生。此時的珍，處於她人生中的最低潮。

兒子出生三個星期後，珍接到母親安(Anne)打來的電話，說有消息要告訴她。安最近幫一個剛動完手術的年輕婦人打掃房屋，曾向婦人提起珍的困境，說她因為三個小孩的牽絆，現在大概再也找不到人願意娶她了。這個婦人提到她認識一個年輕人，這個人也許會想認識珍：他是她的大伯，跟她先生布萊恩是雙胞胎兄弟。

珍本身相當不看好這次作媒，但她仍然打了一通電話給這個婦人。布萊恩的太太告訴珍所有有關大衛的意外，以及他因為和解所獲得的一筆巨額賠償。「她說他有一輛廂型



車，還有一台敞篷車。我說：『他有多少錢、雙腿之間有什麼，真的重要嗎？如果他對我或小孩不好，他儘管走人好了。』」

她們兩人敲定了日期，讓珍到布萊恩家跟大衛碰面。他們兩人一見鍾情。大衛可能還是他們兩人中比較緊張的，他說：「她是一個如此真心的人。」

這四個人打算再一起聚會，便約定那個週末共赴一家餐廳用餐。當晚結束之前，大衛握了珍的手，並約了下一次單獨見面的日期。很快地，他們便開始固定約會，而當他們對彼此愈來愈有感情時，大衛開始擔心要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告訴珍他受傷的事。有一天，當他們開著廂型車前往他在森林裡的小木屋時，他終於鼓起了勇氣，但他還沒有說幾個字，珍便阻止他再繼續說下去。她告訴他她已經知道這件事了，而且她一點也不在意。「她說她自始自終都知道真相，但是她不想跟我說，因為她認為會給我帶來困擾，」大衛回憶：「那時我便知道這是真的感情；她是在乎我的。」

當珍被問到知道丈夫在十五歲以前被當成女孩扶養，她的感覺如何時，珍說，與其說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不如說是令人憤怒。「當我看著他還是布蘭達時的那些照片，我只能搖搖頭，然後想著，可憐的孩子。對我來說，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個女生，他看起來就像現在的大衛。我想，對他來說，上學大概是最難受的事吧。」

一九八九年秋天，他們一起搬進了一間公寓。大衛重建後的陰莖讓他能夠跟珍做愛。

「你也知道開始一段關係是怎麼樣，」珍笑著說：「第一年你們會很常做。」

大衛賣掉了他的「求偶房車」，同時也揮別了他從未真正擁有的衝動莽撞、及時行樂的年輕歲月印記。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顆鑽戒。

「我記得，」珍說：「他走進房間，以一種很嚴肅的語氣跟我說：『我有事想跟你說。』我們坐在床上，他拿出了這個盒子，然後將它打開，裡面有一枚鑽戒。我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他問：『你願意嫁給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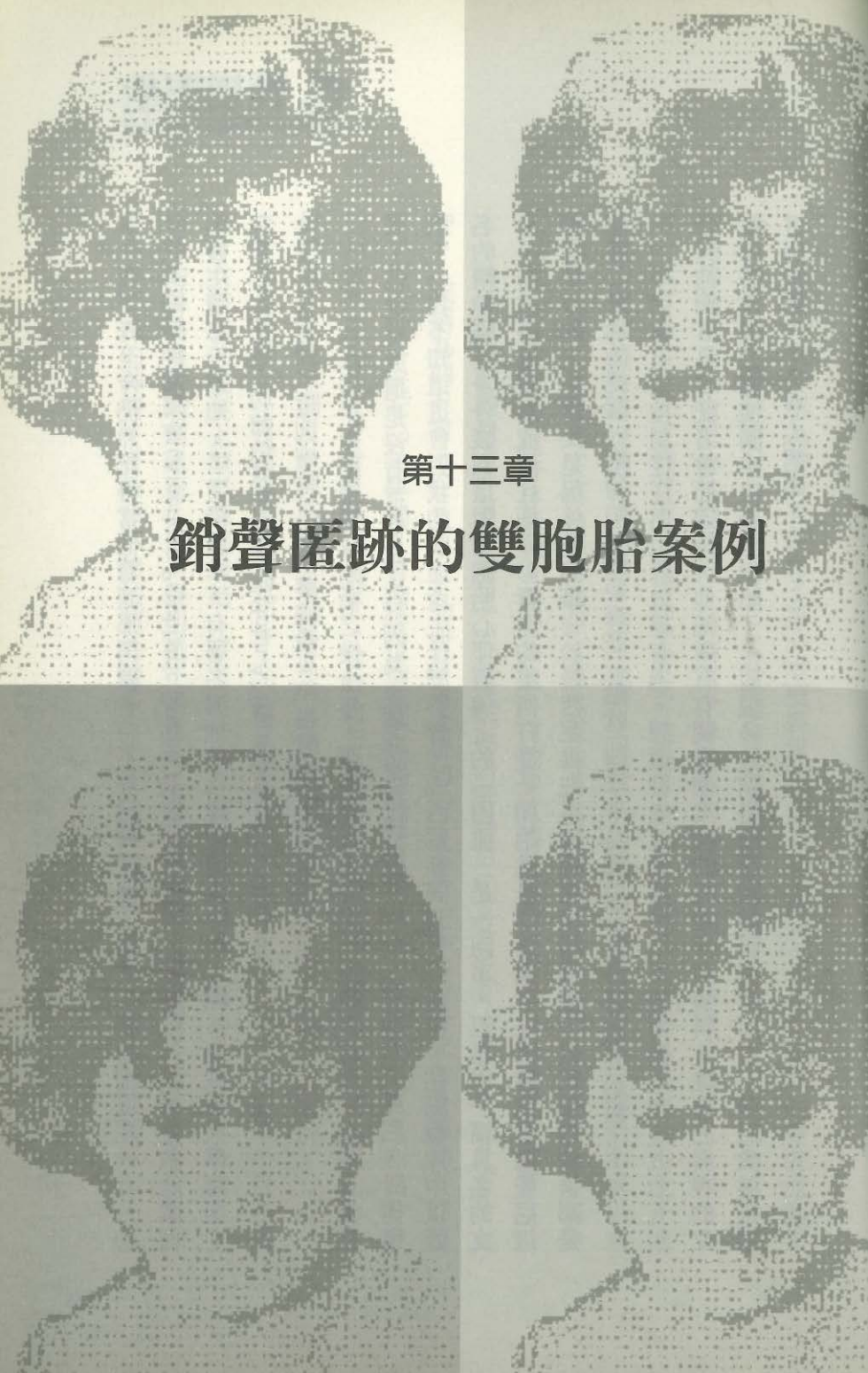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距離他們第一次碰面之後的兩年又四個月，大衛和珍在溫尼伯的麗晶公園聯合教堂(Regents Park United Church)舉行了結婚典禮，珍的兩個女兒是伴娘。大衛穿著白色燕尾服，珍則穿著白色洋裝。站在大約一百三十多位親友面前，在這個不尋常溫暖的秋天早上，大衛和珍宣讀他們自己為對方寫的誓詞。

「珍，」大衛說：「我接受你當我的妻子，在我們在世的每一天，高興時與你一起歡笑，哀傷時與你一起悲傷，在愛中與你一起成長，只對你一人忠誠不二。」

而珍對他說：「大衛，我選擇你當我的人生伴侶，我承諾會尊敬你、鼓勵你、原諒你，並且仍然對你懷抱希望。在今天以及未來的所有日子裡，我將給予你我的愛。」

第三部 性別天生





第十三章

銷聲匿跡的雙胞胎案例



西蒙森至今仍然記得當他看到那則廣告時不舒服的感覺。他說，廣告出現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Society)的會訊上，上面寫著：「治療雙胞胎案例的醫生請惠予通知。」這段請求下有署名與地址：戴蒙博士，檀香山，夏威夷大學麻諾亞(Manoa)分校，約翰伯恩斯醫學院(John A. Burns School of Medicine)。

「我看到了這則廣告，」西蒙森說：「但我就是無法作出回應。」

從一九八〇年布蘭達變成大衛之後十年，西蒙森曾經考慮過要發表這個案例的真實結果，但他終究還是沒有這樣做，只因為一個非常單純的理由。「我怕死了曼尼，」他坦承：「我不知道這會對我的前途產生什麼影響。」西蒙森與BBC合作，在記錄片中以匿名的精神醫生身分談到這對雙胞胎心理調適上的「困難」是一回事，但是以一篇具名的文章，描述曼尼廣為流傳且極具影響力的案例打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來直接挑戰像曼尼這麼有勢力的人，可又是另外一回事，於是西蒙森把這個想法拋諸腦後。但戴蒙的廣告卻是個讓人難過的提醒，剛開始，西蒙森差一點就回覆了，但他還是將這股衝動給壓了下來。

曼尼自己也控制住任何也許曾經有過，想要發表這個案例結果的衝動。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他與BBC記者會面過後，他把所有有關這個案例的直接參考資料，從自己發表的文章、著作與公開演講中，全部刪除了。對很多性別發展領域的研究者而言，曼尼突然不談這個主題，十分令人困惑。

在一九六〇年為變裝者創辦了第一本變裝雜誌《變裝主義》(Transvestia)的變裝運動先鋒維吉妮亞·普林斯(Virginia Prince)，就是對這個案例結局非常好奇的人之一，因為這件事對她接受自己和自己的性別認同，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她出生時原是個男生，叫查理士(Charles)，十多歲時第一次開始穿著女性服裝，以滿足自己的性欲，甚至在結婚生子之後，還繼續維持著這個祕密活動。四十歲時，普林斯與第二個老婆離了婚，開始全天以女性角色出現，並將名字改為維吉妮亞。雖然在她得知這對雙胞胎的案例時，她已經是完全「出櫃」的變裝者，但普林斯說，儘管如此，這個變性的嬰兒仍然對她有很深遠的影響。

普林斯開始聽說這件事，是有一次在性科學研究協會(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ex, 或稱為四S會[Quad-S])的研討會上得知的，這是一個性別研究者及運動者的協會，曼尼在一九七〇年早期，曾擔任這個協會的兩屆主席。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四S會加州棕櫚泉(Palm Springs)的會議上，當時的主席曼尼曾經首度放映雙胞胎案例的照片給會員們看，之後一個月，他就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上大幅披露這個案例。

「曼尼展示了這對雙胞胎的相片，」普林斯回憶：「其中有一張是這兩個小孩在玩耍。女孩子的頭髮上繫了個蝴蝶結，穿了一件小洋裝；她正坐在一輛獨輪手推車的前方，而她的弟弟推著她到處逛。另一張則是一幅肖像，是一張快照，但有擺姿勢。小男孩臉上呈現出不悅的神情，好像並不想拍照的樣子，小女孩則坐得直直地，微笑地看著鏡頭，好



像在說：『我簡直快活似神仙。』那是一張讓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照片。」

對普林斯來說，曼尼的雙胞胎案例是極具鼓舞性的明證，足以證明性與性別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是一成不變的生理現象。往後每一次與曼尼一起開會時，普林斯都會詢問這對雙胞胎最新的進展，而通常曼尼都會欣然答應她的請求。「他對於結果非常興奮、非常滿意，對自己的成就也很驕傲。」普林斯說。普林斯回憶，十年後，在一次加州的演講上，曼尼的態度卻改變了。這時離她上一次聽到曼尼對這個案例的看法已有一段日子，而戴蒙關於BBC調查的報告正要出爐。「我問他：『這對雙胞胎現在怎麼樣了？』」普林斯說：「他那時並不很樂意暢所欲言，似乎對於我會問這個問題有點不悅。他的回答非常簡短。」

在約翰霍普金斯，曼尼對這個案例同樣變得守口如瓶。在醫院或是在課堂上，當他被問到這對雙胞胎時，他總是會岔開話題；對於特別鏗而不捨追問的學生與同事，曼尼解釋，在「媒體入侵」之後，他跟這個實驗已經「失去聯繫」了。「他說BBC讓這個家庭深受傷害，」曼尼以前的學生迪沃說，而且「這個家庭及案例所受的創傷已無法修復」。曼尼對於自己未向愛徒瑞妮絲博士透露隻字片語，也是如此解釋。她在一九六〇年代跟著曼尼作研究，之後成為金賽研究所的負責人。「他說」這個家庭的成員，因為BBC的報導，多少有點責怪他，他因而與他們斷了訊息。「瑞妮絲說。」

但這個解讀卻與真娜的記憶不吻合。她說，即使在BBC造訪完溫尼伯之後，她跟曼尼仍然保持聯繫。「我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大衛已經變性做回男生，也告訴他有關他現在的生活。」真娜說：「大衛現在已經拿到了〔醫院給的和解金〕，也開始與女孩子約會——也許不算約會，而是跟女孩子出去。」真娜說曼尼有回信給她。「他說他希望能與大衛和朗恩通信，而我也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實情。『朗恩和大衛並不要再和你聯絡，』我說：『我是以朋友的立場告訴你這件事。我並不想讓你覺得被排斥，但是他們不想和你打交道。』」真娜說，曼尼在信中對布蘭達現在已經變成大衛的消息，一直很小心地保持學術中立的態度。「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失望。」真娜說。一九八〇年代，他們仍時有書信往來。曼尼寫了一封信提到他去辛巴威旅行，還告訴她他發現自己罹患攝護腺癌的事，另外也提到一九八六年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撤出約翰霍普金斯校園一事。

很顯然地，曼尼已經忘記他們之間的這些書信往返，而仍然對他科學界、學術界與醫學圈的同儕堅持，這個案例已經「無法追蹤」。這是個令人很訝異的說法，我們也找不到任何原因來解釋曼尼為何要這麼說，因為利馬一家人一直住在他一九七九年拜訪過的同一棟房子裡，使用他與他們聯絡的同一個電話號碼。

雖然一九八〇年之後，曼尼不再公開提到這對雙胞胎的案例，但是他繼續鼓吹對沒有陰莖的男嬰進行變性的好處，而約翰霍普金斯醫院也仍然繼續執行這個做法，即使在一九



七〇年代中期，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葛朗巴哈博士對於治療陰莖過小的初生男嬰，已經發展出新的替代方案。葛朗巴哈發現，在陰莖過小的嬰兒出生不久之後，在其陰莖中注射鞣醣，便可以增加其陰莖尺寸。就那些對荷爾蒙反應良好的病患而言，陰莖可以長到一定長度，使他們可以站著泌尿，並可從事性行為。

葛朗巴哈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紐約奧本尼(Albany)所舉行的先天缺陷機構(Birth Defects Institute)第十七屆年度「性別發展基因機制」(Genetic Mechanisms of Sexual Development)研討會上提出了這個方案。他很驚愕地發現，他的方案得不到約翰霍普金斯這個當時在中性治療上唯一最有影響力的醫院的背書。會議的主席，約翰霍普金斯小兒內分泌學家布里薩(他曾於一九六六年擔任曼尼讓布魯斯變性為布蘭達的手術諮詢顧問)說服醫院，不要採用加州團隊的治療計畫。「我想幾年之內(但不是馬上)，我們將有能力回答關於扶養那些『陰莖過小』嬰兒的最佳方式為何。」布里薩在這個研討會的閉幕辭裡如此說：「西岸的葛朗巴哈團隊將會執行他們相信是正確的事，亦即把這些小孩當成男孩扶養；而我們東岸的團隊則會執行我們相信是正確的事，亦即把這些孩子當成女孩扶養。」

曼尼是約翰霍普金斯往後幾年推行這項決定最不遺餘力的人，無論在訪談、演講、著作以及發表的報告中，他都聲稱，讓陰莖過小的男嬰變性為女孩，是唯一的選擇，或者像大衛這般因為傷害而失去陰莖的男生也是。在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場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

發展研究所 (NICHD,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 Human Development) 的會議上，曼尼提到，這種嬰兒變性手術是他對醫學界最重要的臨床貢獻。曼尼發表上述說法的場合，是在表揚過去二十五年來，唯一四位持續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納稅人的錢資助研究計畫的科學家，而曼尼就是四位當中之一。「在男性陰陽人與陰莖細小症候群，或是因為割包皮所造成的陰莖不全個案中，如果沒有足夠的陰莖組織可以進行重建手術，使之能夠適當地排尿與性交，這個嬰兒便可以指定為女生，同時在臨床上也可以讓她習慣成為女孩。」曼尼在他的演說中，如此告訴研究院的聽眾。「到了成人時，相較於那些沒有陰莖的男生，這些變性成女生的人，普遍地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

曼尼的評論至少有兩個原因引人非議：一、曼尼或約翰霍普金斯並不曾發表過有系統的追蹤報導，來呈現這些變性人對其結果的滿意度，而且自曼尼發表其評論後已歷經數年，也未見追蹤報導。二、當時，曼尼形容醫師有能力成功地讓失去陰莖的男孩變性，正常地發展成女孩，他唯一真正從孩童時期追蹤到成人時期的實驗對象，也只有布蘭達而已，而這個實驗在七年前，當布蘭達變性成大衛時，就已經證明是個完完全全的失敗。



第十四章

不說變性多餘向



戴蒙說，他不記得是什麼原因讓他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重新注意起雙胞胎案例。他說，他只是愈來愈無法忍受大家對實驗結果的反應是一片緘默。「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這個人現在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戴蒙說：「所以關於這件事，我們應該能夠寫一篇文章了。」

結果是不久之後，曼尼自己提供了戴蒙重拾這項主題的進一步動機。曼尼於一九九一年發表了著作《成對比較的性別及半陰陽症傳記》(*Biographies of Gender and Hermaphroditism in Paired Comparisons*)，這本專書是他在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工作四十年的總結，呈現到目前為止他所蒐集到為數頗多的「配對」。這本書可以說是對其理論的最新辯護，亦即在人類性別認同的形成上，社會學習要重於生物遺傳。但這本書卻沒有提到其理論的決定性試驗，也就是他的終極配對：變性的雙胞胎及她的弟弟。在這本書的前言當中，曼尼解釋為何在這本幾近完整的著作裡，這個案例神祕地消失了——他暗示，這是和他的長期挑戰者戴蒙的陰謀有關。

「在國際學術界，」曼尼寫道：「與性別認同有關的學說競爭，竟與無恥的媒體掛勾。」（在此處，他加註了戴蒙一九八二年針對此爭議案件所發表之報告。）「此事提早結束了同卵雙胞胎的獨特縱向研究。一群BBC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受到播放學說爭議的好處所誘惑，追蹤了雙胞胎及他們家人的居所，並且不道德地侵犯了他們的隱私，只為了滿

足節目的需要。」曼尼沒有提到任何關於布蘭達在一九八〇年決定變性為大衛的資訊，而這項暗指戴蒙與這個案例的過早終止有關的簡短資料，是曼尼針對這個案例所發表的最後一段書面評論。

可以理解的是，戴蒙不願讓這個無理指控成為雙胞胎實驗的最後歷史結語。同年，有另外一本名為《獻給曼尼》(John Money: A Tribute)新書發表，那是為了慶祝曼尼七十歲生日而發表的論文集。從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看出大部分學術界人士對曼尼版本說法的支持，書中充斥著曼尼長期以來的助手對他及其學術成就的讚揚，其中包括安赫特和瑞妮絲。班克勞復(John Bancroft)也在這本書中向曼尼表示敬意；他是蘇格蘭皇家愛丁堡醫院(Royal Edinburgh Hospital)的精神醫師及臨床顧問，現任金賽研究所所長。班克勞復博士是位行為學家，也相信在性取向的養成上，教養優於生物學。他將這種教養派的觀點，當成他臨床治療的合理推論。身為英國的性治療師，他曾經試著透過治療，將成年同性戀者轉換為異性戀者，但卻徒勞無功。在他獻給曼尼的文章中，班克勞復博士對「戴蒙不斷的抨擊」感到極度不認同，並且質疑戴蒙從BBC節目中取得之布蘭達心理困境相關資料的真實性。

「曼尼已經提出布蘭達不同階段的發展報告，也都符合他的理論預期，」班克勞復這樣寫道：「但是，自從她青春前期階段開始，整個科學界並沒有接到進一步權威性的報



導，只有聽到她發展受挫的謠言（不是來自曼尼）。」他繼續替曼尼在這個案例上長達十年的沈默辯護，說明這全是因為曼尼為了細心保護研究對象的情緒健康。「在這樣的一個案例中，」班克勞復這樣寫道：「當整個科學界（在這個案例中也包括媒體）的注意力都放在某特定個體上時，很容易想見，是有抽身出來並保持沈默的必要性，以保護這個個體；因為作為一個爭議性理論的活生生實驗品，一定是相當辛苦的！」

如今自身學術清譽受到質疑的戴蒙，負擔不起置身事外和保持沈默的奢侈。從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到整個八〇年代，戴蒙已經定期詢問過（而且刊登了至少一則廣告）內分泌學家及精神醫師有關這個案例的訊息，但是現在他決定加倍努力，以了解這名雙胞胎的命運。

透過BBC，戴蒙取得一名曾經參與治療這個案例的醫師姓名——墨姬醫生。那年春天，他打了個電話給她。

墨姬在十四年前便已不再治療布蘭達。她告訴戴蒙，她並不知道這項實驗的最終結果，但是，她提供了戴蒙一個負責布蘭達心理治療的醫師的電話號碼：西蒙森。

「我還記得當我打電話給西蒙森時，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戴蒙笑著回憶：「他的意思是：『我還在想，你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才會找到我。』」

那時西蒙森住在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Victoria)，是該省兒童精神部(Division of Child Psychiatry)的主管。「老戴說：『老西，我們得做這件事。』」西蒙森記得。一開始西蒙森試著求饒，但是他說戴蒙「一直不斷糾纏著我」。

身為一位曾經親眼看過據稱成功變性結果的人，西蒙森傾向於同意戴蒙的理論，亦即將男嬰變成女孩的過程是錯誤的。雖然，西蒙森的同事警告過他，戴蒙是個別有用心「狂熱份子」，但在和戴蒙進一步談過話、讀過他的論文之後，西蒙森卻持有相反的看法。「我認為老戴是位認真的研究者，同時也是個關心事情的人，他真的相信曼尼的理論已經造成孩童很大的傷害，而且還將持續下去。」西蒙森同意跟大衛聯絡，詢問他是否願意合作一篇有關他生活情況的後續報導。

「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大衛談到那年春天接到西蒙森電話時這麼說。那時，大衛結婚還不到一年，只想極力把痛苦的過往拋諸腦後。然而，西蒙森毫不放棄，大衛終於同意先見見戴蒙，再看看接下來該怎麼辦。

戴蒙飛到溫尼伯去看大衛。在當地一家餐廳午餐之際，大衛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在醫學文獻上的名氣，以及他的案例如何成為所謂的成功典範，以致在他之後執行了上千件變性手術，而且還持續地在執行中。「『每天都有人正在經歷你所經歷的事，』」大衛記得戴蒙這樣告訴他：「『而我們正要試著阻止這種情形。』」



大衛感到相當驚訝。「我以為我是唯一的一個，」他說：「而戴蒙卻親口告訴我，他們依據我的案例來進行很多手術。那便是我決定與老戴合作的原因。」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大衛感覺戴蒙是那種對於他的痛苦並非全然疏離，或純粹基於臨床興趣的人。「當我告訴他我生命中的幾件事時，」大衛說：「我看到老戴臉頰上掛著淚水。」

在接下來的一年當中，大衛和他的妻子與母親，向戴蒙及西蒙森訴說大衛從男孩變成女孩，之後再變回男孩的痛苦歷程。利用這些訪談，加上兒童輔導中心所累積的詳細臨床記錄，戴蒙開始主筆寫下論文。他答應讓利馬一家人匿名，並同意模糊他們的所在地、省略當地醫師的姓名，並且幫大衛取假名，而且不只一個假名，因為戴蒙面臨了重述大衛雙性生活的鋪述難題。他決定分別稱呼大衛為瓊（Joan，當他為布蘭達時）以及強（John，當他轉變回遺傳性別時）。一直到兩年後與我閒聊時，戴蒙才注意到他用了曼尼兩位最重要共同研究者，強及瓊·漢普生博士夫婦的名字。戴蒙向我保證這純屬巧合。

這項報告於一九九四年冬天完成，它所描述的大衛生活，正好是曼尼宣稱已經證明的理論的活生生反證。引用堪薩斯小組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經典研究，戴蒙說大衛的案例證明了性別及性取向大部分為天生，是出生前荷爾蒙及其他遺傳因素作用於腦部和神經系統的結果，而大腦和神經系統會限制人類在兩性之間能夠自由跨越的彈性。戴蒙強調，教養可能有助於一個人男性化及女性化外顯的程度，但是在形成一個人內在為男為女的感覺

上，自然的力量卻更強大。

這份報告的有力之處，在於呈現了性取向在神經生物學基礎的例證，同時也對醫師提出清楚的警告，要他們留意為所有新生兒（而不只是像大衛一樣，出生時生殖器官和神經系統正常的嬰兒）進行變性手術的危險性。戴蒙指出，這項手術也同樣會將中性新生兒導入歧途，因為醫師無法預測新生兒的性別認同方向。他指出，以手術改變這些孩子，讓他們成為某一種性別，會讓至少半數的小孩過著像大衛一樣痛苦的生活。

因此，戴蒙及西蒙森為治療外陰性別不明的嬰孩，提出了一套新的準則。體認到孩子必須被當作男孩或女孩來撫養，他們建議醫生繼續將小孩確定在一個固定的性別上，但僅止於頭髮的長度、衣著及姓名這些事情。他們說，任何無法還原的手術，都必須延後到小孩年紀大到可以理解，且能清楚表達自己覺得最接近哪種性別時才進行。或者就像戴蒙對我所說的一樣：「以一致的性別來養育那個小孩，但是別動刀。」

戴蒙了解，這份報告將會無可避免地提升對曼尼的個人仇恨，因此為了將這個危險性降到最低，他刪除了大衛所有提到這位著名心理學家的談話。「事實上，」戴蒙說：「曼尼的名字只被提過一次。我不希望這份報告變成人身攻擊，我希望它是理論的討論。」



然而戴蒙及西蒙森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找到有人願意出版他們的報告。

「我們被所有期刊拒絕，他們都說這份報告太有爭議性，」西蒙森說：「像《新英格蘭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美國醫學會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這份報告終於在一九九六年九月被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小兒科與青少年醫學彙刊》採用，並預計於一九九七年三月發表。在這期間，戴蒙及西蒙森焦慮萬分地等待這顆炸彈爆炸。「我們基本上是在告訴所有精神科醫師，他們過去三十年來都做錯了，」西蒙森說：「我們知道自己會惹惱很多人。」

一如預期，有些評論家認為，戴蒙只是利用大衛的故事來羞辱一名科學對手，而刻意忽視這篇報告，但至少有一位醫師在看到出版前的報告版本時，便強烈傾向於贊同它的結論。雷納(William Reiner)在兩年前就開始長期、廣泛地追蹤研究變性的病人。雷納受的是小兒泌尿科的訓練，醫學生涯中的前十八年實際上是在加州進行讓中性孩童「正常化」的生殖器手術。他在職涯早期，就已經對約翰霍普金斯的治療模式有些懷疑。「我的病人中有嬰兒、兩歲大的、四歲大的、八歲大的，和十六歲大的，」他說：「所以對泌尿系統所

有的這種失常，也就是所有的這種天生缺陷，我看到的是縱向的觀點，因此我能夠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觀察到這些情況對這些孩童和他們家人所造成的各種影響。」然後，在一九八六年，雷納遇見了改變他一生的病人。

她是一名十四歲大的女生，是赫蒙族（譯註）（Hmong）移民。她宣稱自己因為「不是女生」，而從高中退學。從她的外表看來，她在生理上是正常女性，然而她總是拒絕玩女孩的遊戲，而且堅持穿著中性的服裝。到了青春期，她終於下定決心要變性成為男性。她被轉介紹給雷納討論重整手術的可能性時，她甚至威脅如果無法如願，便要自殺。

雷納說：「我對這個小孩作了完整的醫學檢查。」結果顯示，「她」在生物學上是個「他」，是擁有四十六XY染色體的男性，但因為罕見的染色體異常，使得生殖器官無法朝男性發展。雷納替這名孩童動了變性手術，之後這名原本的女孩便很努力地寫在他DNA裡的性別來生活。這個案例讓雷納相信了他長期以來的懷疑：性別心理認同的生物基礎並不容易像他，以及其他所有小兒泌尿學家、內分泌學家、精神醫師及心理學家所學的那樣，被社會及環境的教養所否定。這一點也進一步讓雷納得到了令人不安的結論，亦即在他幫助將中性新生兒導至特定性別的手術生涯中，他一直以來恐怕都做錯了。在《美國兒

（譯註）即苗族。



童及青少年精神病醫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一九九六年那一期上，雷納發表了這個案例的論文，同時警告他的同行醫師，小心他們長期以來所接受的理論：在形塑人類性意識上，教養勝過天生。

雷納還做了另外一件事。在當了十八年外科醫生後，他放下了手術刀，重新接受訓練，成為一名兒童精神醫師，專攻性心理發展及中性狀態。雷納於一九九五年被約翰霍普金斯聘為精神科的助理教授，從此開始長期研究變性病人的性心理問題。雷納開始追蹤十六名病患，特別是其中六名遺傳上為男性、但出生時沒有陰莖，因此被去勢、當作女孩來撫養的案例。經過兩年的研究，他發現這六名變性的男孩在態度及行為上都比較接近男性，而非女性。有兩名病患甚至在未被告知其男性(XY)染色體的狀態下，就自己回復成男性。

「他們都是沒有陰莖的孩童，」雷納告訴我：「被當作女孩來撫養，卻知道自己是男生。他們不說：『我希望我是男孩』或『我真的寧願當男生』或『我想我是男孩』；他們說：『我是男生。』」雷納強調他研究的這些孩童，跟大衛之間有著極高的相似性，大衛也知道，雖然自己被當成布蘭達來養，但他不是女生。雷納在《小兒科與青少年醫學彙刊》上，伴隨著戴蒙及西蒙森的「強／瓊」報告，寫了一篇支持他們的評論。

如今雷納說，大衛的案例以及他自己研究中發現的趨勢，都支持逐漸浮現的證據，證

明神經生物學對性別認同及性取向的重要影響。雷納引述一項牛津大學於一九七一年完成，如今已被奉為經典的研究，該研究顯示出雄老鼠及雌老鼠腦部在解剖學上有所不同。六年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者將這些不同點的範圍縮小到下視丘內的一群細胞。而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於阿姆斯特丹完成的研究，則找出了人類下視丘內相對應的區域，指出男同性戀者該區域是男異性戀者的兩倍大。更多的研究皆支持這項發現。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五年，研究者漢默(Dean Hamer)宣稱，在兩項獨立的男同志兄弟的研究中，他發現他們的X染色體上有段特定的模式。這項結果暗示，性取向可能是有遺傳因素的。

雖然其他的科學家並未能重複漢默的發現，但如今已極少有性學研究者會刻意忽視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人的確有種天生傾向，使得外在行止或內在認同皆表現出特定的性別。「相當清楚的是，大部分出生時睪丸功能正常的男嬰有男性化的腦部。」雷納說。他支持戴蒙和西蒙森的建議，延緩那些沒有陰莖或中性孩童的手術時間，只給他們暫時、可改變的性別指定，以防萬一小孩表達強烈欲望想要以另一種性別生活。雷納表示，這種治療模式與約翰霍普金斯曼尼及其同僚所率先創立的模式完全相反。在曼尼他們的模式中，性別認同是由醫生指定給小孩，不容置喙；小孩若對變性表示懷疑或困惑，也會被醫療照護者否定。雷納認為，從大衛和其他研究的案例看來，沿用數十年的約翰霍普金斯治療模式應該予以重新評估。「我們必須學習傾聽孩童本身的心聲，」他說：「他們才是告訴我



們應該怎麼做的人。」

在戴蒙及西蒙森的文章刊登於一九九七年三月號的《小兒科與青少年醫學彙刊》之前，美國醫學協會公關部門便已通知媒體，即將有爆炸性的新聞出現。文章發表當天，《紐約時報》以頭版篇幅報導，標題為「報告指出，性別認同畢竟不易適應」。在這篇報導當中，作者安潔(Natalie Angier)描述大衛的生活有著「警世寓言的力量」。在報導這個案例成功的新聞二十四年之久後，《時代雜誌》也以全版篇幅指稱，「專家過去完全搞錯了」。類似的新聞報導出現在世界各地，很快地，戴蒙及西蒙森就有接不完的电话，許多國家的記者都想訪問這位只知其名為強／瓊的年輕人。

大衛答應上兩個電視新聞時事節目。在美國廣播公司(ABC)電視台的《黃金時段傳真》(Primetime Live)中，大衛以黑暗剪影方式出現，而在加拿大廣播公司的記錄片中，則是將臉部模糊化。一直要到後者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在紐約市錄影時，我才經由戴蒙及西蒙森的介紹，見到了大衛。戴蒙及西蒙森把一連串想要採訪的記者名單給大衛看，熱愛搖滾樂的大衛，只選擇了《滾石雜誌》的記者。

在第一次跟我碰面時，大衛既緊張又有防衛心。他解釋，童年經驗讓他很難相信陌生人，但稍後，在硬石餐廳(Hard Rock Cafe)喝一瓶啤酒之後，他就比較放鬆了。他提到父母和弟弟如何成為他形容為「黑暗深淵」的童年中最重要的支柱。我很快就了解到，在他求生過程中，他無比的幽默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描述他與比他重些、有點禿頭的雙胞胎弟弟之間的外觀差距時，他在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大吼：「我是年輕的帥貓王，他是發福的老貓王。」

但是我最深刻的印象，還是大衛毫不容質疑的男性化。他的手勢、走路姿勢、態度、品味及用詞，在在都看不出大衛曾經被當作女孩來撫養。事實上，當我問他是否認為他不尋常的童年讓他對女人特別了解時，他對這個問題不予置評。大衛顯然從來不曾是女生，至少在他心裡是如此，而那部分才算數。大衛堅持，他十四歲那年從布蘭達變回大衛的過程，代表的不過是表面的名字轉換而已，切除乳房、兩次重建陰莖，以及終生都必須施打睪固酮，都不過是細節。「我是改變過來了，」大衛說：「但主要的改變是名字，其他的都不過是整型。我只是修復了被損害的部分，如此而已。」

整個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及秋天，媒體持續報導大衛的故事。由於這些報導，在針對嬰兒變性這項未經檢驗的醫療行為的爭論中，另一派聲音開始浮上檯面。這些聲音來自曼尼一九五五年發表調查之後出生的中性人，他們現在已經三十或四十多歲，嬰兒時期便已接



受過生殖器正常化和變性手術，現在則準備好要訴說自己的生活故事。

他們早在四年前開始發聲，主要是透過一個人的努力：以舊金山為大本營的運動份子雪柔·雀司（Cheryl Chase）。她從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就開始遊說改變對中性人的治療方式，但雀司承認：「成效不彰。」這位短髮女子冷淡、理性的態度，掩藏了驅動她的狂熱。「強／瓊案例爆發出來後，情況一夕之間改觀。」

雀司一九六五年出生於紐澤西近郊，是典型出生時外陰性別不明的案例。她沒有陰莖及睪丸，而是在尿道後有一個像陰道的開口，以及一個像陰莖的構造，其形狀及大小可以形容成大號的陰蒂（如果她被指定為女生），或是過小的陰莖（如果被指定為男生）。在出生後三天，醫師們告訴雀司的父母，他們應該把小孩當作男生撫養，因此她被命名為查理（Charlie）。但是一年半之後，她的父母親仍然擔心查理不尋常的外表，因此便向另外一群專家諮詢。這些專家將她變性為女生，並告訴她父母，她會長成一位快樂、健康、正常的女人。她的父母將她的名字從查理改為雪柔，而醫生們則拿掉了她的陰蒂。

就像大衛，雀司在不知道自己出生實情的狀況下成長，因此，跟大衛一樣，她經歷了不斷接受神祕、沒有解釋的手術，以及定期性器官及直腸檢查的童年。也跟大衛一樣的是，她成長期間對自己的性別深感困惑。「我對槍枝和收音機比較有興趣，」雀司說：「如果我試著交朋友，通常結交的都會是男生，而且我會想打倒我弟弟。我無法融入男生群或女

生群，同伴總是羞辱、排擠我，總是拿我開玩笑。」十歲時，雀司的父母親帶她去看精神醫師，企圖讓她為未來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作準備，但是在青春前期以前，她就發現女生對自己具有性吸引力。

在十九歲的時候，雀司稍微打探了自己的醫療記錄，知道自己小時候動過陰蒂切除手術，因此她開始溯尋她的醫療史。她的醫師們阻止她，拒絕透露她的出生狀況，因此她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找到一位願意出示她醫療記錄的醫師。一直到那個時候，雀司才發現醫師們將她歸類為「真正的陰陽人」，意指生殖腺同時具有卵巢及睪丸組織的人。她也在此時第一次知道，她出生後的前十八個月是個名叫查理的男嬰，而她的父母、醫師、阿姨、叔叔、祖父母及親戚朋友們，都聯合起來瞞著她這個祕密。她也發現，她八歲時所動的手術（以解除「腹痛」），其實是要切除她生殖腺的睪丸組織部分。

雀司對眾人的欺騙感到既驚且怒，又因為失去陰蒂而感到難過，因為這使得她無法有高潮，於是，她開始尋找其他像她一樣的人。她寫信給醫學期刊和雜誌的編輯、發新聞稿、跟危機熱線登記，最後還架設網站，建立起一個連結全國各地中性人的網絡。在一九九三年，她把這個團體命名為北美洲中性人協會(ISNA,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是一個同儕互助、積極運動及鼓吹的團體。到一九九九年中期，雀司已經連結了來自全世界各地大約四百名的中性人，很多人的故事與她如出一轍。



跟雀司和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會員們見面，相當於進入一個無法以我們習慣的二分法——男孩／女孩，男人／女人來看待性別的世界。我在一九九七年春天時與他們首度見面，當時他們在紐約的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院(Columbia Presbyterian Hospital)外舉行和平示威，雀司就是在這家醫院切除陰蒂的。拿沃可特(Heidi Walcutt)為例，就遭傳學來講，她是個具有XY染色體的男性，但她生下來卻有一個構造原始的子宮、輸卵管、體內輸精管，和細小的陰莖，她形容自己為「真正的美國性別拼花被」。又例如寇文翠(Martha Coventry)，她生下來就有過大的陰蒂，卻又有功能正常的女性生殖系統，如今已是兩個女孩的母親。另外，翠亞(Kiira Trea)兩歲時被指定為男生，直到青春期月經第一次從她的陰莖流出來時，她才知道自己是中性人。時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翠亞被轉介給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曼尼博士，從十四歲到十七歲這個期間，都在該中心接受治療，與布蘭達同時期。

翠亞和大衛從未見過面或說過話，但是她的故事卻與大衛的有驚人的相似處。她敘述曼尼博士在很顯然是要確定她認同男性還是女性的狀況下，以他著名的坦率言詞，詢問她的性生活情形。「你曾經幹過別人嗎？」她記得曼尼是這麼問的：「你不會想要幹別人嗎？」翠亞同時也描述，曼尼怎麼用他辦公室內的放映機，播放色情電影給她看。「他想要知道我認同電影裡的哪個角色。」她說。

曼尼宣稱，中性的嬰兒若當作男孩撫養，就會發展出明確的男性性別認同，但是翠亞的性意識和自我意識情況卻複雜許多。十四歲的時候，她同意在約翰霍普金斯接受女性化手術，模擬女性生殖器，但是當她三十二歲第一次有活躍性行為時，她卻發現她的性欲對象是女生。

在雀司團體裡的其他中性人也有類似的複雜性意識。麥克斯·貝克(Max Beck)原先是被指定成女孩來撫養，取名茱蒂(Judy)。儘管有強烈的男性想法、愛好、行為和態度，茱蒂試著維持她被指定的身分，以免使家人和親友擔心，甚至在二十歲出頭便結了婚。但是二十七歲時，茱蒂離了婚，走出婚姻。三十二歲時，她停止服用雌激素，改名為麥克斯，並開始使用睪固酮貼片。「我總是覺得，也永遠會覺得，自己是中性的，」他最近寫給我的電子郵件內這樣說：「『男性化』僅是一個比較舒服的妥協，而睪固酮也只是比雌激素可口的荷爾蒙雞尾酒而已。」

並非所有加入雀司團體的人都在嬰兒時期作過變性手術。迪沃是一位一九八〇年代在曼尼旗下作過研究的心理學家，他在一九五八年出生時，有嚴重的尿道下裂(hypospadias，陰莖從底部至尖端裂開)，而且睪丸既沒有發展，也沒有下降，但他仍然被當成男孩撫養。從三個月大開始，他童年時期忍受了總計十六次的「正常化」手術，為的就是要給他一個外觀良好的陰莖。迪沃說，這種經驗真是情緒上的蹂躪，而且根本不需



要。他的生殖器仍然不像正常的男性，而經常住院的唯一結果，就是所造成的精神傷害，遠比讓他只進行心理輔導，接受生殖器異常來得更嚴重。迪沃按捺住自己的看法，沒有跟曼尼爭論。「我很早就了解到，如果你選擇向曼尼宣戰，」他說：「你將必須應付一位非常、非常生氣的人，他將會讓你因為挑戰他而後悔不已。」（迪沃說，一直到「強／瓊」的故事揭露，他才有勇氣公開他的中性身分，並且公開地挑戰他之前的教授。）

憑著自己及其他中性人的遭遇，雀司開始試著警告醫療院所注意約翰霍普金斯提出的中性處理教條的危險性。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宗旨在於廢除所有新生兒的性器官整型手術，而且不僅是陰莖過小的男嬰的去勢及變性手術而已。雖然雀司不反對為了拯救生命而進行性器官矯正手術，但她仍然譴責，所有為新生兒進行、對他們性欲或生殖功能有無法還原影響的不必要醫學整型治療是「野蠻」的。最後，她說，她想要「終結『與眾不同很可怕』的想法」。

雀司發現，要讓這個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傾聽，包括曼尼，超乎她預期地困難。「我多次寫信給曼尼，語氣客氣地詢問他是否可以表明立場，」雀司告訴我：「每次他都將我的信件退回，只在信的角度潦草地寫著他沒有時間跟我談。」

雀司也寫信給美國小兒科醫學會(AAP,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這個擁有五萬五千名以上來自美國、加拿大及拉丁美洲的醫師會員的機構。美國小兒科醫學會長期以來都

支持曼尼對於中性人的治療方式。「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是要告知諸位，我們許多依循諸位治療模式的人，發現這些治療讓我們的生活苦不堪言，」雀司在一九九五年寫給美國小兒科醫學會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們這些中性人透過北美洲中性人協會交換經驗……我們發現，現有的治療模式並未減少中性人的羞辱及難以啟齒……我們想要跟諸位談談，並希望諸位在教授中性人治療課程時，能夠提到世上有一群公開發聲、有組織的前中性病患，而且他們反對現有的治療模式。」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並沒有回覆這封信。雀司在一九九六年再次寫信給他們，卻同樣沒有回音。那年十月，雀司和其他北美洲中性人協會會員在美國小兒科醫學會於波士頓舉行的全國大會外示威。學會的官員拒絕和抗議者見面，但是向示威群中的記者及抗議者發表新聞稿：「美國小兒科醫學會替兒童代言超過六十年，了解中性人的顧慮，也體會他們的需要。」這份新聞稿也說明了，美國小兒科醫學會不會改變他們對於中性人治療的原則，同時引用曼尼一九五〇年代的研究來為他們的立場辯護。

雀司也跟前衛生署署長愛德絲(Joycelyn Elders)陳情，她在加入柯林頓行政團隊前，曾是阿肯色州開業二十年以上的小兒內分泌科醫師，定期採用曼尼的中性人治療原則，來處理外陰性別不明的新生兒。愛德絲從不曾回應雀司的信件。

一九九六年，雀司終於成功說服《紐約時報》撰寫一篇專文，報導正在萌芽的中性人



運動，但是在這篇專文中，醫療院所的人員都拒絕討論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抱怨。約翰霍普金斯小兒泌尿科主任吉哈(John Gearhart)駁斥這個團體為「狂熱份子」。吉哈一九九七年夏天跟我談話時，正身處戴蒙及西蒙森針對失敗雙胞胎案例的報告所捲起的媒體風暴，因此提起北美洲中性人協會及大衛的案例時，圓滑許多。雖然他仍然堅持，對於生來陰莖過小或因傷失去陰莖的男孩而言，變性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只是如今因為陰莖重建技術的進步，讓他對建議重整比較遲疑。「如果強／瓊的故事發生在今天，」他告訴我：「我會跟父母親坐下來談，跟他們說：『小孩有睪丸；他是個正常的男孩。』我會認為你們可以改變小孩的性別，但是我不推薦，因為從強／瓊的事件之後，重建生殖器的手術已有長足的進步。」

吉哈也說，醫藥的進步讓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顧慮早已過時。「當這些北美洲中性人協會會員在二十五或三十年前動手手術時，還沒有真正的兒童重建手術，」他說：「的確，〔這些孩子〕大部分接受過陰蒂或陰莖切除術。那是錯的，可以吧？那是錯的。但是外科醫師當時不知道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進行現代重建手術的人不再切除小嬰兒的陰蒂或陰莖，或是任何相關的器官了。」吉哈說，現今的顯微手術能夠保留器官的感覺。

在聽完吉哈這類醫生和雀司這類運動份子之間來來往往的意見後，可以想見，相關的議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例如，雀司斷然否認吉哈所宣稱的，以手術縮小陰蒂尺寸

後，仍然可以保留它的感覺。吉哈則仍然拒絕北美洲中性人協會改變現有治療程序的要求，並堅持，根據記錄，嬰兒時期進行過變性的中性人，大多都過著快樂的生活，雀司和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成員只能代表「不滿的」少數。對於這樣的指控，雀司和其他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成員特別反對。他們堅持，成年中性人保持沈默，並不表示他們高興別人在他們小時候幫他們作的決定，相反地，它代表著羞辱和守口如瓶，正是現有治療方法的遺害。

「這要追溯到孩童時期完全的孤立，」沃可特告訴我：「知道自己和別人這樣不同，卻得對這種不同保持沈默、感到羞恥。有些人從來不曾尋找過解答，更別說站出來做個反抗過去的運動份子。」雀司也說，還有一個讓中性人不敢站出來的強烈原因，因為這表示必須和當初決定讓他們動手術的父母痛苦地對質。雀司指出，很多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的會員與他們的家人都因而疏遠了。

對於我這個獨立的調查者而言，顯然難以證實吉哈與北美洲中性人協會相互衝突的說法，何者是正確的；也就是說，拒絕站出來自陳遭遇的成年中性人是否快樂？因為就定義而言，他們本來就是隱而不見的。當我問到能不能提出一位滿意的病患時，我接觸過的每位小兒科專家都以同樣的理由回答，說他們在病患剛成年時就與他們「失去了聯絡」。吉哈則補充：「我知道的那些人，現在只想平靜地過生活。」



我終於找到一位不屬於北美洲中性人協會或其他行動團體的中性人，並和她談了話。她也頗有名氣，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經常被提到是嬰兒時期變性特別成功的例子。她的案例不但在得到艾美獎的ABC電視台科學系列記錄片中報導過，也在BBC雙胞胎案例的調查報告中出現過。她就是博拉，之前是曼尼的病患，並曾在威廉斯及史密斯披露雙胞胎案例時，為平衡起見而被列入。她現在隱姓埋名住在東北部，我透過列有人口普查資料的網路搜尋引擎找到她。博拉同意與我會談，條件是我不得透露她的姓氏或是她的身分。

透過與博拉和她母親通過多次電話，以及進行過五個小時的面對面訪問之後，我了解了博拉出生時的狀況。她的狀況和我已從雀司及其他北美洲中性人協會會員那兒聽來的故事，在很多方面都極為雷同。博拉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生，在三個小孩當中排行第二，生下來便外陰性別不明，有陰囊、裡面卻沒有睪丸，有一個小陰莖、但大部分只是空皮囊而已。當地的醫師建議把孩子的性別確定為男生，認為陰莖會再長大，睪丸假以時日也會下降。這名嬰兒於是被命名為麥可(Michael Edward)。但是在麥可一歲半以前，他的母親還是對孩子的外貌感到沮喪，並持續與醫師諮詢。當麥可八個月大時，一位曾經聽過麥可母親告白這個兩難狀況的鄰居，拿了一本當期的《時代雜誌》來，裡頭報導了一對雙胞胎，兄弟之一割包皮時失去了陰莖，稍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心理學家曼尼的建議下變成女生。根據《時代雜誌》的文章，他的變性相當成功。麥可的母親立即寫信給曼尼博士，而曼尼博士也

很快回信，並建議她帶麥可到巴爾的摩來，馬上進行變性手術成為女生。「兩天之內，」博拉的母親說：「我和先生跟小孩就在往巴爾的摩的路上了。」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麥可在約翰霍普金斯由瓊斯醫師操刀動手術。瓊斯確認這個小孩，就像雀司一樣，其生殖腺同時具有卵巢及睪丸細胞。瓊斯拿掉了這孩子尚未降下的生殖腺，以防青春時期會出現自發性的男性化，並重建其外部性器，讓它看起來更女性化。陰道的整型則要等到小孩青春期再作。同時，博拉被安排定期回約翰哈普金斯由曼尼博士進行心理輔導。的確，博拉的母親在她女兒童年時期，每年都會帶她到曼尼那兒回診好多次。因為曼尼博士經常提到，博拉是他最好的病人之一，所以當博拉剛過七歲生日不久後，曼尼博士問博拉的母親，是否願意讓博拉上電視討論她成功的變性時，博拉的母親並不驚訝。「我說：『如果這樣做能夠幫助別人的話，』」博拉的母親回憶著：「『我想要的就只是那樣。』」

那個節目是ABC電視科學系列《人類身體》(The Body Human)的一部分。那一集的名稱是「性別」(The Sexes)，當中拍攝了博拉(一個滿臉雀斑、短髮的女孩)某次到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回診的一幕。鏡頭慎重地與曼尼掛滿植物的辦公室內陳列的生殖器雕塑，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位知名的心理學家坐在他的桌前，只穿著襯衫和領帶。他向坐在一張披著毛毯的扶手椅上、面對他的博拉問問題。博拉穿著一件蕾絲衣領的碎花洋裝，塗著亮紅色



的指甲油，當她吞吞吐吐地回答曼尼關於婚姻及職業的問題時，她小心翼翼地微笑著。同時旁白解釋：「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裡，在專家曼尼博士的啟發性照顧下，女孩博拉的自我意識被賦予細心的呵護培養，以便為她未來完整的女性經驗作準備。」

一九七九年五月，這個節目播出不久後，曼尼再度要求博拉的母親讓博拉上電視，這一次是面對BBC的記者。博拉的母親再次同意，於是曼尼博士先與威廉斯和史密斯安排訪談博拉的母親。這次拍攝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初開始。根據博拉母親的看法，相較於和ABC電視台製作人接觸的經驗，這一次的訪談比較不自在。在訪談完的幾小時後，她接到曼尼博士激動的電話，他告訴她，BBC的記者拍這部記錄片「別有居心」，並要博拉的母親別接受訪問。當他知道記者已經作完訪問時，他相當震怒。「他對這些記者相當生氣，」她回憶：「氣極了。」但是這次糾紛並沒有損害博拉母親及曼尼博士之間的關係。她繼續帶博拉定期去看曼尼博士，直到博拉滿十八歲，作完最後階段的陰道手術後，才不再去約翰霍普金斯。

現在，博拉二十七歲了，她身材細瘦，藍眼，黃褐色的直髮旁分直垂到腰際。她穿著牛仔褲、藍襯衫和一雙平底露趾的涼鞋，看起來無疑是個女人，雖然是個身材像小男生的女人。她的小胸部和臀型必須靠著終生定期攝取雌激素來維持。她特意將粗糙的聲音拉高，但是有時候還是會出現幾個比一般聲音低沈女性還低的音節。博拉很勤於修飾外表，

非常照顧她長而濃密的頭髮，每週都會去美容院修一次手指甲及腳趾甲，而在我們談話時，她經常以訓練過的化妝師技巧整理她的妝容。

儘管有這些加強她女性化外貌的顯著外在努力，博拉說，私底下，她別無選擇地每天都會想到她的醫療狀況。就像和我談過話的其他中性人，博拉動手術做的陰道天天提醒她，自己並非天生的典型女人。「我看起來不像其他人，」她說：「一點都不像。所以你當然總是會被不斷地提醒這一點。」當問到她的陰道是否有感覺時，博拉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當你哪裡有傷時，總是會缺乏感覺。」了解這些現實狀況後，當博拉說儘管醫藥再進步，她還是一直感覺自己「帶著祕密」生活時，就不太令人驚訝了。在被問到她是沒有任何親密的朋友，可以自在地傾訴祕密時，博拉的表情僵硬，帶著一閃即逝的嘲諷輕笑著：「你在這世上幾乎沒有朋友——相信我。」她再吸了一口煙。「沒錯，」她以相同的口吻繼續訴說：「你可以相信的人，這世上太少了。」她說她曾經有一位從青少年後期到二十歲出頭、交往了六年的男朋友，她把自己這個祕密告訴他，而他也能理解，然而，從那次之後，她寧可把自己的狀況和出生時的情形，保密不說。

博拉二十七歲仍然是處女之身，並說她從來都沒有被女人吸引過。當我問這個問題時，連問題都還沒問完，就被她打斷。「一點也沒有，」她說：「從來沒有、從來沒有。一點都沒有，一點都沒有。」我問她，在成長過程中，是否曾經想過，「也許我是個男



孩」，但是她又在我問完整個問題之前打斷我。「從來沒有，」她說：「一點也沒有想過。」

博拉坦白表示，她不想質疑母親在她還是嬰孩時所作的決定，以免讓母親難過。她堅持她很開心這個變性為女生的選擇——或者應該說，她覺得當時也沒有其他的選擇。「我不覺得事情還有其他的出路，」她告訴我：「你知道嗎？」她停頓一下，再繼續說下去：「在當時，對任何人而言，這個決定，好像是唯一的選擇。」

就像其他與我談過話的曼尼研究對象，博拉對於曼尼的心理輔導記憶猶新。曼尼要她看男人與女人性交的照片，並問她最私密的問題。博拉回憶：「他問的是六歲、七歲、九歲或十歲小孩絕不會被問到的問題。」也就是自慰、她的私密性幻想、如何轉移其他女孩對她的同性戀舉動等等問題。「他會逼你回答，」博拉說：「他會坐在那裡，一直逼、一直逼、一直逼。一個小孩子是無法承受這些壓力的。我總是跟媽媽說：『我不懂我幹嘛要去看他。』」

上電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開的七歲小中性人，博拉說，這也是「很痛苦的」。當她在討論與曼尼博士的接觸時，博拉的用字及音調失去了穩定的女性溫柔。當她嘴裡吐出一連串生氣的字語時，她的聲音低沉了許多。「那些上電視的屁話都是胡說，」她斥罵著：「根本就是胡說八道，這經驗很痛苦。我是說，你要了解，當時我已經上小學了，班上的同

學第二天都在問我那件事情。我年紀太小，不能自己作決定，但是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絕對不會那樣做。那都是因為我媽媽。」她說著，臉上掛著寬恕但惱怒的微笑：「她太愛曼尼，會做任何他叫她做的事。她以為她在做好事，在幫助其他的母親，但我認為那根本就是放屁。」

博拉的母親從未質疑她為博拉所作的決定，也不曾質疑曼尼處理這個案例的方式。到今天為止，她仍然稱呼曼尼為她的「拯救者」，在談到曼尼和原本是男生的女兒變性時，她都用最熾熱的讚美。「博拉的一切都很成功，」在我跟她女兒見面之前，她在電話裡用一種忘我的上揚語氣告訴我：「她充滿生命力，而且很風趣。她從未跟我說過什麼耽憂的事。她真的很棒！是個愛參加派對的女生。她熱愛生命、派對，愛出去玩，有一堆又一堆的朋友，電話從來沒停過。」她把博拉形容成百分之百的女性：「她愛死了當女生。愛購物，都買最貴的衣服，還有珠寶，每件東西都要是名牌。」她說，博拉小時候從來沒有像過男人婆。（這項觀察與ABC某位製作人的記憶剛好相反，他對七歲博拉的印象是：「小男孩仍舊是小男孩，無論他們對他做了什麼。」）

但博拉的母親的確談到她對博拉現在的生活，有一個小小的憂慮：女兒仍舊是單身。當博拉的父母帶她到約翰霍普金斯時，曼尼博士還特別解釋，變性是為了確保博拉有一天能結婚、擁有正常的異性戀生活和領養小孩。博拉的母親驚嘆：「曼尼博士看得真遠。」



婚姻是曼尼博士預言當中，唯一尚未實現的部分，但是博拉的母親還沒放棄希望。「對我來說，」她說：「終有一天博拉會結婚的。」博拉看著母親說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後把眼光轉開望向別的地方。

博拉懷疑自己是否會結婚。原因之一是她不尋常生殖器的微妙狀況——博拉覺得那是她與伴侶身體及心靈親密交流的嚴重阻礙。另外一個原因是，博拉認為婚姻是過時的機制。所以現在，她繼續跟父母住在家裡。她的父親患有嚴重的憂鬱症，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關在房裡，因此博拉大部分都是與母親相處。她們的關係雖親近，但情緒上又很複雜，博拉全心照顧母親，但有時她會突然脫口衝出一陣咆哮。在成長過程中，博拉多次聽說自己出生時帶給母親嚴重的痛楚，因此她在生活中會儘量減少自己可能造成的沮喪或不安。博拉因此告訴她的母親，她會永遠住在家裡照顧她，而且「永遠不會離開她」。

同時，博拉也專注於她的工作。博拉選擇的職業，並非沒有挑戰性，卻沒有反映出她的高智商。她十歲時在約翰霍普金斯作測驗，智商高達一三二，占人口的前二・二%。當時，曼尼的同事林恩(Gregory K. Lehne)在博拉的檔案裡寫著：「未來的學業計畫可以包含大學和專業訓練，成功是必然的。」事實上，博拉曾經計畫當律師，但是在她大三的時候，她母親說希望她能當護士，於是她便放棄了這項野心。雖然博拉一直表現出對所有醫學專業可以理解的厭惡，她還是從大學退學，轉而就讀護理學校。目前博拉是一名註冊護

士，而且在攻讀護理碩士。她的母親對於這些發展感到「欣喜若狂」，且直誇耀博拉如何「從未回首過去」。

博拉似乎是一個決心不回首過去的年輕女子。她說她對那些遊說改變治療方式的中性人運動份子沒有任何評論，但是她自己抱持的立場是，最好繼續生活、不要挑起過去。然而，當她的母親出門後，博拉小聲地承認：「也許他們應該等一等，讓孩子對手術有選擇的機會。」不過，這個意見她是不可能傳達給醫療專業人員的。她最近拒絕了約翰霍普金斯針對變性病患進行追蹤研究的要求。她只是不希望讓她的童年再曝光——雖然她堅持是相當快樂的童年。但是她童年時期所留下某種程度未解決的情緒，也許可以從今天博拉選擇專攻產科及婦科的事實看出來。如今，她在那間她二十七年前以麥可的身分出生的小醫院中，幫助接生寶寶。

對雀司而言，醫療院所拒絕傾聽已經選擇站出來說明他們經驗的中性人，一點都不令人驚訝。雀司曾經如此寫道：「我們的立場暗示著，他們已經在職業生涯中，施以病患永遠無法完全復原的傷害（比較好的是無心之過，最惡劣的則是蓄意否認）。」她說，除非受



迫，否則她也不期盼醫療院所會改變他們的治療，而雀司計畫要逼迫他們。「我認為，未來的環境會讓持續這樣做的醫師很容易被告，」她告訴我：「但是創造這樣的環境需要一段時間。現在我們無法提出告訴，因為它是標準程序，而且有父母親的同意。我們想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當他們向父母親提出建議時，他們必須說這是實驗性的，沒有證據顯示它一定有效，而且許多接受過這種治療的病患都十分憤怒。」

當然還有其他的需要。費絲托史得林 (Anne Fausto-Sterling) 是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的胚胎學家，她就認為醫療院所必須提供家長教育及情緒協助，來幫助他們面對撫養生殖器異常嬰兒的艱困課題。「目前沒有受過性心理發展專業訓練的人員所進行的持續諮商，」費絲托史得林說：「如果要大規模地改變，那麼醫療專業必須做到像遺傳諮商那樣，也就是培養一群專業人員，長期與這些家庭合作，幫助他們解決情緒及現實疑問。現實問題非常實際，像是在健身房更衣時，我該怎麼做？我如何介入學校體系？眼前有相同的基礎結構必須建立和付諸實行，我認為這是醫師的責任。」

也許最需要改變的，是醫師現在對於撫養所謂外陰性別不明小孩的看法，因為曼尼以及霍普金斯的準則是基於一個信念，亦即若不加以治療，這些病例的童年心理和性心理都會受到傷害。但是，能夠證實這種憑直覺觀察而來的真相的研究很難見到，因為既然很少有中性新生兒躲得掉手術的介入，小孩帶著不明生殖器長大的案例自然很少見。一九八九

年，確實有一篇研究出現在《泌尿學期刊》(Journal of Urology)上，主題是二十名以生物性別撫養長大的陰莖過小男性。倫敦聖彼得醫院(St. Peter's Hospital)及病童醫院(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的萊利(Justine Reilly)及伍得豪斯(C. R. J. Woodhouse)描述，這些病患年紀從十歲到四十三歲，他們都有健康的男性性別認同，並且「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參與正常男性的活動」。他們報告，較年長的病患中，有九名(七五%)性事活躍，而且「通常可以從陰道插入，只是需要調整姿勢或技巧」。研究者得到兩個結論：「陰莖細小不會阻礙正常的男性角色，而就算陰莖過小或相關性器官過小，也不能因而就在嬰兒期將小孩變性為女性。」

然而，萊利和伍得豪斯的研究只檢視了二十名男性病患的生活，而且他們的症狀都一樣。另一篇研究則更為徹底地研究未經治療的陰陽人的生活，他們的症狀範圍更廣，不只是陰莖過小而已。這篇研究寫於一九五五年治療教條出現之前，是一篇獨特和令人驚異的專題論文，檢視超過二百五十名出生時沒有接受過手術治療的陰陽人。再者，這篇專文直接研究，當小孩帶著和他們養成的性別相反的性器官長大時，他們如何生活？「要跟這麼明顯的性問題奮鬥，(這些人)是否會像精神科理論所說的，在壓力下崩潰，」研究的作者這樣寫著：「還是能適當地調整以應付生活所需？」

研究顯示，大部分病患完全沒有嚴重的精神創傷及心理病症，他們超越了性器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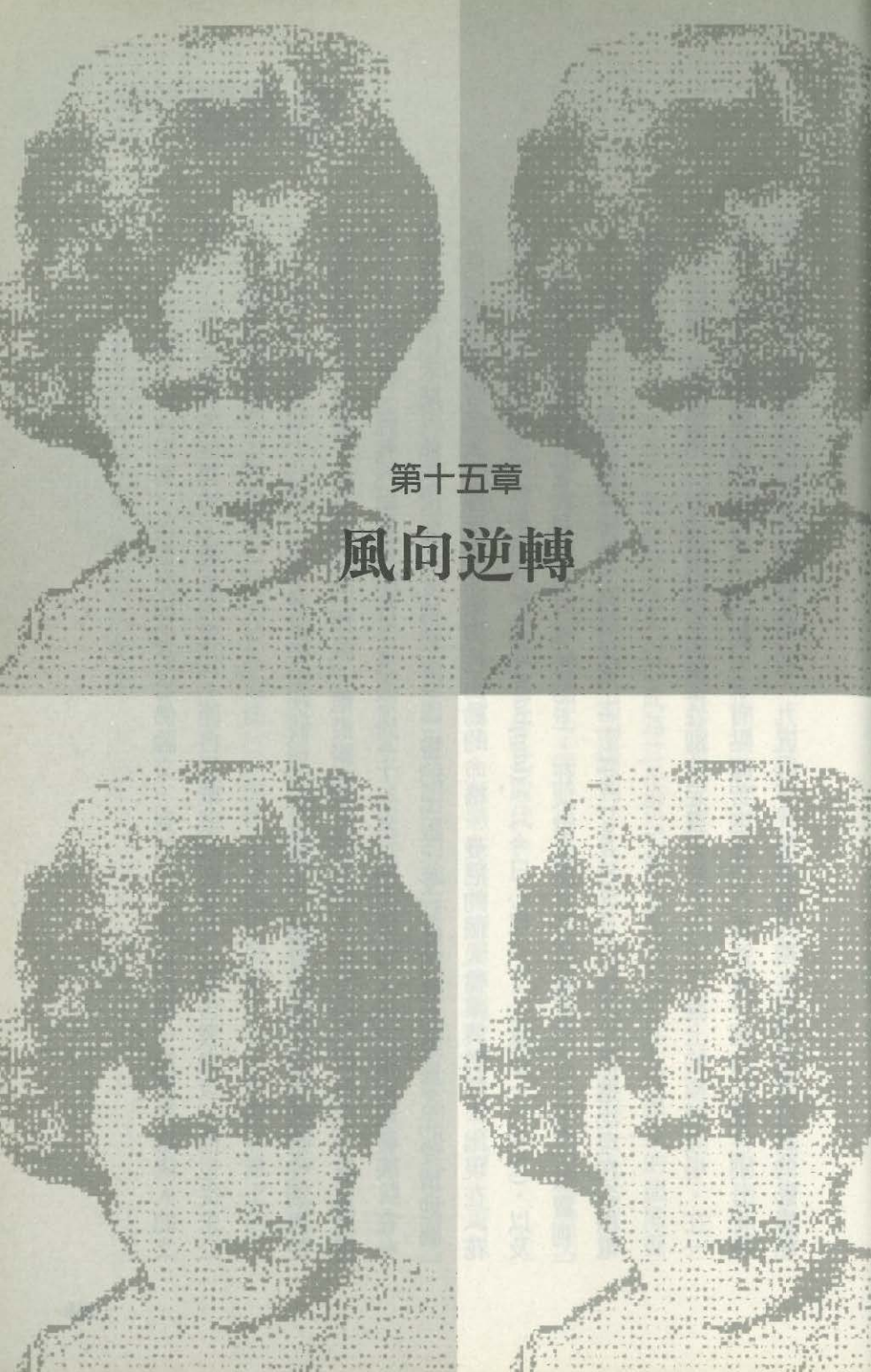
不僅對生活作了「適當的調整」，而且生活幾乎與性器正常的人沒有兩樣。這樣的結果顯然讓作者們感到十分驚訝。

「如果半陰陽症的矛盾是精神病或精神官能症的重要來源，我們也不會驚訝，」作者寫道：「但是，證據顯示，最曖昧的陰陽人，亦即那些無法不知道自己性別曖昧的人，他們發生所謂功能性精神病的比例其實非常低。而典型的神經精神病狀（病情相當嚴重且不會錯認）的發生率，也明顯地很低。」研究指出，生殖器官不明確造成部分病患情緒上「消沈」，或社交上的「壓抑」，但研究也指出，這些人「沒有證據顯示，他們的沮喪或壓抑會日積月累引起精神疾病，嚴重損害他們應付日常生活需要的能力」，例如完成教育、每天上班以及每週努力賺錢等。

這篇研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深入訪談了十名直到年紀夠大可以自己下決定前，從未接受過手術或荷爾蒙治療的陰陽人。他們的生活更加深了調查人員的印象，堅信生殖器官的情況，對一個人形成穩定且健康的性別認同，幾乎是無足輕重的，更別提是否關乎一個人安全和自信的自我形象。一名生下來陰蒂過大的病人，直到十二歲才接受手術縮減它，她帶著男性生殖器官度過的童年，並沒有對她的心理造成傷害，也沒有損害她身為女孩的自覺。「你會欣賞她過人的精力，以及凡事靠自己的態度。」作者這樣註明。第二個有著類似醫療史的女孩，則展現了清楚的「社交靈巧度及整體的平靜」，而且，儘管母親有

憂鬱症，「她比她成年的兄弟還要來得穩定」。另外一個到十二歲才同意改變自己男性生殖器的女生，「沒有人有理由說她跟其他青少年不一樣」。一名陰莖過小但沒有接受治療的男孩，則在二十四歲時便已結婚，而研究指出：「他的生活相當成功，沒有任何精神病的疑慮……他的生活是人類個性活力最有力、最明顯的見證。」一名陰莖過小、陰囊分開、青春期胸部發育的「真正陰陽人」，以男性的身分生活，從未動手術矯正這些異常。「這名年輕人又是另外一個活生生的見證……證明面對各種性別不明確的情況時，人類性格可以有多大的能耐。」一名十七歲大的男孩，童年及青少年時期都未治療他過小的陰莖，「現正對其生命作出頑強的、幾乎是英勇的調適」。同樣地，一名二十歲、出生時陰莖細小且分裂的男孩，必須蹲著上廁所，一直到十九歲時才矯正。這名病患「幾乎是一般民眾所能想像的健康、調適良好的典型美國年輕人，」作者註明：「自信、自立且樂觀。」

很不幸地，在中性人治療爭論中的任何專家，包括戴蒙、雷納、費絲托史得林或雀司，都沒有提過這篇相當有價值的研究報告。這樣稀有且獨特的報告會被忽略，也許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這篇報導從未經過商業化的發表或發行，只能向哈佛大學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提出書面申請才能取得，因為它是該校一九五一年一位大四學生申請博士計畫的論文。作者是一名三十歲的博士候選人，名叫曼尼。



第十五章

風向逆轉



曼尼從未對外說明，自從完成他的哈佛論文，到他四年後撰寫第一篇關於陰陽人的文章中，這段期間內他想法上發生的變化，而自從戴蒙和西蒙森的報告發表後，他也從未公開地評論過自己的任何作品。

如今他已經七十八歲，差不多是半退休狀態了〔譯註1〕，儘管如此，他仍然是性別與性取向議題產量豐富、固執已見的作家。他最新的著作《說不出口的怪獸》(Unspeakeable Monsters)，於一九九九年春天印行。過去這二十年來，他的書和文章持續定期發表，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他更因為《愛情地圖》一書的出版，受到媒體熱烈追逐。「愛情地圖」是曼尼用來形容個人特殊性愛品味與性衝動的命格。曼尼的個人檔案與訪談，出現在《花公子》(Playboy)、《柯夢波丹》(Cosmopolitan)、《今日心理學》、《萬象》(Omni)、以及《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雜誌上。在一九九〇年那期「熱賣刊」(Hot Issue)上，曼尼更被喻為「發燒愛博士」(Hot Love Doctor)。此外，他還出現在各種電視節目中。

同時，曼尼開始巧妙地轉變他早期在性別決定養育勝於天生理論上的極端立場。在一九八八年五月的雜誌人物特寫中，他似乎有點痛苦地把自己描述成一個為心理性別分化的生物角色長期奮鬥的戰士，他說當他在一九五〇年代發表胎兒期性荷爾蒙對行為的影響相

關論文時，「許多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對於在我們出生之前，血液中的荷爾蒙會影響自己性別分化的想法感到憤怒」。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當中，曼尼重申他的主張，指出依靠手術和荷爾蒙的治療，小男嬰也可以變成異性戀的女性。

倘若過去二十年，曼尼鞏固了自己成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性心理學家的國際聲望，相對地，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生涯，卻遭遇到一些挫折。曼尼的問題早在一九七五年開始萌芽，當時約翰霍普金斯的精神科主任、同時也是曼尼在醫院裡長久以來的保護者艾克斯(Joel Elkes)被撤換，由麥克修(Paul McHugh)取代。

麥克修稱得上是一名十足的務實天主教徒，厭惡在精神病學中搞什麼時髦流行，可以說是與曼尼完全相反的對頭——只除了他對自己想法的強力推銷和付諸行動的決心之外。如今，麥克修以精神病學界最敢言的鞭笞者聞名。在提到麥克修「為促進本身專業健全永不停歇的行為」時，一九九七年《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的人物特寫，就曾經封他為「破除舊習博士」。文中更條列出他「對於由醫生協助自殺(絕對錯誤)，到多重人格失調(根本不存在)等各種情事的輕蔑看法。」該特寫還特別強調他對「醫學專業上的可

〔譯註1〕此書英文版付梓之際，為二〇〇〇年。



疑行為，包括其執行人員」的痛責和不屑。被他痛斥的對象，包括了凱佛肯（譯註2）(Jack Keovkian)，麥克修稱他「瘋了」；還有著名的兒童專家貝托漢(Bruno Bettelheim)，麥克修說他是「說謊慣犯、不知感恩的朋友、邪惡的流氓，和無恥的剽竊者」。

麥克修一直秉持著對成人變性手術行為的輕蔑。他把變性癖(transsexualism)歸類為更大範圍人格失調的一種症狀而已，因此他長期以來都相信，心理專家應該以談話治療，而不是使用激進且無法變更的手術來醫治病人。在一九九二年《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上發表的文章中，麥克修嚴厲指責變性手術是「二十世紀精神科醫生所鼓吹的最激進治療」，並將此風潮比喻成一度流行的前額葉切除術(frontal lobotomy)。「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是〔變性手術〕始作俑者之一，」麥克修在文中指出：「當我在一九七五年抵達巴爾的摩時，我的目標之一，就是要終結這樣的做法。」

在麥克修來到約翰霍普金斯的兩年之後，霍普金斯的精神醫師，同時也是性別認同中心的主任梅爾(Jon Meyer)，開始長期追蹤該中心自一九六六年成立以來，在約翰霍普金斯進行過治療的五十名變性成人手術前後的狀況。梅爾的報告指出，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有明顯的改善，結論是：「就社會改造的觀點而言，變性手術並沒有提供客觀上的優點。」這份報告在一九七七年五月，於美國精神醫學會年度大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s Annual Convention)上發表，兩年後又刊載在《一般精神醫學彙刊》(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不過報告上指稱變性方法與目標的不科學方式，卻讓變性團體反應激烈，但他們的抗議徒勞無功。該篇文章的發表預告，是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約翰霍普金斯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宣布；記者會中同時告知在場記者，性別認同診所現已關門。沒有人通知曼尼要辦這場記者會，診所關閉也沒有人問過他的意見。對當初可以說是單槍匹馬、帶頭一手創立該診所的人而言，這可是件極不光采的事。

麥克修在約翰霍普金斯的任期，與曼尼在該機構一度穩固的地位（常駐性改革家）突然瓦解，發生在同一時期。一九八三年，曼尼接獲通知，他極具爭議性的夜間課程「人類性學」必須立刻停課。三年後，曼尼六十五歲，約翰霍普金斯通知他，不再保留辦公室給他（這是其他一些屆臨退休教授所享有的特權），他必須搬出校園。他被安置到離醫院和大學四條街遠的一棟老舊醫學建築物裡，對街是一塊許多當地流浪漢及毒癮犯聚集的空地。曼尼搬進那裡一間天花板很低的地下室辦公室，辦公室裡現在縮減到只有一名研究生幫他做事。曼尼在新地方廉價的三夾板門上，釘上從之前辦公室門上卸下來的招牌，上頭寫著：約翰霍普金斯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

即使在曼尼搬出約翰霍普金斯後，他和該機構之間的紛擾仍然尚未結束。在一九九〇

〔譯註2〕密西根州開業醫生，以協助病人自殺出名。



年代早期，一名他以前研究過的對象，對他和約翰霍普金斯提出控訴。這名希望保持匿名的病患，要求我以「查利·高登」(Charlie Gorgon)來稱呼他。這個假名其來有自，它是一九六〇年代丹尼爾·凱斯(Daniel Keyes)的小說《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mon*)中主角的名字。小說後來改編成由克里夫羅勃遜(Cliff Robertson)主演的電影《落花流水春去也》(*Charly*)。這個小說是描述一名智障男子，因為參與了實驗性的研究，而變成天才。《落花流水春去也》中主角的一生和這名我同意叫他查利·高登的男子，有驚人的相似處。

高登出生於一九四七年，小時候就有甲狀腺功能低下症(Hypothyroidism)，這是一種先天性內分泌失調，症狀包括了嚴重的發育不良，以及智力發展遲緩這種通常被歸類為「呆小症」(cretinism)的症狀。在他兩歲的時候，高登被轉介到約翰霍普金斯由威爾金斯主持的小兒內分泌中心，高登在這裡接受補充荷爾蒙的實驗性治療，醫生讓他攝取以牛隻甲狀腺腺體做成的藥丸。這種治療不僅讓他長高長大，更提高了他的智商。在五歲時，高登變成剛創立的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心理學研究對象，而後的二十五年，皆是由曼尼來主導，研究高登對於身體與智力變化的調適。在一九七八年九月於《小兒科期刊》(*Journal of Pediatrics*)發表的文章中，曼尼指稱，高登是所有研究對象中，智力增高最多的案例。根據曼尼的說法，高登從五歲時智商八四，躍升到成人時期的智商一二七：提高了四三%，讓

他從低平均值，提升到高水準——曼尼稱之為「驚人的躍升」。

在他們維持醫病的過程中，高登成為曼尼最喜愛的研究對象之一，他也同意曼尼的要求，出席醫學院的臨床學術研討會，讓許多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實習醫生們研究。在此同時，高登也每年定期前往中心，與曼尼進行深度訪談。高登發現這些訪談讓他相當不安。「他老念著『幹』，」高登回憶著：「『幹這個』、『幹那個』的」。我從小在虔誠的宗教背景下長大，當我做一些教會的事情時，他會說：『喔，你做那些狗屁事兒幹嘛？』」

曼尼也會很仔細地問高登有關性方面的事。因為相信曼尼之所以對他的性生活有興趣，都是為了要幫助他應付自己棘手的狀況，高登毫無保留地誠實以對，非常詳盡地說明自己的性幻想內容，描述自己手淫的技巧，還詳述了他試著搞三人行，以及童年時跟鄰居一個女生玩「扮醫生」的經驗。後來，到了二十歲時，高登坦承，因為自己身材矮小的不安全感，他一度跟年紀比他小很多的女孩來往，甚至有年僅十四歲的女生。一直到高登停止跟曼尼治療的多年之後，他才了解曼尼對他性生活的興趣，不僅僅止於治療本身而已。

這個領悟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可是來得特別強烈。當時他剛好在一家人書店閒逛，湊巧看到一本曼尼最新出版的書《野蠻的愛情地圖》(Vandalized Lovemaps)。這本書詳述了曼尼的理論，說明人類如何發展出性癖好、性變態和性障礙，並列舉了案例歷史。第一個實例名為「甲狀腺功能低下男性之戀童癖」，立刻吸引了高登的注意。他開始瀏



覽文章開始的幾段文字，卻既驚又恐地發現，上頭講的個案史竟然是他自己的經驗。他看到自己的性生活竟然從他和曼尼的訪談錄音帶裡逐字節錄、大量引用、一覽無遺地攤在眼前，又看到自己因為對十幾歲少女有興趣，就被診斷為戀童癖。讓他更震驚的是，高登說，曼尼也公開了他父母的資料，包括據說他父親告訴曼尼，高登母親曾與親兄弟亂倫的情節。雖然書中並未提及高登和他家人的姓名，但是他覺得從這個案例的許多細節看來，認識他們的人都會知道就是指他和他的家人。在震驚之餘，高登打電話給曼尼，但卻找不到曼尼。「他根本不回我電話，」高登說：「他的同事說：『他在忙。』」

一九九〇年春天，高登透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下設的研究風險保障辦公室(Office for Protection from Research Risks)，正式控告曼尼和約翰霍普金斯；這些單位都隸屬於美國的衛生部(DHH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高登此時才了解，拿聯邦資助研究經費的科學家，必須恪守嚴格規定，包括當科學家要發表病患和研究對象的消息時，必須告知他們，並取得他們的書面同意。曼尼在《野蠻的愛情地圖》中引用高登非常私密的資料時，從未取得他的同意。衛生部開始展開調查，作出的結論是：「從〔曼尼揭露的〕資訊內容看來，原告會被熟識〔他〕的人認出來。」那年秋天，衛生部裁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嚴重違反」保護人體實驗受試者的聯邦規定。衛生部要求採取「強烈的修正措施」，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精神醫學科「重新印製該單位保障病患身分的準則」，讓病

患在拿到知情同意書時，可以在出版前先閱讀手稿。另外，該機構也要求曼尼必須親自在系主任，也就是曼尼的死對頭麥克修博士的陪同下，向高登道歉。高登說，曼尼根本沒有跟他道歉，但是他感到正義獲得了其他制裁的伸張。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柯林頓總統的國家生物倫理諮詢委員會(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召開有關人體實驗受試者的會議，在會上，高登準備了一份資料，大致說明了他與曼尼之間不愉快的經驗，並把自己被當成研究材料的經驗，與八個月前才在媒體上爆發的著名「強／瓊」案例相提並論。

儘管在專業上遭受一連串的逆轉、難堪與懲罰，曼尼依舊目中無人、鬥志旺盛、不受威脅。事實上，這些挫折似乎更加燃起他的鬥志。曼尼不斷發表的作品，除了讓他闡明人類性取向的議題，也是他報仇出氣的工具。他在一九八七年一本表面為說明性取向起源的著作《同志、異性戀，和介於兩者之間》(Gay, Straight, and In Between)的序中，不尋常地離題談到他最近被約翰霍普金斯趕出去的事情。「在一九八六年春天，」他寫道：「我接到命令：分配給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的空間……將要重新安排。新的地方是在遠離醫學院校園的一棟商業建築內。該命令沒有附帶進一步解釋，也不接受上訴……我的回應，就是寫下這本書。」

一九九一年，曼尼在收錄於文選《臨床心理學史——以自傳呈現》(The History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裡的自傳式文章中，繼續從他對性學研究貢獻的主題，



轉向他和約翰霍普金斯的戰火。曼尼忿忿不平地談起他人類性學課程被停課的事情，寫道：「約翰霍普金斯學生們的損失，反而變成全世界學生的收穫。我現在已經更有空寫書給他們看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曼尼痛罵麥克修（沒有指名道姓）是「我所見過最好辯、最愛毀滅他人的人」，還得意洋洋地說：「他暗中想要除掉我的努力白費啦。」對於他現在只能在陰森危險的地下室設置心理荷爾蒙研究中心這種大不如前的處境，他的敘述口氣一如往常般大發豪語。他寫道：「被放逐至校園之外、以人工照明而生長茂密的綠色地下叢林之中，我感覺自己好像是伽利略之流的異議份子，因為梵蒂岡教廷的命令，而被追軟禁家中，過著放逐的生活。」

或許是無可避免之事，在同一篇文章中，曼尼也提到了在性別發展領域中，多年來挑戰他科學理論的人。雖然他沒有提到戴蒙的名字，但那位夏威夷大學的教授，卻無疑是那串如今曼尼批評為「無恥」攻擊他的惡人名單上前幾號人物。在抨擊過這些批評者之後，曼尼又以神祇般的傲慢轉變了語氣，說他在學術界的挑釁者根本不值一顧。「我個人的印象是，」他寫著：「他們根本缺乏原創思考的天分，沒有辦法發展出新的觀念和假設，當然也不會有新發現。」對於他在學術界中存活下來的事實，曼尼寫說：「我存活下來是因為我把自己的原理付諸實行，而且沒有受到誘惑，打一場我絕不可能打勝的仗。我不直接攻擊，相反地，我採取了脫離的策略，把我的力氣用在其他的成就上。」

六年後，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曼尼將這個脫離的策略付諸實現，當時，他的事業與聲望，因為戴蒙和西蒙森雙胞胎案例的文章引起全球各地的媒體反應，而遭受前所未見的重創。對於許多新聞機構要曼尼談談這個如今已成醜聞的醫學案例的要求，這位心理學家都援引隱私法條拒絕發言。我當時也在這群邀請曼尼作訪談的記者之列（為了準備《滾石雜誌》的文章）。在信中，我極力呼籲他和我談一談，並跟他保證，我會以謹慎的客觀來報導這個故事。他拒絕了，但是接下來的幾週或數個月，我們幾次用電子郵件往返，他在信中終於表示，願意和我合作，以匿名方式一起作一篇他所謂的「調查性新聞報導」。他表示可以提供他發表作品的必要影本，同時可以檢查我尚未發表的文章中「某些資料的正確性」。

但他的這項邀約卻在八月下旬收回了。我在第二趟前往溫尼伯之旅返回之後，首次通知曼尼，我已經找到病人，並且和他與他的家屬訪談過，同時我也已經獲得大衛的承諾，要簽署放棄私密權的同意書。如此一來，曼尼就可以自由地跟我談論這件案例。曼尼說話的口氣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從原本可能的匿名合作者，變得冷若冰霜。「謝謝你在八月二十四日的電子郵件。我的回覆是，我的立場現在沒有改變，未來也不會有變化。」他這樣寫著：「我現在沒有時間接受有關利馬案例的訪談，也沒有進一步的看法要說明，所以請你斷念吧。」

接下來的兩個月內我的確斷了念頭，專心撰寫《滾石雜誌》的文章。在十一月初，文



章即將發表，我打電話到曼尼的辦公室，跟他的助理王威廉(William Wang)確認某些細節。當曼尼把電話接過來時，我相當訝異。雖然他拒絕了直接討論大衛的案例，他還是強調，媒體的報導根本只是反映出保守的政治偏見罷了。他對於《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特別憤怒。「這根本就是反女性運動，」他說：「他們說男性與女性的差異都建立在基因上，所以女人應該回到臥房及廚房。」而對於他無法說明案例結果，曼尼並沒有任何道歉之意，只是重申，因為利馬一家人沒有回去約翰霍普金斯，所以他無法作後續追蹤，他和他們才會失去聯繫。當我向他表示，他的許多捍衛者向我暗示，那件案子的錯誤報導，都是利馬一家人的錯，尤其是大衛的母親，因為她一頭熱地相信實驗會成功，以及想要取悅曼尼，才會給曼尼「一幅瑰麗前景」。曼尼顯然被這項說法冒犯了。

「我才沒得到什麼瑰麗前景呢。」他激動地說，彷彿我那麼說，是在暗示他在評估實驗進展時，沒有考慮到這種來自母親偏見的影響，對此他深受刺激。「對我來說，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家人不再來約翰霍普金斯之後，我就什麼景況也不知道了。」

他仍舊堅持他對這件案例的原始說明，更駁斥我說他在和孩子一對一諮商中「誤解」了對方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地，他暗示我，大衛變回他的生物性別，說不定還不完全是他個人的決定。曼尼說：「我不知道他想要做什麼的想法裡，有多少是人家教的，因為我很久沒見過他了。」他同時也暗示，戴蒙和西蒙森的報告暗藏玄機。「沒有理由將我排除在

後續追蹤之外，不是嗎？」他問：「有人拿著刀子在背後捅我，但在科學界這種事情也算常見。當你才把頭從草堆裡抬起來，獵人的槍已經準備好要射殺你了。」當戴蒙得知這些看法時，他說他之前十五年，一直不斷邀請曼尼共同發表或出版雙胞胎的訊息，但總是沒有回音。

當我問曼尼，戴蒙認為應該延緩嬰兒的變性手術，直到他們夠大到可以表達自己想法時再說，曼尼變得非常生氣。很明顯地，曼尼忘了自己在哈佛的論文裡，檢視過兩百五十多名未經治療的陰陽人後所下的結論。他斷然地否決一個生殖器官不明確的人，能從童年倖存下來的想法。「我看過那樣的受害者，」他說：「我聽過那些可憐人，描述他們怎樣關在房間內不敢出去，生怕被別人看到。」曼尼堅稱，出生後儘早進行手術，才是小孩未來幸福的唯一保證。「你不能做個沒有性別的人。」他宣稱。他還說，戴蒙的建議會讓陰陽人重回在羞辱中將自己關起來，以及從事「馬戲團怪胎」工作的日子。

曼尼拒絕談論任何私生活問題。「你想要引誘我掉入陷阱，」他陰鬱地說：「就跟我的病思想陷害我一樣。」

此時曼尼似乎決定要掛電話了。在他掛電話之前，我提醒他，他的經典著作《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這本書還在發行，書中報導雙胞胎案例是成功的。我問他，是不是值得在未來新版中作些內容上的修正。他冷淡地說：「到那時我早死了。」



雖然這聽起來有點像最後結語的意味，但卻不是曼尼對這個案例最後的評論。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在《滾石雜誌》發表文章之後，他再度打破他在媒體上的沈默，同意接受紐西蘭雜誌《傾聽者》(The Listeners)那位同情他的作者和好朋友金恩(Michael King)訪談。其中，曼尼把戴蒙與西蒙森的「強／瓊」文章，以及我在《滾石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視為對抗他的陰謀之舉。《傾聽者》一文甚至暗示，大衛和他的家人是為了錢，才精心編織了布蘭達生活的謊言，因為大衛決定要合作這本書，而電影製片也對他的傳奇故事表示興趣。金恩的文章將曼尼描述成一名儘管有爭議，但卻「出奇有彈性且樂觀」的人。文章最後提到，曼尼在美國各大獎助研究的機構還享有不墜的地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最近還通過他一項重大的新計畫，是關於性倒錯或『性變態』當代知識的界定與整理。」金恩報導。我在一九九九年夏天詢問國家衛生研究院，得知曼尼拿的依舊是國家衛生研究院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核發給他的研究獎助。他最新的續約金額為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六美元。

曼尼在學術界也不乏擁護者，尤其在心理學教授中，許多人目前的終身教職及臨床聘

約，都是建立在曼尼性心理學發展理論的宣揚及散播上。其中一位更為投入熱心也比較聰明的捍衛者，是祖克(Kenneth Zucker)，他是多倫多克拉克精神病學研究所(Clark 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心理學家，長期信奉曼尼性別認同形成過程中的養育派觀點。(祖克多年來在他的臨床研究中，試圖修正男孩或女孩的同性戀和變性癖行為)。在戴蒙和西蒙森文章發表幾個月後，祖克寫了一篇名為「養育的實驗」(Experiment of Nurture)的文章，以直接回應強／瓊案例的公開為架構。祖克顯示自己環境學家的傾向，認為雙胞胎案例的失敗，並非因為大衛擁有男性生理之故，而是因為某些「社會心理因素」所導致，特別是「父母對當初決定把嬰兒變性為女孩的矛盾情結」。

像這樣把案例失敗的過錯怪罪於朗恩和真娜缺乏決心，正是許多曼尼的捍衛者所做的事，而非僅止於祖克一個人。許多曼尼的追隨者在接受我訪問時，也曾經作過相同的指控。若非所有證據都歷歷顯示，朗恩和真娜對這項實驗可說是謙卑地盡心盡力(更別說連曼尼自己，在這個案例的相關報告中，都不斷描述朗恩和真娜是一對特別會撫養女兒、特別盡責的父母)，這些指控可能會更有分量。可以確定的是，實驗失敗的消息一出現，謠言也隨之而起，而且很明顯是曼尼走漏給科學界的。這些傳聞說，朗恩和真娜是鄉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他們嚴格的宗教和文化價值觀，讓他們從一開始就無法接受孩子的變性，因此他們才會下意識地破壞了這個實驗。事實上，朗恩和真娜是在溫尼伯的現代都會區長



大，而且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此生活（除了年少時期在農場上度過的三年之外），而且兩人就跟曼尼本身一樣，完全拒絕接受父母親的基本派教義信仰，甚至到了拒絕在門諾教堂結婚的地步。所有新的證據都正好是相反的，朗恩和真娜都不死守過時的男女角色刻板印象，不會無法接受有個只是「男人婆」的女兒，同時他們所處的一九七〇年代的溫尼伯（各種文化、宗教、背景、種族和社會經濟階級兼容並蓄、共通共容），也不會因為小女孩和僵硬的女性刻板形象不符，就排斥她。

然而，祖克的報告不只關心未指明的、對這案例應有負面影響的「社會心理因素」，他也同時也提出了第二件正常男嬰被當成女孩來撫養的案例，以及他的長期後續追蹤。這件案例和大衛的案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個孩子很巧合地，也是加拿大人，而且也是因為電灼器功能故障而喪失陰莖，並在一九七一年，當他七個月大的時候，動了去勢手術變性為女孩。現在她已經二十六歲了，祖克描述這名病患依舊以女性身分生活著。「就她記憶所及，她不記得曾經懷疑過自己不是女性，」祖克寫道：「也沒有表達過作為女性任何不適應的感覺。」但同時，祖克也承認，這個案例還不能看作是性別指定有效性的純金範例，因為他得說明，病患在小時候一直喜歡玩「那些典型男性化的玩具和遊戲」；而她長大成人後，她也擔任「那種幾乎全是男性的『藍領階級』工作」；現在她正和另外一名女子同居，這是她第二次和女性建立重要的性關係。


儘管如此，祖克還是作出結論：「在這個案例中……在女性性別認同的分化上，養育實驗是成功的。」他說這個案例提出有力的證據，顯示以女性撫養的事實，「可以超越正常胎兒期男性生物學的任何假定影響」。

對於這些看似不連貫的結論感到吃驚，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到祖克多倫多的辦公室和他討論這個案例。我們的談話，只讓人對報告的結論產生了更多疑問，因為當我問祖克，病患說她從未對自己的性別有任何質疑，她有沒有可能只是說研究者想聽的話時，祖克完全無法回答我的問題。至此我已經明白，這是所有性學研究中特有的現象，亦即依賴病患的見證，特別是在變性這個充滿緊張及敏感的世界中。就像一名北美洲中性人協會成員告訴我的：「你覺得跟別人談這些事既尷尬又丟臉，所以你基本上會告訴他們任何事情，只要能儘早脫身。」祖克同意，這樣的情形確不少，但他無法說明這樣的情況在我所質疑的案例中是否成立。理由很簡單：他從未跟這名病患見過面，他的報告完全依據其他列名共同作者的人提供給他的資訊而來。這當中包括了一位從未受過性別認同評估訓練的婦產科醫生，以及一名精神醫生，後者和那個女性只作過兩次面談，第一次是在她十六歲，第二次則是她二十六歲的時候。

這份報告的結論，還有更多的理由讓人感到不安，那跟它隱晦的出處有關。在我和祖克即將結束訪談，我關掉錄音機之後，他才洩漏這份報告還有另一名匿名合作者。當這位



研究者得知該論文研究人員的努力時，便馬上提供了他在病患童年早期蒐集的記錄。這名研究者就是曼尼，他曾經授權且監督該病患在嬰兒時期的變性過程，還曾經親自跟小孩作過幾次年度追蹤諮商，直到她不再返回約翰霍普金斯之後才停止；至於原因為何，祖克在報告中並未提及。

The image consists of four quadrants, each containing a grayscale halftone portrait of a man's face. The portraits are arranged in a 2x2 grid. The central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top two quadrants.

第十六章

漸入坦途



自從布蘭達轉變為大衛以後已經二十年了，這個變身也成為這個家庭運氣的分界點。過去一直為立業苦苦掙扎的朗恩，終於建立起一群建設公司和工廠的忠實主顧。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他一年薪水已經四萬塊，可以說是他這輩子所賺過最多的錢了。真娜則繼續看她的精神醫師。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透過鋁的化學藥物治療，她的沮喪減輕了不少。「我終於發現自己究竟是哪一種人，」她說：「我去找我的孩子，跟他們道歉。我說：『我知道自己有時候不可理喻，而你們有時候對我總是小心翼翼，因為你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你們不會完全信任我，或是會覺得對我沒有信心。』我跟他們說，我真的覺得非常抱歉。」

朗恩的經濟狀況好轉，加上真娜的情緒健康，讓夫妻倆享受到從結婚初期之後就不曾擁有的和諧。「我願意為朗恩犧牲自己，」真娜在一九九八年夏天這樣告訴我：「事實上，我記得曼尼博士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老是說做愛；那不過是性行為罷了。』當時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現在我知道了。我跟朗恩之間是愛，我們是做愛。」

朗恩和真娜兩人都沒有假裝自己可以完全忘卻過去。比起朗恩，真娜更常談到三十年前讓兒子變成女兒的決定，所帶來主要是內疚和悲傷的情緒。朗恩一向覺得自己很難直接談到這些話題，不過儘管如此，他還是會用他比較保留、比較沒自信的方式來陳述。

「我在想，」我在第一次訪談時就問他：「你是否已經到了某種階段，忘了這件事情曾經發生過？」

朗恩搖搖頭。「不會，」他說：「我們絕不會忘記。」然後他又說了一次：「絕對不會忘。」然後又一遍：「絕對不會忘。」

我想起我曾經在英格曼森醫生的治療筆記上，看到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她和真娜與朗恩私人面談後她寫下來的註記。在標題「反轉」(counter transformation, 心理學名詞，用來描述治療者對病患產生的情緒經驗)下，英格曼森醫生寫著：「需要保護他們。」我現在也覺得有相同的需要。

「我知道大衛一點也不怪你們，」我告訴朗恩：「他將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全都歸功於你和真娜。」

朗恩虛弱地笑了一下，眨乾眼中的淚水。「我很高興他這麼想，」朗恩說：「但我知道我是否也這樣覺得。」

但也許在我們正式訪談結束之後，從後院走進屋子時，朗恩才給我機會真正了解到他對於實驗失敗的情緒。朗恩為我們倆各倒了一杯皇家威士忌，並邀請我一起觀賞他最喜歡的一部片子。那天我很累，所以我告訴他我也許應該回去旅館早點休息。朗恩以奇怪、與以往不同的堅持要我留下來。「這真的是一部好片子，」他說：「我特地請布萊恩幫我從



HBO上錄下來的。我看過差不多二十次了。」他說，這部片子叫作《十字路口》(Crossroads)。我很快就知道再堅持也沒有意義，因為此時真娜（也很喜歡這部片子）也加入朗恩熱情邀約的行列，於是我就跟著他們到地下室去，一起坐在電視機前。

在利馬家看的這部片子，我約略記得電影的情節。雷夫馬奇歐(Ralph Macchio)扮演一名趾高氣昂的年輕藍調吉他手，他和一名八十歲的盲眼藍調樂手威利(Willie Brown)有一段忘年之交。兩人結伴從紐約市一路來到盲眼威利在密西西比的家鄉，他說他在家鄉還有些「未料理完的事」要處理。當萊庫德(Ry Cooder)充滿感情的藍調吉他配樂隨著電影片頭揚起時，真娜轉頭對我說：「我們都好喜歡這個音樂。我想你得飽受折磨之後才會回頭愛上藍調吧。」因為這部電影的細節鋪陳，以及對這對老少之間那種困難重重、卻又感情深厚的關係的著墨，使得它比我預期的還要好看；不過當故事發展到最後一幕時，我發現我仍然在努力趕走睡意，此時電影場景來到密西西比鄉村內陸，一條顛簸又塵沙飛揚的十字路口——此際我整個人開始清醒了起來。

這部電影故事是根據藍調吉他樂手羅伯強森(Robert Johnson)著名的傳奇改編，據說他高超的吉他技巧，是和魔鬼在「十字路口」簽下交易得來的。電影現在揭露，原來盲眼威利早在六十多年前、他十七歲的時候，有過類似的交易，但是盲眼威利並沒有成名變成大人物，相反地，他流落到哈林區(Harlem)的老人院中，一貧如洗。如今他返鄉是為了算帳。

站在十字路口上一棵光禿禿的大樹陰影下，他看著那名不知從何處現身、多年以前和他簽定條約的時髦光鮮、能言善道、露齒而笑的男子。兩人面對著面站著。坐在我右邊的扶手椅上的朗恩，放下了威士忌和七喜，微微向前傾坐，把臉湊近了電視螢幕。

面對這個以壞交易騙他的男人，威利要求這名黑衣男子撕掉他們之間簽下的合約——「就饒了我吧。」

黑衣男子嘲諷地笑著：「我幹嘛這麼做啊？」

這名男子的漫不經心激怒了威利。「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威利叫道：「我卻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我一無所成，一無所得！」

但這名露齒笑的黑衣男子沒有任何一句道歉。「一無所成難道不是和我們原先想要的一樣好嗎！」

朗恩和真娜兩人都非常專心傾聽這段對話中的每個字，彷彿他們非常期待這一次看到的故事，會有不同的結局。這場戲結束後，朗恩把背靠回椅子上，然後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眼光調開。在我們那天漫長的訪談中，有好幾次我都試著想讓朗恩談一談，他對曼尼，以及他說服他們夫妻倆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究竟有什麼感受，他也好幾次努力想回答我的問題，但又猶豫不決、吞吞吐吐，很顯然無法說出他心中所有的想法。此時我覺得我已經得到答案了。朗恩除了遺憾和內疚之外，還明顯地混合著被背叛的憤怒，深埋在他



內心深處，非言語所能表達。

朗恩和真娜的這些情緒，不只限於對那個他們同意變為女兒的兒子而已，因為大衛絕不是這起不幸事件中唯一的受害者，他的對照組也深受傷害，而且傷得很重，到現在還難以忘懷。在利馬全家飛往英屬哥倫比亞省之前的那個春天，布萊恩的順手牽羊事件終究並非單一的插曲，而是更嚴重犯罪事件的前奏。

「我十三歲時，和一群壞胚子混在一起，」布萊恩解釋：「剛開始只是喝酒抽煙，最後就開始偷車嗑藥打架了。我個人是從來沒有持槍搶劫，也從來沒有真正把人傷得很重……」然後布萊恩想了一會兒，又修正了這句話：「有個人我是把他揍得蠻慘的。」他指的是有次打架，他把一個男孩的手給打爛，還因此上了法院。聽完一連串布萊恩年輕氣盛時的暴力犯罪事件，我卻迷糊了。即使在成年之後，和大衛那種傳統男性態度比起來，布萊恩很清楚地更具審美自覺與敏感氣質，與他年少時不斷滋事生非、暴力相向的事蹟，實在很難想像是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那是我不能讓大家看到的一面，」他說：「善感的人只會淪落在最後頭，硬漢則贏得尊重，不會被騷擾。這樣說很不好，但事實就是如此，他總是贏得女孩芳心；所有的派對都會邀請他。」

對布萊恩來說，朋友能接納他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他覺得自己被父母遺棄了。「我在成長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但他們必須處理我姊姊的問題，她的問題嚴重多了。」布萊恩

說：「你不妨試著想像，你整個人生成長過程中，自己的問題都不被看重是什麼滋味！」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布萊恩從真娜那兒得知姊姊的真實出生狀況——跟朗恩告訴布蘭達是同一天。

「母親當時在停車場工作，」布萊恩說：「她打電話給我說：『布萊恩，我得告訴你一件事。』所以我就在她上班的時候去找她，到她坐著的收銀亭裡。我們一邊喝著咖啡，她一邊說：『是關於布蘭達的事。』然後她說：『布蘭達其實是你的哥哥。』我聽了非常生氣。」

布萊恩的反應相當激動。他從椅子上跳起來，揮拳打破了亭子的強化玻璃窗。「我打破了兩面玻璃，」布萊恩回憶：「我非常光火。然後我冷靜下來，媽媽告訴我所有發生過的事，包括閹割和每件事。我說：『現在我可以了解了，我可以把事件原貌拼湊起來了。一切都有道理了。』但是我覺得：『可惡，原來我過去這十四年來的生活都是一場謊言。』」

布萊恩還有其他情緒上的障礙要克服。在知道真相的當天稍晚，他第一次看到雙胞胎哥哥時，這種情緒變得明確起來。「大衛穿了一套西裝，」布萊恩回憶：「他問我：『你覺得如何？』我說：『嘿，你看起來挺不錯的。我很替你高興。』」不過布萊恩承認，大衛的變性帶給他複雜的情緒。在過去，布萊恩一直是家中的獨子，讓他覺得自己很特別，現



在連這種感覺都沒了。「我百分之百支持他。」布萊恩說：「我覺得鬆了一口氣，因為現在他終於能夠融入這個社會了。不過同時，我也不再是大哥了。」

這個快速、情緒上令人困擾的事情轉變究竟影響布萊恩多深，在一年後才顯現出來。那是在雙胞胎十六歲生日前沒多久，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大衛動第一次陰莖手術的前兩個星期，布萊恩被送到聖伯尼菲斯醫院急診室洗胃，他喝下了一瓶排水管清潔劑。那時，布萊恩告訴家人，他自殺是因為一個女孩要跟他分手，如今布萊恩承認那並非事實。「媽媽擔心大衛擔心得要命，」他說：「只要醒著，都是大衛、大衛個不停，而『布萊恩沒問題，他會照顧自己。』我的任何問題，和大衛比起來都是芝麻小事，所以好像我得做些什麼事來吸引大家一點注意。」

在他十六歲那年，在讓父母錯愕生氣的情況下，布萊恩輟學到加油站工作。他搬出家裡開始和女友同居，十九歲那年跟女友結婚，生了兩個小孩。他們的婚姻生活爭吵不斷，幾年後他們彼此惡言相向、以離婚收場。

布萊恩的生活在離婚後到達最低潮。沒有工作、還得獨力撫養兩個小孩，他開始酗酒，也深受嚴重憂鬱症之苦。他的孩子暫時離開他的監護，和朗恩與真娜一起住了六個月。在那段期間，布萊恩開始振作自己，讓生活重回正軌。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他找到一份鐵工廠車床的工作，工資很不錯。他又再婚，生了個女兒，之後便搬到在溫尼伯西區

買的房子，抗憂鬱藥(Prozac)則穩定了他的情緒。

除了他的太太和小孩，布萊恩說全世界他最了解的，就是他的哥哥了。兩兄弟之間，雖然有時候還是偶爾互相較勁，甚至到了成年，還讓兄弟倆產生嚴重爭吵，不過他們彼此內心還是相當契合。然而布萊恩自己也承認，就跟他的父母一樣，他對大衛也有罪惡感。這種內疚得回溯到大約在阿格西道小學六年級時，當時布萊恩與他在人際關係上被遺棄的姊姊保持距離。「我可以選擇，」布萊恩說：「和朋友或是和姊姊在一起。他們表達得很清楚，很有技巧但很清楚，說我可以自己選擇。」他選擇了朋友——一個他永遠無法完全原諒自己的抉擇。「我想要有自己的生活。」他說：「我背叛了布蘭達。」一直要到多年以後，在大衛以真正的性別生活了大約五年以後，他們兄弟倆才又再度親密起來。

一九九七年六月末，在我們第一次會面中，布萊恩驕傲地臚列出他們兄弟倆驚人的相似處，他把大衛和自己，拿來跟那些出生時就分開、長大後又重逢的同卵雙胞胎相比，發現他們的生活有非常神奇的重點。「我和大衛都在九月結婚，」他告訴我：「我們都各有一隻狗一隻貓，都是工廠員工，賺的錢都差不多。我們都喜歡看《人物志》(Biography)、《10/10》(20/20)、《第五權》(Fifth Estate)、《六十分鐘》這些節目，都喜歡貓王。在某方面來說，我一直都是和哥哥一起對抗這個世界。」



自從大衛最後一次和曼尼博士見面，也就是在這位著名的性學專家在他父母家的客廳裡給了他十五塊錢之後，已經二十多年了。在這段時間內，大衛經常幻想，如果他們真的面對面，他會對這個心理學家說些或做些什麼呢？他承認年輕一點時，他幻想過暴力以對，不過現在不再這樣想了。他決定要繼續自己的生活，拒絕沈溺在無法改變的過去中。在戴蒙和西蒙森的報告當中，他們形容大衛是一名「往前看的人」，在日常對話當中，戴蒙則稱他為真正的英雄。事實上，大衛現在的生活，和三十三年前那位心理學家宣稱他絕不會結婚、「必須離群索居」的可怕診斷完全相反。但是，對他來說，卻也不可能完全將過去拋諸腦後。在我們所有的訪談過程中，當大衛談起他特殊的童年與年少生活時，坦率且毫無掩飾，但他並沒有自憐自艾。他的痛苦是強烈的，而他的倖存則幾近奇蹟，這些都使得他沒受過學校訓練的言談，冠上了一圈天啟智慧的光環。

「我不責怪父母親，」他告訴我：「很多人會對此感到驚訝，但他們必須設身處地，過過看我的生活，才知道我的父母其實犧牲了很多。我父親是個非常特殊的人，他內心澎湃，卻不知如何表達自己。但你知道，你可以從他的眼神靈魂看出他很痛苦，而且他很在

乎你、愛你。

「我的母親就好得多，她會尋求協助。她承認自己做錯了事，有些人連這點都做不來呢。你知道，我很小的時候，對母親有股迷戀，我常常摘蒲公英送給她。對我來說，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了。」

「當我想到弟弟小時候的樣子，我眼前就浮現那個七歲大、剃個光頭、眼睛像小狗、向我求救的孩子。『救救我！救救我！』他會惹麻煩，跟人打架，然後我會全力把他救出來。連又瘦又乾的傢伙都可以把他打得亂七八糟。他跑來躲在我身後！因為我的穿著，我打起來看起來很好笑——我可不是故意要擔任那個拯救他的角色。我爸爸知道我跟人打架還會罵我，因為他以為如此一來，布萊恩就得保護我：『你害弟弟必須那樣做，這是不公平的。』我試著解釋：『我不是幫弟弟打架，是幫我自己打架。』但解釋一點用也沒有。我不會奪走布萊恩的任何東西，他是因為我才不好過的。那些事是針對我，不是他。當他們找他麻煩時，就嘲笑我。『那是你野蠻的姊姊。』」

「我的童年，是命中注定的，我不願多想。但我準備睡覺時，這些蠢念頭就會鑽進我的腦子裡，我想把它們甩掉，我說：『我要想些別的事情』，但它還是會跳回來我的腦袋裡：我以前外表的記憶、被同學欺負的記憶、掙扎求生的記憶等等。」

「如果我做個沒有陰莖的小男孩而長大呢？喔，我還是會有問題的，但問題不會像現



在那樣複雜。如果父母把我當男孩子養，其他人會更接受我。如果他們讓我保持那個樣子，我會好過得多，因為當我再變回去的時候，就面臨兩個問題了，不只是一個，因為他們試圖幫我洗腦，讓我接受自己是個女孩，因此你腦子裡會有心理上的障礙。當我和太太親熱時，它有時會纏著我，思緒三不五時就會回到小時候的我，它會讓你……我承認，有時候我必須從床上起來，跑到浴室裡嘔吐。

「你知道，如果我沒手沒腳得坐輪椅，得靠著嘴裡的操縱桿才能移動東西，這會讓我比較不像人嗎？可是他們似乎暗示，你如果沒有陰莖，就啥都不是。你一旦失去它，你就什麼也不是，他們就必須幫你動手術、打荷爾蒙，讓你變成個什麼。就好像你是個零蛋，好像你整個人格、所有的一切，都要看——全都得決定於兩腿之間有什麼東西一樣。對我來說，那是無知。我沒有受過那些科學家、醫生和心理學家受過的那種教育，但對我來說，這是非常無知的。如果一名女子失去了乳房，你會把她變成男生嗎？好讓她覺得『更完整、更圓滿』？」

「我為女人感到遺憾。我曾經身處其境。『你是個小淑女——去廚房吧。』或者是『我們不要你砍柴——你可能會傷了自己。』我記得當我還小的時候，女人為平權極力抗爭。我說：『抗爭得有理。』我大概能體會到女性當時在社會中的位置——在很下層的地方。別人就是這樣看待我的。我不想淪落到那樣的位置去。我覺得，我也能做其他人能做

的事！但是，『喔，你是女孩兒，你玩球會受傷的。』

「在阿格西道小學中，有個男孩叫作塔比(Tubby Wayne)，他是隻大沙豬。『女人是糞土；她們不能做任何男人能做的事。』他一直說：『你什麼也不知道。你是個女生，女孩子什麼也不懂。』我終於跟他說：『你以為你很悍嗎？那麼你打我看看啊。快來打我啊。』他說：『不要，我不會打你的；你是個女生。』『別這樣，你打我啊。我才不會容忍這件事呢。』他不肯打我，所以我就給了他一拳——然後他嘲笑我。我猜，他不打我是件好事吧。但我在想，別拿『我不打女生』這種藉口當擋箭牌呀。」

「跟我一起工作的男性都不知道我發生的事情。我是說，我在屠宰場工作，那裡都是男人。你能想像嗎？——『那兒有個變態，他小時候竟然穿裙子耶。』他們老是滿口沙豬言論，就像他們老說自己是家裡的老大。他們看著我問我說：『誰是老大？』我說：『聽著，老兄，在我家，我們是夥伴關係。那不表示我無能；有時候我作主，有時候不是我作主。但不管怎麼說，就是夥伴關係。我是說，誰要個沒腦袋的女人，只會盲從你呢？那與其說是老婆，還不如更像是奴隸呢。你不會想要個奴隸的，你要的是有她自己想法的人，能幫你拉回正軌的人，能為你指引正確方向的人。要跟那種完全愚蠢、只會盲從你的人講話，還真的很難。」

「但你知道，倘若我以前過的是正常的生活，我剛講的這些事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可能就會是那些沙豬中的一個，就是那種去上班，累壞了，回到家，灌一瓶啤酒，看運動節目的男人。如果我在電視上看到像我這樣的人，我會坐在那邊說：『老天，真噁心啊。』我就會是那個樣子。所以一旦知道那個人是我，你可以了解，當我回頭看這些事情時，我會覺得有多噁心了。你會希望上帝讓你跟任何人交換位置。

「在我試圖自殺之後，他們讓我住進精神病院。他們立刻就想要把你放到團體聚會裡。你甚至無法自己面對這個情況，他們居然還要把你關在一個都是人的房間內，讓你可以和一堆陌生人討論自己的病情，然後有個大夫一直告訴我，說我想自殺是不對的。嗯，他當然可以很輕鬆地坐在那裡說：『丟臉，丟臉，丟臉啊。』這個人一直念到大學，拿了學位，說不定還住在一棟不錯的房子裡，他有二、二個小孩，生活正常。別拿那樣的生活來跟我比。不一樣的。」

「我獨處的時候最快樂。這並不代表我不友善，只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覺得比較自在。不是孤獨，是放鬆，是平靜。那讓我想起祖父的農場，如果我去那兒散個步，我就會得到全然的平靜。但是我從未獨自在那兒過，即使在那種地方，你仍然會覺得被包圍。到底被什麼包圍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就是無法獨處。」

「我還是常常會幻想，如果有個親生小孩會是什麼樣：看看孩子會有多像我。這其實不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那是……你就是會有那樣的感覺。但我愛我的孩子，他們

是我的孩子，不只是繼子女而已。我會想要告訴我的孩子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無法向他們隱瞞這樣的事情，我會非常不自在的。我已經在我的老大十五歲的時候，告訴她這件事。她當時臉上有一種表情，好像在說：『你穿洋裝？』但總之，她接受得很好。她說：『我不會因此少愛你一些，爸爸。』我知道我的老二也會了解，可是我還得多等幾年才會告訴她。我必須等到她再長大很多才行。我的兒子？我會等到他大約十五歲時再告訴他。

「我透過我的兒子生活。我兒子做的每件事，都是我。當我的兒子對一個女孩子有點興趣時，他靠在籬笆上，女孩走過來說：『嗨』，他就臉紅了；當他參加小童軍，那也是我。我是透過他在活著。當他成功，彷彿就是我的成功。某些專家可能並不同意我透過他生活，但我從未有過任何童年啊。」

「要告訴我兒子實情，將會比告訴女兒要難得多。你永遠不會明白父子間的那種感覺。他可能會從此對我另眼相看。你知道的：『我父親穿洋裝耶，我父親有個女生的名字，我父親以前是女生。』我是說，真相實在是太難消化。你可以看得出來別人能不能接受或是覺得尷尬。若他以異樣眼光看我……」

「我實在恨透了那種覺得自己很丟臉的感覺。那種感覺永遠都不會消失。我並沒有做錯什麼，但是好像你注定就要覺得自己丟臉似的。每次一想到我穿裙子、有女孩的名字、留長頭髮和其他事情，我就覺得下半輩子可能都會帶著這種感覺了。你無法抹滅那樣的記



憶。我已經盡力求生了。我不斷告訴自己：『那不是我的錯。發生的一切都不是我的錯。』

「媽媽和爸爸希望這麼做會成功，我也會快樂；那是每個父母對自己孩子的夢想。但是我不能為了父母而開心，我必須為自己快樂。你不能當那種你根本就不是的人，你必須做你自己。」

在我著手和大衛展開面談前，他的前精神醫師墨姬警告我，我會碰到一段危險的心理過程。她害怕大衛在從目前生活跳躍到過去生活的過程中，會無法不產生嚴重沮喪，無法順利跨越那個鴻溝。她叮嚀我，在引領大衛回憶他長久以來試圖想要忘掉的過去和事件時，要特別謹慎小心、步步為營。我很在意她的建議，但在我和大衛的談話中（通常都是利用早上緊湊的時間，但一坐下來深談，往往歷時六個小時），我發現他常常因為我提問時太小心而生氣。他似乎只希望毫無畏懼地回到過去，沒有顧忌地說出他所有的遭遇，讓他的真實人生留下永遠的記錄，然後才可以重新擁有自己的人生。我同時也發現到，他希望重新擁有自己的人生，不只是以那種和我訪談的抽象方式而已。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中，我找到他的老朋友海瑟，並和她談了一下。她還住在溫尼伯，

但是已經結婚冠了夫姓，目前是幼稚園老師。就像我和其他所有認識孩提時布蘭達的人訪談時情況一樣（大衛授權我可以向他們揭露他的病史），我剛開始並沒有告訴她布蘭達出生時的真相，以免誤導她對這個女生的記憶和印象；不過當我最後終於跟她透露，其實布蘭達出生時是男孩，他現在以男性身分生活、名叫大衛時，她說她想見見他。我記得大衛十五年前曾經在小型賽車場避開海瑟，我擔心他對這項消息會有什麼反應。當大衛表明他也願意去見她時，我很訝異。那個星期天，他們私下見面共進午餐，而我則和珍待在家裡，試圖安撫她大部分是假裝的妒嫉——不過後來因為大衛幾乎四個小時之後才回到家，這妒嫉竟然有些成真了。當他回家時，他為太太帶了朵紅玫瑰回來（很典型的體貼行為），但同時也帶著一種表情。在他臉上，有一種我過去從未見過的表情，一種安詳且幸福的平和表情。珍問他他們談什麼談了這麼久，大衛甚至還拿他可怕的過去來開玩笑。「喔，」他說：「就是姊妹淘的對話嘛！」事實上，他後來說，他和海瑟討論了童年的各個面向，比較一下他們記得的共同回憶，重新檢視他們的友情，畢竟他們兩人當時都不知道真正的實情。這次的會面，很明顯地卸下了大衛過去這二十年來背負的重擔。

但這些並不代表，為了這本書的研究目的，跟他一起重新檢視過去時，不會有痛苦、危險的時候——特別是當我遇到利馬家過去從未被揭露的最後一個祕密時：一個真娜過去為消除女兒對她真實性別的疑心，得不斷為布蘭達編造的善意謊言。這個善意的謊言，因



為父母的疏忽，從未跟大衛澄清，也因此埋藏了幾乎二十年，就像一顆未引爆的地雷。

在我八個月前第一次到溫尼伯時，大衛首先跟我提到關於母親的幾件事之一，就是她發表過詩作。他驕傲地跟我形容，他事實上曾經跟那些幫他母親印書的編輯們碰過面。當然，我很快就知道真娜詩人的故事是個計謀。由於我想要從大衛那兒了解，他在一九七九年十月遇到BBC記者那天的印象，我覺得保留這個詩作編輯的說法很不妥。我知道我必須戳破謊言。我儘可能地一再拖延，直到一九九八年初，我逗留在溫尼伯一個月的期間即將結束之際。我試著以溫和的方式告訴他這個新聞，但大衛仍然反應非常激烈。

「我為什麼要這樣得知真相？」他氣極了：「我已經是個三十二歲的男人了！」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中，他還是對母親「沒膽」告訴他真相這件事耿耿於懷；他大喊著自己一輩子都活在謊言中，他還說：「你根本想不到你信任且深愛的人會那樣做！」他的憤怒和沮喪真是非常可怕地強烈，不過感謝老天，大衛的盛怒很快便平息下來。隔天他去看母親，跟母親談到了這個欺騙。她對於自己忽視了這個最後的謊言而道歉，他們彼此言和。終於，揭發這最後一個長期以來的隱瞞，有了正面的效果。真娜說，那也去除了從大衛童年以來就縈繞不去的祕密與謊言所造成的障礙。有這樣的結果，我很高興，也終於放了心；不過同時，由於目睹了大衛世界末日般的盛怒，也讓我希望（並非第一次）他能夠去接受心理治療，以發洩他由於過去的事，而定期累積起來的那種旺盛盛怒。

不過，大衛從小跟精神健康這一行人士的不愉快經驗，幾乎可以保證他在長大後，絕對不會去看精神醫生——除非是他的老朋友麥肯蒂。不過這也不太可能，因為她已經八十三歲，早就退休了。然而，大衛和她還是好朋友。我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最後一次到溫尼伯時，他曾經陪我去造訪過她。儘管麥肯蒂現在已經有阿茲海默症的病徵，經常連自己的孩子都認不出來，但她卻立刻就認出大衛。她是個嬌小的女子，有著一頭長長的灰色髮絲，和仿若帶著面具、典型阿茲海默症的表情，但是當她看到大衛跨進她家門檻時，她的臉突然綻放出燦爛的微笑。

當大衛和麥肯蒂的隨身護士聊天時，我和她兩人則窩在前廳外小小的起居室內。幸運的是，我們來的那天麥肯蒂的記憶力特別好，她對於我的問題，回答雖然簡短，卻聲音清晰，很清楚地完全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我問麥肯蒂，她當時如何處理布蘭達這個棘手的案子。她聳了一下肩，說：「我只是試著體貼和支持她。」我問她，布蘭達是否曾經像過女孩子。「沒有，」她說：「一點都不像女生。」我想起曼尼博士曾經說過，布蘭達拒絕當女生的情況必須加以「訓練」，但是當地治療團隊的筆記中，完全沒有看過這方面的證據，而大衛也曾經清楚地說，麥肯蒂絕對沒有「訓練」他。不過我還是覺得我有義務問一聲：麥肯蒂是否一直都沒告訴布蘭達她真正的性別？「沒有。」她說。我問她，她是否曾經試過溫和地指引她別當個女孩。「沒



有，」麥肯蒂說：「她應該要自己了解、自己去做那些事。」

我對於麥肯蒂和她的病患之間，尤其是她和布蘭達之間特別的人性互動印象深刻，因此請教她她在精神治療上的大原則。她回答我：「抱著父母的心態。」然後她往走道那邊看了一眼，大衛的聲音從那兒傳來。「就像父母親一樣，」她補充說：「你就會經常欣賞他們。」我被「欣賞」這個字眼感動，這跟一般人會期望從精神醫生那兒聽到談論病患的說法如此不同，也或許是因為聽到像麥肯蒂這樣受過高等博士教育的醫師，如此形容一個像大衛這樣在屠宰場上班的清潔工人。不過很清楚的是，她對大衛的欣賞是完完全全的。

我問她，她有沒有看過任何曼尼的作品。她的臉，本來是一種很奇怪的僵硬狀態，皺起了眉頭。「看過。」她的聲音透露出明顯的厭惡。我問她對作品的看法如何。「我認為很不尋常。」她毫無感情地回答。

大衛進到房間來，她立刻顯得開心了起來。他蹲在她坐著的沙發前的地毯上。

他溫柔地說：「好久不見了。」

「有多久了呢？」

「至少十年了。」

「麥肯蒂開始治療你到現在幾乎有二十年了。」我說。

大衛看起來侷促不安。就在那天早上，他和我一起看麥肯蒂治療布蘭達的筆記，大衛

震驚地回憶起他曾經在他們最早開始治療時，對她所作的殘酷惡作劇。

他現在跟她道歉。「我把你畫得很可怕，」他說：「我還拿玩具槍挾持你。」

「我不介意。」她說。

「我還做了個有你名字的死亡執行書。」

麥肯蒂大笑，還假裝要拿她的拐杖。「你最好小心點！」她說。然後麥肯蒂表情就嚴肅了起來，看著大衛。他的笑容也褪去了。霎那間，彷彿回到了二十年前，這兩人再度成為當年的病患和醫生。事實上，麥肯蒂接下來的問話，就是精神醫學上的經典問題，問到了心理治療事業的最核心，也問到了人類追求自我了解這亙古不變志業的核心——我們大家都身處的志業。

「你還想改變什麼嗎？」她問。

大衛低頭看著雙手。他疲倦地嘆了一口氣，然後他看著她，笑了。「每一件我想過要做的事，」他說：「我都已經做了。」

在大衛做過的許多事情當中，最值得他驕傲的，是他決定要公開說出他的苦難，還有



他經過這個行動後所獲得的正面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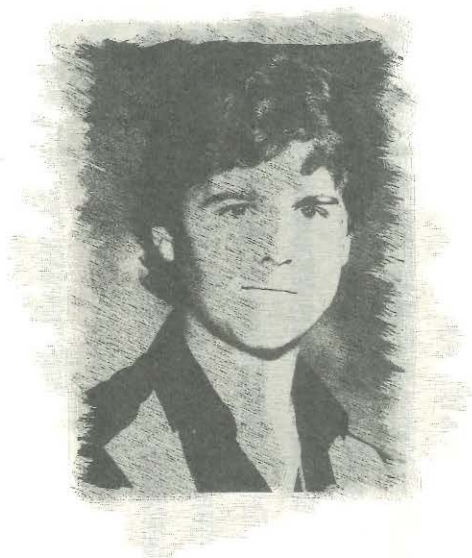
儘管有雀司的勇敢嘗試，儘管戴蒙花了三十年試圖警告醫生現今治療陰陽人的方式很危險，儘管雷納長期對變性年輕人的追蹤研究，醫學界還是不大願意談這個議題。但是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在戴蒙和西蒙森「強／瓊」文章所引發的爭議愈形升高之時，美國小兒科醫學會邀請戴蒙到他們有名的年度泌尿學家會議上發表演說。戴蒙談到這個失敗的雙胞胎案例，並提出他和西蒙森治療性器不規則或受損孩童的修正方法。他的演說得到醫師不斷的掌聲，這也是過去四十年來，醫學界第一次露出有可能改變長期原則的跡象。這是一個勝利的時刻，戴蒙自己不願邀功，他將功勞直接歸給大衛，多虧大衛願意說出自己被當成醫學界最有名（雖不自知）的「天竺鼠這段不平凡的人生」。

因為他的告白，大衛因此動搖了建立在曼尼工作上的臨床操作基礎；他也對風行了大半個二十世紀的理論，亦即佛洛伊德所說的，男孩或女孩健康的心理發展，取決於有沒有陰莖，提出了根本的質疑。這是大衛一開始就被指定為女孩的終極因素，也是現今神經生物醫學研究質疑的觀念，並讓科學家作出如同雷納博士的結論：「最重要的性器官並非生殖器，而是你的腦袋。」

大衛以另外一種方式說明了這點。當他談到從來不敢相信能有如此好運，同時扮演人夫、人父和家裡唯一一個掙錢養家活口的多重角色時，他對自己深以為傲。「我父親教導

我們，」他說：「真正的男人會對妻子好，讓家人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而且是個好父親。這些事情總加起來才算是個男人，而不只是會嘿咻嘿咻，只有性。我猜曼尼也許會認為我孩子的親生父親才是真正的男人，但他們並沒有好好照顧孩子。我有。那對我來說，才是男人。」

結語





科學的首要格言之一，就是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立基於單一實驗上。這項真理適用在戴蒙揭發雙胞胎案例的失敗上，也適用（或者說應該要適用）在曼尼原先宣稱它的成功上。雖然千真萬確的是，戴蒙表示大衛的案例並非獨立事件（他不斷針對陰陽人案例，從臨床和理論兩方面提出具有同樣後果的證據），但只有經過不斷的研究和持續追蹤變性為女孩的正常男孩案例，醫學科學才可能肯定地宣稱，究竟是先天或是後天的因素，主導了男人及女人、男孩及女孩的生成。

像這樣完全因為意外而喪失陰莖的案例，實屬稀有。然而由於大衛的案例引起高曝光率的辯論，已經顯示這樣的案例的確存在，大家也比過往更積極追蹤與報導。一九九八年十月，《泌尿學時報》(Urology Times) 刊載了一篇由哥倫比亞梅德林(Medellin)的安提歐奎亞大學(University of Antioquia)前小兒科及泌尿外科主任歐秋亞(Bernardo Ochoa)所撰寫的報導。文章中提到一名小男嬰，他的情況跟大衛類似，同樣也因為受傷失去陰莖，接著就藉由閹割、陰道手術和荷爾蒙治療變性成女孩——結果也和大衛驚人地類似。「她和她的家人接受了相當多的心理輔導，」歐秋亞報導：「然而，十四年後，當她邁入青少年時期，她要求重新變回男孩，因為她覺得自己不是女孩。」

為了追求進一步的資料，醫生和研究人員幾乎特別密切關注一九八五年發生在亞特蘭大北方醫院(Northside Hospital)的事件。當時有兩個正常發展的新生嬰兒，在同一天內因為

電子燒灼器發生問題，使得陰莖遭到嚴重灼傷。其中一名男嬰整個陰莖都燒壞了，另一名嬰孩也有相當大面積的灼傷。前者的父母同意進行手術，讓小孩變成女生；另外一名嬰孩的父母則選擇讓孩子接受整型手術，幫他做個人工陰莖。

這可是另一個百萬分之一的機會，另一個完全未經安排的命運實驗，兩名孩童剛好成為理想的對照控制組、活生生的實驗品，也提供了研究者絕佳的比較研究機會，得以比較兩人同樣面對失去陰莖的災難時，是變性好？還是人造陰莖可行？兩個孩子十四歲生日前夕，因為隱私權的關係，外界無法得知他們的狀況，而我因為和代表雙方父母控告北方醫院的律師們談過話，得以窺見非常小部分的報告。

山普森(Thomas Sampson)是代表安東尼奧(Antonio)父母的律師，他為他們贏得兩千兩百八十萬的賠償和解金。安東尼奧被當成男孩撫養。根據山普森的說法，安東尼奧如今的情況，要比當初他受傷時預期的好得多。他初期的學校生活曾有一段困難時期，因為他曾歷經多次人工陰莖的手術，以及來自同儕故意或非故意的殘酷對待。現在他十年級了，社交情況已經改善太多。他自我的男性認同沒有問題，至於他是否會有足夠信心，以他的人工陰莖進行性行為，或是生育自己的孩子，只有時間能分曉。

另一個孩子的命運外界比較少知道，也受到更小心的保護。出生不到兩個星期就動了去勢和變性手術，她的名字在法院上的文件上只有簡單的「無名氏嬰兒」(Baby Doe)幾個



字。一年半前，我曾經找過她的律師以及醫師，想詢問她的心理與情緒狀態，不過他們都拒絕回答。我自己能夠查證到的少許資料也不足以說明什麼。她還小時父母就離異，她則和母親住在一起——雖然她們未來的關係也沒人敢保證。根據參與處理過這個案例的律師表示，她最近已經交由法院指派的監護人看護。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最後一次到溫尼伯去看大衛時，跟他講到了無名氏女嬰的事情。他感到深深的悲哀，堅持要口述一封信給她的父母，他在信中表示，願意為她的父母或她本身提供意見或協助。但對方全無回音。「我不訝異，」大衛說：「我曾經也是過來人，我的父母也是。他們只是需要時間。」

從那時開始，大衛發現自己會夢到無名的她。在他的夢裡，她是個不能說話的小妹妹，努力地試圖在孩子們的黑板上塗鴉，好像想要表達些什麼。而大衛能和她產生特殊情感，並不讓人訝異，因為她不僅也遭遇了塑造大衛生命的意外和治療，他們之間更有非常怪誕的相似性。其中最明顯的是，一九八五年在亞特蘭大北方醫院受傷的這兩名小孩，都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也就是大衛和布萊恩兄弟出生的整整二十年之後。而在大衛宣布要成為男性的五年後，為無名氏嬰兒進行諮商的那位心理學家，正是曼尼博士。

謝辭

除了利馬一家人，還有書中其他答應與我會談的所有人之外，我還要謝謝在溫尼伯的梅爾斯 (Mel Myers)、溫斯坦 (Josh Weinstein)、丹納克斯 (John Danakas) 以及布萊克 (Keith Black) 等人給予我的重要協助。謝謝華盛頓特區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安柏 (Dave Amber)、倫敦 B B C 的萍托 (Sara Pinto)。感謝儒格太太 (Miriam Zuger)，在我第一次和她接觸時，她的先生才過世沒幾天，她提供我我非常珍貴的報告影本；還有迪娃 (Holly Devor)，她有兩本關於中性的著作；愛區 (Edward Eichel)，他給了我很難尋覓到的資料，亦即《培帝卡雜誌》所作的曼尼訪問文章；瑪莉安諾與馬文·譚尼 (Mariano and Marvin Tan) 兩位醫生，他們不斷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我雙胞胎的早年生活訊息；還有攝影師伯潤，他非常好心地送我一本他的攝影著作《兩個誕生》。同時也要感謝紐約醫學學會圖書館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Library)、紐約心理分析研究所 (New York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的圖書館，以及紐約社會圖書館 (New York Society Library) 的工作人員，本書有許多部分都是在這些地方寫成的。

如果不是我的朋友、《滾石雜誌》長期的編輯羅夫 (Bob Love)，就不會有這本書的問世。他協助我構成並潤飾原始文章的結構（這也形成了《性別天生》的敘述藍本），他永遠



有耐心聽我說明想法。也衷心感謝《滾石雜誌》的編輯以及發行人溫娜(Jann Wenner)，她從一開始就對這項計畫非常熱心，當她看到那篇文章一萬七千五百個字的初稿時，她的反應是大叫：「太棒了，我還要更多！」還要謝謝《滾石雜誌》其他協助這本書的同仁，他們也功不可沒：分別是福特岡(Erika Fortgang)、康羅伊(Tom Conroy)以及貝勒羅維茲(Marian Berelowitz)。

講到家人，我要特別感謝某些家人，他們提供我許多醫學與科學上的名詞和想法，讓我能這些領域內不致迷失方向：像是我的母親卡蘿(Carol)，一名註冊護士；我的兄弟泰德(Ted)，一名神經外科醫師；還有先父文森(Vincent)，曾在多倫多聖麥克醫院(St. Michael's Hospital)擔任多年的泌尿科主任，他每天晚上都會為我和我三個手足說醫學世界的故事，包括在一九七〇年早期，那些新生男嬰因為割包皮手術失去陰莖，而被變成女生的大新聞。我父親不是小兒泌尿科醫師，他本身沒作過嬰兒變性手術，但是他跟多數男性醫師一樣，都接受所受心理邏輯訓練的合理性。我努力藉由此書，向醫學界以及全世界，散布過去三十年來難以取得的相反證據，我希望他能以我的努力為榮。

當然還要感謝我的經紀人班可芙(Lisa Bankoff)，她讓我的企畫案得以呈現在哈潑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的瓊斯(Robert Jones)眼前。瓊斯不僅幫我的書作了最仔細和最藝術的編排，讓它免於冗長、重複和雜亂，居然也找得出時間在字裡行間空白處，解釋他每一項

建議的改變。當然我接納了他的所有建議。另外，也非常謝謝哈潑柯林斯的哈洛葳爾(Fiona Hallowell)。當然，如果書中仍有事實或解釋上的錯誤，實屬個人疏失。

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唐娜(Donna Mehalko)，她是我這本書的第一位讀者，我非常相信她的直覺。也要感謝我兒子約翰文森(John Vincent)。我在寫這本書時，他才出生十一個月，他可愛的模樣讓我特別能了解朗恩和真娜多年前所面對無法想像的恐怖。他那新生兒的哭聲，有時雖會讓我分心，卻也是個令人開心的刺激，讓我能夠在電腦前堅持敲到最後，寫完本書。